

在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征途上艰难跋涉，在为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血泪斑斑。那段历史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劫后余生的我已届耄耋之年，如果眼睛一闭，这桩冤案将永埋黄土之下。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促使我必须拿起笔来还历史之真实，但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ISBN978-962-450-626-6



定价：20.00元

求索

谭蝉雪 编著

●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本书简介：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甘肃河西走廊，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第四大案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共逮捕了43人，判刑25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枪毙2人，与本案有关的林昭亦不幸遇难。为什么大学师生会沦为阶下囚？为什么共产党县委书记、委员成了反革命？为什么老实种地的农民成了凶神恶煞的暴徒？本书将作出回答，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受害人血和泪的控诉！

求索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谭蝉雪 编著



作者简介：1934年出生于广东开平，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60年被捕入狱，判刑14年。1980年平反后曾在酒泉师范任教，1982年调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工作，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敦煌民俗：婚俗、丧俗、服饰及其他生活习俗，先后出版过七部专著。1998年退休，定居上海。

求索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

谭蝉雪 编著



2017.5.7日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心是颤动的,血是热的, 灵魂是圣洁的

——谭蝉雪:《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序

钱理群

这是一本血写的书。这是一本拷问我们灵魂的书。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书。

我们早就从已经成为民族圣女的林昭的叙述里,知道她有一群来自大西北荒原的战友:他们共同编印了《星火》杂志,在“万家墨面没蒿莱”的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希望之光,却因此而罹难。我们永远怀想他们,更渴望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当年究竟发出了什么声音,让执政者如此恐惧,非除之而后安?他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怎样一份精神遗产呢?

本书的编著者谭蝉雪,是其中的幸存者,她也因为人们这样的期待而感到责任的重大,经过近三十年的苦苦追寻,终于在有良知的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星火》的原稿,并且和同为难友的向承鉴先生分别写下了自己泣血的回忆。被淹没了整整四十九年的历史真相终于得以呈现,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本拿在手里都会颤抖的好沉重的书,我们将如何面对呢?

(一) 在理性支配下走向地狱

让我们首先进入历史。

我的耳旁响起了林昭的声音——

“我应该在那里,

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

不仅是和已经先行的朋友在一起，更要寻找新的战友。林昭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深刻的共性”。

林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时代思潮”和“阶级共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身在江南苏州水乡，并且是北京大学1957年《广场》传统继承人的林昭，和大西北腹地兰州大学的以张春元为首的右派学生，是因为共同的时代思潮，或者说是面对共同的时代问题而聚集，因为相同的阶级共性而形成“平等的联合”的。我们的讨论，就从这里展开。

说起“阶级共性”，自然要想到他们共同的身份：1957年的“右派”。其实，包括林昭在内，他们都是稀里糊涂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他们只是凭着出于本能的正义感，发表了当权者不愿意听到的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更没有自己的自觉的“阶级立场”。他们的真正“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建立，是在成为右派以后。也就是说，是反右运动把他们造就成了具有阶级自觉的反抗者。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我们也可以说，专制体制发动的反右运动也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本书的编著者说得很对：“到了农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这就是说，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是在中国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的，这是意义重大的。而且他们之到农村，不同于五四之后的民间运动者（也包括今天的志愿者）以改造农村为己任去农村，因此难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是以戴罪之身来到农村接受强制改造，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接受和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与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同时，他们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

题。

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中国农村最严峻的时刻来到那里的。因此，他们亲历了大跃进的狂热，浮夸，直接体验了大破坏造成的大饥荒，目睹了成片成片的农民的死亡和“人相食”的人间惨剧。谭蝉雪只要回想起她的房东老大爷直挺挺躺在床上活活饿死的情景，就仿佛听见大娘凄厉的哭喊声，心都会流血。她说：“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我能无动于衷吗？我能视而不见掉转头去捧着书本吗？”

这就说到了更为本质的问题：这些1957年的热血青年，血还是热的。这很不容易，极其难能可贵。因为超乎人们承受能力的现实苦难，早就把许多人从肉体到精神都压垮了。如谭蝉雪所说，即使是当年的右派，也或是努力改造，天真地等待重返校园，或是苟且活命，无可奈何地混日子，或是看穿世事，流落天涯，更有堕落而成为告密者，借出卖难友而自救，真正坚持理想，继续探索真理，为国为民之心不变的，已是凤毛麟角。万幸也不幸的是，林昭和她的战友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正是这样的一群不合时宜者。在今天许多人看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蒙冤受难，自身难保，却偏要怀着“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不能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承担解救民族灾难的重任。谭蝉雪说：“我感到责无旁贷，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人，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忧国忧民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祖国的命运！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濒临死亡的老百姓！”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向承鉴说得好：“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就只能是这样的选择。“‘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选择爆发”，“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之路。如果说五七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我不下地狱，谁下地获；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

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

历史将记下这一笔：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向承鉴说），正是这些已经被打入地狱里的右派，林昭、张春元、谭蝉雪、向承鉴们挺身而出，维护了理想、真理，维护了人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没有他们，这段历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们将无法向祖先和后代交代。在这个意义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战友们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的，他们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但也正如鲁迅所说：“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毁，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吗》）：这又是我们民族的最大悲哀。

（二）我们是农民的儿子

更加可贵的是，他们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清醒体认和充分自觉：“我们是老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于水深火热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他们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聚集在《星火》里的。这就意味着，这批1957年的受难者在1958-1960年的中国农村的炼狱中，经过了“困惑——悲愤——求索”的思想历程（向承鉴语），终于成长为有着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战斗目标的自觉的反抗者。这是一个林昭说的因“阶级共同性”而集合的群体。

那么，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他们将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阶级共同性”何在呢？我们可以看他们的自我命名。

首先是：“我们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最为关注，要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星火》不仅有直接反映农民心声的《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三月

的）农村一日》（向承鉴记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现场实录，而且有张春元撰写的重头文章《粮食问题》、《农民、农奴和奴隶》、《论人民公社》。他们计划将《论人民公社》一文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中共从底层到高层的干部，作为他们所要发动的拯救中国的运动的关键步骤。在这些文章里，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是农民问题。这不仅因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即新兴的农业无产阶级，将是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因此，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是否“背叛人民”，“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重要标准和尺度”。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察与判断：“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与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

他们要追问的，正是导致农村惊人的贫困，农民无产化的原因。

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对农民的经济剥夺。“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农民“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也彻底“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

其次，是对农民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剥夺：“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和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

主和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当代统治者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如选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对于农民来说，完全是骗局”，政治、人身自由的剥夺，就“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

其三，是对农民精神的控制：一方面，“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一方面，又在农村进行所谓“反右倾”运动，“打击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他们“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来自农民家庭或本人就是农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行政治思想上的“高压政策”，就使农民完全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任凭宰割。

他们还要追问，对农民经济、政治、思想的全面剥夺、控制背后的经济、政治原因。因而首先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路线提出质疑：“大搞与国计民生不相适应的工业建设，因而在积累资金、市场销售、产品收购、工农业发展速度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侵犯农民利益的措施”，其实质就是用对农民进行“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来实现国家工业化。被质疑的，还有当时所推行的对外援助、外贸政策：“用‘援助’、‘救济’、不等价交换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装出一付纸老虎相”，实际形成了对农民的更大压榨，而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首先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的基本原则。

更要质疑的，是国家体制和农民的关系，更要追问的是，农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实际的，而不是口头的地位。回答是严峻的：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处于“国家奴隶”即“农奴”的地位。

造成农民的绝对贫困的原因，还有“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惨重的损失”；“兴修不切实际、不获实利、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浪费劳力，朝改夕变的农业技术改革；费人费钱的地方工业；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征用，农村劳力的紧张，田亩荒芜”，等等，都把农业生产和农民逼到破产的绝境。

这就必然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革命本来“实质就是农民战争”，并且是在农民的牺牲、支持下取得胜利的，党内“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党的力量就在于和农民的“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的联系”；现在却用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夺手段“对待自己过去的哺育者”，这无异于一种自噬和自杀。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由于把不被接受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强加在农民头上，党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这是一切“真正维护党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袖手旁观”的。

这就必须要说到被《星火》同仁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1958年曾是他们所在的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的杜映华，他后来因为支持并参与《星火》活动而被捕，最后和张春元一起被枪决。他出身于农民家庭，1949年以前，就学于陇西师范，秘密加入共产党，领导过学生运动，革命胜利以后，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漳县县委副书记。向承鉴在回忆录里，这样谈到他眼里的杜映华：“杜映华和我一样，至死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身为‘书记’，始终一身农民打扮，穿着不整不洁，一双老布鞋，浑身农民的‘俗气样’，显出普通和平凡”。在大跃进的全党全民、从上到下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坚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切实实办点有益事”，他坚守的原则是“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做事就不会出格”。但他却因此而罹难：在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因而和同样忧国忧民的“右派”一拍即合。他在和向承鉴的一次彻夜长谈中，这样倾诉内心的困扰和痛苦：“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道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的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在天天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古今中外，绝无仅

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应该说,有类似杜映华这样的困惑的共产党的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他们大多以“维护党的大局”为理由而“说服”了自己,保持了沉默。其实他们所要维护的“大局”,不过是党的执政地位,而执政地位的背后,就是既得利益。这就是说,当农民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和党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选择了后者,尽管许多人内心依然充满矛盾。杜映华令人尊敬之处,就在于他完全突破了一党专政的逻辑,而坚守了自己的作为“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持了为劳动人民的谋求幸福和解放的原初理想。向承鉴说他是“一个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痛苦的人”,这确实是一个衡量是不是真正的革命者的基本标尺,他也因此“永远是个高尚的人,值得人民纪念的人”。

(三)要“民主社会主义”,不要“国家社会主义”

这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右派,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当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思想上出现了“无休止的问号”时,首先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去寻找思想资源,据向承鉴回忆,他就曾经猛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大有收获。给予巨大启发的,还有林昭传给他们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草案)》,也就是说,他们试图从国际范围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中获取精神支援。这样,《星火》群体的思考,当然首先是面对国内问题的,但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国际视野。

因此,我们注意到,在具有纲领性的《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里,对国际形势所作出的两点分析。一是强调帝国主义“企图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霸权”,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正在发展,“局部或由局部而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但也“越来越可能克服新战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质(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

个典型)而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由此提出的建立对“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具有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理论的迫切性。这样的分析,实际上就确立了《星火》群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两大基本立场: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立场,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支持殖民地人民斗争;一方面,面对社会主义的分裂与危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1957年北大校园民主运动提出的口号),批判变质的社会主义。

于是,就有了如下《自白》(向承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

同时提出的任务是:“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以指导我们的行动”(《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作为这样的理论建设的第一步,也是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他们在《放弃幻想,准备战斗》(顾雁)、《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向承鉴)、《论“政治挂帅”》(何之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何之明)、《告全国人民书》(向承鉴)等文章里,把重点放在了对中国现行体制的分析和批判。

于是,就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判断:中国现行社会主义体制实质上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是“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在“党政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实行党控制下的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全面权力的高度垄断。

其次,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形成“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论者认为,这样的官僚阶层,“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57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

其三,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另一面,就是其他阶层人民,特别是工农基本群众基本权利的被剥夺,基本利益的被侵犯,处于被欺压、掠夺和奴役的地位。“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奴隶”或“农奴”。

其四,这样的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形成“政治寡头”的统治,提倡“偶像迷信”,压制党内的民主。

其五,寡头政治一面必然导致“思想垄断”,“思想的强化统治”,一方面则必然导致“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胡作非为的能动性”,其结果就是任意执行“违反客观规律、脱离物质基础、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力的全面的毁灭性破坏”,给国家与民族带来了极大灾难。

面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造成的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星火》所表现出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高瞻远瞩的眼光,政治和思想的坚定性,理论的批判力量和行动的勇气,确实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天火”,照亮了现实的黑暗,也为未来播下了火种。

因此,历史也应该记下这些日子: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油印出版,16开本,仅印三十多份。1960年9月,《星火》全体人员和支持者、相关者全部被捕,共43人,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好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杜映华同时殉难。

(四)盗火者普洛米修士和永生的海鸥

对这样的“结局”,林昭和她的战友,是预料之中的。如向承鉴所说:“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了为真理献身的准备”。因此,他们早就为后代留下了遗言,为历史绘制了自我形象。这就是林昭在《星火》上发表的两首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第一期)和《海鸥——不自由毋宁死》(第二期)。前一首已经在为林昭所唤

起的朋友中广泛流传,后一首是第一次公布于世,相信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在《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里,引人注目地写到了寓意深长的对话和呼唤。

在普洛米修士面前,诸神的统治者宙斯竟感到“刺促不安”：“他到底保有什么力量?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于是,普洛米修士和宙斯之间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你可以把我磨碎,要是你高兴。

但是救不了你们的恶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石?”

“不,是真理保持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普洛米修士遇难了,宙斯竟“不感到复仇的欢欣——一种阴冷的、绝望的恐惧,深深盘踞在他的心胸……”

而普洛米修士在临难那一刻,却在对“人”呼唤——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孙,

作为一个兄弟,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斗争！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海鸥——不自由毋宁死》写的是一个悲壮的故事：一位“殉难者”，“最最勇敢的战士”，“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失败后投身大海，“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青人沉没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飞翔。

这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的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风一样”。

这令所有“宙斯”恐惧的，在临难时呼唤“人”的永生的普罗米修斯，这“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的“斗士”，这“自由得像风一样”的海鸥，都融入了林昭、张春元、杜映华的生命，同时也闪现着所有《星火》受难者、幸存者的身影。

他们就站在这里，逼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

你的心是颤动的，还是死的？你的血是热的，还是冰的？你的灵魂是圣洁的，还是脏的？

2009年12月21日-28日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退休）

前 言

这是一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史实，一群在民主、自由征途上跋涉的青年，一桩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的冤案，一声来自社会底层的呐喊！

当纪念林昭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人曾问我：为什么你们那边不见动静？例如彭令范在《我的姊姊林昭》后记中就提出：“还有那些林昭的‘同案犯’，和当时进行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一些同志、朋友和叛徒却默默无声，我希望他们也能讲一些心里话。”是关心，也是一种责备！作为劫后余生的我，何尝不想早日执笔而书，但两手空空，什么资料也没留下，不像林昭幸运有亲人和挚友保存着有关材料，而且还抢救出了一些资料。而我们都同时被关进牢房，出来后除了一纸判决什么也没有，当年的事情虽然历历在目，却也只能记得大的情节，经过几十年具体细节已模糊了，例如关于《星火》，最多能把篇目回忆起来，其中的文字内容谁也无法记清。回忆也只能局限在个人的范围内，对于整个案件及有关人员的情况就无从下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设法查找资料、积累资料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八十年代以来，我就苦苦寻找，结果是到处碰壁，一提起当年的事就“谈虎色变”，“左”的思潮仍弥漫在祖国的大地，“反革命”的卷宗不许动，“反革命”的阴霾仍在作怪。我曾经质问：那平反算什么？回答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平反与查阅档案那是两回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怎么办？苦恼而又无能为力，也有人劝我：算了吧，年事已高，只好记得多少写多少，这已经属于抢救性的了！当然我

可以这样做,但是良心和责任鞭策着我,特别是看到社会上发表的文章,有很多都是捕风捉影,甚至连年代、姓名等基本事实都有出入,我不能坐视不管,我应该尽到最大努力,把当年被列为全国大案之一的真相披露出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要不遗余力地继续努力,作为七十多岁的老妪,我奔波寻找……

历尽千辛万苦,也许是这种精神感动了一些好心的、有良知的人,再加上新世纪的到来,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我想到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我找到了兰州大学的有关方面,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冷漠,以几十年前的事他们完全不知道为借口推掉;另一种是出于正义的关心,有的也曾风闻此事,认为这是兰大历史上光荣的一页。在他们的帮助下,再加上其他很多友人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愿: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是当年历史的真实记录,其中有原始的资料,有当事人的亲身回忆,“它来自底层,并踏着自己的血与汗。”(章诒和)岁月可以流逝,但发生过的历史是不能磨灭的,心中的创伤会牢牢地结成疤痕。

这段史实是时代的缩影,是向民主与自由进军的号角,是反封建、反专制的一场鏖战,是黑暗与黎明的搏斗。当年的言行不是个人的异想,也不是事件的偶然,是历史造就的必然结果。逝者如斯,愿其沉淀会促使今后历史的发展!

谭蝉雪

2009年3月

目 录

楔子	1
一、儒冠误身作流人	1
一锤定音	
等待发配	
惊涛骇浪中沉浮	
二、星火燎原会有时	19
《星火》的诞生	
串珠子——林昭的参与	
《星火》第一期全文	
《星火》第二期的稿件	
三、征途坎坷何足惧	97
探索中迈进	
县委书记杜映华	
掉入陷阱	
告密者——出卖灵魂的人	
四、铁窗难锁凌云志	113
身陷囹圄	
越狱拼搏	
女囚生涯	
五、出师未捷身先死	130
凤凰涅槃	
余音	
六、向承鉴《回忆录》(部分章节)	136

楔子

1960年9月甘肃省天水地区发生了一起被列为全国第四大案的“反革命集团案”，国庆节前夕，一夜之间在武山县就逮捕了兰州大学下放监督劳动的右派学生8人，农民25人，至1962年又批捕了干部3人，武山一地共36人。天水县5人（当地捕2人，广东捕2人，上海捕1人）。另有2人均在上海被捕。此案一共逮捕了43人，大学教师2人、研究生1人、大学学生12人、干部3人、农民25人。全案共判刑25人，大学师生15人、干部3人、农民7人，刑期从无期徒刑到三年不等，另有农民3人管制、2人戴帽处理，13人无罪释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本案枪毙2人，与本案有关的林昭亦不幸遇难。

为什么大学师生会沦为阶下囚？为什么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却变成反革命？为什么种地的农民成了凶神恶煞的暴徒？

一、儒冠误身作流人

一锤定音

五月的南方正是桃红柳绿、莺啼燕语的明媚季节，但在河西走廊却仍是春寒料峭，树上的嫩叶在瑟瑟发抖，地里的庄稼才长出麦苗，加上每天下午的风沙，这里不仅是春来迟，而是给人一种无春的感觉。这里的生活习惯是不过“五一”早晚还脱不下棉袄。经过1957年反右运动的洗劫，大学校园里是万马齐喑，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打扫干净，人头涌动的场面变得销声匿迹，操场上的喧嚣也显得稀少而无力，空气也似乎凝结了。就在1958年5月6日，兰州大学饭厅大门上贴了一张布告：下午两点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务必按

时出席。布告像一声乍雷,无形的波浪在扩散,自从戴上“右派”桂冠以后,我们就成了另类人物,今天下午的大会我们参不参加,心里正在疑惑之际,班上的干部来通知了:你们都参加。

打好饭我们便习惯地聚集到后面的锅炉房,那里已自然地成了右派小食堂,尽管没有餐桌、也没有坐的凳子,只有自己动手搬来的几块砖头,吃饭时或坐在砖头上,或蹲着、或站着,只要打好饭大家便自然地集中到这里,这里没有仇视的芒刺,没有歧视的寒心,没有鄙视的痛苦,也没有漠视的麻木;在这里彼此都是“老右”,有的是平等相处,彼此共话一堂。今天的话题当然是关于下午会议的内容,大家七嘴八舌的猜想:有的说叫右派参加肯定没好事,有的说可能又是传达什么“最高指示”,有的说也许是宣布什么新的政策,一位消息灵通人士煞有介事地说:告诉你们,是宣布对右派的处理。一锤定音!大家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只管闷头吃饭,心里七上八下,前面的路怎么走?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彼此都不开口,祸从口出的教训使我们都学乖了,反正我们的命运是捏在人家手里,一切就听之任之吧!



摄于1957年3月,尚不知暴风雨之将临也!

大会在饭厅的二楼举行,开会时我们不是坐在边角就是坐在最后,大家心里都非常紧张。通过大会才得知全校共有右派分子195人,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14%。教职员工52人,学生143人。据说后来又补划了一些右派,具体数字就无从知晓了。右派又分为极右、中右和一般右派,极右的处分是开除公职、开除学籍、甚至逮捕法办,如中文系的萧凡,当上右派后,助学金被取消,连吃饭都成问题,但求知的欲望并没有因此而泯灭,有空就徜徉在书店的海洋中,没钱买就顺手牵羊,结果被发现,以现行反革命罪予以逮捕。古人云:“偷书不为偷,此乃窃也!”看来古训已行不通了。中右是保留公职、保留学籍、下放农村监督劳动;其他是留校察看或免于处分。学生中共有34人监督劳动,我是其中之一,大会明确宣布:学生一年以后回校继续学习。此次大会成了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拐点,我们的命运就这样被定下来啦。

等待发配

大会以后我们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其实大家心中都感到冤屈万分,本来是抱着满腔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阵营的莘莘学子,怎会转眼之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鸣放之前班上开会、团员开会,反复动员大家要关心党、爱护党、热情帮助党整风,你如果默不作声,那就是不靠拢组织,那就成为运动的落后分子。说的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等你提了意见,立刻变成“猪八戒倒打一耙”,说你是向党进攻,你在放毒箭,我们成了一条条毒蛇,多亏党的“英明”,把这些暗藏的毒蛇引出洞来一网打尽。这个时候如果你站出来申辩,无异于“以卵击石”,你的罪行立刻升格为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定性从右派变为现行反革命。过去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现在是“专政铁拳一声令,谁人有理都说不清”。圆的扁的任人捏,只好等待着何日发配!

本来我们的活动是在校内劳动,以系和班级为单位,从打扫卫生、擦拭厕所到平操场、挖地基,抬筐挑土无所不干。随着处分的下

达,我们就像是被开除出兰大一样,没人管,课也上不成,原有的助学金一律取消,对我们这些调干生来说,这就切断了我们的生活来源,把我们推到没饭吃的困境,怎么办?是坐以待毙还是谋求生路?我们不会向别人求饶,更不会去乞讨,我们的信念是:咬紧牙关、挺直腰杆、自力更生,天无绝人之路。到校外去找工作。以我们的身份是不可能找正规的、比较好的工作,我们的方向是打零工、干体力活,凭着反右后一年来的劳动,也为我们打下了体力劳动的基础。一天晚饭后散步,中文系的宫忠诚、吴家风、马启凯和我等几个人,正在谈论今后的生活出路时,宫忠诚非常高兴地说:“我打听到前面离火车站不远处正在建一幢大饭店,工地上需要小工。”爆炸新闻一说完,大家便嚷开了,叫宫忠诚明天一早赶快把此事定下来,在建筑工地上我们可以干的活多着呢:码砖、送砖、和水泥、送灰浆等各种杂活都行,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这样一言为定了。报酬多少可灵活些,以混饱肚子为底线。走着走着不知是谁哼起了《十二月党人之歌》:“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相同的命运、共同的感受、心灵的感应,大家不约而同地合唱起来,“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深沉的歌声在空旷的郊野、在干涸的黄土高原上空随风飘荡……

宫忠诚去找到兰大负责基建的老师,因为平时劳动和他有所接触,请他帮忙联系,果然第二天我们的工作就定下来了,和平饭店(文革期间认为该名字有修正主义色彩,改名曰战斗饭店,到了八十年代才又恢复原名。)总算收留了我们这批人。我们的任务是码砖、运砖、送水泥,一方面是把汽车运来的砖卸下来码好,另一方面是把砖放到板车上,送到各个地方,或者把和好的水泥送过去,大家照顾我,让我只负责码砖,虽然跑的路不多,但一天下来也累得腰酸胳膊疼,一天的工资是2.48元,如此廉价的劳力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一天的伙食费控制在1元钱左右,紧抠慢抠像我这样不抽烟喝酒的每天最多节约1元钱,以备意外的开支。就在7月的一天,接到正式通知,让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开路,目的地是天水。美其名曰下放,通过农民群众的监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思想。

在即将启程的前两天,有人动议:此去前途未卜,踌躇满怀,何日再见更是渺茫,我们应趁此机会举杯相聚,以抒胸臆,既慰同派之情,也不枉同窗一番,大家双手赞成。接下来的问题是到哪里相聚?经济问题怎么解决?基本原则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人把一个多月来节衣缩食在工地挣来的血汗钱倾囊交出,当时一共是七、八个人,凑出的钱也还可以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太高档的餐厅我们上不起,太小的饭馆不想去,老这样窝窝囊囊的活人太憋屈了,也该堂堂正正地聚一回,最后选中了悦宾楼,这是刚从上海搬迁到兰州的第一家餐馆,风味的独特吸引着来客,而且离兰大不是很远,于是大家步行到了悦宾楼。点的菜都比较实惠,男同胞们喝酒,我是以茶代酒,象征性地表示相邀聚饮,席间大家谈笑风生,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是吃银丝卷,雪白的面粉做成的花卷,用筷子夹起来,轻轻一抖便成了一根根像环钗一般的圆索,难怪称作银丝卷,吃起来松软喷香,我都记不得那顿饭我吃了多少个银丝卷。从那以后我吃到的银丝卷都感到索然无味,我还怪是厨师的手艺不高明,恐怕是应了那句“饿极生美味”的话吧!

终于到了离校的时刻了,我们直朝火车站走去,坐上开往天水的列车。事后才得知有的同学迫于形势,只好在窗户后目送我们的离去,如王珊珊她只看到我的背影,背着行李、昂头健步前行。还有的自己跑到火车站,躲在一边,既没有见面细语,也没有握手言别,凝视着列车徐徐启动,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此别情悠悠,所谓“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如班上的诗人朱文武还为了到车站送别一事成为一桩罪行,“拔白旗”时怎么都交代不清。

惊涛骇浪中沉浮

我们一行41人,除学生34人外有副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2人、研究生3人,下车后停留在北道埠,然后分成两批,一批分到天水,另一批分到武山,再分到具体的社队,天水的分到北道埠

公社、马跑泉公社、甘泉公社(后改为麦积山公社);武山那边的分到城关公社和洛门公社,当天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彼此都不太说话,满腹心事无从说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和打算,所谓人各有志,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下述四种状态:第一,通过现实去寻求答案者,这是些有志之士,有抱负,有理想,有为国为民的拳拳之心,被打成“右派”后思想上难以接受,满脑子装着问号,孰是孰非,希望在这次下放中找到答案,现实会做出公正评判。第二,满怀希望,等待重返校园者,在公布处分的大会上明确宣布:到农村监督劳动为期一年,保留学籍。幼稚可爱的年轻人信以为真,他们相信努力劳动,一年后将又是一名大学生了。第三,无可奈何混日子者,半信半疑,既看不到光明的未来,也没有任何出路,像棋子一般任人摆布,放在哪里就停在哪里,等着走棋者的来临。第四,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者,把世事看穿,不能坐等,海阔天空任鸟飞,既然出来了,“将在外就不由帅”,看时机找出路。

连我在内共四人分到甘泉公社,后改为麦积山公社甘泉大队,中文系、数学系各二人,我们在集体食堂吃饭,一天两顿,每顿每人一块巴掌大的稀面浆蒸成的发糕,当地又称粑子,外加一碗清亮的面汤,清亮到可以当镜子照,每天端上面汤的时候也就是我端详面容的时光,也只有在这时才静下来看看自己的尊容,面汤既好吃还可照镜,发挥着多功能的作用。隔三差五吃上一碗水煮菜,就是美味佳肴了。

我的任务是喂养鸭子,公社成立了一个养殖场,公社干部给我介绍说:甘泉大队的养殖场是省上有名的先进单位,养有鹅和鸭约二十来只,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当时连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状态下,大队能有一个养殖场那可真是难能可贵了。我这个鸭馆的具体工作就是每天清早剁好饲料,所谓饲料就是我割来的野草,说起割野草还真有一段小插曲,一天,我一手提着草筐一手拿着镰刀,正朝一处野草茂盛的地方走去,野草齐腰深,绿油油的,我心里正美滋滋的,今天的野草够吃两天的,放下筐子拨开草丛,正要挥镰去割时,草丛里突然冒出一条拇指般粗细的草花蛇,正摇摆着向上

伸,吐出细长的舌头在摆动,似乎准备向我进攻,我吓得浑身发软,立刻掉头就跑,连草筐都没拿,跑到路边尚惊魂未定,一边暗自嘲笑自己的书生气,从此以后每次割草都要带上一根长棍以作防身的武器。养鸭子也可自得其乐,每天清早喂完饲料后,我便把鸭群赶到河边,要经过街面道路,开始鸭群乱跑,后来我按前后左右不同方位固定相应的音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鸭群慢慢地好像能听懂我的指挥了,叫它怎么走它就怎么走,一路上都可以听到我那“yayaya……”、“kakaka……”的声音。这条小河其实是一条干涸的河床,中间有潺潺的流水,鸭群一到水边便到处觅食,吃饱了便三五成群地躺在干燥处。这时也是我最惬意的时候,找一处树荫坐下,打开书本让自己徜徉在书的海洋中,这里没有尘世的喧嚣,更没有无知儿童跟在后面乱喊“右派!右派!”、“反革命!”、“特务!”的噪音,身心得到了暂时的安宁。直到中午把鸭蛋拾好交到公社,哪怕饥肠辘辘也从来不动一只鸭蛋,把鸭群赶回饲养场,就这样循环往复,青春在身边流逝。

天水地区还经常有山洪暴发,六十年代以前天水一段的铁路经常被洪水冲毁,每年都要抢修。开始我不知道,有一次暴雨后雨过天晴,我把鸭群赶到河对岸的地里去吃收割后撒下的麦粒,然后把鸭群赶回来,当我正走在干涸的河床中时,听到后面有人高喊:“快上来!快上来!”我不知道他叫谁,只见一位老大爷跑过来匆匆忙忙地把鸭群赶上了岸,并用力不断地向我招手,这时我听到了“嗷嗷”的雷鸣声,掉头一看,山洪正从我身旁飞掠而过,直径1米多大的石头在泥石流中上下翻滚,我不禁想起钱塘江的潮水一次就吞噬上百人,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是大爷搭救,我已随着山洪到龙王爷那里报到了。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着有救命之恩的大爷。

随着生活的深入,我们知道、看到、听到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首先是对“右派罪行”的彻底否定,原来在学校的时候还对自己的言行有过怀疑,是不是错了?到了农村才知道真相,才明白了是非。本来鸣放时我在会上曾提过:百姓中流传“国民党贪污,共产党贪

功”，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批斗时认为这是对共产党的莫大污蔑，形而上学者认为我把共产党与国民党相提并论是极其反动的。到了农村接触实际后，才明白其实真是过奖了，当时正值浮夸风泛滥，为了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为了向上爬，弄虚作假、虚报成绩，吹、拍、拉、捧是扶摇直上的捷径阶梯。放卫星、高产田其中自有玄妙。初秋之际的一天，干部通知社员晚上出工，把各队里长势旺盛的庄稼统统移到靠近公路边的指定的地里，原来的庄稼全部拔掉，一时间这片地立刻旧貌换新颜，放眼望去绿艳艳的一片，如画美景，一旁竖着大大的木牌，“金皇后高产田”、“白玛牙卫星田”，如此茂盛的庄稼真是丰收在望。本来这种把戏是非常容易拆穿的，仔细观察便破绽百出，地里的土是新翻的，明眼人一看便知，但由于迎合了参观者的需要，因为这正是他们的“伟大政绩”，于是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是眼开眼闭，或者是假装糊涂，甚或是添油加醋，就这样一层层一关关地变成了事实。其后果是不但不增产，还毁了庄稼伤了民心，更可怕的是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没想到这种浮夸之风也把我们卷进去，一天公社刘书记把我们召集到办公室，下达命令：“公社要办一所大学，就叫甘泉农学院，你们几个负责筹办，马上拿出方案，争取明天开学上课。”我们几个都懵住了，面面相觑着不知说什么好。刘书记看出了我们有顾虑，“现在是大跃进的年代，首先要思想跃进，办什么事都要多快好省、力争上游。”上纲上线了，我们只好答应下去立刻办。四个大学生：一个刚毕业，一个三年级，两个二年级，起草了《甘泉农学院办学计划》，设三个系：农作物栽培、水利水电、畜牧。我们自我解嘲说：右派升成教授和系主任了！首批学生60人，学制半年至一年，学生来源由各生产排（队）派遣1-2名，每月每人交口粮40斤，学费2元，由各排（队）缴纳。早饭后开始报到，学生年龄最小12岁，最大已届花甲；文化程度最高是初一，最低不识字。公社又派来一位苏书记，到了傍晚全部人马排好队，敲锣打鼓向公社报喜。惊动了各家各户的农民，纷纷跑出屋外观看，“甘泉办了个农学院”的消

息就这样不胫而走了。而刘书记则满面春风、得意洋洋地在公社大门接见了报喜队，一所“大学”就这样诞生了。我们四人的分工是：丁恒武负责院务，周善有是水利水电，孙自筠是农作物栽培，我是畜牧。上午上课，有文化课和专业课，下午劳动。甘泉农学院的消息通过报纸及各种媒体大造声势，惊动了省上甚至北京，来参观取经的络绎不绝。后来刘书记当了天水市副市长，甘泉公社升为麦积山公社，甘泉农学院也随之升为麦积山农业大学。好景不长，随着粮食问题越来越紧张，学员的口粮无法缴纳，我们几个还曾经分头下去催粮，也无济于事。特别是后来刘书记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农业大学也就寿终正寝了。（前年孙自筠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题曰《“小右”办大学》，发表在《黄河文学》2007年8月号）



摄于1959年3月，在天水甘泉农学院的校园内，左起：谭蝉雪、孙自筠、周善有、丁恒武。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北省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文章——《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同时配发《徐水创造了好经验》的社论,为了兴修水利,全县打破了地界,建立了93个团、299个营、1099个连、3365个排。

3月14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写了一份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3月21日,毛泽东在看过陈的报告后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出巡视察他亲自树立的先进典型徐水县。

为了迎接毛泽东的视察,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徐水县委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县委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准备让毛泽东看的地方,并且按照军事编制,明确连、排、班负责人。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

下午4点半钟,毛泽东首先来到徐水县南梨园乡的大寺各庄农业社,问道:“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社主任李江生回答说:“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毛泽东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754斤。”毛泽东笑着赞叹道:“不少啊!”

问了社里的收成以后,毛泽东又问起全县的收成。

张国忠回答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实际上,1957年徐水的粮食亩产才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仅有70斤。

毛泽东和张国忠的对话,一位党领袖和一位县委书记的对话,全是热昏的胡话!这些热昏的胡话上了全国的报纸,成为全国的舆论导向。

1958年8月18日新华社电:河南火箭公社玉米亩产12875斤;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北部山区连县水稻亩产60437斤;9月6日新华社报道:山东光明公社玉米亩产27312斤;紧接着又传来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已达130435斤……粮食产量吹上了天,可百姓的肚子却饿成扁的,农民生活在一个荒凉饥饿的世界中,树皮扒光了,野菜挖净了。当你还有饥饿感的时候,这只是饥饿

的开始,接着是肚子空了叽里咕噜乱叫,全身乏力、腿软,全身从下往上冒口水,把口水咽下去,顿时感觉好多了,继续下去便会眼冒金星、四肢发凉,慢慢地不觉得饿了,只是糊里糊涂,这时躺到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果挣扎着往外走,不管是摇摇晃晃还是拄着拐杖,走着走着人就倒下去了。仔细观察路边的饿殍,他们脸上全无痛苦或争斗的表情,而是平静地躺着,有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似乎在向路过的人们乞讨,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因为他们已没有丝毫力气了,也不知道自己走向了死亡,在不明不白中闭上了眼睛,在懵懵懂懂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焉知饿死填沟壑,遍地白骨无人收。

为了生存、为了活命,用尽了各种办法,过去看到“衢州人吃人”之句,总有些不太相信,总觉得不太可能。有一天,我们从山上背柴下来,看到前面围着一堆人,走过去一问得知是卖肉包子的,一位农民手捧一篮子,上盖了一块毛巾,这可是稀罕货,这年头的白面包子别说吃就是看一看都像是做梦似的,更何况是肉馅的,那就更加稀罕了,别人没有他为什么会有呢?那位中年农民振振有词地说:家里早年存下的一点白面,一直舍不得吃,刚好听说前村的大爷家宰了一头“猪”,我拿面去换了一点肉,合计了一下:一个包子卖十块(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块)钱,少说也能卖个两百来块,能换个几十斤粮票,买成粮就能救活我们全家,起码能度过一两个月。包子很快就抢购一空,我没钱只能望着包子咽唾沫。第二天就听说有人在包子里吃出了人的指甲盖,我的心在颤抖,天呀!这可是不容置疑的铁的事实——人吃人了……从此以后每见到一个人我都要仔细瞧瞧他的眼睛,因为据传说吃了人肉的人眼睛是发红的。

更骇人听闻的是家中死人不埋,供自家“享用”。村里一位老妈妈突然失踪了,刚好娘家的亲眷来看望她,寻遍了就是找不着,逼着要她儿子说清楚,最后揭开地窖一看,老妈妈被大卸八件扔在那里,其中一件已没有了。消息传出后群情愤怒,娘家人把儿子告到了法院,法院判了几年徒刑,就此草草了事。向承鉴以此事为题材写了一篇文章,题曰《食母记》,遗憾的是原稿已焚毁。一纸判决是

无法解决这一社会现象的,蔓延发展变成“易亲而吃”,把死者相互调换,彼此关系越远越好,最好是互不认识的。应运而生出现了“掇掇人”,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中介”,谁家死了人,消息立刻传过来,有合适的就很快互换成交,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而中介人当然是坐收渔翁之利。

当时在农村里不饿死活下来的基本上是这样三种人:一类是干部,借助权势,或短期检查工作,或长期住社、队,“近水楼台先得月”,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难怪百姓说:干部干部,先填饱自己的肠肚。第二类是会偷会抢的“能人”,狗急了也会跳墙,人饿极了为了活命什么事也能干出来,圈里的牲口、地里的庄稼,是他们瞄准的头号目标,真的是鸡犬不宁,哪块地的麦子黄了,连夜就被剃光头;哪块地的包谷长好了,晚上这里便热闹非凡,人们背着背斗去扳包谷成了公开的秘密。把粮食弄回家里,全家总动员,搓的搓、簸的簸,等不到磨成面便煮着吃了。开始是个别的、小规模,后来发展成大批量的;开始干部还管一管,但是管不胜管,所谓众怒难犯,无可奈何只得眼睁睁,甚至自己或家人也参与到这个行列中去。第三类是会跑的,哪里有活命之处就往哪里跑,听说新疆可以吃饱肚子,因为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不征收统购粮。历史上流传:一出玉门关,两眼泪不干。可现在却是:一出玉门关,肚子就能吃饱饭。能跑的以青壮年为主,携家带口外出,新疆也正需要劳力,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这是往西的,还有是往东跑的,1960年前后天水的妇女为了吃饱肚子嫁到陕西,有的是未婚,有的是已婚,先撇下丈夫和儿女,在那边安定后让丈夫冒充亲戚来探亲,把粮食背回来。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后来甘肃省与陕西省达成妥协,强行遣返甘肃的妇女,于是那边又丢下丈夫和儿女,又一次造成人间悲剧。剩下的老弱病残在家里等死。真正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我们可说是生逢其时,居然遇上了这样的“盛世”。《孟子》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我们痛心、我们愤慨,我们不禁扪心自问:今后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有时兰大的同学会在张春元所在的

马跑泉拖拉机站不期而遇,张春元曾在志愿军后勤部汽车队任技术员,所以马跑泉公社让他管理拖拉机站,而马跑泉在地理位置上居于交通要道,离北道埠比较近,又是通往北道的必经之路,所以同学们只要外出往往在此歇脚聚谈。有一次大家又见面了,其中还有从武山来的孙和、向承鉴和苗庆久,彼此都谈到各自所在地的状况,这时已是1959年下半年,饿死人是增无减,特别是武山,比天水更为严重。武山是甘肃的穷困县之一,满目荒山黄土坡,兰大的同学有的就住在老乡家里,眼睁睁看着他们倒下去,有时他们把家里寄来的粮票分给老乡一点,但无济于事,真是爱莫能助。每当说到自己认识的老乡倒下去时,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最痛苦的是你还必须面对。作为一个右派分子,哪怕小心翼翼,随时会被揪斗,“未曾翻身已碰头”,我们可以麻木不仁,可以明哲保身,可以糊里糊涂,可以佯醉不醒,但我们内心却流动的是满腔热血,当时对“怎么办”的答案多数人寄希望于返回学校,不少人回到兰州探问校方的态度。

同在甘泉劳动的四个人,在监督劳动过程中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遭遇:

丁恒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同在甘泉劳动,他是数学系的毕业生,陕西人,身材魁梧,人高马大,他的饭量也特别大,当时也就饿得特别厉害,有时连腰都直不起来。反右时吃尽了“好友们”检举揭发的苦头,现在是一反常态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他曾经回学校去交涉,兰大是既不理睬也不分配工作,只说回去好好劳动,“思想改造”好了学校会处理的。回来后,他气得破口大骂:“他娘的!说话不算数,一千多人的大会上公开宣布,在农村监督劳动,一年后返校继续学习,保留学籍。现在一年半都过去了,怎么连个屁都不见放,这不等于无期徒刑吗,再这样下去非得饿死在这里不可。”他变得更沉默了,只见他天天中午都到水库那边去,后来有一天他悄悄地对我说:“我要走了,我不能在这里白白地等死。”“可哪里有出路呢?”“天无绝人之路,到国外去!”他的计划是从缅甸边境沿湄公河凫水偷渡出去,我觉得太危险了,问他:“有把握吗?”他说:“这是逼

上梁山,与其活活饿死不如拼搏一下,不成功便成仁。”他本来是个旱鸭子,一点水性都不懂,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他天天到水库去学习游泳,一米八的个子,学起来多不容易呀!他反复权衡:回兰大希望渺茫,分配工作不可能,回老家无脸见爹娘,更可怕的是会给家人带来祸患,而呆在甘泉天天受着饥饿的折磨、人格的侮辱、精神的痛苦,最后是死路一条。我问:“如果此路不通怎么办?”他是做好思想准备的,“只有两种可能性,成功了我会和你们联系的,不幸被捕,我就把自己的舌头咬掉,一辈子成为哑巴,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什么。”就这样他走了,偷偷地走了,我们连送都不可能。后来音信全无,直到今天仍无消息,我只有在心中默默地为他祝福。

一起在甘泉的还有孙自筠,他是中文系学生,比我高一班,当他伸出舌头时可见右侧有一疤痕,那是在班上的一次批斗会上,他觉得自己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于是就当时班上党支部划右派的行为说了几句公道话,没想到猪八戒倒打一耙,自己倒成了右派,他气愤不过,就用刀割自己的舌头以示抗议,在场人多及时制止才没酿成严重后果。和我一起分到天水甘泉公社劳动,正由于这颗红顶花翎,我和张春元来往的内情不敢告诉他,当我离开甘泉回广东时,也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回老家看看,我离开甘泉回广东之际他出事了:他在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农村现实之后义愤填膺,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基层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履行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于是天真地把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写成材料寄到《红旗》杂志,并对自己的作为感到自豪,这是1959年8、9月间的事。按理这是在行使自己的党员权利,没想到却招来弥天大祸,一个来月后的一天,他正在地里劳动,公社通知他去开会,刚进入会场,几个民兵立刻簇拥而上,五花大绑,并戴上手铐,主席台上立刻宣布:逮捕恶毒向党进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扣到了头上,接踵而来的是判刑蹲监狱。在狱中曾被一逃跑后被抓回的犯人反诬是受孙的唆使,他拒不承认,于是各种刑罚随之而来:拳打脚踢、挂尿桶,先不说臭气熏人,那一大桶屎尿,铁丝的提耳,挂在人的脖子上,时间一长,那铁丝便慢慢地嵌入人的肉

中,钻心的疼实在叫人无法忍受,天旋地转中他晕倒了……醒来时发觉自己被扔在露天的地面上,夜深了,看守的犯人都已入睡,他的第一感觉告诉他:赶快逃出去!于是忍着浑身疼痛就往前冲,这样蛮干其结果可想而知,大门没出去就被抓回来了。这一下就惨了,戴上背铐子,而且还把他关在鸡窝里,腰始终无法直起来,双手反铐越来越肿,几天后开始腐烂,于是他以绝食表示抗议,身体已极度虚弱,为了避免他真的死去,管教终于把他从鸡窝里拖出来。他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能轻举妄动,经过仔细周密的观察后,他终于发现了一条出路:躲在每天出去拉粪的大木桶中混出去,终于逃出了牢笼。昼伏夜行,野果生菜是他充饥解渴的好物品,身无分文,就爬行到公路边,预先用纸把泥土包成一个大包,看到远处有车过来时,把包放在公路当中,只要司机停车观看,他立刻从车后爬上去搭乘免费车,就这样一程又一程,他终于走到了四川的一个山区,选择了一家山上的独户,给人家当雇工,生活有了着落,满以为在这世外桃源似的地方可以安稳下来了,曾几何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深山野岭的独户也未能幸免,他被发现了,以后在收容所、看守所、监狱中几进几出,直到1980年平反。

周善有,数学系,是我们当中的小弟弟,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整天低头看书,不论走到哪里,他总是抱着书本,凭着身强力壮,是我们四个人当中唯一熬到回兰大继续上学者。

张春元曾问过我今后的打算,我的回答是:读书,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决定回兰大去一次,质问学校有关方面:1958年6月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对我们的处分是保留学籍、下放监督劳动、一年后回校学习,现在我们已经过了一年半,为什么不见校方有任何安排?到底还算数不算数?校方打起官腔:“你们首先要安心改造,学校会根据国家的统一政策和形势的发展作出相应安排的,不要再跑了,只有改造好了才会有出路。”改造好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才算改造好?校方不作正面回答,含糊其词地说领导自有安排,言下之意是要我们无限期地呆下去,我们的青春就这样默默地消耗。残酷的现实告诉我,返校只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是镜中花、水中月,

实际上我们已经被变相开除学籍了。一个国家可以“阴谋、阳谋”地出尔反尔，一个学校就更不在话下了。

从兰州回来以后，我反复思考：继续求学希望渺茫，只有面对现实，而摆在我面前的现实就是谎言、吹嘘、饥饿、死亡和满目苍茫萧疏。我是华夏子孙，我曾经满腔热血投身革命，那时我只有十六岁，希望尽己之能报效祖国，没想到到头来落得了一顶“右派”桂冠。我的心在流血，如果我还在麻木不仁，如果我只想钻进象牙塔，如果我只看到鼻尖上的自己，我还是一个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我带着这些思想上的问题去找了张春元。

在校时我们没有接触，下放天水后才逐步彼此了解，春元是河南上蔡人，其父是当地报社的职员，写得一手工整的蝇头小楷，负责石印版的稿件誊写。父辈兄弟五人，其父老小，前面四个兄长只有一个男孩，在“传宗接代”观念的主导下，春元降生后，家中视若掌上明珠。自小就极有个性，以致小名称“犟劲”，稍长，父亲即手把手教写字，受其影响，春元写得一手流畅的行书。母亲陈氏体弱多病，五年后弟弟春沛降生，不到两年母亲就撒手人寰，还不到卅岁。族人认为年轻夭折，不许入葬祖坟，当时三伯挺身而出，大声疾呼：“陈氏是功臣，给张家生了两个儿子，张家香火得以延续，为什么不能入葬祖坟？”最后葬在已故爷爷脚下。

母亲逝世时春元才七岁，十岁以后父亲续弦，继母是个聋子，加上春元的抵触心理，双方经常发生矛盾。一次在饭桌上发生争吵，聋子一气之下把一碗面扣到春元头上，春元立刻离家出走，从此再没回过上蔡。父亲忧郁成疾，不久也去世了，时年50多岁。弥留之际声声呼唤着“犟劲”……最后没办法，在他神志不清的状态下，以春沛冒充春元，抱着老人叫“爹爹！我回来了，”老人欣慰地笑了：“啊！你终于回……”话未说完就咽气了。

春元离家后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先是做些杂务工作，以后跟老师傅学开汽车，学了一年有余。1948年10月家乡解放了，春

元参军，先在江汉军区第一军分区当汽车驾驶员，后在第四野战军五十军后勤部汽车队工作，历任技工班长、技术员等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改为志愿军，同年10月出国作战，1953年2月在朝鲜战场上因抢救汽车而光荣负伤。1955年初由朝鲜回国，在湖北省农业厅工作。直至1956年8月考取兰大。

春元特别怀念母亲，以朝鲜战争为背景，写过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中朝儿女》（《电影文学》1959年6月号），通过一对朝鲜母子的英雄事迹，既赞颂了中朝人民的英勇精神，又寄托着对母亲深深地爱，那个十二岁的小孩或多或少地有着他幼年时的影子。春元用了“司马章”的笔名，寓意是要继承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刚直不阿的人格和文风，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东北制片厂本拟拍成电影，可到天水一了解，得悉出自右派之手，此事只好作罢。

当张春元问我今后的打算时，我明确说：现实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每当看到那一一张张干瘪枯黄的脸、那一具具倒下去的尸体，还有那荒芜的、无人收割的庄稼，这一切既是无言的哭泣又是愤怒的控诉。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我能无动于衷吗？我能视而不见掉转头去捧着书本吗？我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本来这是祖孙三辈的幸福家庭，饿得受不了了，为了活命，儿子和孙子全都跑出去了，剩下老两口，我住进去后看见男主人的身体很瘦弱，他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布衣百姓，多少还是个组长，加上为人耿直忠厚，硬是不搞偷鸡摸狗之事，他说从小家里的老人就反复对他讲：宁愿站着死，不能跪着生。“人”字不就是直直立着的嘛！每天从食堂打回来的那碗清汤，他还得让着给老伴多吃点，就这样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



张春元，摄于1956年

摇摇晃晃的。一天夜里,我突然听到大娘凄厉的哭喊声,跑过去一看,大爷直挺挺躺在床上没气了……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民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我流着泪睁大眼睛定定地凝视着大爷的脸,我仿佛看到他、也看到千千万万个倒下去的农民伸开双臂呐喊: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错,我们更没有罪,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死掉?天呀!去惩罚那些罪魁祸首吧!我感到责无旁贷,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任何一个有爱心的人,任何一个流着热血的人,都不能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无动于衷,忧国忧民是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答案是:为了祖国的命运!为了拯救千千万万濒临死亡的老百姓!

当我们谈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该如何办时,春元态度明朗而坚定:我们不能麻木不仁,不能只是明哲保身,象牙之塔的梦想破灭了,苦难磨炼了我们的意志,时代赋予了我们的使命,哀伤、叹气、痛苦都无济于事,不要等待救世主的到来,靠我们自己去探寻今后的出路。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金钱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1959年上半年,春元就对我说:我们现在行动受限制,只有通过书面的方式,大家可以写成文章相互传阅,一方面相互交流,彼此促进;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影响,争取别人对我们的了解和支持,逐步发展和壮大我们的队伍。在内容上明确我们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尽管我们会遇到千难万险,甚至是掉脑袋,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他不断地念诵着裴多菲的诗句:“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二、 星火燎原会有时

《星火》的诞生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无休止的问号,为什么会出现我们所见到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是自然条件还是人为因素?在全国来说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吗?符合马列主义路线吗?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吗?作为执政者应当负什么责任?政府给百姓带来的是灾难还是幸福?……我们见面时往往围绕着这些有关问题各抒己见,没有强迫命令和压制,只有受客观形势所迫,不敢畅所欲言,有时是言不由衷,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到时候就成了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在活动的规模、范围、人数和地点上,都要倍加警惕,往往是分头联系的多。也正是通过彼此的接触,达到相互认识 and 了解,观点接近或相同者便逐渐走到一起来了,相聚的地点多在张春元的马跑泉拖拉机站,因为那里是一座单独的大院,没有闲杂人员来往。



1957年摄于麦积山下。左起:向承鉴、孙和、苗庆久

1959年5月在拖拉机站以张春元为主作过一次比较正式的聚谈,参加人员除张春元外还有:顾雁、胡晓愚、孙和,互相谈论了对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张春元提出“巩固地位,扩大组织,联系同志”的活动方针,同时大家提出了一个意向性的意见:通过串连应该成立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对今后社会的变革也作了估计,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宫廷政变,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农民暴动,大家只是泛泛而谈,都对当前的现实感到不满,都希望要改变这种现实,也都认为我们有责任去面对现实,但如何进行?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大家丢弃私心杂念,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向着理想之路探索前进。

正是在上次聚谈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做些实际的工作,同时由于复学希望的破灭,顾雁打算回上海,张春元回河南,我准备回广东,面临着散摊子的危险,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在一起研究一下今后的问题。另外客观形势更加严峻,全国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为了避免被发觉而可能遭受一网打尽的厄运,决定分散活动,但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作出通盘的安排。同年11月底张春元、胡晓愚、顾雁和苗庆久四人在天水北道埠的一个旅社里,讨论了开展工作事宜:

顾雁说:“咱们内部必须有经常性的刊物,定期出版,在刊物上交流看法、认识,沟通思想。”

胡晓愚表示同意:“很有必要,这样能统一认识、交流情况。”

苗庆久说:“我和向承鉴的意见也是要多写些文章,揭露现实、批判现实。”

张春元提出:把大家对形势的看法写成文章,把有相同观点的人联系起来,扩大宣传,统一思想认识,扎扎实实做些启蒙工作。并明确地说:“站稳脚跟,加强联系,扩大影响。”把活动范围突破“兰大、知识分子、甘肃”三个圈子,大家一致同意办一个刊物,既是每个人说话的园地,又是相互交流的平台,以达到统一思想、加强联系的目的。至于刊物的名称顾雁提出用“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大家一致同意。在场者分头写稿,还可以组织别人写稿,武山地区由苗庆久负责,天水由顾雁负责,如果顾雁回上海由胡晓愚负责,张春元负责交通联络和组织发展工作,大家对未来寄托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

促成《星火》诞生的还有以下各种因素:

孙自筠事件并不是使我们后退,而是使我们更清醒了,坐牢、砍头并不可怕,当我们献身于人民事业时早已做好思想准备,通过孙自筠事件使我们懂得:一个人单干无异于以卵击石,必须形成一股力量,写单篇文章的作用收效甚微,能看到孙自筠写的材料的不会超过三五个人,包括编辑、编审和书记,而他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我们应吸取教训。我们不寄希望于当局给我们出版,自己出版、自己发行,像一枚扔出去的炸弹,终究会引发爆炸的。

其次是庐山会议的影响,会议后期批判了彭、黄等人,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打击了说真话讲实际的人,这不是一错再错坚持错误嘛!还有谁敢发表意见、反映情况!以其资历之老、贡献之大、功劳之巨、职位之高的彭德怀元帅,都被撤销了国防部长,连人民代表资格也被取消了,其他人怎不噤若寒蝉,怎不叫人经过沉思以后,寻找其他方式来反映自己的和人们的意见,来另辟途径以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这一运动的后果是十分有害的,把一些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采取了对待阶级敌人的手段和方式来进行打击和迫害,我们称之为“剥竹笋”,即先是把一般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基层群众,用种种运动形式使之和党感情疏远、离心离德,现在却又在自己人中间开了火,而开火的对象又不是党内的一般干部,打击面也不是某一部门、某一省区,而是从中央政治局开始到各省各地,这不是倒行逆施、四方树敌、使自己处于孤家寡人的地步吗!这不是中国政治日趋反动和衰退的表现吗!彻底暴露了当政者的狰狞面目,使人们看清了统治者的本质,粉碎了一切的幻想,摧毁了头脑中残存的任何侥幸,终于发出了清醒的呼声:团结起来,丢掉幻想,去迎接战斗!

还有就是林昭的参与使我们增添了力量,打破了甘肃、兰大的界限。能和林昭取得联系是孙和起的桥梁作用,孙和的妹妹孙复也是北大右派,当年下放在青海民族学院劳动,孙和在孙复那里得悉林昭的情况后,开始是冒用孙复的名义与林昭通讯联系,后来直接相互联系,林昭把诗作《海鸥》寄给孙和,孙和又把《海鸥》介绍给张春元,张春元意识到林昭的能量,很快便与林昭取得联系,数次赶到苏州面谈,林昭也尊称张春元为“大哥”。开始林昭是不同意刻印出版小册子的,认为这不仅对印刷者来说是个冒险,对读者来说同样是个冒险。经过张春元的直接联系,加上顾雁在上海的交往,林昭才亲手把《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交给张春元,并同意发表在《星火》第一期,林昭还把在资料室得来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及北大的有关资料传给张,张春元把《海鸥》和纲领让大家传阅。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星火》的出版条件已趋成熟,天水方面顾雁、胡晓愚和张春元的稿件已完成,武山方面苗庆久、向承鉴也承诺了写稿,接下来是一些具体工作,苗庆久和向承鉴承担了刻印事宜,因为他们两人当时在武山的漳县盐井公社搞硫酸厂和化肥厂,该厂房的原址是砖瓦厂,给他们留下有些办公用纸和一部旧的油印机、油墨等,并在盐井商店买了些纸张。他们就以菌肥的接种、消毒、培养为理由,其房间外人不得入内,苗庆久和向承鉴用了七八个晚上刻钢板,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诞生了,16开本,共印了卅多份,本意是作为内部交流思想之用,装订成册后分发给胡晓愚、张春元、顾雁等人,其余由向承鉴负责保管,据说后来他把东西放在北泉李大爷家中了。考虑到用厂里的油印机不方便,应该设法有一台自己的油印机,张春元把拖拉机站的一部旧马达交给苗,苗把它背到武山,以比市价便宜的办法卖给硫酸厂,然后张、苗二人到北京用100多元购买了一台油印机,存放在顾雁乡下家中,顾雁用这台油印机刻印了《论寡头政治》、《为秦始皇翻案的背后》等文章。

串珠子——林昭的参与

本来林昭和兰大之间是陌路人,空间的阻隔让彼此毫无接触,虽然胡晓愚和顾雁都是北大出身,但都未能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林昭又为什么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呢?除了客观上孙复的搭桥外,还要从林昭本人的思想发展谈起: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最高考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个人志愿达到了圆满的满足,在那么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天地、新环境里,当时对于生活还是抱着比较乐观而振奋的态度,希望从此开始生命上新的一页。但是土改时在农村工作团期间因与领导关系不好,曾受到过打击,以致情绪上有时也会流露出一种遗留的低沉与压抑,表现得与组织不是十分靠近,政治热情较差;在学习上却是如饥似渴,非常努力。

接着开展的肃反运动中,个别党员怀着私愤,趁机进行打击,批判林昭人生观消极、思想颓伤、恋爱观不正确等等,最后给林昭以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这样一来林昭在政治上越没热情,对组织越不靠近。有一次她随意在纸上题了一首他人所作的七绝:

泽畔行吟楚逐臣, 井中沉史宋遗民。
频年我□⁽¹⁾伤怀甚, 人寿几何俟河清!

没想到居然被人抓住作为证据,说她要做蒋政权的遗民。林昭听后非常气愤,自己未解放前就积极参与地下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且曾一度有组织关系,这不但抹杀了自己当年一片纯真无邪出自赤子之心的革命热情,而且是对自己一向所持政治态度之莫大侮辱。从此心灰意懒,在政治态度上便逐渐趋向一种批判的保留。一方面多与被人们称为“落后分子”的同学接近,可另一方面又与怀疑现状的激进分子保持相当距离,并与他们发生辩论。如1956

1.注:原稿无法辨认。

年初学习“再论”时，林昭对团支部内一位态度激进的怀疑派所持的种种观点就不能同意，甚至无法接受，还和他进行辩论。

“鸣放”开始了，林昭在来势凶猛而凌厉的北大反右运动面前，思想斗争是比较激烈的，用她自己的话说：“似乎有两种力量扯着我往两个相反的方向去。”林昭当时的思想感情是站在朋友们那边，她曾经在北大的露天演讲会上公开为朋友们辩护，但另一方面她又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能够两全其美地解决问题。所以常劝一些比较接近的朋友要注意检点，不要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是性质不同的。想使朋友们不要以过激的言行引起领导上的怒恨、怀疑，使这新生的民主运动可以进展得比较和平顺利；同时也想劝领导大胆放心、信任群众，不要偏听偏信而轻举妄动。林昭这时在心底里对当政者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党也许会适可而止地罢手收场。

然而斗争的进行，无论校内校外都只日趋惨烈，无情的现实再一次粉碎了书生善良的梦想，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锤炼下，林昭终于怀着最沉痛的心情，亲手撕破了、抛弃了自己原来的改良梦幻，在政治态度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校内与“广场”友人们的关系达到了比较完满和谐的一致。林昭很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持的政治态度意味着什么，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可能通向哪里……

1957年下半年林昭因病回家休养，回校后，1958年的一天晚上，她得悉“广场”的主要成员被捕，紧接着就是对右派的处理，怀着沉痛的心情送走了一批批友人，这时的林昭处于痛苦和绝望之中，现实的疯狂、友人的星散，使心灵承受着惨重的创伤。瞻望前途自己觉得孤军无力，想到朋友们的处境又辛酸彻骨，一想到他们正在镣链之下、迫害之中，而自己还“逍遥法外”，便有一种像是自己叛卖了他们似的感觉，心中如焚如炽，无奈写下了一首诗《我应该在那里》，末段的大意是：

悲愤如此沉重，压得我难以呼吸，
我怎能摆脱这些面庞、这些记忆！
任教它算什么——考验、惩罚、抛弃，

我宁可去——我应该在那里，
我应该和自己的朋友们在一起！

林昭在悲愤中抬起头来，把痛苦和磨难作为鞭策、激励自己自觉地、坚定地走向朋友们先行的道路！在孤立与磨难中自然会有“嘤鸣求友”之心，她通过来往和书信，与校内、校外及社会上的同派们进行广泛接触，在联系中去观察和了解——搜索人们的内心，她发现不满现实是极普遍的共同意识，甚至有时达到相当尖锐与深刻，问题倒是：不满之后怎么办？以容忍求苟安，还是决心战斗、采取行动？光是说说话那是不够的，小市民对现实的认识也能达到相当的深度，但他们永远只站在一边说风凉话，我们需要的是既认识现实又怀有牺牲精神的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通过孙复、孙和的媒介作用，林昭和兰大的友人很快就学会了相互鉴别、彼此沟通了，用林昭本人的话来说：“秉承着北大以及‘广场’传统的影响，我很重视对外地、外校的联系，因为从北大以及京城的情况，使我坚定地相信：‘天涯何处无芳草’！时代思潮如是一种超越空间的存在，更不如说作为一个‘阶级’的这些人本身之间便有着深刻的共性，散珠子遍地是，就看会不会拾，小珠串也一定有，找到一些沟通起来，戏就有得好唱。”这些散珠子终于串在一起了，通过张春元和顾雁与林昭的直接接触，很快沟通了、交流了北大与兰大反右以来的一般情况，谈起来当然会谈到人，林昭是这样分析的：“但我们的人泰半被各种形式束缚或半束缚着，故而还是他们的人（指兰大的）较有实际意义……从主观上来说，我是代表‘广场’去考虑某些问题的，自然也没谁们封我当这代表，但也可以说



风华正茂的林昭

有。”“代表‘广场’的意义并非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而是作为平等的联合。”林昭对兰大伙伴们的评价是：“大约黄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辉煌的北京城内是辽阔而且犷悍，兰大的朋友们性格相当开朗而外向，好动作，却不甚好静去深思，这当然与客观环境有很大关系。似这种好动的习性用以造反，长处是颇富于进取，短处是不善于等待……”

珠子虽然串在一起了，但在一些问题上彼此仍存在分歧，如关于组织形式一事，兰大这边部分友人主张应尽快成立组织、并拟定名称，否则就名不正则言不顺，不利于开展工作。而后期“广场”诸友则不斤斤计较什么组织不组织，独立存在，独立作战，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不负初愿、不改初志！要像液态的升汞那样，聚到一起立刻能混合无间；拍散了，不论是多细的一粒也独立成样！只要精神一致，自必呼吸相通，没必要过分强调组织不组织。另外关于出版《星火》也有不同意见，林昭认为太冒险，印秘密宣传品，不仅对写和印的人来说是个冒险，对读的人来说同样也是个冒险。同时还需考虑其价值和意义，一份或一张东西出去，能给人家一点什么？值不值得冒这个险？如果不过是些尽人皆知的道理，就不值得去干。至于其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宣告自身之作为现实反对派的存在。但兰大友人们则认为出版刊物可以交流思想、扩大影响、团结同志，特别是在彼此分散，不能自由行动的情况下，出版《星火》是启蒙工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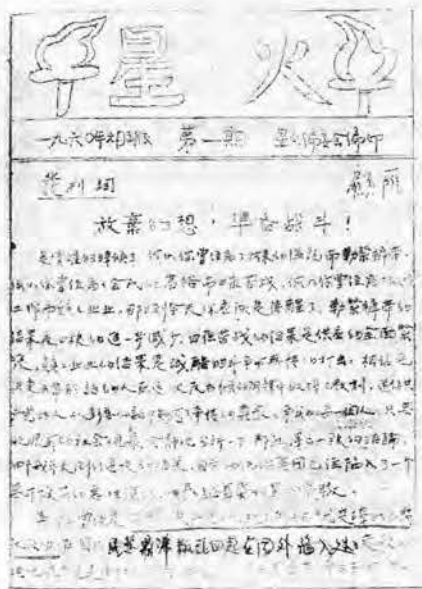
林昭对自己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曾做过如下的剖析：存在决定意识，外因通过内因。“党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国，林昭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岂有政治成见存在，非要闭着眼睛抹煞良心反党不可？但党既不能做到那样而恰恰相反，又要说、弄出了如许多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来，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烂、血泪遍地而白骨成堆。那么，林昭虽是乳发未干的黄毛稚子，也觉中怀惨痛五内崩裂而万万容忍不得！这时候，同一条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至于外因通过内因，林昭坦率承

认：“在自己这方面，最内在、最本质的一个原因，就是个人思想上的民主观念和自由倾向相当强烈。当年鸣放中我引过一句话：‘我不同意你这句话，但我甚至不惜生命来保证你有说出这句话的权利！’这种基本立场导致了我和领导的分歧，以及和‘广场’诸友的统一。”林昭本人不承认说与党和政府形成对立是自和兰大友人们联系之后开始的，林昭鲜明的个性、执着的追求、睿智的头脑，成就了一代英魂！也兑现了自己的誓言：

自由无价， 生命有涯。
宁为玉碎， 以殉中华！

（上述材料依据林昭 1961 年 10 月写的《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与检查》）

《星火》第一期全文



涌动的星星之火

发刊词 《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顾雁)

是清醒的时候了!假如你曾经为了将来的温饱而勒紧裤带,假如你曾经为了全民的富裕而日夜苦战,假如你曾经为了做好工作而兢兢业业,那么到今天你应该是清醒了。勒紧裤带的结果是口粮的进一步减少,日夜苦战的结果是供应的全面紧张,兢兢业业的结果是残酷的斗争与无情的打击。相信毛泽东主席的话的人在这次反右倾的阴谋中取得了教训,迷信共产党的人从彭总的话中知道了事实的真象。事实上每一个人,只要把眼前的社会现象冷静地分析一下,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由于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蹈着秦始皇的覆辙。

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做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这也是由于政治寡头们狂妄自大、指鹿为马、一味倒行逆施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做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古语说得好:“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正是这一次比一次彻底的反右运动,正是这一天等于廿年的跃进,加速了目前统治集团的死亡。

目前全国人民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任务——紧接着反右倾的高潮,一个比1957年更大的马鞍形即将来临。已经清醒了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抓紧时机,唤醒群众,为彻底摧毁目前的强权统治而奋斗!

《自白》

(向承鉴)

我们信奉的是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认为马列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对于任何东西——人物、主义等的绝对崇拜,决非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它必须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能体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工农)的意志。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的为彻底的摧毁它而奋斗。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向承鉴)

一,目前的国际情况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现代,帝国主义的活动地盘虽然大大减少,殖民主义在许多地区已经瓦解,但是它们却仍然千方百计,坚持着对国内国外的压迫和掠夺,并企图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霸权。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也在加剧。

许多殖民地已经取得独立,其他殖民地人民也正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作出日益激烈、日益有成效的斗争。

各个中立而中立程度和倾向又各不相同的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对大国和不同政治体系的集团表现出不稳定的态度。

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外国内重重矛盾和困难中艰难的前进。其中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自[身]推行错误政策的结果,使得经济倒退和政治反动。

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矛盾[盾]和冲突,对于殖民

地运动的支持和镇压，对于不同中立国家的争取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手段和现象，所有一切国家间的相互作用、矛盾、影响，使得国际情况异常的复杂和尖锐（它不可能稳定地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局部或由局部而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仍然存在。

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教训，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迅速的加强和壮大，使得越来越可能克服新战争的威胁。（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发生了作用）。

第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分裂，这分裂是由于反修正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而导致的。随着反修正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加剧，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空前的混乱局面，使得国际工人运动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非常困难和缓慢，甚至出现了危机。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垄断和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的恶性发展，由于一个或数个带着“真正马列主义”衔的政治寡头的思想方法日益主观唯心、反动变质，已经造成了可悲的结果，还有些国家也面临着这个黑暗的深渊。

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以及一些国家内部的这些情况产生的根源在于：在阐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还是一个空白，为填补这个空白所出现的理论还没有得到统一和公认。

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了填补这个理论上的空白，为了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对那些具有雄厚背景而企图进行思想垄断的所谓的“真正马列主义者”——而其实是对马列主义作了实用主义修正的人们——作了最坚决有力的斗争。这个斗争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支持，它振奋了人们[对]真理的信心，给国际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新途径。

国际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它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化官僚独裁统治，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金色牛皮的识破，中国

的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并且处于空前孤立的处境。

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对几个主要经济指标悬殊的更改，是它牛皮吹碎和迫不得已的表现。（其实还是吹牛！）在国际上没有看清中国大跃进其实是大跃进、人民日报所吹嘘的“钢铁翻一番”、“稻谷亩产万斤”等等伟绩真相的人只有那些头脑特别简单和不愿用眼睛的人。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看清了中国当代统治者的反动、变质的也大有人在。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统一工人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1959年12月3日《人民日报》），深刻地分析和暗示了中国当代统治者的“美好”未来。（请参考本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一文）

中国统治集团在国际上的景况取决于它在本国的施政和人民的情绪，应该肯定，它将越来越孤立，它的真面目很快就要在世界舆论和人民面前全面的揭露了。

二、国内情况

甲、恶性发展

从总的方面来看，共产党在取代了国民党的统治之后，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的事实，但是1957年整风运动以后的事实表明，它们正在努力把中国倒退两步的工作。

当代统治者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实在和它的没有法制，它使得许多无辜者在心灵、肉体上受到重大的创伤，使数以万计的生灵变成冤魂。

应该指出：当代统治者的这种穷凶恶极、灭绝人性的做法是与时俱增的，在解放初的运动中只是部分、甚至个别现象。

虽然共产党在1957年以前，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和罪行，已经使人民群众不能忘记，但由于他以前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大多数数人期望它改邪归正，但这种期望被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彻底粉碎了。

反右运动虽然使许多人失去生命、变成囚犯、神经失常、失去家庭、爱人，但得到的却是亿万人对当代统治者本质的认识。

反右运动使当代统治者在道义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步入反动的深渊。

反右运动之后的双反、交心、拔白旗等运动是反右的继续，这几次运动将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作了彻底的变革。

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必然产物，统治者为了使人民驯服，对人民群众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所有实行彻底的剥夺，使人民依附它，并强迫以军事组织形式将农民编制起来，实行奴隶式的集体劳动。

人民公社的最反动性在于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儿东西南北，这是对人性最基本特征的否定。

共产党标榜人民公社的最大优越性之一是它的大协作精神，而这恰是它的主要症结之一，以公社或管区（生产大队）为单位实行劳力统一调配，其实质是将定居变为“游牧”。在无常的运动中物质、时间、体力的消耗使生产效率大大减低。

大闹钢铁运动是自然科学的复古（反科学、反客观发展规律），它的结果在于数不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数以万计的人命牺牲和数年来国库储存消耗殆尽。（至今，许多生产队还欠下农民一个劳动力200元）。

大闹钢铁运动是一个或几个政治寡头头脑发胀、愚蠢无知的最明显表现。（由此观之他们早应该滚出庄严的宝座去与三岁小儿玩球的。）

大跃进完完全全是一次数字上的自欺欺人的把戏，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到处兴办了没有一个工人的工厂，没有一个学生的学校，只[有]一只猪的猪场，没有一只鸡的鸡场，那些报纸上醒目的红色数字增产比赛，使人不感到惊奇，并习以为常！

目前在党内展开的反右倾运动证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已有很大一部分不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反动的政策，它的实质和表现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前大分裂。

乙，各阶级、阶层的情况

由于狂妄自大、愚蠢无知和主观唯心；由于反科学、反马列主义、反人性，当代统治者已经彻底地背叛了工农群众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下了不能诊治的极症。

由于一切被剥夺（连同基本人权），农民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品性日益明显地在他们身上呈现和成长起来。（虽然在思想意识上他们还保有农民的大部分特性）。

农民同当代统治者的矛盾及其尖锐性突出地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现在全国农民都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他们奄奄待毙（而且有许多地区已经饿死了不少人）。而当代统治者还强制农民（开辩论会——打人会等）拿出24分的干劲，作24小时连续的苦战（平常最少也达12小时），农民恨之入骨，他们的情绪是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事实上小规模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了。）

根据过去的经验，当代统治着很了解工人阶级的团结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因此待工人阶级较之于农民要“宽厚”些，但是除了一些大城市附近的可数的大工厂外，大部分工人状况也并不比农民好多少。由于无休止的加班、加点的红旗竞赛，不断加强劳动强度，严厉的惩罚制度（减薪和开除等），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终月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和反抗也在迅速的加强。

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很熟悉当代统治者的习性。而它们也在1957年里记尽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可惧影响，很快地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它们谓之曰“改造”，当然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引诱、拉拢和利用一些市儷式文人、学者参加共产党，为它们做招牌，替它们歌功颂德，打击和迫害一批追求真理的人（这之中特别是大学生），企图驯服、稳定知识分子阶层的局面。

由于知识分子的动摇和两面性，当代统治者的分化手段也确实起了一些作用。

目前知识分子情况的主流是幻想改良、悲观失望、消极反抗。

它的综合表象是：所有的会议和学术上等等场合，冷冷清清，一言不发。

知识分子的转化和发展还表现在：那些由于受蒙蔽而在反右中的“积极”者，日益越来越感到受到良心上的自责，而对被迫害者越来越敢于表现出同情和友好。

在军队中不久前发生众所周知的“彭总事件”，这表明军队中上层领导的分化。

军人一般出身于农民家庭，对于目前农民情况绝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军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思想、行动上的特殊管制，将不能阻挡他们思想认识的转变。

现在的军队自然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但由于军队组织、纪律的特点，它很可能随时随地被用来反人民。军队组织、纪律的特点，和军人由于对现实认识的转变，将使军队出现混乱的局面。

反右倾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使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这样虽然使人民遭到更严酷的统治和迫害，但古语说：“长痛不如短痛”，当代统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第二，又有一批人受到了政治运动的洗礼，从而提示了他们的认识，这些人（并非全部）将可能为劳动人民的真正解放和幸福做出有益的贡献（当然，还必须提高认识、改造自己）。

一个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在1957年之前就已萌芽，但在1957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官僚统治阶层的特征在于：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对其它阶层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

目前国内总的形势是：

由于当代统治者推行各种各样反动政策的结果，工农业生产已遭到全面的毁灭性的破坏；由于以所谓的“党性”代替个性和人性，而实际是强赐人民的“奴性”；人与人的关系到了空前虚伪的程度；由于变化无常和没有法制，人民基本人权被剥夺；每时每刻都遭受着生命的危机，由此而反映出来的现象（全国范围内）是：政治运动鱼贯而来，各种刑事案件激增（凶杀、偷盗），市场供应紧张，

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烽火满地。在政治上、人民精神面貌上、经济上出现了全面紧张和混乱。

当代统治者在国内、外已经陷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三，我们的任务

面临着国内外这种形势，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唤起人民，放弃幻想，统一行动，准备战斗！

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全民行动的需要，在理论上应该努力从事于客观规律的研究，从而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并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我们应该大胆，由于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幸福、科学的社会主义，工人农民是推翻现政权的力量保证。我们应该大胆而果断的在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启发他们对当代统治者本质的认识，引导他们将暴乱自发的行动变成统一自觉的行动。

还必须启发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理智，因为他们能为革命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绝不容许混水摸鱼的现象，我们永志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及其所代表的反动阶级），我们将以革命手段对待那些来自自己死亡阶级的任何妄想。

全国的百姓们！赶快醒来吧！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升起了，让我们团结一致，为迅速彻底地摧毁当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统治而奋斗！

《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林昭）

（一）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它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摺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钢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它们急一嘴慢一嘴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殷殷，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丹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保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陶情。

一下，啄着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碎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但还微微跃动着，颤现着生命。

痛楚炮烙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流淋，
哪里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钢针。

钩曲的指爪掐透了手背，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那点点锈色的血痕，
勾勒出受难者巍然的身形。

对着苍空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隐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须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电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巅清涼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他先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流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吟……
醒来，醒来哟！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斑斑的岩层，
唇边泛起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安，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扁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说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啊？——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改正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财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种族家庭，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向往像平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吧，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要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从前种种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
要推翻神族——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旷世□□，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真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可真是新闻”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出了困窘。

“闲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那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窝，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台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吧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哪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专横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比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青，
他扬起雷电鞭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宏！”
“谁会把你和宽宏联系在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难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先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要是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怒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鞭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槌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难道说我整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然而他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的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强的舌头，
舐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睁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朗的疏星，
下弦月淡淡地抹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杂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常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辟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只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你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了，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才能够摆脱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物和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膨胀着对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黍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书生的灯盏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天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孙，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坡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倾听哪儿有第一声鸡鸣。

这些黎明仍会有兀鹰飞来，

但他将含笑忍受一切非刑，
因为，随着每一个血腥的日子，
那个真正的黎明正刻刻逼近……

《粮食问题》

（张春元）

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一切都在“大跃进”，到处都是“奇迹”，比如最近人的胃口也在“跃进”，进度实在惊人，“吃风盛极”，粮食到处呈现紧张，这甚至惊动了专门“为人民服务”的部长阁下和委员同志们，他们煞有介事的开会讨论，连一贯高喊上马，说别人是“小脚女人”的“一家之主”，也不惜给自己戴上一顶保守主义者的帽子，说要解决粮食问题需十年奋斗哩。

那家自称是“人民”的报纸也不知依据什么，说：大跃进的58年粮食产量翻一翻，比1957年增产一倍！瞧！总产量7500亿斤，每人平均1200斤；瞧！“奇迹”就出现在这儿，一个人每月有100斤口粮还叫喊不够，还叫喊紧张，无怪乎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说：总在人们的食道上“抓的很紧很紧”了。

是不是咱们小百姓吃得太多，胃口太大？不！决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供应标准，农村人口平均只有27斤原粮（还有15斤的哩；今年夏收前夕每天三两；收秋之后略增；十一月底又跌至每天三两。）城市人口在原来就控制很严的标准下，每人每月又节约10%，正因为大家吃的不够、太少，所以都想尽力的塞饱肚皮，粮食紧张，吃风盛极，也就是必然现象了。

粮食为什么会紧张、不足呢？要探讨这一问题，涉及到整个的农民问题、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经济税收、对外贸易等等等等。这里提出几点愚见，共同探讨。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一只手却狠狠的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

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割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地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请想！农民在这种残暴措施下，对自己没有丝毫利益的生产活动，怎能发生兴趣？怎能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是当前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所以无论是四十条纲要也好，八字宪法也好，必将成为一纸空谈，都不可能发展农业生产有丝毫作用。相反的农民对这种强加在自己头上的重担，采取了形形色色的反抗斗争，以消极怠工、破坏农具（尤其是新式农具）、敌视“政策”到揭竿起义，竭力来破坏与粉碎这种奴隶式的统治，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

当今的统治者除了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外（如前不久的公社化运动），在农业生产上走上了另外一条最简便、最省力、也是最低能的道路，盲目的扩大粮食增产数字。用这种数字来麻木自己、恭维自己，用自己编造的帐单，来歌颂自己的“丰功伟绩”，试问用这些天大数字来决定农业税收、统购任务、出口外销、工业用粮等，必将使广大人民勒紧裤带，吃糠咽菜，面黄肌瘦，营养不足，这就是统治者一再吹嘘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险”！这种慢性自杀的“社会保险”，必然使广大农民扶老携幼“免费”专车到处流窜，结果是农业人口锐减，农村劳力紧张，田亩荒芜，产量递减，生产力受到摧残和破坏。

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上到下，大家都尽力的打肿脸充胖子，把臃肿说成是“发福”，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生动的例子：一个全省闻名的重点县，一个全县闻名的先进生产队，这个队为了争取荣誉夺得“红旗”（非常遗憾，象征光明、热情、自由和先烈鲜血的红旗，竟被玷污到这等地步！可悲！），连夜“发动”群

众，把成熟的玉米从一块地移植到另一块地去。然后各级书记们锣鼓齐响、大嚷大叫、恬不知耻地把这种丑事说成是“丰产”，煞有介事的汇报成绩，总结经验，登报表扬，发给奖状。但可悲的是粮食征收机关像个凶狠的债主似的，一丝不苟的按照这个“丰产”的数目征收公粮，这一下，生产队的干部才知上了大当，吵吵嚷嚷的叫苦叫屈，而“挂帅”的书记说：“你虽多交了粮食，却获得了荣誉呀！”这句丝毫没有讽刺的绝妙话，使终年劳苦奔波、风吹雨打的压断脊背的人们，啼笑皆非，最后还得勒紧裤带。不过人们在啼笑皆非、勒紧裤带之余，首先感到的是什么？我敢说：那是愤怒！是憎恨！

当今的统治者用庸俗的暴发户的资产阶级的虚荣心理（呸！还有脸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呢！）不惜让国内人民牺牲一个人的起码的物质需要，放弃人的生活权利——吃饭；在国际市场上，像个败家仔似的，漫天撒线，搞暗线，丢人，不讨好的生意，单纯追求一些形式的名词，自己左右开弓打肿了脸，让人家说他是“胖子”，用“援助”、“救济”、不等价交换等名目，表示自己的“大方”和“慷慨”，向所谓友好的国家送秋波、递媚眼，好让人家在报纸屁股上说声“发福，发财”；另外又用“倾销”、“自由竞争”、“控制市场”、“换取外汇”等手段企图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妆成一付纸老虎相，吓唬一些神经衰弱的人。在这种可耻的政策指导下，许许多多的农副产品源源外运，形成了粮食、食油、肉类、蛋类和加工食品……定量的定量，减少的减少，脱销的脱销，绝迹的绝迹，把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知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首先是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这一真理踏在脚下。

当今的统治者在粮食问题上所玩弄的把戏，绝不止这些，不过仅仅这些人们就可以看出当代社会和政治的本质，可以看出：“为人民服务”这个招牌是多么的虚伪和无耻。粮食问题——其实也就是农民问题，已经像一座火山，越来越重地压在当今统治者的脊背上，有朝一日，会把它压得粉身碎骨的。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向承鉴)

当代统治者在叫喊英明、伟大、绝对正确之余,最近也突然谦虚起来(其实是不得不如此。),承认它们的各方面工作缺点和成绩有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是如像其它所有的一样,当代统治者惯用颠倒黑白的技术,这两个数字的颠倒也是自然应当的。

当代统治者经常教训人们要看事物发展,要看主流,我们现在也不妨来看看主流。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80%以上,农民的情况是现在社会情况的主流,这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当代统治者的愚蠢无知,在农业上强行采取一些反科学的措施,使得许多土地减产,并且随之以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实行其他一系列的错误政策,目前农村生产遭到了可怕的破坏。农民的情况是:吃不得饱,穿不能暖,处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目前全国许多农村成年农民口粮不到20斤,还有些省份的农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三两,他们把包谷棒视为高级食粮,以野菜、树叶等充饥。在今年阴历三、四月间,有一个县就饿死了一万多人,有一个生产队就饿死了180人之多。槐树叶吃光了三次,柳树叶吃光了一次。全国农民除了在阴历年时沾了点油外,全年都没沾着油,(有情况特别好和位于大城市附近的,在伟大的国庆十年大典那天吃了八钱油!)许多老年人厌世上吊自杀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还在无休止的向农民搜括、掠夺,并且强制农民拿出24份的干劲,24小时的日夜苦战。如果农民一旦有点不满情绪,那些无法无天的干部就可以随时随刻召开所谓“辩论会”,(其实就是打人会。)不是捆绑法办就是打得死去活来。

这就是“社会主义”给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恩赐,这就是农民从当代统治者那里得到的幸福生活!

是那些繁华的都市、那些只供官僚们“办公”享受用的大楼,那

些只供外宾们参观的设备,是那几个国家供了大量补贴的公社典型、是城市里穿皮夹克戴手表人数的增多是主流是九个指头呢?还是80%以上人口的农民是九个指头呢?

《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

(张春元)

随着当代统治者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加深和发展,农业问题——其实质就是农民问题,像一座不可攀登、不可克服的巍巍大山,摆在统治者面前,从目前的政策、法令、统治手段、剥削方式等等来看,当代统治者也将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在这座大山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任何一个统治集团,任何一个政党,想抹杀农民大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忽视他们的经济利益,剥夺他们的物质享受,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把他们当牛当马,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愚蠢的,都是死路一条,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以当代统治者过去所进行的活动看,从战略战术、武装斗争、人员军队、给养补充……其实质就是农民战争。所不幸的是,当代统治者也和其他统治者一样,一旦登上了宝座,就翻转过来,用残酷的超经济、超政治的剥削和统治手段,对待自己过去的哺育者和支持者。但是今天的统治者不同于历代任何一个统治集团,由于它们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专断独行、扼杀民意的推行一些旨在破坏农村生产力,使五亿农民陷入赤贫化的政策、法令,在农村引起了既深刻又广泛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将给中国以后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纪元,创造一个崭新的时代。

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这个阶层的出现是由于当代统治者实行反动透顶的各种农业政策的结果。首先,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

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在这个所谓“通往共产主义桥梁”的帷幕后,使广大农民瘦骨嶙嶙、嗷嗷待哺;使广大农民处于“国家”奴隶与依附者农奴之间的地位,从物质生活到人身自主都得依靠当代统治者的赐予。当代统治者还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农村,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与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烙上了奴隶的烙印。此外,像当代统治者所说的一切公民权利,如选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言论自由等等,对农民来说则完全是骗局,请试想,一个终年累月挣扎在饥饿线上,不上工就不给饭吃的阶层,连起码的做人的生活权利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能在政治上享受真正的民权吗?即有的话,也不过是按统治者的意图表现的工具而已。

这个深刻广泛的变化,在国计民生中和社会生活中都起着严重的影响,正由于农民群众在政治上日益的奴隶的地位,在经济上日益无产者化,农业生产破坏,粮食减产,各种农副产品、轻工业原料供应紧张,这就是必然的了。而处于自发与成长过程中的农村无产者阶层,虽然用相当消极、隐蔽的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遭到了当代统治者残酷的报复,目前在广大农村中进行的所谓“反右倾”运动,就是打击一些对农民疾苦略表同情的人,(这些人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他们来自农民家庭或本人就是农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大都是农村党员。)实行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只有促使广大农村无产者的觉悟,促使当代统治者处于孤家寡人的地步。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不可能掀起一个波浪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但星星的燎原之火已经在局部地区燃烧起来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个燎原之火一定会愈烧愈欢,席卷全国。在这场农民运动的烈火中,必将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工农群众代表

者”烧得毛发不存,原形毕露,最后将被远远地抛弃在工农大众的历史巨轮后面。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

(胡晓愚)

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充满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而且明眼人不难看出,他虽是站在匈牙利的讲台上,眼光却是看着中国的,不信请看下面的话:

“这些倒霉的领导人脱离群众,向群众发号施令起来。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行动,往往不是运用工人阶级的专政来反对劳动人民的敌人,而是打击自己人……而是向自己人开火,使革命力量受到打击。这些人士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垮下来。”

这段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执行党的绝对领导,不应该进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预言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垮下来。

“他们自以为不会犯错误,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可以不考虑客观条件,不考虑劳动人民的意见。说服教育这个作为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被代之以发号施令和行政命令。”

这段话是说我们忽视客观规律,不听群众意见,不用说服而用强迫命令的方法。

“苏联共产党第一个做出了榜样,大胆而严厉地谴责了由于个人迷信而产生的一切缺点,这样做是正确的,虽然有些人说我们党的第廿次代表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定的复杂化现象,说不应该那么尖锐的提问题。不,同志们,是必须这样做的。”

我们认为不应该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才打出一阵修正主义的浪潮,赫鲁晓夫却认为必须一棍子打死才现出马列主义的真实面目。

“……公正的批判了斯大林所提出关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增多,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论点。……十分明显的是,无产

阶级专政的加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断导致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导致敌对阶级残余的反动力量的削弱。这就是在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内之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向。”

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由于不仅要革资产阶级的命,而且要革小资产阶级的命。阶级斗争将日益频繁、尖锐。

“在这些阴险的图谋中,我们的愚蠢只会成为帝国主义的贪欲和妄想的同盟者。如果我们骄傲自大起来,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领导中犯错误,如果我们歪曲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学说,那么这些错误将被共产主义的敌人所利用,1956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段话当然也不会无的放矢,矢就是指的中国,暗示我们愚蠢,我们犯错误,我们骄傲,我们歪曲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暗示说这些都将敌人利用来发生第二次匈牙利事件。

“……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起来,就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允许的。”

我们要大跃进,赫鲁晓夫劝我们“对对表”,向谁对?难道我们应该永远落后于苏联,这就是骄傲自大吗?所以我们说苏联党的马列主义水平低。我们要力争上游,赫鲁晓夫劝我们不落后也不抢先,安居中游。还恫吓说要不这样就是帮助敌人,反对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对社会主义的经济高涨具有重大意义。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并且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证实:不从物质利益上使工作人员关心他们的劳动成果,就不能提高国家劳动生产力,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把千千万万人引向共产主义。”

我们要政治挂帅,赫鲁晓夫要钞票挂帅;我们要红旗,不要钞票,赫鲁晓夫要钞票不要红旗,把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提高生产力,全部归之于物质利益,与我们多么不同。

这篇讲话里,说我们脱离群众、骄傲自大、要发生匈牙利事件,向自己人开火,不考虑客观条件,没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反对大跃进、反对力争上游,主张钞票挂帅等……够了,总而言之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言论之大成,结论只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头目。

注:“ ”内的话是赫鲁晓夫的讲话。见1959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件与参考消息》

编者话:为了帮助读者看清国内外重大事件的真相,我们特辟《参考文件与参考消息》专栏,专门刊载不见报章的重要文件与重要消息,这期发表的是毛泽东在去年(1959年)四月间给全国小队级以上农村干部的内部指示,每一个人读了这篇指示以后,可以想像得到忠心耿耿执行主席指示的干部,在今天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省级、地、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谈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200斤可很好了,吹上800、10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加200、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密,不可太稀。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说越密越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一些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作出一个较科学的密植程

度的规定,几年之后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收管吃)抓的很紧很紧,而且要抓的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都不可讲,讲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的大国,实在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多少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实行,三年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有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根据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先进的农具,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间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方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谈到机械化,用机械化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然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讲不合实际情况的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这几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办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累积经

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从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是在真正调整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如果事实不是我唱的那样低,而达到较高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59.4.29

(注:“编者话”是由顾雁执笔。)

《反右倾的来由》

(苗庆久整理)

据官方内部透露消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八中全会,最后一天代表们正准备闭会后游山逛景之际,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交给毛泽东,其内容指出了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某些错误,特别是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说:“……若不是中国农民愚昧无知、最富有忍耐性,早就把我们推翻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一旦农民起来,依靠本国军队是无用的,必须请外国军队……”毛见信后大发雷霆,立即召集代表继续开会,提出反右倾运动。

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一些言行

据悉:霍维德说,思想改造、反右斗争把知识分子得罪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民得罪了;红旗竞赛、超先进赶先进、提高定额、加班加点把工人得罪了。

当看到全国市场全面紧张的局面时,他说:“老子若知道是这样,当初就不革命了。”

他最近到农村视察人民公社时,当地给他准备了丰富的饮食,并介绍说:公社化以后社员提高了,经常吃喝这样饮食。他看见农

民都是面黄肌瘦，不相信这些介绍，当即检查社员厕所，实际看到的粪便都是绿水，并严厉地提出批评。

(注)：上述事实也就是他成为右倾分子的主要原因。

《星火》是一种正义的声音，它向邪恶开战；《星火》是民主的号角，吹响了向独裁、专制的进军；《星火》是历史的见证，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星火》象一束强有力的闪电，刺破黑暗的天空，风驰电掣的雷鸣将接踵而至。《星火》是先进的种子，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并将茁壮成长。在那令人窒息的长夜里，在祖国的大地上正暗暗涌动着、汇聚着星星野火！随着《星火》的出现，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例如物理系的何之明，正是通过“星火”使他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说：“过去我是你们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现在我们一起干，我把脑袋别在裤腰上，生死何足畏！”

当时环境不许可，所以原文均不署名，这是根据健在人的回忆添补上去的。本来还计划出版“星火”第二期，已开始部分组稿，有条件的话改为定期刊物。另外还有对外的宣传，1960年4月在顾雁上海郊区南汇县瓦硝公社黑桥德星堂的家中，苗庆久、张春元和顾雁三人聚会，提议针对时弊写一篇文章向高干散发，计划8月份在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西安）通过邮寄的方法传递到高层干部手中。这五大城市的确定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而来的：苗庆久原来在北京工作，上海有顾雁，武汉是张春元的工作所在地，广州有梁炎武，西安有向承鉴的亲友。文章就是张春元执笔的《论人民公社》，当时印了约三百份左右。张春元是这样分析此计划的：如果能发到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发给中央高级干部，他们之间必然相互猜疑，彼此疑心，这是效应之一。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与我们观点相同的人，会因此受到刺激而有所表现，我们可以静观其变，这是效应之二。另外还可以试探一下当局对这类事件是如何处理的，采取的措施、方法等，可以为我们积累一些经验。邮寄必须有具体对象和具体地址，这一工作提议让梁炎武负责，后来形势的发展无法进行，此计划也宣告流产。

《星火》第二期的稿件

《不打自招》

——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

(孺子牛)

根据中共中央八月十日发出的文件，人民日报在本月初发表了《南泥湾的方向》的社论。

这篇社论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我国内外形势良好”；“大跃进，持续跃进”；“x x 翻一翻增几倍”的口头禅不见了，我们倒从满篇的“艰苦、困难”里听出悲惨的哭音。难怪，夏天已经过去，秋风正横扫老朽的树叶，并且，按照自然的法则，严冬也就要到来了，蝉儿们还有什么可叫的哩！

这篇社论本身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这是当局最最害怕啊！）金色的牛皮吹破了！同时也证明了：无论动员怎样多的力量来缝补这个大牛皮，哪怕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组织力量甚至军事暴力，在事实面前他们终是白费力气！（因为事实是客观真理——即绝对真理，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奇怪！自从1957年反右派之后，我们一直从中共领导人嘴里听到：“气象一新”、“钢、粮翻一翻”、“大跃进”、“稻谷亩产x x斤”、钢棉粮煤提前两年完成5年计划、形势空前良好、继续跃进等一连串振奋人心的捷报。怎么？有人问：我们怎么“跃”到南泥湾那儿去了呢？奇怪！

的确，在中共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我们终于被飞速的“跃进”带到南泥湾的那里和那时了。睁眼一看（当局者说：我们中共是绝对正确的，你们要绝对服从，闭上眼睛跟着我走。所以我们一直不敢睁开眼过，因为知道许多试图睁眼的人都倒了霉，我们再不敢了。）钢丝床是没有的，每日半斤肉、四两糖也是没有的，所谓的康

庄大道不见了,却是悬崖峭壁、穷途末路,原来!我们受骗了!

从《南泥湾的方向》这个社论的题名里,当局者给了我们这样的暗示:现在全国的情况和南泥湾的那地那时一样;并且:那里那里的困难能够克服,而且被克服了,现在也能一样。(对当局者来说,能作这种公开承认和暗示,该是一个多大的让步!)不!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愿受骗了,我们不但要睁开眼看看,而且要作现在的情况之所以与南泥湾的那时完全不一样的比较:

首先,程度上大有不同。那时解放区正是小日本、蒋介石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一切为了战争、前线,极大一部分的物力、人力、财力均消耗在战斗上,而当时解放区还小,这种担子相对来说应该是极重的了。但是南泥湾的那时,不管饿死人民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说明解放区的人民力量(人力、物力、财力)尚有盈余,景况并不太坏。如今,全国范围内除少量的军事行动外,不曾有大规模的战争,大部分待戈的军队边训练边生产还能自给自足(据报称),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证明,现在在我们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全国范围内对于一小部分有军事行动(就算全部军队吧)的军队,给人民造成的负担是微不足道的,与南泥湾那时战争给人民的负担相比只千一而已,彼此相较,现在理应好得多了,可是我们所见刚反:“饥饿笼罩着全国,到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扶老携幼,沿门求乞(而不可得!),铁路公路饿殍野尸屡见不鲜,荒山野岭白骨铺地,豺狼抢食,食人!食人!”

(编者注:孺子牛是向承鉴的笔名。此稿似乎尚未完成。)

《(三月的)农村一日》

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割视之一

向承鉴

同志,你问我目前农村的情况吗?那什么党群、干群关系咯,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咯,生产关系咯,我可说不上,连什么叫生产力我都不懂得。不过,同志,如果你愿听,不嫌麻烦的话,我倒可以把我

一天里的事情讲给你听,如对你有帮助你就记下,没用就算扯淡好了。

不知是谁接二连三的摇我的胳膊,使我醒来了。妈妈说:“快起来吧,上工的哨子已经吹了半天了。”我用了很大的力量想动一动我的身子,但它像被十二捆疲倦的麻绳捆在床上,我用力想睁开我的眼,但我的眼皮比几十斤的钻头还要重,我哼了一声,又睡了。但妈妈又把我摇醒了,说:“再不起可了不得了!昨晚的辩论会就要临到你头上了!”妈妈一提到辩论会,我的瞌睡立刻吓的走了大半,自从大闹钢铁到如今,村里一半多人都吃过那味道,昨晚上“辩论会”上,王家老二被人用拳头脚踢打倒到地上好几回,又拉起来,最后拉不起来,就为的是前几日上工太迟的缘故。妈妈又接着说:“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就不能看见你受那么的刑,儿啦!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惹不起那些当权的东,那些富牲啊!”

我起来了,穿上我那土改那年做的破短袄,妈妈怕我冷,又把父亲留下的破长袄披在我身上。父亲是上个月饿死的,那是因为食堂的门关了,自留地收的150斤谷也被他们从地底下寻到,(还说我家是人家的哩!)屋后面的几棵榆树皮已剥吃光了,远处已早被别人家剥去了,只剩下管理区周围没人将,我弟弟偷偷的去剥,被夺去了斧头和刀子,说这是破坏树木,还绑关了几天,“鞭抢”了一阵。而门前沟边的柳树却还刚发芽,未长叶,吃不成才饿死的。像这样饿死的人才多呢!光我家和我亲戚中就有我父亲和我的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我外祖父、外祖母、我三叔和我岳母,我随便算了一下全村340多人。要不是这几天毛主席突然长了眼,供应了,那我妈妈和我老婆也早到另一个世界了,就有我存根,我还算落了好些哩。最近政府也在统计饿死的人数,据他们说只有63个,我感到好奇怪,他们一向喜欢数字大功劳大的,这次第一次把自己的功劳说小了,我估约至少说少了一半罢!

我揉了揉眼,用腰带扎紧了,担了一担土箕出门来。我一出门便打了一个哆嗦,好冷啊!望了天上三星将沉,启明星有五尺来高了,我细算了一下,昨天晚上大概睡了两个时辰,比起大跃进和以往

的日子,不算睡得最多的也算很多的了,咳,不过现在大跃进一天等于20年,只怕一天一夜睡两个时辰多得太不像话了吧!这时从村东头又传来了一阵阵的哨子的“嘶~嘶”声,和粗嘎的喊骂声:“王家老二,你想死了吗?昨晚罚定你第一个上工,你还死得不起来!”天虽然黑得很,但我听得出来这是赵队长的声音:“你哭!你装病!装死!今晚才叫你好看呢!”这赵队长工作可负责任哩,每天天不亮他自己扛个铁铤,总是精神抖擞、气势汹汹的,他是社里的党支部委员,又是队的财政委员(会计吧!),别看他管不了社员的吃,可是把自己的伙食倒安排计划得好,不但他自己,连他家的人都没饿着,都是肥头大耳的!他不管自己的工作,可是把社员的工作活计倒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按照他的安排24小时每一秒钟都不会浪费,他总是天没亮就叫(骂)社员上地,一年到头天天如此。

我怕错过一道去上工的时候,就带上工具到每天集中的地方等着。这是一个牲畜棚,棚面前是一个不大的场子。牲口房很大,长长的两大排,原先刚土改时我们每家都有1.5-2个牲口,有的人全家子还有分到4-5口的呢!刚入社时牲口房挤得满满的,小的牲口还得另存,有的被挤坏或踏死哩!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全队原先有60多对牲畜,现在只剩下11对了,而你听连声音都听不见了,要是过去你老远就能听见这里“咕嚓”、“咕嚓”的响声呢!……我越想想着,可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突然哨子和队长的骂声把我惊醒,真可怕呀!我连忙打开眼一看,还好,还没来一个人哩!我还以为人都到齐已去上工了,队长专门来找我骂我的呢!东方一片红光,有个别早醒的鸟在飞在叫了,天还没大亮,我在连接不断的哨声和队长的骂声中,就又糊里糊涂睡着了……

我第二次惊醒了,并且出了一身的冷汗,那是由于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坐在我旁边一块大石头上打盹的细毛(我的邻居),因瞌睡而我倒在旁边放着的土箕上,弄得“咔嚓”一声响,他是一个11岁的小孩,脸面瘦得像小猴一般,这时正将头从土箕里慢慢地很困难地爬起来。天已经大亮了,我看见他的额头上被土箕扎得直流血,不知什么缘故,他没有哭,甚至连哼一声也没有,说真的,现在

我们都不流泪了,哪怕遇见最伤心最痛的事,例如我父亲临死的时候直瞪瞪地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的像,又望望妈妈和我,可是我和妈妈连一滴眼泪都没掉,不过妈妈叫我把那像撕下了(她自己那时已饿得不能下床)。我赶忙帮细毛擦掉了头上的血,并扯了一条我的大手巾(指揩汗巾—记者注)帮他捆包了。这时我望望四周,看见了一二十个妇女、男人(多半都是年青的像我一样),也都乱七八糟东倒西歪地睡在场地上、草上,或坐在石头上,而赵队长也坐在磨床石的一个碾石上打盹(他也晒了!),其中有几个人被细毛的摔跤声惊醒,揉着极晒的睡眼朝我这里望。

赵队长也突然醒来了,他立刻站起来吹了一声哨子,我看见许多睡梦中的人被吓得跳起来,大家都索索的发抖!“这些好吃懒做的死猪!怎么还没来齐!”他望望众人之后骂道:“好,夜晚让驻社干部和你们这些流氓算账!”他立刻给我们分了工:五个人将牛粪送到西村的地里;十四个人犁土岗下面的老地,我被分配为挑粪。(原先我这队有75个全劳力)。

赵队长分配完工作带着嘀嘀咕咕的骂语和恶狠狠的神态走了,他有他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睡觉)。

我试着挑担子,但是第一次却没有挑起来,我不禁再望望担子,看它到底能有多少重,我很冷静地估计了一下(但这也不免夸大),两小半土箕牛粪最多50斤,但为何这等重!我今年26岁,身体从不生病,以前能挑起三百斤担子,常日挑一百五满不在乎,这回儿50斤竟变成了五千斤那么重,真真的古怪!我望了别的同伴们,还都不如我呢!我再鼓了鼓劲,终于挑起来了。

将牛粪由东头送到西头要经过全村子,我正担到村里时,一家门前围着三个人在看什么东西,我也累了,便也放下担子看看;原来是一个饿死了的人,旁边一个人说:“这是吴婶的亲弟弟,也是因为肚子的事来请姐姐帮忙的,但是如今谁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可怜吴婶有15天不能下床了,家里都夭亡了,她弟弟昨晚来,她都不能下床来开门,她弟弟看见帮助没希望想走,可怜连这门口的小沟都过不来,我眼看着他在过这沟时候倒了就再也没起来过,

可怜吴婶听见她弟弟这样也就完了。可怜……”说话的是个女人，她哭了。为什么要哭呢？我就不哭，我父亲死了我就没哭，我孩子死了我也没哭，人反正是要死的嘛！咳！

我的同伴们把粪倒地，就寻起野菜和草根起来。说实在话，肚子实在饿得惨啊，我恨不得将泥土、牛粪往嘴里放！我挖到了好几棵野猪草，就快得不能再快地将它吞到肚里，连泥巴和叶子上的粪尿，我还寻到了一个小烂薯，那是去年的存货，咳！要是这些存货再多一个(!)又有多好啊！

我寻累了，望望我的同伴，已经有三个因为收获不大而厌倦得睡了，我也就倒在地上睡了。我睡得正糊里糊涂，张家老五把我叫醒了，他说：“差不多了，咱们该往回走了，红眼睛的人来了又麻烦。”于是我们就往回走。果然不错，我们走到鲍姓庄子门口碰上了眼睛睡得红红的赵队长，他问：“你们挑几趟？看你们一个个任务完成了没有？”张家老五回道：“我们挑了十好几趟，每人都超额过了一万斤呢！”现在我们都学会了“以虚带实”，把五十或一百斤说成一万斤，不是吗？按照党提的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把任何东西都该放大7000倍才成，要不就是落后保守分子，要挨“鞭抢”（辩论）了，谁还敢不响应党的号召呢！？

我这就到食堂去吃饭，早饭吃的是黑麸饭，每人6两，另外还有两勺子菜汤，说实话，这些以前连牲口都不吃，可我家土改时是贫农啊！但这时却望见眼就红了，恨不得盛饭的人盛多一点才好，没吃之前想一口全吞了，可到了嘴边又舍不得，害怕一下吃光了，我就慢慢地嚼，哎呀！你可不知道那黑麸皮饭该有多香，以后好了万万不要喂给牲口吃，多可惜哟！我吃完后又帮我妈妈和老婆打饭，她们两个打做两处，就这样各吃各的，她们还吵嘴哩，妈妈骂我偏心我老婆，说我把多的浓的给她吃了，或说我偷了；可我老婆呢也是这样骂我，叫我真为难，说实在话，我可从来没有偏心过哪一面，食堂怎么打的，我原样带回家，有什么办法呢，国家只给我“照顾”这么多嘛，另外做饭的、管伙的还要多吃一点，你看，要不然他们一个个的脸上为什么都红红的？还有哩，你看，那厨房东边小屋

里，有七、八个干部正围着桌子一边谈笑一边吃着，那碗里不但是白面条，还带肉哩，咯！社里这些日子牲口也天天有饿死的，那些可怜的牲口全进了他们的肚子了，我们可没闻到一点味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吃得好，我可没有半点不满意的，他们都认得几个字，会骂人，还会对大干部笑，本领可大哟，那能和我们农民相比！我想他们的祖先都是积了阴德的吧。你看，我们不是只能吃这些、吃这么多了吗？他们骂我，真亏人啊！不过，也不要紧，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

刚走到家里，上工的哨子就响了，跟早晨的一样，哨子吹了两个钟头左右大家才去了。说来也怪，“辩论”会几乎晚晚都要开，大部分的人都尝过“鞭抢”的厉害，可大家反倒不害怕哨子了，说实在话，连我心里也松了许多。可1957年以前，哨子只要吹两三声人都到齐了，你看十点上工的，这会太阳都歪西了人还没到齐呢！我想大家不太害怕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辩论会开的还跟以前一样的多，可打人的人比以前少了些，或是打得没以前那么有劲了，1958年的时候，粮食有一个时候不定量，人都很有劲，打一拳、踢一脚都了不得，可现在就不是那么难受了，再说也都不愿打人了，大家想：今天打别人，明天说不定自己挨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何苦呢！虽然这话不对可也有点理，另外，我们农民里如今有力打人的真不多了，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今天下土呢还是明天，为什么在下土前还要结下怨仇呢？

中午上工本没什么事发生，可赵队长总不喜欢大家太平静的。他一见张家老五就骂：“小杂种！你明明只挑了一担30斤，说什么挑了十几担几千斤，你敢胡吹牛皮，你胆敢骗你老祖宗，好，今晚上瞧！”赵队长说我们胡吹牛皮，我想这就怪了，去年你把十五亩快熟的包谷连根挖起来栽到一亩地里，报包谷亩产2万05斤，有谁说你吹牛皮了！报上登稻谷亩产2万斤，谁说吹牛啦，为什么我们就是吹牛了！按照党的精神，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吹牛，这么说就是党的话是吹牛或党号召我们吹牛了咯！那还了得，我看你也是睡糊涂、吃糊涂了吧！

话虽如此说,经他这么一骂,整个下午我的心头都忐忑不安,大家也是这样子,按以往中午也是挑一回的,这次可挑了两回,每人2千斤了。我看见张家老五两次都挑得特别多,压得东倒西歪,有好几次都差点摔倒在路,因为“红眼”队长每次都红着眼瞧他呢!这张家老五也真可怜,父母亲和小弟弟在2月间都死了,如今只剩下他和他妹子们,原先该是多么可爱聪明的小家伙啊!

你还要我谈谈生产力吗?天哪,我连什么是生产力还不懂,你要我算帐?啊,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是同样远的路,以前我每天能担30趟,可现在只三趟;以前每趟能最少担150斤,可现在每趟最多担50斤,合起来算就是,过去干一天,现在干一月。你问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可不会说了,不过那时我每天吃三斤多,还有油、肉、菜咯!

你问我有什么感想吗?为什么不起来反对共产党?唉,同志,你这样问我可是冤枉我了,我对共产党可热爱得很哟!我一点感想都没有。再说,反共产党谁来领导,又怎么个反法呢?共产党可聪明厉害得很哩……

好了,又叫开会了,我不能再陪你谈了,我心里老想着张家老五,说不定我还要挨“枪”哩,不过又听说今晚开会布置夜战的,这是应该的,包谷再不种就不能熟了。

1960.4.19.3 时

《告全国人民书》

(向承鉴)

全国的父老兄弟们,姊妹们,全体同胞们!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59年、60年血的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我们用木板、桌子、门、床板做的棺材埋葬了我们的亲人,柜子或草席埋葬了我们的亲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人葬在门前的院子里,葬在家里,葬在床面前所挖的坑里,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濒于饿死的人,我们在死亡战线上挣扎,我们

不知道自己死在今天或明天,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来拿动亲人的尸体,我们看见了其他的人死后的尸体在炕上或床上躺了十几天、廿几天,臭了,没人管!同胞们!你们一定看见了:在高山、在平地、在大路旁、小路上、在车站、在家门口,那衣衫褴褛、平展四肢、眼球突出、嘴巴张大的年老人、年青人、妇女和小孩的惨象吧!或许你自己的亲人中就有成这种冤魂的!全国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全体同胞们!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什么都该清楚明白了!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对人性、对生命的浩劫啊!

当代统治者不管它说得多么漂亮,所谓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等运动如何用马列主义的美丽招牌来解释、来标榜,但我们不再受骗了,我们早就明白了。当数百万、数千万的农民饿死在床上、在火车上、在铁路旁、在沟底,当数亿(四亿)人民濒于饿死的时候,当其它二亿人半饥半饱的时候,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做“人民的勤务员”的畜牲们,却在商店的后面可以买到任何的点心、饼干、糖果、中华烟、前门烟;他们可以在任何农村食堂里吃得饱饱的扬长而去(谁敢问他们要粮票),而且他们一到,饭就端上来了,真做到了随到随吃,57、58、59运动后,干部在群众头上建立了崇高的威信,他们可以恣意的开盛大的宴会,以便能得到“贵宾”们在酒醉饭饱之后的几句恭维话。像这样的宴会一次就要花5000农民劳动一整年,在北京等各大都市天天皆是,一句话,他们变了,他们脱胎换骨了!彻底变了!他们从57年之后已经正式形成了一个官僚统治集团,他们是人民大众的老爷,他们是把国不当国、民不当民、贪得无厌、花得不倦的浪子,是一个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不懂装懂的资产阶级的轻浮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以无偿的受淫换取捧场的下流女戏子,更是一个在半有知半无知中罪大恶极的土匪、强盗。

彻底变了!刘少奇、陈毅的老婆为什么只有20妙龄、漂亮无比,可是他们自己却是50开外的老妖魔了!许许多多的大中干部们为什么离弃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女人,另有新配?从反右倾

中揭露出来无数事实可表明,无数的干部老爷们强霸民家妻女,在他们工作过的地点设下10-20个暗窑,恣意作乐!他们变了,在他们身上连每根毫发都不是人的东西了,这些畜牲!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全体同胞们!中国人民被这群牲口杀得较多了,农民死得已经较多了,死去的冤魂在向我们作证。同胞们,我们千万不能说:他们死他们的,等死到我们头上再说!同胞们!如果那些死去的人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或者妻子、儿女,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难道你的良心会无动于衷吗?如果说我们现在不积极行动,那么等死面临我们自己的时候,又有谁来帮助和拯救我们呢?恐怕到那时或许人都死光了吧!同胞们,我们千万不能这样打算,这是奴才的哲学!这是统治者要把我们分批杀尽的技术和战略!因此,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互相救助,只有这样才能自救。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全体同胞们!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团结起来,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战斗!唯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过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

《从一首歌谈起》

(杨贤勇)

农民是爱唱歌也会唱歌的。他们用歌声来说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愿望、理想、赞美、愤怒。从他们的歌声中,可以认识他们的心灵,现在他们又唱起了一支歌,这支歌用的是“社会主义好”旧调,装的却是新词,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糟,
社会主义糟,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饿死了!
吃树叶,吃野草,

人民政府都把粮食刮光了。

人民政府害人民,

六亿人民活不了,活不了!

这支歌,我是亲耳听到的。朋友,你也许没听到这样的歌声吧?你也许还会说,这不会是人民的歌声,而是少数坏分子、落后分子、地主富农的反调。朋友,你的想法错了,我忠实地告诉你:这些歌手是“解放了”的贫农,而且还有党团员呢!有上面想法的人,不是中了统治者的毒,就是对现实缺乏真实了解,如果他了解现实的真实情况,而且又有热爱人民、关心人民命运的崇高的胸怀,那末他对于上面那首歌就不会有“格格不入”之感,而会自然而然地“心心相印”了。

这支歌的内容是真实的吗?啊,你又发生怀疑了,让我们一同来看看现实吧。当我们坐着火车东去西来、南往北返的时候,当我们穿行在农村的广阔原野上的时候,不需要特别留意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剥树皮、掠树叶、挖野草、寻野菜……用这些东西做什么呢?沤绿肥吗?哈哈,猜错了。原来是拿来当粮食的,正是这样:当粮食啊!人们常常习惯地用“糠菜半年粮”这句话来说明解放前人民的痛苦生活。可是而今,人民连糠菜也吃不上,为了生活,为了活命,只得用树叶树皮野草野菜来充饥了,只得向大自然索取“粮食”!索取生活和生命的源泉!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就是这样生活着,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要知道,这是被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劳动人民的生活啊!由于没有粮食吃,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亲眼看见:农民饿得面黄肌瘦,普遍害一种由于营养的严重缺乏而造成的水肿病,道路旁、大树下、田野中到处是死尸,有很多家庭甚至断粮绝种:人全部死光了!古人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用在我们的社会里是符合的,真是古今一致的写照。好一个“承先启后”呀!

了解到上述的悲惨景况,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感到愤恨,而且都会异口同声地发出质问:每年,政府总是公布说粮食大跃进、

大增产、大丰收、人民生活大改善、大提高，这是真的吗？为什么又这样普遍严重地缺粮、饿死人呢？粮食到哪儿去了？问得对！广大农民也理直气壮地问道：我们用血汗换来的粮食到哪儿去了？为什么给我们极端苛刻的定量：每天半斤？为什么有几个月一颗粮食也不给？粮食到哪儿去了啊？要回答这些严重的问题，只有从统治者的一系列的政策、方针、运动中才能找到答案。事实的结论是：共产党叫人民受饥饿！共产党害死人！

千万人饿死了，他们在闭上眼睛的时候没看见一颗粮食，在合拢嘴巴的时候没吃顿饱饭，他们的生活和生命便构成了上面引出的一支歌，他教会活着的人“千人唱，万人和”。这是一支痛苦的歌，愤怒的歌，反抗的歌！这是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最真实最有力的歌！它暴露了广大人民对统治者的刻骨痛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预告了潜在于广大人民精神世界里的火山，这座火山不久就会爆发，其结果必将毁灭罪恶极的统治阶级。不信吗？请听，这支歌又响起来了，它的声音越来越大，越传越远。一切伟大的真正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医生们，让我们把这支歌当作一支听诊器，通过它来倾听人民的心声，从而决定我们的态度和药方。

《论“政治挂帅”》

(何之明)

“政治挂帅”成了当今世界最时髦的口号了，它是这样的时行以致在每个角落都泛滥开了，无处不是在奉行着它，它是执政者最得意的法宝，也是执政者摊出的最后的一张王牌。它集中地表现了统治者的反动及腐朽的本质，暴露了其狰狞而凶恶的真面目。

所谓“政治挂帅”是在57年全民整风和反右以后才以这样特殊的面貌显现出来，大家都记得当时的情景，由于在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了复杂而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当然是由于执政者的“三害”而产生的，起始，统治者想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

或者缓和一下这些矛盾，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宗派主义的口号，但由于执政者的本质所决定以及当时矛盾的深刻，使得人民大众以骤风暴雨的群众高潮来向“三害”进攻，面对着这样波浪壮阔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统治者发慌了，因为它们认为这样便动摇了它们的宝座，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展开了“反右”运动，企图用压的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在此种情况下，“政治挂帅”便应运而生了。它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刻的背景，那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持并加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采取的手段，结果统治者便愈来愈步入反动的深渊，矛盾也更进一步的加深，愈是这样，它也就愈强化其统治手段。所以，“政治挂帅”的出现，标志着执政者的走投无路，日暮途(途)穷，也显示出了它的真面目，不管它是以怎样巧妙而迷人的姿态出现。

所谓“政治挂帅”就其内容来说，首先便是强调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它要求不论什么地方，也无论任何部门都得服服贴贴的执行它的政策——“违反客观规律的反马列主义的政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不仅这样，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得由党来领导，党到处发号施令，党的组织包办了一切，不管大事小事，鸡毛蒜皮一把抓，以党代政，使行政机构成了一个形



学生时代的何之明

式上的空东西,这样一来,国家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官僚主义菌集而至,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各方面就实行了“绝对”的法西斯式的统治,如意算盘是打得很不错的。与此相应的便是所谓“书记挂帅”,一切事情都归书记管,一切地方都有书记,书记的话被奉为金科玉律,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书记成了实在的土皇帝,这不就是独裁统治的变种么?不管怎样,剥去画皮,原形毕露,原来所谓“党的绝对领导”只不过是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权的变种而已,正是这种所谓“绝对领导”,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绝对统治了。

其次就内容来说所谓“政治挂帅”便是指思想的强化统治,依照官方人士的话来说便是:“思想是灵魂”、“以虚带实,虚实并举”、“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一方面表现为否认物质基础,忽视甚至违反客观规律,把“主观能动性”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以想象代替规律,以梦呓代替现实,撒谎、吹牛无所不作。他们忘记了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理性,也不是观念,而是物质需要、经济关系,大谈而特谈其“欲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忘记了只有用物质力量才能克服进行压迫的物质力量,把实在的生活与幻想、把现实同意识混同起来。当然,思想是能动的,人们思想的能动只是充分的认识客观规律,从而掌握并运用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而不是脱离客观实际的胡思乱想。官方人士所一再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只不过是它们任意胡作非为的能动性罢了,当然谈不到广大群众能动性的发挥了。另一方面人为地制造思想上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制造人们思想上的紧张局势,以便合法地对人们的精神方面实现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统治,窒息人们思想的自由发展,使人民成为它绝对驯顺的工具。这方面实在情形是人人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一个紧接着一个的运动便是执政者一手制造的明证,实行着恐怖性的政策弄得人心惶惶,稍有不合它的心意的思

想一露头,铁帽、大棒便满天飞舞,使人们心甘情愿的接受它的反动统治。以上两方面便是所谓“思想是灵魂”的实质所在。

“政治挂帅”就作为执政者本质的集中体现来说有其深刻的理论根源,这就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虽然他们打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幌子,只不过是这幌子下贩卖主观唯心主义的私货而已。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这点,这里就不再啰嗦,而只指明出来就是了。

总之,把“政治挂帅”揭开一看,统治者的本质便暴露无遗了,这就是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的变种,现在,这种统治使得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各种矛盾更深刻和尖锐化了。可是,统治者却愈顽固地坚持着这种统治,那我们只有将这法西斯的孽种从政治的舞台清扫出去!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何之明)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正是目前中国哲学界唱得最热闹的一出滑稽戏,各色各样的小丑们红脸进、白脸出,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真是好不闹热,乍一看去人们真还会以为这正是当今世界“百家争鸣”、“自由讨论”的表现,然而,揭破画皮一看事情并不这么单纯,只要作一番较深刻的观察与透视,狐狸的真相便显露出来了,事情的本质也就显现在我们的眼前。笔者极不愿意来和这些侏儒小丑们一起凑热闹,因而不准备参加这次争论,也就是说不准备对问题本身发表什么意见,但作为一个真理的探求者,不能对这次争论袖手旁观,有必要指出这场争论的实质,使人们更深一步认识当代统治者的真面目。

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其中的一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原理”,是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的事物、属性和现象”,“思维与存在毕竟是有差别的,毕竟不是同一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是古今中外所有较彻底的唯心主义的共同点，而且也是它们全部哲学理论的基础、实质”。……而另一方则认为“上述观点明显地表现了二元论倾向和形而上学”，“反对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的统一就必然否认了思维依赖于存在，否认了思维能够认识存在以及否认了思维也可以向存在转化”。并说：“人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承不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是一个要不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问题”。……够了，从这些简单的引语里就可以明瞭争论的焦点了。总的说来，优势显然在后者一方，而且也获得了官方人士的撑腰，这中间就大有其奥妙了。

先还是让我们离开这些抽象的理论，回到现实客观世界中来吧！洞察一下现实的情况，看一看这场争论的背景就可以了解这次争论的由来及实质。

当今执政者自57年整风反右以来，就明显地踏上了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道路，什么“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什么“以虚代实，虚实并举”，执行一些违反客观规律、脱离物质基础、脱离现实的反动政策，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紧张局势，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强化的法西斯式的统治，特别是58年刮了一次所谓“共产主义之风”——其实是歪风。其结果产生了所谓“大跃进”、“人民公社”、“群众运动”、“大协作”等等一系列的把戏，更突出的是大吹而特吹其牛皮，这一切的一切实质并不是形势发展——经济基础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只是执政者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它远远地脱离和违背了客观规律、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与辩证唯物主义，片面而极端的强调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只是统治者一手制造出来的把戏，这些把戏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广大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不过是统治者为了保住它的宝座，从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其他方面强化变种的法西斯统治的手段。执行的结果从而造成了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经济事业特别是农业的普遍衰退、萧条，广大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各方面受着极端残酷的奴役和压迫，人们在饥饿、贫困、死亡线上挣扎，广大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与日

俱增，统治者并不想真正的解决甚至缓和一下这些矛盾，相反，却变本加厉从各方面来加强其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顽固到底，坚持走死胡同。59年的“反右倾”运动和已经开展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雄辩地证明了这点，这时，统治者为了加强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正）当合法，又动员了它御用的文化走卒来给它搽粉抹脂，寻找“理论根据”，这便是这场争论的背景。

现在又让我们回到本题上来吧！那些认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的小丑们也就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们的用意，他们身披马列主义外衣，头戴毛泽东思想的纸帽子，手执“阶级斗争”的大棒，引经据典的论证这问题的同时，却怎么也掩盖不了事情的真正本质，正如俗语所说：“狐狸的尾巴是藏不住的”，最后不得不原形毕露。他们论点的实质就是片面而极端的强调“人（——当今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而要这样就得认思维与存在统一，两者互相转化，特别是思维向存在转化，“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导向二元论和不可知论，就会导向否认或者不能足够估计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不能设想思维能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我国人民目前正处在一个空前大跃进（？）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时代（！？吹牛与捏造真是前所未有！）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思维与存在统一性原理得到充分表现和光辉发展（！好一个发展！）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思想就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反动的主观战斗精神！）形成了特别尖锐的对立……”得啦，只要看了这一段话读者就不难了解这争论的实质所在了，呵，原来如此，正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片面夸大思维向存在转化的方面，这样强调所谓“人——统治者的主观能动性”，忽视甚至违反客观规律、不顾客观存在——物质基础就有了理论的后盾了。这样，主观战斗精神，吹牛、撒谎、捏造种种就找到了靠山——理论根据，而在思想上强化法西斯统治就合法化了。以后吹牛家、政客等等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进行伪造、吹牛、撒谎，安安心心

的实行法西斯式的统治而无后顾之忧了，这真是一着“妙棋”！真是所谓“马列主义空前未有的发展”！？这只能欺骗不明真相的或不懂事的三岁小孩，而对为真理而斗争的勇士来说，那不过只是纸糊的筒子，一戳就破，我们不会再受骗了！

总之，透过浓雾就可以认识这“庐山的真面目”，狼总是狼，无论它披着怎样迷人的画皮，终久会被人识破的，谎言到底是谎言，当真理的阳光一照，它就会冰化雪消，春天的温暖总会来到这酷寒的大地，这是任何势力都阻止不了的，一切真正的生命将会逐渐甦醒。真理之花永远为勇士而开放！

1960、4、18.晚完稿

4、18.晚初改

[原注]：一，关于这方面的文件请参看《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哲学研究》以及《人民日报》的一些报道。本文所引之话均由上述文件中引出。

二，引文中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括号内的文字也是我加的。

《论人民公社》

(张春元)

作者按语：由于独裁分子近年来对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和迫害，反面意见在我们党内已经销声匿迹，不论流行的高调是多么荒谬，不论主观臆造与客观实际相差多远，在高压的气氛里，同志们都不得不附和与服从。这种虚假的统一使少数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日益狂妄和骄傲，不顾一切地推行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们以鲜血换来的政权当作实现个人野心的资本，而终于走上专横、独裁的道路。

目前，国内外的形势明显的指出，由少数独裁分子在“左”的词句掩盖下所推行的暴政，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反。倘若这种政策再继续推行下去，必将使整个党陷入与广大人民为敌的漩涡中去，为

此我们将要对党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特别是近年来的方针政策，给予系统的分析、研究、探讨和批判，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希望收到这份材料的同志，能郑重考虑，并加以讨论，写出自己的意见，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传阅。

论人民公社

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最惊人的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不仅因为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更重要的是农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即新兴的农业无产阶级，将是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任何人想抹杀这个事实，违反这个客观规律，都会犯错误，都要背叛人民、背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家知道，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侵犯广大农民的利益，拒绝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结果被推翻了！而党所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正因为满足了农民的要求，进行了土地改革，才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在我们取得了这个胜利，应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与改善农民生活的时候，我们党内的独裁分子却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忽视实际情况、用盲目的主观唯心论点来代替客观事实，在农业与农民问题上犯了极大的原则性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阵妖风，这就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人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是并不为过的。人民公社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愿望”，而是独裁分子主观臆造的产物，是独裁分子为了保持其独裁地位而倒行逆施的结果，所以人民公社从成立到现在，遭受到国内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反对，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人民公社对广大农村和农民最直接最残酷的破坏作用之一，就是在所谓“全民所有制”的掩盖下，彻底的剥夺了农民对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剥夺了农民对产品最低限度

的食用和需求,使农民在经济上彻底的无产化;而随着他们经济状况的改变,在政治上则处于农奴和国家奴隶地位。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便于控制与驱使,使广大农民丧失了人身自由、劳动就业、居住迁徙等起码的生活权利,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之上;而作为剥削与统治农民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却像一座大山压在农民头上,给农民带上无形的枷锁。如公共食堂就是用饥饿来进行强迫性劳役的一种工具;户口手续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卖身契;加工加点的实质是一种苦刑;粮食限量就是一种逼人的慢性自杀。总之,其对付广大农民的伎俩,穷凶极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但是,作为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党组织,由于不得不执行独裁分子的错误指示,把这一不为群众所欢迎的公社组织形式强加在人民头上,这就使党和广大群众处于严重的对立矛盾中,它不仅破坏了党的威信,孤立了党在群众中的作用,逼迫广大农民起来反对党,更严重的是有可能把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上毁灭的道路,间接的帮助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这是非常痛心的事实。

其次,人民公社化使得农业生产遭受到空前的破坏,粮食减产,各种轻工业原料和农副产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广大农民陷于饥饿的漩涡中,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究其根本原因,首先是因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既然处于依附农奴与国家奴隶的地位,一些起码的生活条件与生存权利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就必然会出现象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情况:“奴隶对劳动不感兴趣”。所以,消极怠工、厌倦生产、破坏工具(尤其是新式农具)、反对农业技术的改革、敌视各项增产措施,就成为农民种种反抗的手段,这是农业生产衰败的原因之一。由于独裁分子忽略了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业问题这一经济法则,一方面生搬硬套一些过了时的教条,一方面自以为是的大搞与国计民生不相适应的工业建设,因而在积累资金、市场销售、产品收购、工农业发展的速度和相互间的关系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侵犯农民利益的措施,用旨在使农民破产和农村毁灭的人民公社运动,来进行压榨和超经济的剥削。根据切实可靠的统计,这种剥削,占农民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使

农民常年过着饥不得食、衣不蔽体的生活。试问:农民勒紧裤带、劳苦奔波、挣扎于饥饿线上,对于产品不归自己享有的强迫生产,怎能发生兴趣?又怎能把这样的“生产”搞好?这是其原因之二。由独裁分子所发动的违反客观规律的所谓大跃进,也给农业生产带来惨重的损失,如兴修不切实际、不获实利、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浪费劳力、朝改夕变的农业技术改革,无计划无目的地兴办一些费人费钱的地方工业(包括公社工业),凡此种种,都得征用大批的农业劳动力,致使农村劳力紧张,田亩荒废,必要的农田管理与农业收获不及时、不彻底、不合格,这是农业生产衰败的原因之三。由于上述种种,所以无论是八字宪法也好,发展农业纲要四十条也好,都毕(必)将成为一纸空文,无从做起,也根本无法改变与遏止农业生产的衰败、农村经济的破产。

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一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应首先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后首要职责之一也是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无数革命先烈洒鲜血、弃头颅、前仆后继、舍身就义的革命目的也就在于此。那么,自人民公社化后,劳动人民首先是农民的一般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是我们评论人民公社好坏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和尺度,有很多同志,都出身于农民家庭,或者有不少的农民亲戚朋友,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家庭、朋友中间作一次调查,你就会惊异的发现,目前的农民生活水平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时期相比较,是大大的降低了!农民经过公社化后,丧失了对一切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变为生产资料的附属品和会说话的工具,而随着也丧失了对生活资料的享有权,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归自己支配,不能保留与分得生活所需的起码数量,常年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以成立最早的也所谓最好的河南为例,据吴芝圃同志的调查,1959年农民平均收入每人约70元,按1959年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的精神来分配这笔收入,除去农业税收、公共积累、生产费用等,农民能分得这笔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即每人收入才35元到50元,用这笔收入来支付全年的粮柴油盐菜等开门七

件事,其生活的困苦,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再加上不等价的交换、变相的盘剥、层层的上扣,农民能真正到口到手的还要低于这个数目。根据今年在全国十九个省的调查,农村人口(指成年劳动力)平均每人每天粮食定量仅有半斤,还有不少地区不及此数。就是素以产粮丰富的两湖、川广、江浙等地,也不能幸免。不少农民因为缺乏粮食,饥不能耐,则举村逃荒流亡在外,沿铁路干线触目皆是,而独裁分子却称人民公社是最可靠的社会保险,这显然是胡说八道,颠倒黑白,而事实上是农民群众勒紧裤带吃糠菜、瘦骨嶙嶙、嗷嗷待哺,铁证如山,这不是少数独裁分子巧言诡辩所能抵赖掉的,这是他们背叛人民、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又一罪行。

对着这种残酷的事实,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极其痛心地发出过引人深思的反躬自问:这样作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利益吗?这种形式和手段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吗?更有不少有远见有头脑坚持马列主义立场的同志,提出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但独裁分子却专横、武断和狂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一些合理的计划、可行的方案、积极的措施、稳妥的政策,一概归之曰“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促退派”,拒绝与漠视任何代表真理、代表人民利益的言论和主张,对敢于说真话、讲老实话的人、对独裁分子的独裁政策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或坚持真理的同志,都加以“反党”、“反人民”的罪名,给予严厉的压制与打击。1959年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反右倾运动(包括对解放军部分将校进行的所谓“集中学习”),就是最明显、最疯狂、也最凶狠的政治迫害,不少有功于党,对革命事业流过血汗的同志,不少维护真理、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同志,遭到了清算和斗争,甚至于枉受逮捕和虐杀。关于这个运动,赫鲁晓夫同志在匈牙利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对我国独裁分子的残暴行为提出了指责,他指示:“这些倒霉的领导人,脱离群众、向群众发号施令起来,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手段,往往不是运用工人阶级的专政来反对劳动人民的敌人,而是打击自己人;……而是向自己人开火,使革命力量受到打击”。赫鲁晓

夫同志这段话是善意的引人深省的,而我们党内的独裁分子却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同志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认识不足,缺乏分析和批判。由此可见,独裁分子已骄傲自大、狂妄顽固到何种程度。

我们党过去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其实质就是农民战争,是依靠广大农民的参加与支援才取得胜利的,在我们党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同志出身于农民家庭。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和农民兄弟有着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的联系,当我们应该更好的巩固与发展这种联系,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党内少数独裁分子却背叛了农民兄弟,推行了不得民心的人民公社,使广大农民兄弟在政治上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受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在生活上过着瘦骨嶙嶙、饥不得饱的艰苦日子,在广大农村出现了农村无产者这一新兴阶级,而这一深刻巨大的社会变革的结果,使农业生产遭受到空前的破坏,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黑市流行、交易中断、市场空虚、民怨沸腾、社会秩序动荡,农民起义,彼起此继,在这样一个困难局势面前,凡是真正维护党的利益、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都不能袖手旁观。所以,当前的唯一出路就是清算与打倒少数独裁分子,废除各种祸国害民的独裁政策,使我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合乎人民利益的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让我们在这个伟大而崇高的目标下,高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共同奋斗吧!

《海鸥——不自由毋宁死》

(林 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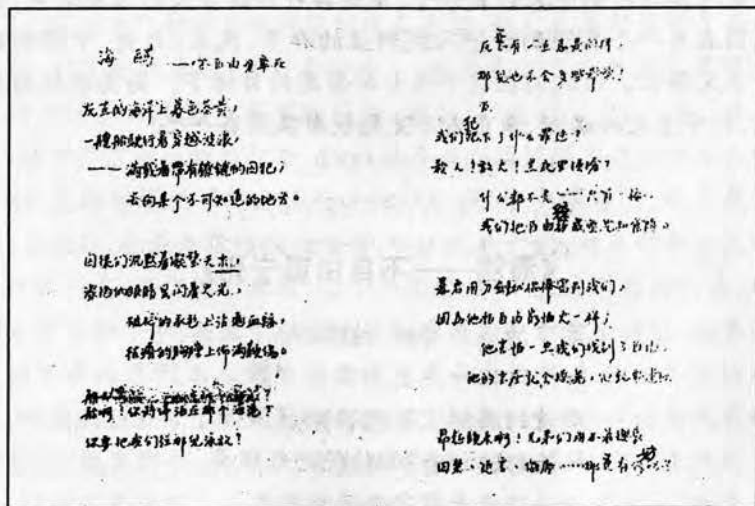
灰蓝的海洋上暮色苍黄,
一艘船驶行着穿越波浪,
——满载着带有镣铐的囚犯,
去向某个不可知道的地方。

囚徒们沉默着凝望天末，
深陷的眼睛里闪着火光，
破碎的衣衫上沾遍血迹，
枯瘠的胸膛上布满鞭伤。

船啊！你将停泊在哪个海港？
你要把我们往哪儿流放？
反正有一点总是同样，
哪儿也不会多些希望！

我们犯下了什么罪过？
杀人？放火？黑夜里强抢？
什么都不是——只有一桩，
我们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

暴君用刀剑和棍棒审判我们，



《海鸥》的刻印件

因为他怕自由象怕火一样；
他害怕一旦我们找到了自由，
他的宝座就会摇晃，他就要遭殃！

昂起头来啊！兄弟们用不着懊丧，
囚禁、迫害、侮辱……那又有何妨？
我们是殉道者，光荣的囚犯，
这镣链是我们骄傲的勋章。

一个苍白的青年倚着桅樯，
仿佛已支不住镣链的重量，
他动也不动象一尊塑像，
只有眼睛星星般在发亮。

梦想什么呢？年轻的伙伴！
是想着千百里外的家乡？
是想着白发飘萧的老母？
是想着温柔情重的姑娘？

别再想了吧！别再去多想，
一切都已被剥夺得精光。
我们没有未来，我们没有幻想，
甚至不知道明天见不见太阳。

荒凉的海岛，阴暗的牢房，
一小时比一年更加漫长，
活着，锁链伴了呼吸的节奏起落，
死去，也还要带着镣链一起埋葬。

我想家乡么，也许是，

自小儿我在它怀中成长，
它甘芳的奶水将我哺养，
每当我闭上了双目遥想，
鼻端就泛起乡土的芬香。

我想妈妈么？也许是，
妈妈头发上十年风霜，
忧患的皱纹刻满在面庞，
不孝的孩儿此去无返日，
老人家怕已痛断了肝肠！

我想爱人么？也许是，
我想她，我心中的仙女，
我们共有过多少美满的时光，
怎奈那无情棒生隔成两下，
要想见除非是梦魂归乡。

我到底在想什么，我这颗叛逆的
不平静的心，它是如此刚强，
尽管它已经流血滴滴，遍是创伤，
它依然叫着“自由”，用它全部的力量。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
充满着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
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
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象枯悴的绿草渴望雨滴，
象萎黄的树木近向太阳，
象幼儿的乳母唤叫孩子，
象离母的婴孩索要亲娘。

我宁愿被放逐到穷山僻野，
宁愿在天幔下四处流浪，
宁愿去住在狐狸的洞里，
把清风当被，黄土当床。
宁愿去捡掘松子和野菜，
跟飞鸟们吃一样的食粮，
我宁愿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只要自由这瑰宝在我身旁，
我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
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
宁愿把前途、爱情、幸福、
一起抛向这无限的波浪。
只要我的血象沥青一样，
铺平自由来到人间的道路，
我不惜把一切能够献出的东西，
完完全全地献作她自由的牺牲。

多少世纪，多少年代啊，自由！
人们追寻你像黑夜里追求太阳，
父亲在屠刀的闪光里微笑倒下，
儿子又默默地承继父亲的希望，
钢刀已经被牺牲者的筋骨磕钝，
铁锈也已经被囚徒们的皮肉磨光。
多难的土地啊，浸润着血泪，
山般高的白骨砌堆成狱墙，
埋葬的坟墓里多少死尸张着两眼，
为的是没能看见你，自由的曙光。
你究竟在哪里？自由！你需要多少代价？
为什么你竟象影子那么虚妄？
永远是恐怖的镣铐的暗影，

永远是张着虎口而狞笑的牢房，
永远是人对他们同类的迫害，
永远是专制—屠杀—暴政的灾殃。
不，你存在，自由啊！我相信你存在，
因为总是有了实体才造成形象，
怎么能够相信千百年来
最受尊敬的高贵的名字，
只不过是一道虚幻的虹光。
哪一天啊自由，你来到人间，
带着自信的微笑高举起臂膀，
于是地面上所有的锁链一齐裂断，
囚犯们从狱底里站起来欢呼解放！
那一天啊，千百万为你牺牲的死者，
都会在地底下尽情纵声欢唱，
这声音将震撼山岳和河流，
深深地撼动大地的胸膛，
而那些带着最后的创伤的尸体，
他们睁开的双眼也会慢慢闭上。
那一天我要狂欢，让嗓子喊得嘶哑，
不管我是埋在地下还是站在地上，
不管我是在活人还是在死者的行列里，
我的歌永远为你——自由而唱。

远远地出现了一个黑点，
年青人睁大眼对它凝望，
听见谁轻声说：是一个岛，
他的心便猛然撞击胸膛。

海岛啊！你是个什么地方，
也许你不过是海鸥的栈房，

也许你荒僻没有人迹，
也许你常淹没在海的波浪。
但是这一切又算得什么？
只要你没有禁锢自由的狱墙，
只要你没有束缚心灵的枷锁，
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天堂。
勇敢的黑眼睛燃烧着光芒，
他走前一步（镣铐叮当作响），
暗暗地目测着水上的距离，
对自由的渴望给了他力量。

我能够游过去么？能还是不？
也许押送者的枪弹会把我追上，
也许沉重的镣链会把我拖下水底，
也许大海的波浪会叫我身丧海浪，
我能游到那里么？能还是不？
我要试一试——不管会怎么样！
宁可做逃犯葬身在海底，
也强似在囚禁中憔悴地死亡。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
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即使我有卅次生命的权利，
我也只有会都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

别了，乡土和母亲！别了，爱我的你！
我的祝福将长和你们依傍。
别了，失败的战友！别了，不屈的伙伴！
你们是多么英勇又多么善良，
可惜我只能用眼睛和心拥抱你们，
愿你们活得高傲死得坚强！

别了，谁知道也许这就是永别，
但是我没法——为了追踪我们的理想，
啊！自由，宇宙间最贵重的名字，
只要找到你，我们的一切牺牲，
便都获得了光荣的补偿……

他握紧双拳一声响亮，
迸断的镣铐落在甲板上，
他象飞燕般纵到栏边，
深深吸口气投进了海洋。

枪弹追赶着他的行程，
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
那个黑点却还是那么遥远……
他只是奋力地泅向前方。

海风啊！为什么兴啸狂号？
海浪啊！为什么这样激荡？
臂膊象灌了铅那么沉重，
年青的逃犯用尽了力量。

最后一次努力浮上水面，
把自由的空气吸满了肺脏，
马上，一个大浪吞没了他，
从此他再没能游出水上。

押送者停止了活靶射击，
追捕的小艇也收起双桨，
难友们化石般凝视水面，
无声地哀悼壮烈的死亡。

……年青的伙伴，我们的兄弟，
难道你已经真葬身海洋？
难道我们再听不见你激情爽朗的声音？
再看不见你坚定果决的面庞？
难道我们再不能和你在一起战斗？
为争取自由的理想献出力量？
海浪啊！那么高那么凉，
我们的心却象火炭一样！
听啊！我们年青的兄弟，
悲壮的挽歌发自我们的心房，
记得你，无畏的英烈的形象，
记得你，为自由献身的榜样！
记得你啊！我们最最勇敢的战士，
在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
你从容自若地迎接了死亡。
海浪啊，请抚慰我们年青的兄弟，
海风啊，把我们的挽歌散到四方，
象春风带着万千颗种子，
散向万千颗爱自由的心房……

那是什么——囚人们且莫悲伤，
看啊！就在年青人沉没的地方，
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
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

这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
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
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
如今啊，他自由得象风一样。

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
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
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
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

跋

鲁凡

《海鸥》一诗，友君xx所作。作者系一青年学生，有志于文艺事业，曾于两年前学生运动高潮中，因误会被当局逮捕，释放后攻读如旧。此诗即被捕期间所写，其时，同学们竞相传阅，颇获得部分人士的同情与赞赏，有付印之议，后运动急转直下，此议即罢。事后每谈及此诗，悉辄赧然以为己短。今年年初，忽不知君去向，或猜暗遭绑架，或猜私走内地，至今未知其存亡。

隔年的花瓣，虽然失去了原有的芳香，却能引起往事的回忆。今夜重见此诗，回顾两年来时势转变之剧，未尝不有感于斯。两年前，学生运动之兴起，如一声春雷震醒大地，瞬息间波及全国，汇成巨流，其汹涌澎湃之势，使统治者为之失色。多少篇新颖作品，多少种新生刊物，雨后春笋般地从学校的每个角落里涌现出来，举起了争自由争民主的旗帜，吹出了为真理为人民的号角。值得纪念的是，有多少个青年，受了运动的影响，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抛弃个人事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途；尤其是当运动失败以后，仍有不少青年战士，或明或暗地坚持战斗，那种“头可断志不可屈”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两年后的今天却完全是另一境地。专制统治的魔影笼罩全国，到处是鞭梢剑影，到处是泪痕血迹。人与人的关系已到了空前虚伪的程度，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么真理、什么道义、什么爱情、什么友谊，这一切都不如统治者的意志那样能立即兑现。尚在人间的战士们，有的入狱，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难道寒冽的天气真能冻住一切真理的声音？难道统治的魔影

真能扼杀一切革命的生机？难道撒下的种子真会永埋地底？让事实来回答这些问题吧！此时此地，我却仅有这两年前的诗篇，披露出来，愿易于忘却的人们藉以知道过去的存在。

形势的改变既然如此剧烈，人们的思想当然也不会停滞不前。今夜重读此诗后却明显地感到了它的缺点，也可以算作一个思想改变的例证。绝大多数的青年，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开始由热中转向清醒，这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浅薄，这浅薄在从前是曾经被认为深富的；他们将感到自己的浮夸，而在从前这浮夸又被设想是自信。在经历了XXXX（形势剧变）以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在“自由”（对于）人生有着更为深远更有价值的目标，因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号召反而显得浮夸了；他们也深深地懂得，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个人才能获得解放，因而诗中青年囚犯的英勇举动，在他们看来便显得过于浅薄。此外，诗中流露的伤感情绪也会使他们感到不合时宜。虽然如此，我却想没有一个人会对这首诗有丝毫责备的意思，相反的每个人都将珍惜这首诗，像珍惜一片隔年的花瓣，因为藉了它我们能知道过去的存在。

1949年跋于“五四”前夜

上述八篇稿件《论人民公社》和《海鸥》是刻印的，其他均为手写原稿，排列的先后顺序完全按原卷宗不动。关于作者有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原稿首页的上眉处亲自署名，如向承鉴、杨贤勇、何之明三人。第二种是署以笔名，如孺子牛就是向承鉴，在行文中他用的是“孺子牛”，如果刻印的话他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同时以此笔名激励自己，立志献身于追求民主自由、为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寓意“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在原稿的上眉处写下了“向承鉴”。第三种是无名氏之作，《告全国人民书》作者应是向承鉴，在《农村一日》中的上眉处直接署名“向承鉴”，而在文末则署名“孺子牛”，很明确这是向承鉴的作品。《农村一日》和《告全国人民书》不但字体完全相同，而且用的稿纸也一样，所以判断《告全国人民书》应为向承鉴的手稿。他本人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判决书上说他写过三篇

文章,他只记得《星火》第一期的《自白》和《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论人民公社》是张春元所写,为什么不署名呢?当时曾有过这样一个计划:把《星火》散发到国家高层领导手中,但苦于一时难以搜集到通讯地址,《论人民公社》写成后,就决定将此文印发给全国公社书记以上的干部,在顾雁上海周浦镇家中,在场者共三人:顾雁、张春元和苗庆久,张春元和苗庆久各刻一份蜡纸,顾雁负责印刷和装订工作,后来张和苗各带了一部分回武山存放,准备条件成熟便往外散发。正因为计划往外散发,所以不便个人署名。

《海鸥》一诗是林昭之作。1959年8月前后,孙和赴西宁民族学院找其妹孙复,经孙复介绍得与林昭通信联系,9月林给孙寄来长诗《海鸥》,后来传至张春元手里并进行刻印,便于大家传阅。原诗无跋,当年阅读完《海鸥》后,受诗的魅力所感染,心中激情欲吐为快,张春元和顾雁分头执笔写跋,最后采用了顾雁所写的,但顾雁本人已记不清了,至今他还认为是张春元写的“跋”,他只记得为什么用了“鲁凡”笔名,寓意是鲁迅走了,我们后辈写的评论也是语不中肯綮。末署“1949年跋于‘五四’前夜”,这是一种保护手段,既使外人琢磨不透诗的真实来源,而又点明了这是争取民主自由的前奏曲。

这些稿件尽管当时未能刻印刊出,但保存至今仍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三、征途坎坷何足惧

探索中迈进

随着《星火》的出版,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正式的组织首先是命名,然后是纲领,明确目标、统一行动。既然大家有相同的思想认识,也有着共同的愿望,为了更好的团结一致发挥力量,是否可以商讨一个名称,以明确我们的方向。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苗庆久、向承鉴、张春元等人认为现在就应该拟出总纲领,成立正式组织,以指导进一步行动。另一种以顾雁和林昭为代表,林昭的意见是:只求有实、不求有名。她认为在我们组织尚处于萌芽阶段、人少力弱的时候,首先是多做实际工作,即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不应过早地搭起一个空架子,徒有虚名而无其实,因为这样树大容易招风,易被政府发觉和破坏,有名称也好、无名称也好,都不妨碍我们实际工作的进行和发展。他们认为目前暂时没必要写出纲领,因为纲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是几个人想出来的,必须大家公认、在行动上予以执行,先放一放再说吧!名称和纲领一事就这样暂时被搁置了。

1960年5月随着杜映华、罗守志及其他人员的加入,名称问题的呼声再度提出,其中以向承鉴的呼声最高、主张最激,认为人员增加了,组织发展了,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一个响亮、有力的名称则不足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把群众团结在组织的周围,于是组织名称的酝酿讨论又开始了,首先应明确指导思想:

- 1,能明确地恰当地表达我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和平、民主、社会主义。

- 2,既能反映工农群众的利益又能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接受和理解。

3,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赶上时代的思潮。

围绕着上述思想相应提出了三个名称: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主要是受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的影响,“草案”的来源有二:一是林昭曾在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利用工作之便复印了一本“草案”交张春元,在我们当中得以传阅。另外据向承鉴自己说,1959年底有一次给化肥厂买材料出差到北京,他的一位亲戚是北京干部,向承鉴到其家中拜访时看见桌上放有一本“草案”,他就顺手牵羊拿回来了。所以分别在水、武山流传,同时传阅的还有:波兰事件、铁托的演说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对演说的批判。这些书对大家的思想是有所触动的,如1959年5月,当时苗庆久处于悲观失望状态,病在床上,孙和带了波兰事件、铁托演说等书去找苗庆久,并向苗介绍了有关情况:“目前已经有些人踏上了研究社会上诸问题的道路,他们驱逐了悲观情绪,去探讨社会诸现象的本质。这样的人在全国来说是很多的,如果汇合在一起是一批力量,当政者会吃不消的。”苗庆久说:“我很希望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使自己振作起来、乐观起来。”果然苗庆久很快就投入到我们的共同活动之中了。对这一名称持否定意见者认为有沿袭之嫌,不能走南斯拉夫的老路,应走自己的路,这一群追求真理的青年是多么渴望得到问题的答案啊!

“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反映了这群热血青年仍然对共产党存有希望,他们相信党内会有仗义执言者,会有为国为民的人,这些人应该分离出来,高举革命的旗帜引导全国人民去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们反对的是当时专制独裁、为名为利的封建统治者。

张春元认为这些名称不容易为农民所接受,而且始终没有跳出原来的影子,他提出“中国劳动农工同盟”,这样可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也明确了我们的奋斗目标。各说各的理,后因意见无法统一,暂不作最后正式确定,此事就不了了之。

这时我们处于三无状态:无纲领、无名称、无组织,只是边活

动、边扩大、边计划、边进行,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了1960年4、5月间,初步拟定了如下方案:

第一步,草拟纲领(草案),起草宣言,然后进行酝酿修改,争取年底前完成准备工作,由张春元、顾雁、林昭负责。

第二步,加强国外联系,扩大国际影响,具体执行人谭蝉雪。

第三步,在宣传工作方面继续出版内部材料《星火》,每个人都有责任投稿,准备利用暑假期间向党内发出《论人民公社》一文。

第四步,抓紧发展力量,要超越兰大右派学生的圈子,并深入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干部军队中,不拘一格,全面发展。

当上述各项工作基本实现的时候,才有条件正式成立组织,才有可能通过纲领、宣言、名称及分工等,目前的努力只是为今后打基础。

当时我们还只是一群廿多岁的年青人,政治上的不成熟,理论水平的欠缺,生活经验的不足,特别是从中学时代以来就一直接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正像一个先天不足、营养不良的人,他面临的将是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我们是在残酷现实的大熔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有的的是清醒的头脑、锐利的双眼、炽热而又善良的红心和刚直不阿的人格,我们将迎着风雨前进!

县委书记杜映华

兰大监督劳动的右派有一半是分在武山县,1958年的武山是由漳县、甘谷和武山合并而成,比较穷困,那时饿死人的情况也比较严重,从59年开始粮食越来越紧张,每人每天的粮食从半斤逐步减到四两、二两,到了年底连二两也保证不了,就靠蔬菜、野菜、树皮来充饥,如当年的百泉公社的百泉大队,一千多人就饿死了约三百多人,三分之一的饿殍,这是一个多么骇人听闻的数字啊!

想方设法增产是当时唯一的出路,单纯靠人力已是不可能,多施化肥来促进产量的提高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更何况又是中

央的号召呢！可谈何容易，谁来搞？当地没有这样的人才，而兰州大学下来的右派既有物理系也有化学系的，这不正是“瞌睡遇着了枕头”嘛，可他们都是右派呀。当时县委的干部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不能用右派，这是路线问题，哪怕不搞也可以，以县委书记张十存为代表；另一派则认为利用右派的知识和技术，把化肥搞出来，把生产搞上去，以副书记杜映华为代表。

杜映华是一位真正的农民的儿子：原籍是甘肃省陇西县文峰区土店子村人，1927年出生于陇西县巩昌镇南面王家沟的一个农民家中，1948年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并参加了中共甘肃省陇右地下党，入党后他一面担任小学教师，一面从事陇右工委领导的地下秘密工作，解放甘肃岷县时他是陇右游击队的先遣队员。解放后在漳县县委工作，并历任漳县代理宣传部部长、农业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县委秘书、县委副书记等职。

1957年农村很多地方发生捆绑、打人等违法乱纪行为，当时有的干部还辩护说：“群众在气头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杜映华坚决反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他负责的几个乡就没有出现一



杜映华摄于天安门前

例捆绑、打人的事例。1958年4月三县合并后担任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兼城关公社党委书记等职。在农村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提倡深入调查，不受虚假浮夸之风的影响，叮嘱基层干部要说实话、讲真情，担任城关公社书记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跑遍了所辖的14个管理区，直接到农民家中进行体察。在农忙抢收季节，他带领干部把劳力组织好，亲自上阵干活，绝不能让粮食白白地烂在地里，认为那就是犯罪。他目睹了农民啃树皮，树木成了白杆子；农民吃观音土，这是生长在山脚下的一种泥土，土质细腻嫩滑，当饥饿逼得走投无路时，把观音土挖回来用筛子过滤后，拌上野菜和树叶，以此填充肚子，若吃过量，就会在肠胃内形成干结，最后导致胀死。1959年杜书记心急如焚，他一方面悄悄发放救济粮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让大队、生产队按实际亩产上报产量，与当时的虚报浮夸风背道而驰，使得城关公社农民家里都偷偷地留了点口粮，老百姓心中感谢这位救命恩人。

杜书记很清楚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从根本上发展武山经济、狠抓粮食生产，当时尽管存在两派不同意见，但他相信这是一条可行之路。就利用公社党委书记的权力先在城关公社试办一个硫酸厂，因为当时胡晓愚（兰大化学系讲师）和胡学中（兰大化学系学生）在水北道埠已办成了硫酸厂，先是孙和（历史系）到北道埠向胡老师取经，接着苗庆久（物理系学生）、向承鉴（化学系学生）也来请教，所以武山的硫酸厂很快也就办起来了。在杜书记的领导支持下，决定在盐井和杜家楞各办一个硫酸厂和化肥厂，分别由苗庆久和向承鉴、张开锡、柴志德共同负责。正是这样一位群众的贴心人，在1959年反右倾期间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开除党籍下放到草滩劳动。

当杜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随着这一变化，昔日围着身边转的一群人，就像四川绝技“变脸”一样，一个个都成了冷眼冷面孔，杜书记深感情冷、世态炎凉，只有兰大下放的右派学生仍一如既往地对他热情而尊重。通过工作和生活上的接触，杜书记对这些右派学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在工作上是认真负

责的,在人格上是正派的,在思想观点上是富有正义感的,他们写的和说的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杜书记对这些右派学生从开始的单纯利用到同情尊重,从1960年4月份以来,开始是孙和有一次问他:孙和得到官方的可靠消息,听说党中央领导人中也有不团结现象,反右倾运动的开展主要是刘主席和邓小平搞的,朱德不同意,最近不知因何事把朱德也批判了,这问题听说已经传达到县委以上党的组织中。当时杜映华确实不知此事。

从1960年4月以来,向承鉴便开始与杜映华接触,通过交谈在以下问题上有共同的认识:农民饿死的现象非常严重,造成的原因是中共中央路线上的左倾错误,和下级干部欺下瞒上、腐化变质所致。而中共对这一严重状况不闻不问、不加处理解救,说明现政权和中共党已不代表群众利益,已不是工农的政权和为工农服务的政党,已经彻头彻尾背叛了工农群众、腐化变质。为了解救农民目前的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实际行动,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串联和我们有相同看法和思想的干部,扩大我们的力量。正是通过杜映华的努力,罗守志(武山县委委员、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了。

1960年9月上旬陇西东铺和土店子车站附近一带的农民终于发生了结伙盗抢火车上的粮食事件,反正是个死,在家里坐等着是白白饿死,去抢粮被抓住也是一个死,但起码能把肚子填饱,做饿死鬼还不如做饱死鬼,这可真是逼上梁山了!如何对待这一事件?杜书记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应该同情他们这种反饥饿的斗争,并应该设法支持和帮助他们,杜书记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大家议定由杜书记设法去寻找线索,与这些抗粮、抢粮的农民取得联系,后来由于案情的变化,此事便搁置下来了。杜书记被捕后仍念念不忘此事,在材料中呼吁:在这问题上不要怕丢人,要向群众认错,公社所有制要得到改变……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生产抓不好忙于追求工业化,那就物极必反了,造成损失不可弥补。

此后向承鉴与杜书记直接联系,多数是向到杜的家中交谈,从农村现实到国家大事,彼此交换意见,正由于他们是直接身临其境,相同的处境造就了共同的思想认识,随着接触交往,敞开心扉坦诚相见,向承鉴还把南共纲领草案等有关书籍借给杜书记阅览,后来两人曾一度住在一起,情同手足,有一次向承鉴病了,杜映华甚至亲自给他端洗脚水,向承鉴感激之情铭刻肺腑,现在70多岁的向承鉴仍然念念不忘当日之情,一说往事就禁不住泪水盈眶。

向承鉴在谈话中曾向杜书记提到“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之事,引起杜映华思想上很大的震撼,首先他想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既然出自这些右派学生之口,很可能是确有其事,很可能是党内领导同志提出的,要采取新的措施,纠正当前农村问题,改进农村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希望这是真的,他拭目以待,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杜映华正是抱着这种心情和向承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后来向承鉴把杜映华的情况介绍给张春元,1960年5月杜张二人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地点就在向承鉴居住的地方,谈到了对当前形势的认识,两人彼此默契,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可能张春元要求杜在干部中多做些工作,多联系些有相同观点的人,后来杜与县委委员、农村工作部部长罗守志有所联系,可见武山县干部队伍中有良心、真正为民说话的仍不乏其人,杜映华也正是抱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忠心和我们走到一起了。

杜映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长期工作在农村,和农民血肉相连。他决不会为了向上爬而趋炎附势,讲良心、说真话是他的人生信条。他把法庭当作揭露农村现实的平台,在法庭上他挺直腰杆慷慨陈词:“我们的民主成问题,上头咱不知道,越下越不像样子,谁敢说实话?哪里有民主?谁要说老实话,不是辩论就是斗争,戴好多大帽子。群众不敢讲,干部也如此,只是一般好。有没有问题呢?马列主义者对问题不能忽视,既然要群众,为什么还要这样搞?好多干部善于编口号、戴大帽子、好大喜功、看脸行事、脱离实际、不走群众路线、简单急躁、强迫命令,这样下去只有造成党群关系恶化,人民群众受苦。”在铁窗内他以写“交代材料”为幌子,详细地陈述

了当时农村的具体情况：三县合并后，武山共有56万人，从59年11月—60年4月外流和饿死的就达25万人，其中饿死的约13—15万人。而在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的统计是7万多人，东顺是县里的重点，全县的好地区，也在饿死人，其他地方死人问题就可想而知了。听说马河、盘安死人非常严重，人死了无人埋，死的活的一床睡，你们说这残酷不残酷！好多人为了求活，离了他可爱的故乡和亲人。有些人流离失所，丈夫当中兄弟出卖自己女人，有夫之妇去找人，造成家败人亡、妻离子散，这些问题提出来真痛心。但是有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问题究竟上面知道不知道？问题如何办呢？应该是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讲实际、残害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残害人民的这些坏东西，像魏宏模（盐井公社的领导干部）把社员饿死了，他还说有粮，群众要粮他就打压群众，这类干部尽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让广大群众诉苦斗争，叫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受到处置。把真正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的好干部选出来，担任领导工作，惟有这样局面才能扭转得快，不然还认为右倾搞坏了，那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

杜书记就是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优秀干部。

掉入陷阱

1959年10月我们看到了《南共纲领草案》后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苦苦探索“出路何在”？共产党把国家治理成这样，百姓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解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而凭当时我们的学识、社会经验、政治阅历还不足以透析这一切，当然我们是不会与国民党、资本主义合作的，南共的道路是否也值得借鉴呢！张春元认为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应该设法打出去，与国外的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一来扩大我们的视野，同时争取对我们的援助和支持。谁来承担这一任务呢？只有我比较合适，我是广东人可以通过亲友想办法，我表哥在香港工作，他母亲、妻子和孩子滞留在广州，急于出去，所以1960年5月我离开天水返回广州，住在姑妈家里和表嫂

商讨出去的办法。

在那个年代要申请到香港是非常困难的，只有偷渡，但风险很大，必须有人引路，有以此为职业的人称曰“蛇头”，表嫂找到了一位蛇头，并把我带到她家中，原来是在广州市北郊的菜地里搭的一间简陋小棚子，我估计这不可能是她真正的住房，所谓狡兔三窟，像她这种人更是如此。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五十左右的老妇，她自我介绍说已无数次带人过去，她熟悉的这条路是由广州乘火车到平湖，也是当时列车运行的最后一站，出站后由她带领我们步行前往。这条路可以直接涉水过河，在广州每人给她交20斤粮票，她只负责把我们送到对岸，那边必须有人来接，每人给他交港币100元。我们一行四人：我、表嫂和表嫂的两个朋友，表哥来接我们。表面看来此方案似乎可行，但我还是做了两手准备：如能成功那边的事情表哥答应他来处理，不成功怎么办？据了解当时凡是普通老百姓的偷渡被抓住后，在看守所关押十天半月，然后由家里人出面担保领回去就算了，因为偷渡的人实在太多了，有的村子只剩下老弱病残跑不动的，偷渡的目的都是为了找一条生路。所以我不能暴露身份，冒用胡用仙之名，这是广东老家农村的一位表妹。

就这样我们坐上火车出发了，大家都作农妇打扮，到了平湖已是下午，一出站就有民兵拦着问：来干什么的？老妇上前说：我们是来探亲的。他们也就放行了，走了一段路后便是村庄，不少人在地里干活，看到我们这一行人，他们都抬起头用惊诧的目光盯着我们，小孩子公开喊叫：偷渡的，偷渡的！我们的心情很紧张，跟着老妇前行。走了二百来米迎面来了一个背着枪的民兵，很严肃地说：你们不能再往前走啦，前面就是国境线。老妇也不说什么，掉转头把我们领着往回走，走了一段路后让我们坐下休息，这时太阳已西斜了，老妇说：不要紧，等天黑了我们再过去。天色开始灰暗，老妇领着我们又继续前行，走了一阵过来两个民兵，斩钉截铁地说：你们既然不听劝告，我们只好把你们押到一定地方看管起来了。这时我们如果后退或者反抗都是不行的，四五个妇女面对两个拿枪的民兵，除了服从别无出路，老妇和我们一起乖乖地在黑暗中被押着

走,最后走到一间祠堂模样的房子,也许就是民兵的营部。当天晚上我们就饿着肚子坐到天亮,民兵拿着枪在门口守着。这时我盘算着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第一是收买民兵把我们放出去,但我们事前没做这方面的准备,老妇也没给介绍相应的措施,这时身上没有足够的资金,毛毛雨人家根本看不上,还会惹得一身骚。第二是逃跑,凭着妇人的力气能跑得过民兵吗,而且人生地不熟,茫茫黑夜怎么跑?第三是忍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问民兵打算如何处置我们?回答是分别送回各自的家乡所在地,果真如此,家里人会把我们接出去的,因为我们没做任何犯罪的事情,只是一般的偷渡而已。相比较之下只有忍为上策,安全、切实可行,静待以观其变。奇怪的是半夜以后老妇不见了,民兵说是她有急病送走了,估计是蛇头与民兵之间可能都建立一定的关系,放她溜走了。

天亮以后大家就各奔东西,表嫂她们回广州,我被送到深圳看守所,两天后就转到开平看守所,因为胡用仙是开平赤坎公社的人。看守所面临人满之患,除了真正的刑事犯罪外,还有一部分是在农村吃不饱而故意犯罪,如寻衅闹事:相互斗殴打架、专门跑到看守所门前吵闹谩骂、看到有吃的东西就抢等等,这类人只要抓进来就打发不出去,赖在监狱不出去,说是好歹在这里还有两顿饭吃,不管饱不饱总不致于饿死,这种自动甘愿蹲监狱的行为,恐怕也算是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我在看守所里以偷渡犯对待,行动比较自由,外出劳动、上山打柴都有份,这对于我来说是相当吃力的,为了不暴露身份就得咬着牙顶过去,特别是有一次上山打柴,南方的劳动妇女都是赤脚干活,我当然不能例外,光脚走平路还问题不大,走山路那些石子、草根、树杈戳得我心里直疼,适逢下起大雨,割好柴草,捆绑成担,然后挑下山,回到看守所,雨水、汗水使得整个人从头到脚像个落汤鸡,不管怎样总算熬过来了。管教人员对我说可以往外发信,自己太幼稚了,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不可原谅的失误,我给梁炎武发了一封信。梁炎武原是北大研究生,与顾雁同学,是一位志同道合者,他家在广州,给他去信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我的行踪,以便另作安

排。这以后的日子我处于等待状态。

七月中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拣菜,突然女监的组长带上两个女犯人,神色紧张地叫我立刻回号子(犯人的宿舍),我预感到发生事情了,此后再也不让我到外面去。一周后提审我,首先要我交待真实姓名,我死不改口,就是胡用仙。又问我认不认识高澄清?这时我脑子嗡的一下,事情不妙,高澄清是张春元的化名,他怎么到这里来了?

张春元是通过梁炎武得知我的情况,雷厉风行的他立刻持着假的湖北省公安厅的身份证来到开平,以为凭此可以调出胡用仙,或者可以了解些有关情况。因为在59年时张春元曾以湖北省公安厅的身份证到兰州大沙坪客车厂去探望过同班同学史美唐,他以为到开平也没问题,殊不知客车厂是劳改就业的工厂,而看守所是专门关押犯人的地方,二者性质不同,宽严程度也就不一样,而且胡用仙是开平农村的妇女,怎会与湖北发生关系呢?这当然会引起怀疑,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他过于感情用事,缺乏周密冷静的考虑,开平这边只要一个电话过去,事情就会被戳穿,果然不出所料,很快就知道我们是右派大学生。原来我和春元曾有过这样的约定:万一假身份被查出,我们就顺水推舟,正由于是右派在农村劳动,又不让返校,在无前途无出路的情况下,只好以偷渡来拼搏一下,一切到此为止。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来迎战下一个回合。

春元被关押在一个单间,借口看病与女医生有所接触,得知她也是犯人后,春元就极力想通过她与我取得联系,开始是捎口信,但迟迟不见回音。当时我还不知道,只见女医生很热情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从旁得知她是看守所内多年的“老积极”,我当然倍加警惕。春元心急如焚,他以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可以互通,就会有同情心,殊不知又有多少沦落人为了爬上去,不惜踩在别人的肩上、头上,这位女医生的人生天平很明确:我和你张春元非亲非故,素昧平生,更何况你还是外地人,萍水相逢,此后天各一方,我值得为你效劳吗!相反以你为契机,不管功劳大小,起码可以捞到点油水。所以她在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给张春元帮忙,于是春元先后数

次写成纸条请她转交给我：“医生：我拜托您的事办得如何了？我爱人叫胡用仙，小名叫雪，今年有廿四五岁，来此已一月多了，您能叫她给我写个字条吗？我仅希望她知道我来看她被关就行了。”“医生：曾蒙你数次帮忙，我非常感激，这次你一定要胡用仙把她的近况写来字条纸带给我，你多发善心吧！千万别拿我的真诚感情开玩笑！”“医生：我万分的相信您，相信您不会骗我，请求您看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面上，在患难的时节，尽力地帮助我吧，请给我带个回信来。”春元焦虑万分地在那里等待，可他哪里知道正是这位“白衣天使”、正是这位口蜜腹剑的“帮忙人”，不但口头上向管教把他的情况作了汇报，还把他写的字条全部交给了看守所，她躲在黑暗角落在笑，庆贺自己可以“邀功领奖”。

春元一到了开平，全然不顾自己的危险，仓促中就托那位医生给我捎字条：“雪：七月半来此被关，已知我们为大学生，此处一切好，我现住单房三号一八，可给弟去信，由我来办。亲朋不可理，一切谣言不可信，安心等着、老实守法，千万给我一回信！告知近况。前次带来的衣物收到否，还缺何物！我准备最近给家去信，叫弟弟寄些东西来，看情况，不闻不问，咱们得作长期打算哩！信可交带信人转来为盼！大胆来信。”正由于假身份被识破，必须做好下一步的打算，那怕把牢底坐穿也不能说出任何情况，牺牲自我保全大家，这就是春元来信的中心思想。接下来又写了第二张纸条，“雪：医生应允帮忙，我们感谢她那善良的愿望和好心；你一定要写几句话，请托医生交我，否则我怎么知道你收到了呢？坐牢我不怕，也不悲伤，而最愁人的是你近来怎么样了？身体如何？快给我来信！”春元被蒙骗了，此人毫无善良和好心，只有赤裸裸的势利，她可不是菩萨，而是夜叉。春元得不到回音，愁苦交加：“雪：今天接见请求不允，近在咫尺似天涯，一墙之隔难相见，真没有办法！我给你写了二次字条，收到没有？望告，切切！”所有字条全经由答应帮忙的医生之手上交了，并一一粘贴起来，哪怕是只有2厘米宽、7厘米长的小纸片也不放过，成了历史档案的真迹，春元的苦心和真情厚意也才得以披露。7月27日春元给我写了生死与共的誓言：“雪！我们能在

一起坐牢应该说是天作之合，我们的感情将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愿我们同出同进，生死不渝！来日方长，保重！”春元在开平看守所吟诗以明心志：“牢门遮日月，只见一线天；只要硬骨头，铁门也得穿！”



张春元在开平看守所写的字条

由于身份的被识破，引起了看守所以对张春元的注意，为了摸清底细专门派了一个卧底，把何根稳从7号牢房调至3号与春元同住，干部给何作了明确交代：任务是对高澄清（张春元的化名）进行了解工作，方法是“激、诱、挑”，设法诱取他暴露，说自己既有历史问题，也有现实问题，是政治犯，在开平就有一个反革命组织。这是1960年7月30日的事情，在谈话中张只说自己是兰大学生，被打成右派，为了寻求出路所以偷渡。何在8月8日立刻把情况向上打报告，并说：“请审核指示工作进行。”正由于何根稳在张春元面前编造了一套政治犯的履历，以此引诱对方上钩。张春元对待此事是留有一手的，所谓“假戏真来真亦假”，如果是真的，他完全可以在何的身上做文章，他先是口头上要求谈话，准备把何供出以试探官方的态度，如确有其事，他便可得到官方的好感，从而趁机要求和

我见面。但要求如石沉大海,无奈他又正式写了纸条:“我前几天要谈的事是关于同室犯人姓何的事,据我了解他是个反革命,而且是有现行活动的、有组织的,因为我们同住一房,我不便公开的写检举材料,而所方对我的请求接待则看成是无事找事,我感到很奇怪!现在请速派……”何根稳的真面目通过开平看守所写给提审员的纸条得以证明:“张春元如果供出与他同一单人仓姓何的所谓反革命案,这是我们布置狱情骗造的,请注意张犯以此作为借口坦白检举。”这出闹剧以我们被押回兰州而告终。

告密者——出卖灵魂的人

得悉我们是兰州大学的学生后,1960年9月兰州方面便派人把我们押解回兰州。开始还以为只是暴露了大学生和右派的身份而已,一到兰州便感到事态严重,把我们关在省级要犯的贡元巷看守所,预审员开门见山地说:“你们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也不是单纯的偷渡。”我们佯装不知、矢口否认,但在心里不禁疑惑:是谁揭开的盖子?案子是怎么破的?当然人多了,作为一个群体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虽然同是右派学生,这里有同情者,有支持者,有旁观者,有麻木不仁者,也有反对者,反对者置农民的苦难于不顾,看到农民群众支持我们,他们说是我们收买了农民,有一位直接对苗庆久说:有一斤粮票就可以收买一个农民。这就很可能会出现告密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事后曾有人告诉我是某某人告的密,我想这种事情要慎重,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否则会冤枉一个人的。直到2006年通过查阅档案才得以证实,武山公安局1979年7月的《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材料》中明确记载:“案件的线索来源:一九六零年四月省公安厅指示武山县公安局,兰大(后并入西北师大历史系)右派分子陈幼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

陈幼达原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和张春元同班,后并入西北大学,反右时也同样戴上桂冠,属于普通右派,故留校察看。1959年暑假陈幼达专程到马跑泉去看望张春元,交谈中张向陈流露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事后张春元感到陈胆小怕事,但并没有中断联系,秋天张春元到兰州时,又一次约陈见面谈话,也许谈得比较深,陈真的害怕了,为了先发制人,为了立功邀赏,他充当了第一名告密者。

档案接着记载了第二条线索:“五月二日,武山县公安局收到在武山劳动考察的兰大学生郑连生、柴志德交的书面反映材料一份,内称:下放劳动考察的右派张春元、谭蝉雪、孙和、向承鉴、苗庆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组织。”根据上述反映,县公安局即立案侦查。郑连生和柴志德怎会知道我们的内情呢?一方面他们和苗庆久、向承鉴同在一起搞化肥厂、硫酸厂,一起劳动生活,通过直接的接触,猎犬终于嗅到了什么,内奸的可怕之处就是使你防不胜防,你无心他有意。另一方面是苗庆久看错了人,还与柴志德谈心,以致招来横祸。

1963年尚在农村监督劳动的右派学生接到通知返回兰大,当年下放劳动的右派基本上编在一个组,大组长是马启凯。1965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不久马启凯便突然被隔离了,说他是武山反革命案的漏网之徒,要他交代问题。他感到很奇怪,因为1961—62年期间他因病请假回河南老家休养,年底返回武山,一下车就碰到郑连生,郑告诉他武山发生的事情,他大吃一惊,如果不是回老家的话,自己恐怕也是在劫难逃。正在这时郑连生神秘兮兮地问他:“你参加该组织了吗?”马启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郑接着说他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马启凯平日与郑无交往,这时他感到事情的复杂与严重,明眼人会清楚:既然是成员,为什么别人进了监狱而你却太平无事?马启凯也顾不上和郑多啰嗦就匆匆离去。直到被隔离了才把一连串的事情想起来,尤其是工宣队、革委会审问他时,不但要挖武山的事,还把他在兰大宿舍中来往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谁是告密者?马启凯和江先国把接触的人都排查了一

遍,只有郑连生是可疑分子,当时郑住在隔壁,经常借故来转悠。而且郑连生是最早摘掉帽子的右派,一毕业就立刻分配工作,其他人都要等很长时间,所谓“无功不受禄”,这种特殊待遇不正好是明证吗!

有正义感的同学们早在心中窝了一肚子气,1979年右派问题改正了,冤假错案平反了,一天有人告诉江先国:郑连生回来了住在招待所。刚好马启凯也在,二人立刻前往招待所,推开门郑背对门,转过身来正想握手言欢时,二人严肃质问:“武山的事是不是你告的密?”“没有!没有!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呢!”“兰大清理阶级队伍时是不是你打的黑报告?”“绝对没有!”矢口否认,江先国走上去“啪!啪!”两个嘴巴子,“我们代表受害人来惩罚你这个败类!你害死了多少人!”他不敢还手,抱头鼠窜跑去找保安,保安把江先国和马启凯叫出去,问明情况后不住口地说:“打得好,打得好!该打!该打!”

案件的第三条线索是:“七月廿二日武山百泉公社谢家坡生产队雷鸿吉同志(当时在通渭县法院工作)电话反映:他哥雷喜娃向他说村里雷焕章、雷子祥在搞反革命活动,望公安局速来查证。”根据这三个方面的线索:法院经过五个月的侦查,武山、天水两地公安局就在1960年9月进行大搜捕,此案告破。

四、铁窗难锁凌云志

身陷囹圄

我和张春元虽身在开平,当然不能幸免,我们是分别押送,我是两名公安干警跟着,坐上火车,戴着手铐。车上的旁观者都以惊奇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有的人还小声嘀咕:“这个人无凶相、又不像是个坏人,到底干了啥?”我听后不禁抿嘴一笑,是安慰?是感谢?是无奈还是这一切的综合?本来从开平出来后到广州转车便可直达兰州,但偏偏不是这样安排,而是把我往广州看守所一塞,他们就外出游玩了,因为他们没来过,趁此机会逛广州,游览购物为所欲为,四天后才来把我领出再乘火车;我只记得广州监狱是用钢筋水泥修建的楼房,里面分隔成一个个小小的单间,每间宽不到一米,长是一个人的高度,一共关了四个人,只能相互头脚交错侧身躺下,没有窗户,只在最高的墙上开了一个透气口,一寸半厚的铁门一关上,真是插翅难飞,铁门的下方有一个可以开关的供送饭用的小口。当时天气非常炎热,闷得人气都透不过来,幸好每天有两次放出来洗澡,这才不至于中暑。当我被领出来走到门口时,不由得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虽然这不是自由的空气,但至少也是自然的空气。心想这回可以直达甘肃了,因为我还不知道送去的具体地点。到了郑州又下车了,同样的方法把我交给看守所后去游玩了,几天后才领出来继续乘车。公安干警对此次南方之行恐怕是很开心的,他们在谈话中说道:“我跟着这个这(甘肃方言,指第三者而言)跑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在兰州下车,关在贡元巷看守所。

这是一所古老的看守所,是专门关押省级犯人的地方,四周围墙是黄土夯筑而成,墙根部厚近两米,上部宽一米多,哨兵在上面巡逻行走。一道墙把看守所分隔成两部分,墙的东侧是关押犯人的号子,西侧是办公室、伙房及干警的生活区。犯人的号子主要有两

大间,每一大间里面又分成四间,每间可容纳十来个人,全部是男犯。没有专门关押女犯的地方,把我关在一个小房子内,上面架了一块铺板作为床,我仔细观察才知这是一个用水泥砌成的澡池子,干干的,恐怕是有名无实的样子货。号子的大门是用整根的圆木拼成,颇像栅栏,小号是用厚板做成。我一个人呆了一个多月无人过问,后来又来了一女犯,说是省级单位的会计,涉及贪污等情。言谈举止看出此人非等闲之辈,我倍加警惕,所以我们没什么可交谈的。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深夜,突然把我提出去审问,我正睡得糊里糊涂,这其实是一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诱供,利用你神智不十分清晰作为突破口,并且摆出了很多照片,都是武山那边的有关情况,甚至《星火》的照片也在其中,提审员恶狠狠地说:“你可以不说,我们已掌握了你们的有关材料,你的偷渡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右派问题。”法律条文上明确规定严禁逼供讯,这不是诱供又是什么!很清楚我们的防线被摧垮了。

1960年9月底武山县在一夜之间一共逮捕了33人,兰州大学学生8人,苗庆久(物理系)、向承鉴(化学系)、何之明(物理系)、孙和(历史系)、杨贤勇(中文系)、田昌文(数学系)、陈德根(生物系)、谢诚(中文系)。农民25人,凡是和我们有过来往接触、或者当时分配住在家中的老乡,一律都遭了殃。1962年元月又逮捕了杜映华、罗守志(武山县委委员、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和贾启贤(农村的基层干部)三名干部,前后共计36人。并于1962年7月在武山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判刑如下:苗庆久20年,向承鉴18年,何之明15年,杨贤勇10年,孙和、陈德根各8年,田昌文5年,谢诚3年;三名干部杜映华、罗守志各5年,贾启贤8年;农民判刑的7人,最高的15年(刘五雄),其余三人为7年(雷焕章、雷振华、谢思敬),管制的三人(刘长寿、王孟有、雷革家),戴帽子的两人(康付存、王杜生)。

天水方面一共4人,除了我和张春元外,胡晓愚(化学系讲师)、胡学忠(化学系学生)也在9月同时被捕,1965年宣判:张春元无期徒刑,胡晓愚15年,谭蝉雪14年,胡学忠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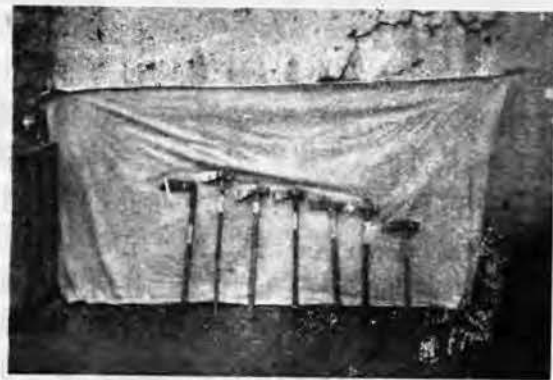
上海静安区法院逮捕了林昭(北大右派学生)、顾雁(兰大物理

系研究生,当时已离开天水返回上海老家。)、梁炎武(北大右派助教,原籍广州,与顾雁关系密切。)1965年判刑,林昭20年,顾雁17年,梁炎武7年。

天津方面有徐长崐,兰大右派教师。

全案涉及人员共44人,判刑22人,管制3人,戴帽处理2人。判刑后除个别少数如张春元等留在监狱外,其他都分到各劳改农场。

省公安厅在兰州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会,有图片、有实物,《星火》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说是明目张胆要推翻共产党;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变成煞有介事,当饥饿来临的时候,只要有人说仓库有粮食,这就是组织抢粮仓;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罪名也都纷至沓来,什么组织农民暴动,抢劫枪支弹药等等。当时大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武山那边不但把有关右派的住处做了彻底搜查,《星火》原稿、装订好的册子及第二期的稿件、油印机等就是在苗庆久的住所搜出,同时还把凡与这些人有来往的,或者是他们曾经住过的老乡家中都翻了个底朝天,把农民家中的生产生活用具拿到展览会上作为罪证,大刀小刀、镰刀斧头、车子棍棒等统统成了暴动的武器,轰动一时的全国大案就这样造出来了。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平台,是他们歌功颂德、耀武扬威的舞台。



农民家中的镰刀、斧头成了“暴动”的“罪证”

越狱拼搏

我一个人被关在贡元巷看守所里，有一天上午放风，当我经过男犯的窗户时，突然听到有张春元的声音，我还不相信，给我们送饭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据说也是兰大的，当然他不可能是政治犯，政治犯是不会留下来的，只重用刑事犯，我趁接饭的机会小声问他：“张春元来了？”他点了点头。从此女犯放风男犯的窗户就必须紧闭，因为必须从窗户下面走过，原来我还可以听到春元的声音，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力量，现在连这一点信息都被封杀了，只有徒呼奈何。

春元心里正在酝酿着一个计划，为了达到预期目的，他只好采用苦肉计，开始是不进食，接着是吃什么吐什么，连喝一口水也要吐，甚至吐血，过了两三天出现昏厥和休克，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于是只好把他送到劳改医院。这是甘肃省劳改系统的医院，设立在黄河北大砂坪第一监狱的对面，专门给犯人看病、住院治疗。春元住院的消息很快被81号犯人沈源知道了，因为他在伙房做饭，在张走前的一个钟头，沈向他介绍了劳改医院的情况，在警卫方面比看守所松得多，逃跑的机会较多，每天下午6点以后外部的警卫就撤除了，只要出了医院就没人盘问，还介绍了一名在医院工作的李xx，可请他具体帮忙，这一切为春元的逃跑创造了有利条件。

1961年7月底春元被送进劳改医院，经过治疗，春元的体力得到了恢复，但他必须装出仍未痊愈的样子。8月10日晚上8点左右，整个医院静悄悄地进入睡眠状态，当时天气很热，苍蝇猖狂，负责看守的三位警卫，两个站在桌子上向天花板上打苍蝇，一位躺在床上拉胡琴，春元立刻抓住这一时机，把事先准备好的衣服拿上，从病房里快速越过中间的走廊，奔到对面的住房内，房里的炊事员都开会去了，春元换好衣服，然后衣冠整洁、仪容端庄，以下班大夫的身份堂堂正正地走出了医院的大门。一出大门即奔向马路，当时这里是荒凉的郊野，漆黑的一片，自己身无分文，先躲在沟边的树

丛中，如果有什么动静就翻身滚向沟底。过了一阵远处似乎有亮光，凭着汽车兵的经验，他知道是一辆汽车，逐渐驶近了，他判断出是一辆货车，一阵惊喜心想有救了，但如何能上去呢？急中生智，赶忙把身上的衣服脱下，使劲向汽车挥动，果然汽车停下来了，向司机诉说家中母亲得了重病，必须赶到火车站，司机看他焦急的样子便问：“你家在哪里？”“在定西”。“正好我这批货要送到定西，你也不用坐火车了，顺路把你捎过去吧。”春元连忙道谢，心想真是天助我也！“师傅！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也当过几年司机，我看咱们俩轮流开吧，免得过度疲劳。”终于顺利地把车开到了定西，已是上午十点多了，与司机告别后，就步行去岷口，岷口离定西城区有19公里地，从字面意思可知这里山势险峻，全是光秃秃的荒山，人烟稀少，到了晚上便是狼群出没的地方，外地人在这里是无法立足的，劳改局也绝不会到这里来搜捕他的。省林业局在山沟里办了一个林场，这样国家的项目资金、绿化试验费用等等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开销了。

我的一位挚友王汉光原是北大学生，解放时参加南下工作团，后来辗转到了甘肃，在林业局工作，57年戴上“右派”桂冠，后来全家人包括太太和两个孩子全被下放到岷口林场劳动，住在窑洞里，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中午在山上啃干馒头，孩子扔在窑洞里自己管自己，可怜啊！一个四岁，一个才两岁，一天到晚就滚成个泥娃娃，肚子还吃不饱。有一天两个小家伙饿了，哥哥带着妹妹说到外面看看有什么吃的，走到地里都长着豆子，掰下来一尝觉得挺好吃，他们就钻进地里看到庄稼就摘来吃，也不知道什么能吃与不能吃，吃着吃着觉得肚子难受了，头也晕了，人躺到地上了……等到王汉光夫妇俩得到通知，从山上跑回来时，孩子已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他们抱着孩子就往定西城里跑，路上遇到了一辆马车，哀求着总算拉到了医院，经过抢救大孩子终于苏醒过来了，小女孩就这样永远离开了爸爸和妈妈……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这笔血泪账该记在谁的头上？

张春元经过考虑认为只有王汉光家比较安全，地理位置是个

死角,不会引起公安的注意,而我们彼此是信得过的。选择天将黑时进入王汉光家中,见面说明情况后,王汉光拉着春元的手说:“你放心吧!有我的一个馍就有你的一半,你先在这里休息好以后再说。”春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才感觉到肚子饿了,拿出藏在身上仅有的两个馒头,王汉光一把拿走了:“今天晚饭我们大家吃一顿热的,一来给你压惊,二来祝贺你逃出了天罗地网,三来祝愿你今后旅途平安。”尽管吃的是青菜水煮面,汉光还特地在面里炆了一勺油,吃得真香啊!春元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春元要走了,汉光坚决不允,“你无论如何得在这里再住几天,这是为了养精蓄锐,否则会前功尽弃。”春元几次三番地要走都被汉光阻止了,最后住了一个礼拜春元坚决要走了,临走前汉光交给他20元钱和5斤粮票,“我只有这点能耐了,路上多珍重。”春元是从不掉泪的,这时眼中泪花闪烁,嘴里念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日后果然成了春元的遗言!

趁着夜色,春元在狼群幽绿目光的照射下赶到了定西,扒上火车直奔上海。先到顾雁家,这时顾雁已被捕,顾妈妈接待了春元并安排他到餐厅去就餐,家中不敢也无法接纳他。接着春元到了苏



张春元给林昭写的明信片

州,到林家一打听得知林昭亦已被捕入狱,春元以她母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他相信林昭会认出他的笔迹:“林昭:我不能去看你,只能围绕着红色的高墙转上两圈,聊表寸心,请接受我这不成熟体的慰藉。”“我们的生活,其材料之丰富、多趣是能写一本书的,而且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愿你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自己一点也不着急的态度,很好的读完这本有用的、难得的书,将来为人民更好的服务。……我们光明磊落,心胸坦然,敢于斗争,只有敢于斗争的人才能敢于胜利。”

这张明信片未能到达林昭手里,监狱截留后收在张春元的档案中。

公安部门为了得到张春元的线索,分别安排了两个卧底,男卧底伪称与顾雁是朋友,要求能在他们家租一间房子住,顾妈妈和顾雁的妹妹以女眷不便为由予以拒绝。女卧底由法院事前安排与林昭同一号子,名叫张茹一,政府许诺如能完成任务可在出狱后安排工作,主要是把林昭的有关人员摸清楚,特别是张春元的信息。尽管这时已到了1963年,张春元已经抓获归案,可能上海这边对情况不够了解,也可能是想继续深挖有关情况,所以仍然安排张茹一要了解张春元的情况。张茹一信以为真,对林昭百般照顾,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两人逐步建立了一定的感情,林昭未能识破其真面目,以致天真地把苏州方面的组织和人员及地址告诉了她,这就导致了又一桩冤案的产生。

春元这时思想上是非常矛盾和复杂的,斗争也是激烈的,虽然人身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但这种自由却是卑鄙的、可耻的,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卑贱的人,成了一个没亲没友、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自己的前途、命运,将来何去何从都茫然无绪。经过一番考虑后决定:不能躲躲藏藏、偷偷摸摸地过日子,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下一步的计划是写信给人民日报,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原原本本的告诉编辑部,我之所以从一个大学生走到这一步,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和客观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的,开始的反右使我感到冤屈,我并没有攻击党和政府,仅在鸣

放中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提出并系的要求,希望把兰大办得更好,而后来进行的院系调整和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事实证明我没有错。而当时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当敌人看待,采取了残酷斗争的方式和无情打击的处理,把我们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使我们耳闻目睹了饿死人、浮夸风,谎言、假话满天飞,最初只是议论、感叹,认为长此下去如何得了?向中央反映吗,反右的前车之鉴,是非只缘多开口,但我又无鲁迅先生“躲进小楼”的涵养功夫,特别是59年下半年以来每况愈下,到处“放卫星”,亩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者,省、区报纸介绍经验进行表扬,而人民日报也照登不误。只要稍加分析亩产7000多斤的小麦或稻谷,平铺在这6000平方公尺的土地上就得半尺多厚,这可能吗?党中央不但对此歪风不予遏制,庐山会议后期还批判了彭、黄,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把说真话、讲实际、办实事的人打下去了,这种倒行逆施、四方树敌的做法,不正是中国政治日趋反动和衰退的表现吗!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组织了一些志同道合,思想观点比较接近的人开始活动,用我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合适的手段来反对现政权。如果说我们有罪、犯法,那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就应该是罪魁祸首。经过这番思考后决定自己直接到北京去投案。

在去北京之前必须到广州,因为那里遗留有衣物,于是从上海南下。有一天春元正在杭州街头走着,突然前面警察押着一群人走过来,他正想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时,警察来到他面前请他出示有关证件,他身上什么也没有,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于是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抓到人群中,全部驱赶到一座房子里,人多房子小,大家挤作一团,原来是赶“盲流”的。最近社会上无业流浪的人越来越多,这是环境造成的,生活不安定,温饱无法保证,加上“运动”一个接一个,多少人有家归不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被逼得到处流浪,当局意识到这是危险的动乱因素,于是在一些大城市成立了集审站,把这些人命名为“盲流”,说是盲目流入城市,影响了国家的管理秩序,需要对他们进行收留,集中审查、分别遣返,这其实就是一种违反人权的搜查和驱赶。春元很清楚审查的后果是什么,

可不能出了虎口又入狼窝,他不能等着审查的到来,他和身边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趁着开晚饭比较乱的机会就带头冲出去,冲过了旁边的小门,但被大门干活的人拦下来了,所有的警察立刻包围上来,并扬言:如再闹事就开枪了,其他人都后退了,寡不敌众,事情被压下去了。可带头的春元无形中暴露了自己,立刻被送到杭州小东桥看守所,提审时冒名高澄清,在兰州地质队工作。但很快被识破,更为糟糕的是他从劳改医院出走后,甘肃省公安厅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结果于1961年9月6日春元被捕归案,先送兰州贡元巷看守所,62年送天水市监狱,戴上脚镣手铐,受尽折磨。

女囚生涯

随着张春元的归案,我相继也被转到天水看守所,看守所坐落在市中心的大街上,是由胡氏大宅院改建而成,前院临街,为干部和警卫的办公及住宿之地;中间是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女犯的劳动场所,主要搞缝纫,楼下是伙房、库房;后面是一间大厅房,是廿多个女犯的生活场所,旁边是卫生所,再过去是一个小院,关押男犯的号子。天水看守所没有贡元巷看守所森严,也看不到荷枪实弹警卫的巡逻,只在进出前院和大门处有岗哨。

我一进入前院就叫我蹲下,据说这是对待犯人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带犯人时必须让他们蹲下,使他们处于低下被动状态,如要进行反抗就得站起来,这样警卫就赢得了一个缓冲的余地。蹲得我双腿发麻,最后才来了一位女警,对我从头到脚作了一遍搜查,只允许带一些生活必需品,就把我带到后院的厅房交给女犯的组长张牡丹,女警走后她问我:“干下什么了?”我回答得干脆:“反革命。”她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什么话也没说,把我带到廿多人睡的通铺跟前,安排了一个中间的位置,“晚上你就睡在这里。”转身就到楼上劳动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此人看来没什么文化,但动作麻利干练,非等闲之辈。初来乍到的我坐在通铺上,看着周围的一切。晚饭是伙房抬来的一桶清汤,在开水里撒上几把玉米面,

再放些仓库里存放的陈年干菜叶，还不如农家喂猪的猪食，每人还有一颗鸡蛋大小的土豆。一说开饭了，人们便都一窝蜂的拥上前去，打汤的、分土豆的，一个个眼睛都瞪得大大的，生怕给自己分得少了。打汤和分饭都是轮流值日的，只要一不合适就立刻吵嚷起来，廿多双眼睛都在盯着你，轮到打面片、打面条或打汤是最好的，因为最后的桶底打饭者便可据为己有，把桶刮得干干净净。每人的饭碗吃完后都用舌头舔得比洗的还清净。据说当年兰州大学的右派副校长陈时伟开始就因为不会舔碗还挨过批斗，我总算是过了这一关了。吃完饭便准备收号子，在管教干部下班之前便锁上大门，廿多口人就在厅房内活动，洗洗弄弄，每人就一缸子水，衣服只好放到第二天洗。大家躺到床上，有的默不作声，眼睛呆呆地凝视着天花板，而心里却是思绪万千、思潮翻滚；有的在长吁短叹；有的在窃窃耳语；有的闭起双眼，在一天天挨日子；只要武警的皮鞋声一响，立刻鸦雀无声，拿着手电把通铺照射一遍，例行公事地走了，房子就又活过来，僵死的生活天天如此。

尽管监狱规定犯人不能互通案情，但谁也不会遵守，不出三五天你把别人的、别人把你的底子就都了解了。这里的女犯有已决的和未决的，这是指法院的判决而言，已决的随时可遣送到劳改农场。案情分为政治和刑事两大类，政治犯以一贯道居多，说他们要推翻共产党，他们中绝大多数文化较低，只知道为家人、为儿女祈求福佑，像我这种现行反革命是个别的，还有一个基督教徒，五十多岁了，每天一大盆一大盆地洗衣服，全是管教干部和警卫的衣服，成了专职的洗衣婆，我看她有时累得都直不起腰。刑事犯以奸情、杀人和偷盗为主。

厅房的对面就是伙房，每天五点左右，大家饿得实在睡不着了，偏偏这时伙房就飘过来阵阵香味，油香、肉香……对于我们这些一年半载没吃过肉的人来说，那个香味就特别刺激，特别诱人！每一个人都饥肠辘辘难以忍受，不过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的，想出了很多排解的办法：不停的咽唾沫，给空空如也的肠胃填补一点润滑剂，从条件反射来说就有一种吃东西的感觉，象征性地在精神

上给予一种安慰。真实的东西吃不上，回忆过去吃过的东西谁也阻挡不了，于是相互交流你过去吃过什么好吃的，我念念不忘的还是悦宾楼的那顿银丝卷，津津有味，越想越好吃，旁边有人说：“那没什么了不起，等你出去了到我家来，我亲手做的花卷比这香一百倍。”啊！那该是何年何月呀！随着时间的推移，谈话的调子也就越来越低了，经常有这样的问：你出去后最想吃的是什么？我不再是银丝卷，哪怕是包谷面窝窝头能让我尽饱吃一顿就行了。

每当我们在厅房的通铺上东拉西扯地谈论吃的话题时，伙房的香气减弱了——饭菜做好了，天色开始发亮，这时便可听到皮鞋的“嘎吱嘎吱”声，由远而近最后进入了伙房。有人就爬起来在窗棂的小眼上去观察，原来是所长雷正义，只有他有这个权力可以自由出入，每天如此可谓“雷打不动”。在伙房里面专门准备了一张饭桌，只要皮鞋响，饭桌就摆上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吃饱临走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提饭盒，堂而皇之地走出去，名义上是到伙房打开水。平日所长的脸是铁板一块，在犯人面前他的脸从没有喜怒哀乐的变化，老是吊着个脸以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只有在进入伙房和医务室时，脸上的刻板度才稍为松弛一点。犯人的医务室成了他的私人家庭诊所，家中老少来此看病取药是常事，特别是保健类的补药，犯人连面都见不着。我有一次患了急性胃炎，几天几夜连一口水都喝不下，奄奄待毙，这时有幸恩赐了一包麸皮粉，本来国家按人头拨款购药，但钱和药都是一笔糊涂帐，只有所长监督控制；按人头定量供应白面、肉、油、糖等，哪怕数量很少，他们采取虚报人头和私下侵吞，这一切都叫大老鼠偷吃了。

我的劳动是给缝纫做下手活，例如钉扣子、锁扣眼等。第二年所有已决犯均送往农场和平凉卫生材料厂，剩下四名未决犯需立刻搬进小号子，就在隔壁的小院子里，当我们被带进号子后，只听背后“咣啷”一声，门锁上了。大家仔细打量了一下这间号子，面积约有多十平米，匆忙赶任务刚刚弄成，墙壁是用泥土掺上麦秆屑糊上去抹平，床是用土块垒成，上面抹上一层泥巴，所有的泥墙和泥床都是湿的，真是三生有幸，我居然睡上了“水床”，过了几天，泥墙

上还长出了麦苗，麦秆屑里的麦粒在一定的湿度下便发芽长叶，哈哈！监狱的号子里也长出了庄稼，真是旷古未闻。当时已进入冬季，同室的两个刑事犯受不了了，就对着院子中的哨楼喊道：“报告班长！号子里又冷又潮，实在受不了了。”哨楼恶狠狠的回答：“家里舒服你不蹲，现在让你尝尝监狱的味道，不许再嚷！”无奈只好在号子里嘟囔：“八辈子缺了德，断子绝孙的，你以后有好瞧的。”下午收号子时，我们集体向管理员提出：能不能给点木柴把房子烘烤一下？她亲自目睹了实际情况，的确太不像话了，而且接近年终岁末，万一上级来查看……第二天果然拿来了木柴，伙房的人帮着把木柴点燃，烤了两天把表层烤得有些干就算完事了。

我们整天关在号子里，仍然不断有活干，主要是给干部及其家人打毛衣、缝缝补补。一天收号子时，随同管理员进来的还有一位男士，管理员介绍说：“这是新来的所长，姓白。”白（正杰）所长看来比前任和蔼一些，而且每天清晨赶往伙房的皮鞋声也听不到了。每天我们放风一次，经常看到伙房把青菜摆放在拐弯的台子上晾晒，有人提议弄些来吃，刚好前面有一堵墙挡着，哨兵看不见，问题是怎么拿进号子呢？因为进入号子之前必须排好队让哨兵检查允许后才可，除了提着的尿罐什么都不许带，干脆把包菜、萝卜放到尿罐里，回来后用有限的水一洗、盐一淹就可以吃了。人的弹性是够大的，讲究时什么农药、虫卵、味道、卫生等等挑剔得很，可当你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时，你什么也不会考虑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饥不择食”的深切内涵。在菜里拌上点盐和醋就是一盘美味佳肴了。

有一天白所长把我叫出去，我习惯性地以为又是提审了，奇怪的是没把我带到外面而是带到医务所旁边的办公室，我当时很紧张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将如何应对。叫我坐下后很自然地问我生活习惯不习惯？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联系？有些什么要求等等，还劝我思想上不要负担过重，等待判决后好好争取早日回到社会上，政府还是很重视你们的才能的。戒备心理使我不能畅所欲言，我摸不透他此举的目的何在，从好的一面考虑是所长的职责范

围，它应该了解犯人的动态；若从另一方面考虑，为什么只提我一个人，而且自进看守所以来还从未见所长了解犯人情况的，到底葫芦里卖的啥药？

过了几天白所长又把我叫出去，这次除了谈我的一般情况外，提到了张春元的问题，问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我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是他的未婚妻。”我想这样回答他应该清楚不能有非分之念。接下来他问我是否知道张春元的情况，我说自从开平看守所押回兰州后就一无所知，他告诉我张曾逃跑过一次，我装作非常惊讶的样子，他说张现在关在第三监狱。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能告诉我这些情况就很不简单了。

几天后又把我叫出去，坐定后他问我：什么叫藏头诗？我说：在一首诗中按一定次序嵌入诗人所要寄托的人或事。这时他在纸上写了这样两句话：“蝉在树间鸣，雪从天上降。”当时我的心情相当激动，是谁写的？意欲何为？我冷静地说了一句：“这是以我的名字藏头的联句。”我等待着他的下文，这时他推过来一张纸，上面写满了诗句，我只记得第一句：“潭月溶溶从西升”，后面是以我的名字藏头，我粗看一遍后，从内容判断出是张春元之作，当我正准备详细阅览时，突然进来一位武警说：“白所长外面有人找你”。白立刻把纸折叠收起，并沉下脸来说：“回到号子好好考虑写出交待。”事情就这样不凑巧，我反复琢磨：他这样作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应该以此为契机打开一个缺口，他不是叫我写出交待吗，我在纸上写下了：“白所长：我把您作为良师益友，谢谢！”第二天来开号子时我亲手交给他。

此后几天都平安无事，可后来不见白的出现，代替他的是雷，大约半个月左右的一天雷把我带到前院提审，提审员是陌生人，他开门见山就问白的事，我平静地如实地谈了全过程，我觉得没什么可以隐瞒的。我想肯定是出事了，只有两个可能：一是白主动把我写的条子上交以邀功，另一是旁人的检举揭发，不管怎么样反正没有出格的把柄。后来才得知是白在看我写的条子时被人发现，惹下

了一场大祸——开除出党、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平反后我曾试图在水找到他，以当面表示内心的歉意，只知道他退休后在家中休养，家在何处？始终未找到线索，直至2008年10月在一次天水友人的聚会上，有一位张先生说他认识白所长，我猛一高兴紧接着问：“他在哪里？”“前不久过世了！”犹如晴天霹雳，满座不约而同地发出“哎呀”感叹，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瘫在了椅子上，多么不幸啊！深以为憾。

1965年元月在水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同时宣判的有张春元、胡晓愚、胡学忠和我，每人都是五花大绑外加手铐，女流之辈也不例外，我有幸亲自体验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对待囚犯的刑罚。在未正式宣判前，我们每人都是面墙而蹲下，后面是荷枪实弹的警卫，稍一左顾右盼，叱喝声马上就来。我和春元离得最远，根本无法见面。正当这时墙外传来喊声：“蝉雪”！那些警卫们如临大敌，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冲墙外而去，我默默祷告：千万别出事了！我听出来了，这是叶青的声音，她个子不高，但长就一身豪侠气概，只要见到不平的事就出手相助，在新疆把人打了，被定为坏分子，她就跑回天水。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一天在路上看见一个中年人，把一个老人的装有馍馍的口袋抢走啦，她上去就揍了一顿，对方也不是饶爷的孙子，彼此厮打起来，惊动了公安局，就把她收进了看守所。我们是千里有缘来相会，经过几天的接触，大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她很佩服我们的作为，说道：“我过不了几天就走了，你多保重，只要我在水，我会想办法和你联系的。”此后她不断地给我送来生活用品，宣判会上的那一声喊对执政者是当头一棒，给我增添了信心、力量和勇气，此后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叶青！你好吗？我们还有机会重聚吗？1965年的宣判大会给天水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心里都有一本帐，八十年代以后为了搜集资料我曾多次去过天水，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一听说我是当年宣判会上的那个女的，就立刻围上来紧紧抓住我的双手，用一种爱抚的目光从上到下边看边说：“受苦了！受苦了！”我不禁泪流满面，少年就失去了母

爱的我就像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50多岁的张根存先生赠我一首诗：“少年曾记仰斯人，慷慨俨然江竹筠。雪击不输梅气魄，沙磨更显玉精神。时光荏苒容颜改，世路崎岖理想真。一片冰心何处寄，天边又见月如轮。”我不敢以江姐自比，望尘莫及，但天水人民的深情厚谊将永世铭刻肺腑！

宣判后，把我送到朱圉砖瓦厂，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完成100斗、300块砖的任务，从出土、泡泥并把泥翻到场地上，成了一个近一米高的尖锥型土堆，然后要把这堆泥翻三遍才可以使用，把泥揉成一个个泥坯打入砖坯的木斗中，一斗三块砖，刮平弄光后，端上木斗倒在地面上，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下午砖坯成型，再一块块码成砖墙等待烧窑。这是一种强劳动，应是男的壮劳力干的事，我一天干下来回到住地连爬上炕的力气都没有了。后来看我实在完不成任务，就改为200多块，一天三顿，每顿两个粗粮馒头，晚上一碗菜汤，我感到难以熬下去。就盼望着天下雨，可以不出工休息，但那里是干旱之地，很少下雨。

幸好甘肃省劳改局在1965年有个新任务，将甘肃省第一监狱改建成兰州阀门厂，仍然是劳改厂子，需要技术人才，于是通知省内各劳改系统将年青的知识分子集中到第一监狱，在朱圉不到两个月，我被送往第一监狱。第一监狱座落在兰州黄河北的山脚下，前面是干部和警卫的工作生活场所，进入监狱是高高的狱墙，两道大铁门分别把守着两道关口，“哐啷”一声就是另类的社会。女监在前面，一边是号子（犯人的宿舍），另一边是工房，开始分配我去弹棉絮，工房里灰蒙蒙一片，满是尘土和棉花纤维，把人呛得透不过气，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每天上午从7点干到12点，一个个都成了白毛女，连眼眉毛都是白的，只有两个眼珠子和两个鼻窟窿是黑的，回到女监连洗带吃一个钟头，下午一直干到6点半。弹棉絮的主要劳动是背弓，完全是人工操作，用弓把棉花弹松，我因为个子不高、力量也不足，所以只能当副手，拉线和磨熨，棉絮的成型就在我们手里。

不到一个月又把我调到缝纫车间，以电动缝纫机加工帆布手套，按不同工序流水作业，从上午7:30干到晚上8点，除了吃两顿饭以外都在劳动，能上电动缝纫机的女犯约20多人，另有负责裁剪和包装成品的男犯，每月的任务是100000双以上，完不成就拼命加班加点。而犯人每天只能吃到7两粮和不见油星的干菜汤，据说国家批给的粮食是每人一斤，不知漏向何方？

在第一监狱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臭虫大战”，每个号子约十来平米大小，用木板支了个大通铺，住了近廿来人，余下的地盘大家只能侧身而过，上面是用纸糊的顶棚，卫生条件不好，加上年久失修，天气一热，臭虫大肆泛滥，锁上号子一关灯，不一会便可听到“嘀嗒嘀嗒”声，臭虫出动了，从顶棚往下掉，咬得人根本无法入睡。这时如果拉开灯，犯人号子的灯都安得特别高，以防犯人寻死触电，加之千瓦数很小，所以灯光非常昏暗，而臭虫的光感特别灵敏，一开灯刹那间，千军万马跑得精光，剩下最后几个可能是吃得太饱跑不动了，才被抓住。天天晚上如此，不堪其扰，最后采用“六六”粉和上锯末，同时在每个号子熏，果然奏效，能否灭绝那就不得而知了。

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监狱也相应发生变化，首先是早请罪、晚汇报，这就需要提早上工、晚下工，每天延长一小时，由于我是女监文化程度高的人，所以被指定带领大家念“请罪词”和“汇报词”，这种心口不一而又不得不做的事真难办，还要思想高度集中，在那种场合是决不能念错一个字的。其次是监狱也要大搞阶级斗争，明确划分刑事犯和政治犯，在第一监狱刑事犯主要是杀人犯，政治犯是反革命和一贯道。管教干部公开动员刑事犯：你们杀了人这是事实，无非是一条命，而政治犯是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你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所以你们必须严格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靠拢政府，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在这种号召下，女监便有人趁机想捞一把。

女犯屈芳桂原是单位的一名会计，因经济问题获刑，入监后不

得重用而心怀不满，特别是对我担任女监的大组长更是愤愤不平。所谓大组长主要是负责女监的生产，每月管教干部传达当月的生产任务，我就得想方设法去组织安排，从数量和质量上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每天奔波劳碌，我巴不得让我退下来。她很快就写了一份检举材料，主要内容说我组织小集团，利用布置任务把人召集到一起，三五成群的开会，把人网罗到自己身边。帽子很大，但下面缺乏具体内容，又无旁证人。管教干部向材料中提到的有关人调查了解，根本就没那么回事，所以也没来问我，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随着阀门厂业务的开展，把我调去描图，直到1973年底，名义上是把我释放，实际上把我送到就业厂子，戴着反革命帽子，仍然不能自由行动。特别令我伤心的是1970年3月，把春元押到兰州来执行处决，关在第一监狱，给女监送饭的犯人悄悄告诉我：“张春元到兰州了”，当时我一下懵住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绝没有好事，因为前几天我亲眼看到把女监的一位小脚地主老太婆拉出去了，她因为承受不了土改的打击，精神有些失常，一天到晚嘴里喊着：“打，打，打打打！”这就成了反攻倒算的现行反革命，拉出去后再没回来。当时不断看到枪毙人的消息，特别是监狱的犯人只要在说话或行动上抓住把柄，格杀勿论，风声鹤唳一片恐怖，我意识到春元面临的事态，于是趁伙房的人来抬饭桶时说：请转告他，“他永远活在我心中！”这是我给春元说的最后一句话，春元！你听到了吗？果然第二天就故意在女监门口贴出了那张布告，我当时欲哭无泪，只有夜深人静时眼泪才尽情地流呀流……接着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两鬓的头发变白了，我才体会到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须发的事实，这才是真正的残酷！一个人遇到了痛苦的事情，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能够对外发泄：诉说、呼喊、号啕大哭，其痛苦便随着发泄而释放，而痛苦便逐步趋向平缓。如果痛苦得不到发泄而闷在心里，这是苦上加苦，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里，又像是一条毒蛇在一口一口地啮噬着自己的心灵，心始终在流血……

五、出师未捷身先死

凤凰涅槃

1962年张春元被送往天水市第三监狱，镣铐加身，关在暗无天日的小号子里，每天只有两顿送饭的时候才从递饭的小窗口透进一些亮光，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但犯人中逐渐了解春元的身世、案情，送饭的宴生贵对他的态度也就变得和蔼了，还不时劝他注意身体健康。

1964年的一天，宴生贵在送饭时夹带了一张纸条，原来杜映华也在第三监狱，他判刑后送往云雾山劳改农场，那里气候恶劣，生活条件极差，杜病倒了，管教干部念他曾是县委书记，就把他调回监狱做些轻的劳动，行动也比较自由。这张纸条就是杜映华写的，他希望张安心服刑、认真改造。春元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杜写了回条，彼此作了相互的问候，同时发出了铮铮誓言：“杀了张春元是矛盾的中断，而不是矛盾的终结！”此后通过宴生贵、史茂珍、史朝忠等人的传递，张、杜二人互有书信来往，张给杜写过七次信件，杜给张先后三次，主要内容是：

杜的刑期将满，征求张的意见：释放后怎么办？张的意见是到农村去，“因为你了解农民、熟悉农村工作，发动农民扎根农村，农民对你有一定的信任，是可以好好干的。另外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学习马列主义要对照中国现实，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不登堂入室就不能同室操戈。”“出狱后要好好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为什么都坐了监狱。”

张向狱方要求学习、要求看报，然后对国内外形势进行分析和评论，如印尼九州事件，赫鲁晓夫的下台，中苏关系的变化，中、苏、美、英外交政策的分析等等，并把自己学习的心得、认识写出来；国内方面反映了对彭德怀的怀念和同情，并明确说：“民族主义是现

时最时髦的东西，我们要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民族共产主义。”这些材料通过史朝忠、史茂珍转交给杜，为了避免被搜查发现，所以看后都销毁，不是烧就是撕，未能留下原始材料。

同监还有黄根宝，他让宴生贵给张说：“不要硬性对抗，争取开镣，还有更多的事要做。”张回答：“作为一个阶级战士，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并写信告诉史茂珍：“监狱中有人也有鬼，要把人认清。可在杜的周围学习最时髦的东西——毛著，一方面可以伪装积极，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史曾向张提出关于越狱问题，张不同意，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等杜映华释放后进行援助再说。

1966年9月第三监狱在犯人中开展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相互呼应，公开号召犯人对自已的问题应坦白交待，主动交待者从宽；对别人的问题应尽快检举揭发，立功者受奖，这是政府又一次给你们的机会和出路，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是争取立功减刑还是负隅顽抗死路一条，何去何从？这时宴生贵害怕了，为了保住自己，他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坦白交待了。第三监狱捞到了稻草，成立了专案组来处理这一事件，接着史茂珍、史朝忠也分别作出交待，只有杜映华和张春元不予承认，或含糊其辞地说纸条写过，内容记不得了。

1967、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公安六条”。这是完全的恶法，办什么案怎么办案，有决定权的人说了就算。往往因政治需要去完成任务，加上有一种“理论”，即“不要被法捆住自己的手脚”。在当时高压的政治空气下，“宁左勿右”，什么“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左在别人身上，右在自己头上”等错误思想盛极一时。

公安六条中的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

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成为无所不包的、能够有效镇压抗拒现实、持异见者的法宝,该条为公安六条的核心。

第四条首次提出了一个 21 种人的名单,其中包括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人员,21 种人均列为专政对象,这些人如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丝的不敬,就是反革命,就依法严惩。

这一法规性文件,没有通过规范的立法程序,仅仅用一个临时性规定就把“以言治罪”、“思想犯罪”制度化、法律化,成为打击异己势力的方便法门,滥用群众专政,这一政策支持了任意捕杀行为,大批无辜者被打成反革命、被杀害。

1970 年 3 月 22 日原天水地区保卫部根据宴生贵等犯人的口供,在毫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如下判决:张春元、杜映华在监内进行第二次反革命活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法无天、草菅人命到了何种程度!鲜血染红了兰州市红山根的土地……



狱中的张春元

涅槃不单是为了求得个人的解脱,涅槃也不只是追寻个人的进入天国,涅槃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和信念,为了达到“大患永灭,超度四流”自由无碍的高尚境界,执着不懈地奋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虽然壮志未酬,但历史前进的号角正召唤着黎明的到来……

余 音

随着“浩劫”的消亡,1979 年下半年兰州大学根据中央(1978)55 号文件精神对我们的右派问题作了复查改正,接着我们向有关法院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谈何容易,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

开始我们各自分别向法院写申诉材料,得到的答复是:原判事实清楚,罪证确凿,原判正确,维持原判。法院还是当年的原班人马,左的烙印仍在作祟,谁会站出来打自己的嘴巴,公开说:我错了!恰恰相反他们一贯以正确自居。1979 年 7 月天水中院的决定是:“原案定性不变,维持原判”。

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大家先后回到兰州大学,直接向校领导陈述当年错划右派下放农村监督劳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要求校方出面关心此案的平反。当时到校要求平反的有:胡晓愚、孙和、苗庆久、向承鉴、何之明、杨贤勇和我,也许是人多力量大,据说在省委的“内参”上居然登出了我们此案的有关报道,并责成省高院处理此事。高院成立了专案组,此案的卷宗及有关人员在水天、兰州之间来回奔波。

同时我们当中有海外关系者也动员亲人向中央统战部和甘肃省委询问亲属的下落,如胡晓愚、何之明等,我们还直接找高院的领导面陈案情的具体事宜,以达了解沟通的目的,加上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形势,在 1980 年元月中院研究决定,并分别向天水市法院和武山县法院发出平反通知。1980 年 3 月天水地区中级法院给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作了如下函告:“经复查,原判事实出入不大,但由于该案的起因动机的特殊情况(右派错划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对该案不以反革命集团定性,其处理情况是:张春元定反革命

罪，维持原判；向承鉴以反革命煽动罪免于刑事处罚（原判十八年）。对其余案犯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仍然留下尾巴，既然不以反革命集团定性，那为什么张春元和向承鉴仍是反革命罪呢？向承鉴多次提出抗诉，要求重新审理。

1980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法院也发出了平反通知：“顾雁、梁炎武在整风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均已由原单位改正。至于他们二人当时由于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方面某些错误有意见，用议论和写文章向上反映情况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显属不当，属于错案，应予纠正。”“宣告顾雁、梁炎武无罪，予以平反。”而林昭的问题，1980年8月上海市高院发出了435号判决是：“现经本院复查查明：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开始就患有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1965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1968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罪处以极刑，显属错杀，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两次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一切以精神病概括，直到1981年12月上海高院才又再次对林昭作出复判：

“如上所述，林昭的行为，既不构成犯罪，故本院（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判决在适用法律上亦属不当，均应与前两个判决一并予以纠正。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前三个判决）。

二、对林昭宣告无罪。”

林昭的冤案终于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

1981年4月天水地区中院组织合议庭对张春元、向承鉴一案进行审理查明：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1）天法刑监字第10号

……“张春元在下放天水劳动期间，于一九五九年多次书写文章和散布言论，内容是对其被错划为右派不满和对当时农村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这些文章和言论中有某些政治性错误，但未构成反革命罪；张春元在服刑期间，对原判不服，坚持其观点，在犯人中进行串连、传递字条属违法行为，再次以反革命集团定罪判处死刑不当。据此，特判决如下：

（撤销前两次判决）对张春元宣告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对向承鉴的判决书是：

（81）天法刑监字第14号

……“（写了三篇文章）在其文章中确有错误的观点，但不构成犯罪。

（撤销前两次判决）对向承鉴宣告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始终留有尾巴，什么“政治性错误”、“确有错误”等等，遮遮掩掩。而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对顾雁、梁炎武的平反判决书则很明确：（80）静刑复字第012号：“他们二人当时由于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方面某些错误有意见，用议论和写文章向上反映情况的行为，是正确的。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显属不当，属于错案，应予纠正。”

平反能唤醒那长眠地下的生命吗？平反能挽回那失去的近20年的青春吗？平反能抚平心灵的创伤吗？呜呼！让历史作出结论吧！

六、向承鉴《回忆录》部分章节

向承鉴近年来勤于笔耕，有自传体的《炼狱归魂》和《论文集》，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现将上述著作中与本案有关的章节移录于下。向承鉴通过回忆具体地描绘了兰大反右的点点滴滴，同时对整个事件从他个人的角度作了叙述，与上文正好互补，给大家提供一个全方位的认识。

《炼狱归魂》

上篇 正值青春喋血时

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

一、灭顶之灾

1957年7月上旬末。这一天，批斗会拟在祁连堂二楼教室进行，早准备布置好了。宿舍的人全走光了，无人通知我开会，落得忙里偷闲，顺便理理自己很糟的心绪，便踱步到静观园边老城墙旁晒日光浴。梨花早谢，青果尚小。自然界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无例外。何以我一片爱党心花竟结“反党”之果？思前想后，悟出一个道理：真纯并非美德，它是无知和幼稚的别称。不要以为任何人都与你一样，人与人千差万别，人太复杂；不要迷信“一贯正确”，世界根本不存在这东西，一切皆在运动变化之中。有时，你愈崇拜它，献给它的鲜花愈多，它给你回报的果实愈苦涩。

我正在遐思的时候，M君来到我跟前，是来叫我开会的，只有她猜到我会在此。我告诉她，这种会太无聊，该说的都说了，还是那句话：要我承认“反党”办不到。他们有权力押我去劳教所，抓我进监狱，有权判刑和杀我，再也无须用开会方式解决问题了。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浪费我的时间已无所谓，白白浪费大家的时间太可

惜。我在此等着，你去叫他们来抓捕我吧。

M君说，今天的会很要紧的，团省委的一个领导干部来参加。也许，越是上边的人越通情达理，越能说清楚你的问题。要是不去，反而以为你畏罪心虚，你还是去吧。

我把自己琢磨几天得出的结论告诉她。对她说，反右运动如果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你的分析可能有道理，可惜不是这样。这场运动是政治需要，完全是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直接指挥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挂帅，由各级党委指挥。越是上边的人必然越“左”，他是带着督促任务来的，岂能抱幻想？我郑重告诉她，此后不再来往，比如今天来叫我开会，今后即使组织委托，你要坚决拒绝。你应积极批斗、揭发我，污水尽管往我身上泼，我决不愿你。我已成替罪羊，不愿你也当牺牲品，和我一道跌到陷阱里。

M君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她认为事情没有我估计的那样严重，不过“批判，批判”，然后检讨认错完事。她的话轻飘飘的，我真替她着急，不免大声吼道：“你好糊涂啊！报纸上和党委明确指出反右派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阶级斗争。我能成为‘反党右派’，难道我不苦大仇深？对党不热爱？我尚且如此，任何人都不是铜墙铁壁，都可能划右。你赶快离我远远的，把我视作瘟病的传染人，千万莫当儿戏！”

后来，我还是接受了她的劝告，随同她去了会场，免得别人以为我做了亏心事，不敢见官。

到得会场已十点光景。刚落座，进来一位中年人，三十好几，中等个头，衣着光鲜整洁。身后有反右委员L和C等人簇拥着，同学大多拥上前与之热情打招呼，女同学斟茶献上。恰其时，有人送来数张《甘报》，醒目的大字标题一下攥住大家的目光：苏共揪出反党集团，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我是异类，只远远瞄上一眼，心中好生吃惊！这几个人原本都有“标准像”，五三年斯大林死后，是掌实权的苏共领袖人物，都是有数十年历史的老革命。我原以为在地球上我是最冤的人，现在知道还有比我更冤的人。

教室里一时很寂静，直到大家对报纸的内容有了大致的了解，

才转入正题。L先致辞：今天，我们请来团省委宣传部姚部长指导我们班的批斗会，感到非常荣幸，我代表同学们向他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现在，请姚部长给我们作指示。

姚一手摸着茶杯，另一只手比画着手势，用一种合格的鼓动家、宣传家的口吻，声音洪亮地说道：这场反右斗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部署发动的，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共和国的命运。如果我们不把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彻底击败粉碎，中国将出现匈牙利事件，千百万共产党员的人头将落地，无数革命先烈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得而复失，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又将骑到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帝国主义将卷土重来。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我的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根有据。你们这儿就有一个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地嚎叫要杀共产党员，要把共产党杀光！他现在手中还没有“刀把子”，就如此疯狂嚣张，一旦“刀把子”落到这些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目的只有一个：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夺无产阶级手中的“刀把子”，实现反革命复辟……。

这个看似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人原是个信口雌黄、满口喷粪的混蛋！我在心中狠狠骂道。

他突然亢奋起来，以高八度嗓音领着同学们呼口号——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要求进步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

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万岁！

……

反右委员L宣布：现在由右派分子向承鉴交代他的反党罪行！反右委员C厉声道：右派分子向承鉴站起来！

这一幕煞有介事的闹剧没想到如此拙劣卑鄙！即使不叫“交代”我也不会沉默缄口，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尽量抑制愤怒，语气平和“交代”道：“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请问：我在何时何地，有何人

证明我说‘要杀共产党’的话？”

语音刚落，彪形大汉W、P、Y和X（年龄都比我大且身体壮）忽地一齐嚎叫起来：“只准你老实交代罪行！不准反攻倒算！”

“交代‘我要杀共产党’吗？这话我没说过，谁说了谁交代，与我无关。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没神经错乱。我家世代贫农，我自幼逃荒要饭，苦大仇深，是共产党救了我全家。解放后我是全县第一任少先队长，我姐是全县第一个团员，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助学金，对共产党只有感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对共产党恨从何来？”

又是一阵歇斯底里地吼叫，一阵狂轰滥炸！“不许美化自己！不许往自己脸上贴金！”

“是否美化贴金，你们可以调查。倘有半点不实，任凭处置！”

W拍桌子狠狠吼道：“你是毒蛇！是披着羊皮的狼！我们不会上当受骗！”

我豁出去了，也大声叫道：“要杀要剐，由你！我没说过的话、没做的事，强迫我承认，休想！”

“你嚣张！”他指着我叫。

“你胡说八道，诬陷人！”。

会开得不如他们的设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右委员在姚部长的耳畔嘀咕好一阵。午饭时间已到，只好草草收场。反右委员L道：“现在宣布校党委决定：经审查，吕佩璜、鲁丕杰、冯淑筠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现在起戴右派分子帽子。学校后天放暑假，我在此代表反右委员会严厉警告右派分子，无论在校中还是回到家里，都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认真反省反党罪行，随时准备检查交



吕佩璜

待,如若乱说乱动、继续放毒,必将罪加一等!现在散会。右派分子先退场。”

我忘不了这一天:1957年7月《甘肃日报》刊登苏共中央揪出反党集团的这一天。

我被兰大党委《点将台》点名划右有十天了,之前已开过多次批斗会,都没有象今天这样粗暴、蛮不讲理、血口喷人,如此地穷凶恶极!

那么,我是怎样划上右派的呢?事情还得从两月前说起。

二、“阳谋”

1957年五月初,兰大副校长陈时伟先生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返校,向全校师生就会议精神作了传达。最高国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他在这次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共产党要开门整风,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不正之风。他号召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缺点,并要求提意见的人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态度谦恭,言辞恳切,至诚至真。我好感动呀!心想:只有毛主席有此胸襟气魄,不愧是伟人。

随后,校党委书记刘海声作了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刘书记人高马大,此前我一次都没见过。听口音像是山东或河南人,听说来兰大前当过驻越南使馆文化参赞。他的资历、级别与林校长相差颇远,跟林的朴实作风也迥然有别。会后,师生中无甚反响。整风是党内的事,老师忙于教学和科研,学生忙于功课,不太当回事。共产党办事向来认真,锲而不舍,极会运用组织力,全校动员会后,紧接着是系总支、年级党支部、班级团支部的动员会,层层级级动员布置。这些会有的叫座谈会,有的叫茶话会,谈心会等等。为招徕与会者,还备有茶水,甚至有水果、点心招待,以表“闻过则喜”诚恳、虚心之意。校园依旧悄无声息,还是无人提意见,“鸣”不起来。没过几天,

有了另一种说法:谁不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说明对党缺乏感情;谁提意见时不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明对党怀有二心。这是顶了不得的政治大帽子,使人心惊肉跳,坐卧不安,诚惶诚恐。它传达的讯息再明白不过:任何人都得开口说话,提意见,否则就与党心存二志。在当时,就我的思想感情来说,只要党需要,我可以为之献身!我不得不思索直至搜肠刮肚,为了党更纯洁、更伟大正确,看看她身上还有什么美中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改进的地方。我认认真真,条分缕析,结论是:我对党没有任何意见(对党的政策方针以及兰大党委、行政任何情况均无所知)。我何止对党,即使对我认识的同班四个党员同学:郁桂莲(女)、巩玉珍(女)、路宝田和李超云也提不出任何意见;对与我接触、认识的任何同学都无意见,我必须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反正那只是下面的传言,党组织并未正式传达说每个人必须提意见。没意见就是没意见,管它呢。星期日我和冯淑筠照常去位于富强路的省图书馆读书。

这时,我心比天高,已暗暗锁定终生为之奋斗的科研目标,要涉猎的知识太多、太多。在物质生活上,我是个低要求者,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行,我甚至认为学校提供的物质条件已超过我的欲求。我无忧无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真诚所至,金石为开。先是高年级的同学贴出了一些大字报,他们了解学校一些情况。有大字报揭露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有批评某些党员干部盛气凌人、作风霸道的;有批评不懂装懂、瞎指挥贻误工作造成损失的,……。新来乍到的一年级同学也有少量大字报:批评学校在招生时浮夸吹嘘、欺骗学生的;对学校教学设备不满、要求更新设备、增加教育投资的;反对新校址选建在闹市区装潢门面而要求改建雁滩的,等等。令我迷惑的是,教授和老师们噤若寒蝉,没一张大字报。

揭露的问题无一得到处理,所提意见无一得到答复。大学生们的情绪开始躁动起来,大字报陡然大增,意见渐趋尖锐。大鸣大放之火烧起来了!(这“火”是谁点的?又是谁在拼命“煽风”?)

大学生们与其说对共产党不满,不如说为下级党委对群众意

见采取蔑视态度所激怒。一刹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祁连堂、天山堂、至公堂的墙壁。以后不得不在操场上,在学生宿舍前的甬道上拉绳架,挂在绳索上。有的系、年级,三、五学生办一个大字报园地,名目繁多,诸如《号角》、《觉醒》、《论坛》、《先驱报》、《战斗报》,等等。有的名字古古怪怪,还有一个叫《黑老鹅》的。

平时,除同一小班(一个系又分若干班,这就是小班),外系、别的年级乃至同大班不同小班的同学无有交往,大家忙于功课,彼此不知爱好、特长。运动一来,许多人的天赋和才华得以显山露水,叫我大开眼界。大学生中人材济济,有书法写得极好的;有漫画画得惟妙惟肖的;有文章逻辑严谨、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更不乏思维敏捷、广征博引、口齿伶俐的辩才。我所见到的大字报中,并未发见恶意的“诽谤”、“中伤”、“攻击”,他们言之凿凿,论之有据,充其量,有的言辞有些过激罢了。没有一张大字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指向党的基本方针政策,都是指向某个具体领导干部的作风、某件事的具体做法。在我看来,这些正是党身上存在的瑕疵,应该改正的。

校园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即使再沉得住气的同学,也不能不看。同学们吃饭时端着碗边吃边看,也只看到大字报的几分之一,未及看的大字报很快被新的刷盖了。学校终日乱糟糟的,一切乱套。

课没法上了,只好停课鸣放。

从这些大字报里我知道了许多情况,都是做梦都梦不到的。不看不知道,知道吓一跳!有些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响应共产党召唤回国的。他们为民族复兴、祖国昌盛,毅然放弃国外丰厚的薪金报酬,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甚至变卖家产购回国家急需的仪器设备,无偿捐赠政府,其爱国赤子心令人敬佩。然而,这些人回国后,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不被信任,在肃反和思想改造中列为运动“重点”对象,“检查交代”屡屡不能过关。大会小会,白天黑夜,穷追猛打。不依不饶的“坦白”;没完没了的“深挖”;无边无际的“上纲上线”,弄得他们吃不下饭、睡不成觉。运动的主持者

和积极分子把他们当作“凶神恶煞”、“反动堡垒”、“披羊皮的狼”、“扮美女的毒蛇”。有些教授成了“头上长疮、脚下流脓”、“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卖国贼、特务、伪君子、大坏蛋”。这些还不算。还要逼他们“心悦诚服”自愿接受这些“光荣头衔”,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给自己头上扣屎盆子,给自己身上泼粪水,给自己编造耸人听闻的“故事”。不少人受尽侮辱折磨,有的逼得发疯;有的自杀!

原来,“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竟是如此!这些教授乃国之瑰宝,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呢。

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只是沧海一粟。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如此,受过迫害的人多得不可胜数。他们被整怕了,至今心有余悸,不敢说出真相,怕“秋后算帐”,怕遭到更厉害的打击报复。

有张大字报揭发这样一件事,是我入校前兰大发生的:物理系有位女生长得美丽非常,被校某领导干部看中,先后采用各种手段逼其就范。该生死活不从,最后跳黄河自尽了。大字报点了当事人的姓名,真实性不容怀疑。想不到在新中国之神圣大学校园竟发生这种事!人命关天,居然无人管、无人问!干这丑行的人又居然是党员领导干部!与我心中的党的崇高形象水火不容。这哪里是共产党员?是货真价实的罪犯,应依法严惩,该杀!我脱口骂道。

停课已数日,学校如一团乱麻,终不是办法。有人提出:大鸣大放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此话言之有理。于是各系、各年级纷纷成立“鸣放委员会”。(成立“鸣委会”领导鸣放应是党委领导旨意,除党委无人有此号召力。——故意设“套”。)我这小班经同学民主选举产生“鸣委会”。不曾想到的是,我居然被选为“鸣委”,这即是我命运的分水岭,从此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大家选我当鸣委,并非我鸣放积极,情况恰恰相反。个中原因我在40年后一直没想明白。党委宣布整风之时,我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座谈会;鸣放伊始直到停课,没写过只字大字报;没向党以及任何人提过一句意见。那时我入团问题正报批团委,个别人对我还有非议,说我不关心国家大事,热衷读书。即使看大字报,也是在上、下课路过偶有一瞥,事实没参加运动,是后来被动卷入的,卷入

的时间最迟。选我当鸣委,大约我当过学生代表、是《红染缸》编委之一、上台演戏献过丑的缘故吧,我猜想。真正的原因只有选我的同学自己明白。

在各级鸣委会的组织主持下,各系的鸣放会相继召开,有的会我去旁听了。新校址开的中文系、历史系鸣放会,搞得很热烈,声势颇大。化学系的鸣放大会开在各系之后,系大、人多,在昆仑堂进行。化学系一年级只有小六班史美唐发了言。

鸣放会意见提了一大堆,问题揭了一大批,动员号召帮党整风的兰大党委始终不表态、不答复。大家越来越不满,情绪越发激愤,要求中共甘肃省委派工作组来校处理问题;要求《甘报》报道兰大的鸣放情况;要求成立赴京代表团。

省委工作组来校后,原是聋子耳朵不办事,只两三日便被同学们“请离”了学校。互相推诿,皮球踢过去又踢过来。失望之余,同学们再难沉住气,要求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来校解决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

听说张仲良七点准时来校处理问题,兰大师生翘首以待。众多师生从盘旋路新校址步行一个小时赶来与会。昆仑堂早已是人山人海,不少人没有座位挤站在过道和两边靠墙的地方,会场上笼罩着热切期盼的气氛。2,000多师生等了个把小时,等得人困马乏,直到天黑尽,这位边疆大员才坐小车姗姗而来。他不是时间观念差,而是缺乏应有的礼节和诚意。会场气氛不再是期许,而是充满焦躁、不满甚至愤怒情绪。张从边门进大礼堂,我站在门边靠墙处,看得清清楚楚。他身材颇高,背似乎有点弓,是我见到的最高级别行政高官。

昆仑堂灯火通明。他刚进会场,立即被雷鸣般的口号声所淹没——

“共产党万岁!”(在当时气氛下颇有嘲讽意味。)

“要求省委答复意见,处理问题!”

“把危害党的坏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惩办迫害、诬陷的凶手!”

“外行不要领导内行,我们要求‘教授治校’!”

“要求把兰大鸣放情况公之于众,省委不要欺骗舆论!”

“为什么把新校址建在闹市区装璜门面,谁人主使?”

……

据说,张仲良行伍出身,解放大西北时是彭德怀属下的军长。“城门楼上的雀儿”——见过场面的。如今坐在台上,面对情绪昂奋的大学生,显出浑身不自在。天气很热,空气很闷,汗水从他的额头、脖颈浸出。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汗,又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同学们,请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意见已经提了一大堆,今天请书记答复这些意见,要你解决问题!”

会场又卷起一阵呼啸声——

“不准迫害教授!不准打击报复!”

“要求答复!立即答复!”

人们看到的是一副苦涩的面孔,无言以对的窘态。张仲良不愿对“任何意见”表态,不愿对“任何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他的暧昧态度、支吾搪塞举止,引起同学们更大的不满和骚动。他张口结舌,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显尽狼狈相。

他应该有备而来,何以形同白痴?我对他的能力、魄力产生诸多疑问。鸣放中师生所提意见无非三类,其实不难处理:第一类是历次政治运动受到伤害的,调查核实后,凡搞错的,在原范围内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属恶意诬陷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属腐败的,坚决清除出党,触犯刑律的依法惩治。第二类属意见正确或基本正确的,立即着手兑现、落实一、二;条件不成熟的,许以时日,积极创造条件解决。第三类是意见不正确、要求不合理的,不妨理直气壮予以回绝。指出这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党的宗旨目标背离,照此办理就会亡党亡国。党掌握几百万军队,有强大的专政机器作后盾,怕什么?只要第一书记是非清楚,态度明朗,群众积郁的不满情绪很快会化解、平息。同学们虽情绪激动,有的言辞尖刻,都有理性,是懂理讲理的。

看着张仲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顿生恻隐之心。他毕竟赴汤蹈火过，为缔造共和国立过赫赫战功。为什么此时不敢接触具体问题，鄙屑怕事呢？苍天可鉴，我真替张大人着急哩。

张仲良不是我等乳臭未干之辈，而是位老谋深算、圆滑世故的政客。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此前已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伟大战略部署。张用的是“缓兵计”和“激将法”，装得呆头木脑实乃演戏而已。足见其城府之深和计划之周详、老到。

傻乎乎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小班同学大都和我差不多，不知情又无意见可提，既然同学们选我当“鸣委”，就要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我提议将本班同学男女搭配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访问若干个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着眼于给老师以精神支持，打消怕打击报复的顾虑，做好访问记录，不加任何分析点评，尔后以大字报形式整理公布，供党委参考。我想，这也算是帮党整风尽点心、出点力。

根据一个小组的访问记录，我整理写出一份大字报，（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xxx教授访问记”，共四页纸，贴在宿舍旁边与学生饭厅之间的墙上方。大字报内容是该教授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骇人听闻的遭遇。我在抄写时，心在颤栗，在汨汨地流血！

既然张仲良亲自来校依然不解决任何问题，兰大赴京代表团便择日启程了。

三、兰大反右的第一个“牺牲品”

赴京代表团只到得西安，便被高教部以刘凯丰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截住，安排住在西安一所高级宾馆里。此时，从上海搬迁至西安的交大，因对搬迁不满，闹得很厉害。刘主要为解决交大问题而来，兰大问题尚在其次。

在西安的兰大代表团不时有消息传回校中，代表团成员每天与刘副部长辩论、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在那儿僵持着。

正值此时，新校址传来消息说，雁滩农民对大学生鸣放切齿痛恨，忽一日夜晚冲进兰州医学院学生宿舍（兰医多为女生），掀掉被子，将他（她）们拽下床，质问：“我们几十个农民供养一个大学生，用我们的血和汗。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党，共产党哪点对你们不好？”有的农民愤怒地朝学生吐口水，骂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是禽兽不如的白眼狼！

真正咄咄怪事。农民怎么知道大学里鸣放是反党的呢？报纸没有披露大学生提了些啥意见，说了些啥。连我这置身其中的人都没感觉出“反党”味道，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如果没有人潜心策划、组织，农民会来大学校园寻衅滋事？我无法想象。

六月八日，当我为此事还在犯傻的时候，更大的“地震”发生了：《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山摇地动，恍若空气都凝固了，整个大学校园人人目瞪口呆！社论言之凿凿：有人在北大党委门前安放了颗炸弹！即使不谙世事的三岁孩童也能感觉出事情的严重性。《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党的喉舌，直接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对我来说，无异于真理化身，没有丝毫怀疑，只感到震惊。这是谁干的？真正反动透顶，其心可诛！震惊之后，我又想：这毕竟是个别人所为，国家有那么多公安人员，不难侦破，将其绳之以法就是，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进行全国总动员吗？《人报》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等一大堆人名，似乎这些人与放炸弹的人是同伙，不可思议。

《这是为什么？》发表没过多久，《甘肃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整版刊发《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甘报》在张仲良、吴坚（中共甘省宣传部长）领导下，是省级地方党报党性最强、政治嗅觉最敏锐的，在整个鸣放期间，它顶住兰大师生的强烈要求，始终一字不报道兰大和全省的鸣放情况。如今，当看到北京上空的信号弹，象埋伏在战壕里的战士一跃而起，端着枪刺，向“敌人”呐喊冲锋！

“大鸣大放，帮党整风”，满打满算不足一月（我卷入只两周时间）。无论校内或报纸上发表的社会名流的鸣放言论，看不出“把共产党赶下台的狼子野心”。即使全错，不接受拉倒呗，谁能强迫（谁

敢？)你接受,何必猪八戒倒打一耙,出尔反尔,不怕失信于民?

政治家做事别于草民百姓,不怕背信弃义。于是“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既定方针付诸实施,“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甘肃和兰大党委则拿副校长陈时伟开刀,成全省第一个“牺牲品”。

反右不是鸣放,不是散兵游勇,不是乌合之众,不是轻描淡写的“意见”,不是牢骚中夹些讥讽的书生意气,而是斗争!是在党中央,毛主席亲自组织、指挥下进行的,依托强大的军队和国家机器,有泰山压顶的威武气势。

校园转瞬间化作讨伐反击右派的战场。

“粉碎右派分子陈时伟的反党阴谋:”

“坚决打垮大右派陈时伟的反动嚣张气焰!”

“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

批斗陈时伟先生的会在“至公堂”进行。屋内屋外的墙上到处贴着标语,全用的“粉碎”,“打垮”一类字眼,陈俨然一个杀人凶犯。至公堂只能容纳几十号人,参加批斗会的人都是事先挑选好的,谁主持,谁开头炮,谁重点检举揭发,谁领呼口号,在刘海声亲自指挥下,一一布置到位。屋外,隔着玻璃窗,有不少学生围观。

很快我发现,屋里与会者中,有鸣放大会上见过的面孔。曾几何时,他们对党身上的不洁现象也慷慨激昂过,怒发冲冠过。不过数日,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批判者”,又在“激昂着”,成了反右英雄。这种事即使杀我的头我也做不来。我承认他们是识时务者,是最聪明的人。低级生物为了生存,需要保护色,人也一样。不过,有的人变色速度与本领,远胜于自然界中任何一类动物。

陈先生坚决否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连错误也不承认。连续几天,收效甚微。批判会改在昆仑堂召开,扩大范围规模无非是给陈更大的威慑和精神压力。虽在刘海声督阵下,批斗会总有不尽人意处,始终没能封住陈先生的嘴巴。在回答“为何要组织赴京代表团反党”的质问时,陈先生作了自我辩护:赴京代表团

是经党委批准成立的,各系代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我是受党委和行政会议委派参与的。为何能说代表团是我组织的?我何错之有?代表团只是向高教部,向党中央反映兰大情况,反映师生的意见要求,难道这也叫“反党”?如果赴京代表团有反党行为,请拿出具体事实来论证你的命题。

有人批判陈先生买空卖空,不学无术,同样遭到他的驳斥。只见他愤然离座,回家中抱来一摞科学专著放在讲台上,气的发抖,不再吭声。事实摆在那儿,此时无声胜有声。

陈很“顽固”,刘海声和党委不乏治顽之术。接着把陈的夫人、化学系系主任左宗祀先生也划为右派,白天开会批斗,夜里布置大量人马将陈、左住宅团团围住,轮番呐喊呼叫,彻夜不停,使他们夜不能寐,意志瓦解,不战而降。此谓“精神战”或称“疲劳战”,陈、左夫妇只能受着,熬着。



至公堂,兰大反右斗争在这里揭开序幕。

鸣放中，看了许多大字报，知道存在于党员中的不少坏事劣行，却没有改变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我懂得把党和它的少数党员区别开来。世上不存在绝对纯净的东西，再好的政党也无法保证它的所有成员不干坏事。反右开始后，（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对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有了看法，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甘报》罗列陈时伟的所谓“右派反党”罪行，明显地言过其实，无法叫人信服。对他的批判不是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而是以势压人，充满诬陷和人身攻击。这些，不是个别党员的个人行为，是在党委组织、领导下施行的，体现的是整个党及其领袖的意志。有的批判到了荒唐地步，比如说陈时伟不学无术，难道他的专著是剽窃别人的？美国“金钥匙”奖的获得是骗来的？他的一级教授不是共产党政府评定授予的？如果是骗取的，你又是干什么吃的？尤其是，包围、骚扰民宅，使人无法入睡，纯属无赖流氓行径。堂堂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何须干这些蝇营狗苟之事，这是坦荡君子所为？发生在大学学府，一个本是文明摇篮，最该说理、讲理的圣地。我百思不得其解。只有在这时，我才对党、对毛有了看法，有了“不满”，并非在此之前，更非“鸣放”之前。

尽管有看法只能深埋心里不敢丝毫表露出来。但是，有人却敢大声喊出来。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左的女儿。其时她在兰州女中读高三，正青春妙龄，冰清玉洁之时。在校园里，她常骑辆红色飞鸽牌坤车，同学们常见她婀娜多姿的身影。她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女中各门功课出类拔萃，招来羡慕和妒忌。她父亲的“反党罪行”在《甘报》公之于众后，她的同学幸灾乐祸将报拿给她看，羞辱她。她看过后，将报纸在众目睽睽下撕成碎片，义正词严为父亲辩护道：“这一切全是谎言！我父亲是个高尚的人，一位学者，一个赤诚的爱国者！相信这些谰言总有一天会不攻自破。”

面对通宵达旦的狂呼乱叫，父母无奈，女儿却凭一腔青春热血奋起抗争。她冲出屋外，对着大学生们慷慨陈词：“我的父母即使有错误，还不至于触犯法律吧。如果违法了，你们可根据法律依法逮捕，并追究法律责任。你们大喊大叫究竟要干啥？骚扰民宅，妨碍侵

犯他人的休息权是违法的！你们的行为证明真理不在你们手里，不是文明人的行为。你们是有知识讲道理的大学生，我为你们的行为感到害羞，难过！”

陈、左的住宅离我的宿舍不到百米，夜夜呼喊之声清晰可闻，不绝于耳。此后忽然停歇下来，我感到好奇怪，终于从他人的口中听到上面的事，令我钦敬不已。（是年夏天，她参加高考，夺全省理科状元，却被一切高校拒之门外。）

这就是后来毛主席自己称之为他搞的“阳谋”。

四、我戴“右派分子”帽子

陈先生的批斗会开过两周光景，六月底或七月初吧，兰大党委贴出“点将台”，公布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共有二十来个，我的名字赫然其中。我眼前一片漆黑，不相信这是真的！

首批划为右派的学生，多为各系，各年级，各班的“鸣放委员”，还有赴京代表团成员（仅一人例外）：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肖藩（他是副团长）；物理系一年级学生苗庆久；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屈健英等。各班于同一时刻成立“反右委员会”，成员由党组织钦定。

我这小班反右委员有仨。在他们主持下，针对我的批斗会起初比较有章法，我有澄清事实和辩白的机会。我觉得划我右派是个天大的冤枉，是党委的一个错误。心里没鬼，不怕鬼敲门。说我胆小真个胆小如鼠，说胆大又天不怕，地不怕。我相信能澄清一切，能证明自己清白无辜，最终能得到党的谅解。

我这小班起初只我一个右派，批斗连续不断。我对“检举揭发与分析批判”，逐一作了回应。我的“反党右派言行”归纳有以下各点：

第一条，当“鸣委”，搜集、整理“反党黑材料”，充当“反党急先锋”。我的答辩是：鸣委不是我要当的，是大家选我、要我当的。成立“鸣委会”组织鸣放，不是我提的，全校各系各班都成立了“鸣委会”。谁最先成立、由谁提出、由谁批准，是不难查清的。我在鸣放期

间没写过一张大字报，鸣放会上没说过一句话。大家选我当鸣委不是因为鸣放积极。我不是什么“反党急先锋”，而是最后卷入的，这是事实。访问老师所得材料是否“反党黑材料”，不能妄言断论，它是根据记录整理写出的。我既未断章取义，更未恣意发挥，可以查证。至于被访问老师说的事是否属实，我无能力也不该负调查落实之责，我认为这是党和政府应当做的事。我没有昧良心造谣、杜撰，整理所得材料有根有据，何错之有？何况，毛主席有言在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何罪之有？

第二条“罪行”是：骂党员干部XXX该杀；对资产阶级教授吹捧，说他们都该入党。一恨一爱，证明我的阶级立场是反动的。

我对此“供认不讳”，坦陈思想。XXX是党员领导干部，正因为如此，他干坏事对党的危害更大，应从重惩治。坏事是大字报揭发的，有名有姓有鼻有眼不是我杜撰的，大家都看了，谁不愤怒？逼婚违犯婚姻法，好端端一个大学生被胁迫跳河自尽，人命关天，不该严惩？我痛恨这种人，痛恨这样的党员腐败干部，与我对党的感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能混为一谈吗？刘青山，张子善都曾是党员干部，党清除了他们，难道党对自己过意不去，党仇恨自己？这样做，正是为了党更纯洁，是对党怀热爱之情的证明。我看到教学楼通夜不灭的灯火，为教授，老师们的敬业精神、科学献身精神所感动，说过“像这样的好教授，好老师都应该入党”的话。党在我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所有党员应当是品德高尚的人，是我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我认为：为人民，为科学勇于献身殚精竭虑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理应成为这个光荣组织的一员。那些虽曾做过好事，有过贡献的党员，只要他今天做坏事，变了质，就该清除出去。我希望共产党永葆青春，更加强大，至纯至美。这些就是我的真实感情。诚然，我见的可能只是教授们好的、光明的一面，他们可能有某些缺陷甚至错误，够不够党员标准只党组织说了算。个别党员的某些行为是否真实，亦有待组织调查核实。我说“该杀”，是基于大字报揭发的事实前提。

在反右委员和积极分子看来，我越说得条条是道，便是越“顽固”，越“气焰嚣张”。尤其是，只要别人发言毕，我立即发言驳斥。我无法沉默，无法不解释，不辩论，不澄清，无法接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比天还大的冤枉。

批斗会越来越激烈。反右委员又动员同学们对我在鸣放以及平时的言行作更彻底更深入的“检举”。他们对平时与我关系接近的同学不断施压，要他们与我划清界线，以求彻底孤立我，在精神上摧垮我。这些都收效甚微。思想里没有的东西，自然无从表现。有人说我同意储安平“教授治校”观点，是篡党夺权。我答道：能者多劳，智者为师。教授治校可以少走弯路，减少时间和金钱的浪费，有利于更快地发展科教事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有什么不好？教授治校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难道教授能将高校搬到外国去不成？只要对人民，对国家有利，必然对党有利。党是人民、国家利益的代表者，利益是一致的，统一的。如果这也算“篡党夺权”，无异于指斥党心胸狭窄、寸权不让，不过为一党之私。这合乎逻辑吗？

已有知识远不足以使我掌握、占有真理，但能使我承认真理，接受真理。如果我错了，绝不固执己见，执迷不悟，我会“负荆请罪”，“引颈受戮”也在所不辞。我没有错，不只在内心即使在言行上确无“反党”，硬要我屈服认错，接受“三反”帽子，办不到！

他们不曾料到我年纪轻轻，竟是块难啃的“骨头”。这一天，终于借来“尚方宝剑”，才有了开篇的一幕。

开我的会不让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有“钦差”亲临与会，情形大不同，我一点不奇怪。非团员想入团需要积极；团员想“火线”入党需要积极；有人要保护自己需要积极；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存，人人都需要积极，傻瓜才不这么作（这样的傻瓜，冯淑筠便是之一）。钦差在，机会难得，焉有不尽情表现之理？只万万想不到，他们把老实巴交的冯淑筠也打成右派，还这般快。冯不是“鸣委”，鸣放中没写过一字大字报，没有一句感慨之辞。此前，反右委员和党团组织找他多次谈话，要他同我“划清界线”，要他“反戈一击”检举揭发我，都被他断然拒绝。非但如此，他反而说我坦诚正直，是个好

人。他这样明目张胆地为我辩护，反右英雄岂能放过他。自从我囿于右笼，要他远离我，割断来往，每次都被他“顶”回。他的划右，全是受我株连、被我所害，心里的痛楚比自己划右更甚。我和冯不是性情孤傲、惹是生非的人，同学相处十个月，我俩未与任何人发生过摩擦、红过脸，有的人为何要这么对我们？

在我这一小班，最了解熟悉我的有三个同学：张友杰、冯淑筠和L。张友杰与我穿开裆裤时就在一起，两家住同街对面，小学、中学到大学，同学13年，彼此不只了解，连相互的家庭都熟悉。张背成份包袱，“夹紧尾巴”小心谨慎万分，不可能站出来替我说什么，我能理解。其次，熟悉我的就算L了。他是我入团介绍人，刚刚个把月的事。我的家庭、身世他都知道（有的来自张友杰的情况介绍），更清楚我对共产党的真实感情。只要他说句良心话，或许我的处境可以改观。然而，他一句话不说，斗起我来更积极。他是个聪明人，政治上成熟的很，聪明绝顶。他知道，不如此，难脱掉与我的干系：你为什么介绍一个反党右派入团？立马使他陷入泥淖。他只能昧良心伪装积极，对我反戈一击，以示划清界线。不象泥鳅般滑，行吗？我对他多有怨恨，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倘若打个颠倒，明知是火坑，我也要跳下去拉他、救他，即使一块儿被烧死，也不后悔。

人啊，人！都是人，冯淑筠与L何以天壤之别，如此地泾渭分明？初涉人世交了这么两个朋友，一真一假，一善一恶，方见世道人心。

放暑假了。

第二章 我经历的“反右”

一、住在“棺材”里的人

暑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大会议，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布置就绪。我原以为暑假前的批斗已够“味”，把人

冤枉得肝肠寸断，五内俱焚！没想到那仅仅是开始，是序幕，“老鼠叨木锨，大头在后边”。

此时，毛泽东把六利六不利的政治标准，加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凡“六利”谓香花，“六不利”则为毒草。我甚觉迷惑，毛主席在号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帮党整风、鼓励人们提意见鸣放时，一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六利六不利”之说。要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显然，任何缺点、错误不能说，说不得。提意见是指出缺点、错误，是批评不是表扬，使一贯正确的人还知道自己仍有不正确的地方；使一贯英明、伟大的人还知道自己有错误之处，需要改正、完善。揭露错误、抖出问题，难免使有的人丢脸面，对想树立偶像者，无疑是种“削弱”而非“加强”。一言以蔽之，六利六不利的设置，即是：只准歌功颂德。如果此话在前，傻瓜也会缄口，再往口里灌甜汤也不喝，还提什么意见！

“右派分子”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阶级敌人。既然“反右”是对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反击，真理和正义全操在手中，“右派”个个反动透顶、面目狰狞，自在情理中。镇反、肃反后，列宁名言：“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这个“阶级敌人”此后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八月底回校，化学系和物理系全搬至新校址。男生住拐角楼，女生住一字楼。二年级住二楼，每间八人，仍是上下铺。

九月初，刘海声一声令下，党、团组织和积极分子全动员起来，不到一天时间，新校所有楼墙上贴满反右大字报，各种漫画、讽刺诗、标语，直指右派分子心脏。有强大国家机器作后盾，右派顷刻化作败叶、残云。

我从化学楼回到宿舍，宿舍容貌“焕然一新”。变化在分秒间如此大，叫我吃惊不小。我住的房门两侧贴着一副白纸对联：

摇唇鼓舌 句句恶语如毒箭 堪为右派马前卒
泼墨弄笔 篇篇黑文似枪弹 实乃反党急先锋

正中门楣上是我姓名三个斗大的字。

房间里的“打扮”别出心裁：我的床四周，靠墙的一面贴着各种标语、口号；其它三面用绳子拦住，绳上挂满各种条幅；头部位置写着：“彻底砸烂右派份子向承鉴的狗头！”反右委员 L 与我同室邻床，很凶狠地对我说：“这些条幅、标语，不得毁损。否则，后果自负！”

除一楼（住一年级新生），二、三、四楼，每隔一、两间房便有一个如同我住室相似的装扮，只是对联各有千秋。其他右派的床帷有否如我的修饰，不得而知。整个拐角楼像座墓地，宿舍象灵堂，每晚上床，只能掀开这些白纸幡帐钻进去，象睡在棺材里，我成了具活尸！

白天照常上课。每晚开右派批斗会，都在文科楼教室进行。各教室都在揪斗右派，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得整幢楼颤动。我是学校最年轻的“右派”之一，也是“气焰最嚣张”、“最顽固”的右派之一，因为我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是“三反分子”。

批斗会场布置成定规：讲台正面坐仨威风凛凛的反右委员，铁黑着脸；他仨对面是我、吕佩璜和冯淑筠。我们身后和两边是同学们。暑假前鲁丕杰（甘肃临洮人）也划右了，现在得到解脱，真为他高兴。不管怎样，少划一个比多划一个好。思想开了小差，直到反右委员吼叫我站起来，才回过神。我这小班仨右派，据说以我为首，批斗时，火力集中，吕和冯君是陪衬。我的情况与有的人不同，不是“交待不彻底”，更非“检讨不深刻”，而是拒不接受“三反”桂冠，被左派视为“反动堡垒”。他们磨拳捋袖，发誓要攻下我这个“堡垒”，他们不会放弃表现对党无限忠诚的机会，有的还指望“火线入党”呢。我越“顽固”，“民愤”越大，口号升级变成呐喊，震耳欲聋。由于对我的批斗最激烈，招来外系外年级同学围观，教室和走廊人山人海，竟使有的班批斗会陷于停顿或冷场。同班四川籍姑娘 G，对党的感情深厚，对我尤恨。只见她愤怒得满脸红紫，因个矮，跳起来痛斥我，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陕西籍 S 说：“不信把你这老牛头炖不烂，只多花几斤木炭！”我心里倍觉滑稽好笑——究竟谁是老牛头？

我才十九岁哦。

刚入学时，G 姑娘对我很热情。她特爱跳舞，学校每周六晚办舞会，她邀我。我对跳舞不会也不爱，她要教我，被推脱。她蛮有韧性，有时在周六晚饭时刻，于大庭广众之中，高喉咙大嗓门指着我说：“这位，我晚上请他跳舞！”我不悦，尴尬，偏不去，宁肯不在校吃晚饭，早早逃亡。“五一”会演要我出“角色”，她是推荐最力、最坚决的一个。我喜欢散步聊天，在僻静的小巷或在校园的双杠上，舞池一次不去。

G 有足够理由恨我，即使唾我一脸秽痰，我都受之无愧的。

每到下午课外活动时候，我和右派同学分派去打厕所，擦拭门窗玻璃和楼梯扶手，被剥夺一切行动自由和体育锻炼的权利。

仅过三、五天，我的问题突然“升级”，饭厅外贴出一张硕大的



向承鉴的漫画像就贴在背后的墙上，当时是饭厅边墙。

漫画,走近一看才知画的是我。这张漫画使我这奶臭未干的小卒,一跃而成臭名远播的“名”右派。

这张漫画毫不夸张地说,是兰大反右期间当之无愧的画王。其一是大,比我本人还高;挂的地点最显眼,正是露天电影挂银幕处,面对小操场,无人不见;三是漫画形象最狰狞恐怖;四是两边的楹联帽子之大,足使胆小者活活吓死!整个漫画画的一副骷髅,我的形象是尖嘴猴腮,奇丑无比;头戴缀有德国纳粹党徽的钢盔,脚蹬马靴过膝,腰佩长剑及地,眼吐凶焰,一颗黑心长在胸腔右边。两边对联上联是:法西斯匪徒;下联是:希特勒走卒。漫画空挡处,全文公布了暑假我给哥姐的信(请M同学转交团组织)。

信的大致内容此前已交代,是封毫无问题的家书,无非倾诉自己的冤情。我即使再傻,写有反动内容的东西能请人主动交与团组织吗?这岂不是找死!莫说我没有任何反动思想,即使有,也不会傻到如此程度。所谓政治运动,首先要造声势,人为制造出“轰动效应”,比如我对某领导干部逼死人命说了一句气愤话——这种人该杀!事后变成我要杀共产党!变成要把共产党员全杀光!哪管是真还是假,只要能“宣传群众”、“鼓动群众”,便达到预期目的了。即使把你冤枉得死去活来、七窍流血,仍然干墙上钉钉、不容你翻案的。理由大约是:运动需要你作牺牲当祭品,你逃不脱的。我的这信不知是如何与法西斯、希特勒粘连上的。难道冤枉你还要与你商量、征得你本人的同意吗?我幼稚过后还是幼稚,一辈子长不大。

大学生中不乏超级天才,从信的内容联想到法西斯、希特勒,直到创作出“匪徒”形象,没有超人想象力是不能办到的。它证明作者不愧为世界超一流的艺术大师。

我的信成了又一次向党猖狂进攻和疯狂反扑的“铁证”。据说,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该书有一著名论断:“我们共产党人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今,我有反党的事实和效果,却没有“反党”动机,鬼才信哩!这不是与毛的思想唱对台戏,是什么?同一个人又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的爱与恨从何而来?我的“反动意识”

何由产生?

嘴是扁的,舌头是软的,有的人怎么说都有理,“经”想怎么念就怎么念。到了我这儿,怎么念都不行,都成了“狡辩”、“反攻”、“反动”。无理可讲,只好不讲;无话可说,只有不说。

沉默,心里却不服。在震天价的吼声中,在歇斯底里的呐喊中,我在沉默中思考,思维全跑到另一境界。只看到面前一张张涨红的面孔,听不见他们说的什么,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

“动机与效果”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能统一?朝朝代代,皇帝老儿的主观动机都是“万寿无疆”,到头来无一活过百岁。早夭的帝王是自己主动找死不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主席要他到农村学农、工厂学工,又到朝鲜战场学军,盼望他成治国全才,好接自己的班,不想却死在异国他乡。这些“效果”与毛的动机如何统一?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捐躯刑场,他们不想看到革命胜利的一天?资本家办厂也有失败、赔得精光的,这结果是他们的初衷?若事事、时时、处处能“效果与动机”统一,共产党闹革命何须28年浴血奋斗、流血牺牲?人人都想成为亿万富翁,亿万富翁能有几人?想当总统的人多多,一个国家只有一人能实现此理想,……我随手可举出一万个“动机与效果”不能统一的例证。……我的灵魂出窍,早在它乡神游。

在所有检举中,只有两点有些事实根据,其余全是捏造的谎言。说我把党员分为三类,并“三三”开:三分之一的党员靠党混饭吃;三分之一的党员靠党整人、害人;三分之一为人民服务。虽有夸大,与我原话的意思总沾着边儿。另一是,在任《红染缸》编委时,又搞了个副刊,叫《НОВЫЙ САД》(俄文:新花园),用块小黑板将《诗刊》等文艺刊物登的有品味的作品介绍给同学们。这其中有四川诗人流沙河的《胆剑篇》,是56年底或57年“五一”前的事,不在鸣放期间。流沙河划右,我推荐、吹捧他,自然臭味相投居心“恶毒”。据说,流的散文诗把白杨喻作指向蓝天的长剑,长剑指向的是共产党!他也太胆大妄为了。

我的态度不谦恭,不该我承担的,坚决顶回去。我答道:“所有

报刊是党在领导,任何文章发表前先经党委审查通过。《诗刊》是党审批在全国发行的一级文艺刊物,并非左道旁门。抄录转载它,何错之有?有错,也不是我的错。那些审稿的人是干什么吃的,难道个个瞎了眼不成!”

与我的漫画像几乎同时贴出的大字报,较为醒目的有中文系二年级女生谭蝉雪关于“爱情自私论”的日记。谭被左派钦定为“兰大林希翎”,早已“臭名昭著”,全校瞩目。这些摘抄的日记有好多张,贴在拐角楼边门的上方。由于所有墙壁都贴满、占满了,只好从边门到饭厅正门拉上绳子,大字报挂在绳子上,俨如一条大字报长廊。我大致浏览了一下批判家的观点,只能嗤之以鼻。

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自由,在没有依法剥夺公民权之前,怎么可以搜查并公布别人的日记?爱情倘若不是自私的,难道要将自己心爱之人拱手相让、无私奉献?不知“爱情自私论”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是如何挂勾的?与“六利六不利”政治标准如何粘连?如果爱情都大公无私,岂不是真的要“共产共妻”了吗?

阶级斗争,为了打倒和消灭“阶级敌人”,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直到你身败名裂、成一堆臭狗粪。

二、“疲劳战”

白纸黑字,信的内容是“秃子头上虱子”,谁都清楚。尽管一再加大马力穷追猛打,鸡蛋里挑出骨头也难。耸人听闻、名噪校园的“希特勒走卒、法西斯匪徒”,帽子底下空不见人。

暂时的偃旗息鼓,往往是休整、积蓄力量,为更大规模进攻作准备。不愁缺材料、无事实,“罪行”会从天上掉下来。不几日我的“反党”新罪证被“揭发”出来,左派同学如获珍宝。

据说,我曾精心策划组织一个三人反党小集团,凡三次在泉水沟秘密开反党会!每次皆有时间、地点和内容。这些材料来自内部“成员之一”的“坦白交待”。呜呼,纵有三头六臂、浑身长嘴,也赖不掉!确实击中要害,叫我昏厥,有口难辩,欲哭无泪!“故事”编得有

鼻子有眼,我若说无一字是事实,全系子虚乌有,为何别人说的条条是道并将自己装进笼子里?

反右中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的,有的是。只有成为反党集团才证明有组织、有计划反党,才证明你反党的狼子野心根深蒂固。

N君是个聪明绝顶的小伙,和我同岁(可能比我还小月份),他不到万般无奈,绝不肯无中生有往自己头上扣屎盆。他承受不了高压,在“坦白从宽”的诱惑下,产生侥幸投机心理,也是人之常情。我对他有几分怨恨,更多是对他的同情,为他而悲。我更悲哀自己:为什么我想不出这种好法子解脱自己呢?

对我的批斗终于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一切火力集中于我一人之身。以往批斗,从晚上七、八点开始,一般进行到十一点就结束。如今变个样:反右委员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个小组,由教室里以班为单位的大会,改在我宿舍中进行的小会——一个小组只七、八个人。这些小组轮番上阵,轮换休息、睡觉。对我的狂妄滥炸片刻不停,通宵达旦,夜以继日,接连几天几夜不叫我合眼!此即名曰车轮战,又叫疲劳战。叫我站着交代,一站就是7-8小时;待到站不稳要栽倒,才叫坐着写交代。我不知交代什么、写什么。我很愿交待我干的、说的,以及我没干过、说过、想过的任何“罪行”,只是无法对上N的“口供”。左派们对我的耳膜拼命吼,推我的座椅,搦我的身体,搯我面前的书桌,一分一秒不停歇。即使我抖擞精神,尽最大意志,试图写“交代”,笔尖刚要接触纸面,眼前一黑,笔尖重重戳在纸上,笔尖弯了,颈椎象是断了,头颅以自由落体的运动形式砸到桌面上,“嘭”地一声!我已无法写出最简单的“一”字来。

这就是“车轮战”或“疲劳战”!它没有任何科技含量,是一种操作简便、最原始的“战术”。

倘若死的方法可以自由选择,我首选枪毙或砍头,只有几秒钟的痛苦;次选被毒气毒杀,不过半小时的苦痛;再选林祥谦的“凌迟处死”,莫过个把时辰而已。惟这“疲劳战”断断选不得。理由很简单:较前三种死法,痛苦的时间要长千倍!万倍!何以承受得了?历次政治运动有那么多人给自己编故事、造谎言,给自己头上泼屎倒

尿；有那么多名人大家跳楼跳河、自刎或上吊，他们中有大知识分子，有大革命家，我终于知道缘由了。

我此时如同落进虎口的羔羊，这虎却不愿一口咬断我的脖子，给我一个痛快。它将我噙在它口中，戏弄我，要我活着，神经健全地活着，每天定时定量地撕扯我的肉体 and 灵魂，一口一口地吞噬我，慢慢地消受我，还要叫我知道他们在慢嚼细咽地“品味”我。

我并非羔羊，而是一只“披羊皮的狼”；我的头并非羔羊的嫩头，而是“老牛头”。他们就这样“炖”我这老牛头，一炖就是几天几夜！一炖就足足炖了三个月！使我经常失去知觉，坐在椅子上尿湿裤子全然不知，浑身臊臭。打手 L 继续作践我，在文科楼北侧贴出大字报，标题是：“死硬极右分子向承鉴在宿舍里随处大小便，弄得全室臭气熏天，以此报复、毒害同学！”当即被我撕了。我无法承受这非人的折磨，已经受不了了，只盼大限早点降临。

在一个早上的拂晓时刻，乘着他们戒备松弛，我溜出拐角楼出后门入家属院，钻进一堆木头堆里（即现在兰大家属院松斋、柏斋一带），睡了个昏天黑地，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醒来约是午后两、三



大木头堆在此围墙后

点，没有丝毫犹疑，迳直去了兰州火车站对面的派出所，这是我早盘算好的。

派出所一位满口兰州方言的中年汉子接待我。我告诉他，我是兰大右派学生，因罪孽深重前来投案自首，请派出所收留我，或将我遣送至看守所、监狱。这位中年人问我是哪省人、多大岁数、兰大哪个系的，我悉数告诉他。没想到他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似乎他什么都成竹在胸，说：“你还是十八、九的毛孩子，生在福中不知福。你们兰大是全国重点大学，化学系更是全国出名，你是赶上好时光了，人民花钱培养你，多不容易呀！你们不好好读书还要胡说八道，给你一个教训应当的。不过你也不必想得太严重，谁又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厉害、轻重，难免说过头话，只要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了就好了，就没事了。回去吧，别耽误了你的学业。”

两月来第一次听见人话，心有几分感动。只是，他对大学校园反右的残酷性概然不知，好象我不愿当大学生而选择当犯人似的。自以为社会阅历丰富的他，把“问题”实在看得太简单，比起我的幼稚来并不“成熟”到哪里去。

我已横下心，宁愿当犯人，吃劳改饭，舍此无法摆脱“疲劳战”的折磨，非死在他们手中不可。因此，反反复复请他收留我，跟他“泡蘑菇”。他说：“无单位向我们递报批材料；无群众检举；又无上级的指示，我如何能收留你！”直泡到日沉西山，还是遭他断然拒绝。以前想问题确是太简单，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想当“犯人”也不容易哩。

我离开派出所，想到死。这念头已萌生快一个月了，如今忽然离我很近很近，就在眼前。我伫立在兰州火车站东端的岔道口，蒸气机车不时从我旁边驰过，有的机头喘着粗气，喷出的蒸汽罩住我全身，只要跨前一步，我立时会粉身碎骨成一团肉泥。可是，物理系那位女生死了，逼她跳河的人仍然官运亨通，没受到任何报应，如果不是“大鸣大放”，几乎没人知道。“思想改造”运动中那些上吊自杀的人，多数背着‘畏罪自杀’的恶名。我死了，兰大从此少一个

“右派”，多一个“畏罪自杀”的人，如此而已。这世道太不公！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至少写好遗书，告诉亲人我是清白无辜的，不是“畏罪自杀”的。

回到学校，回到宿舍。L朝我瞪着一双死鱼眼，定定地审视我；我也朝他定定瞪着，眼光也不柔和，谁都没说话。

利用上课时间，我快速地写了三封遗书和一封短笺，遗书是给死去的母亲的；一份给父亲，另一份是给兄弟姐妹的；短笺是给××姑娘的。我把它们放在贴身内衣口袋里，象完成一件壮举……。这下好了，我可以随时奔赴黄泉，最爱的母亲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怕谁？

三、孙自筠和冯淑筠

事后听说，在我失踪的时候，反右委员发动同学四处寻找。有的判断我已经葬身滔滔黄河浊浪中，谁料我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知何故，对我的“疲劳战”停止使用，又恢复晚11时就结束的大会，明显地，L和同室的人加强提高了对我的监视和警惕，只要我床上有点动静，或翻身或解手，有人故意咳嗽，象是暗示：我醒着呢，你可不要胡来！想不到，踩在脚底的一只蝼蚁，竟使有些人睡不安寝，“英雄”原不过是真正的胆小鬼。会上，我拒绝“检讨”，拒绝回答“问题”，会后我拒绝写任何“材料”，豁出去了。

并非我冥顽不化。在整个“鸣放”期间，属于我的问题只有一个：同意教授治校观点。当时，我这小班没有一个不赞成教授治校，无人对此持异议。对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大量党风不正，谁个不气愤！只是他们见风使舵、变色快而已。大智若愚，大奸若忠，大伪若真，大恶若善，几个打手才是丧尽天良的害人精。

我原以为凶神恶煞全叫我撞上了，“右派”中我受到的“待遇”最“优厚”，很快发现有人受荼毒可能甚于我。

饭厅旁露天电影场地平时是个排球场，有个主裁判坐的高凳。有下午五点光景，我上完课路经此处，目睹一幕闹剧——中文系

三年级一群人正在穷追不舍围剿一个“右派”。这“右派”我认得，叫孙自筠。他反右前是中共支部宣传委员，调干生，人长得很漂亮。很明显，排球场并非批斗会场，他是逃出会场被大家追赶到此的。一帮人将他团团围住，狂呼乱叫，有的气势汹汹抡胳膊，七嘴八舌在愤怒质问他。他急了，噔地跳到那只高凳上呼起口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再好的口号从“右派”嘴里出来，味道全变，左派有的说他在讥讽党和领袖，在继续作恶放毒！有的说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比其他“右派”更阴险、毒辣，更可恨更危险！这帮人在高凳下疯狂地扯他的裤腿，拖他的脚；有的骂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无心看戏，自己原是悲剧主角，只瞥一眼，不知后来是怎么收场的。过不几日，校园传闻孙于半夜敲破伙房玻璃，钻进厨房拿菜刀把自己的舌头剁了一截！

孙自筠的自残，象股冷飕飕的寒风直透我的后背。我钦佩他的胆识，他找到“右派”的“错误”根源。人没有舌头，不会说话，那该有多好！汉字的“狱”字造得出神入化，聪明人早得到启示，可惜我太愚钝，悟得迟了。

淑筠君我每天能见到，上课时，“右派”一起劳动时，以及以班为单位的斗争会上，但始终没有开口说话机会。一天午夜时分，在浴室里间我与他同时入厕偶得相见。我有多少贴心话要对他讲呵！不是串供，无供可串。我俩都心怀坦荡，光明磊落。我对他说：“我已万劫不复，政治斗争需要‘敌人’，需要对立面，我是铁定的要当作‘牺牲’的。你不同，你不是‘鸣委’，又没说一句错话，只因不愿与我划清界线，对我‘反戈一击’招来株连。如果你还认为朋友，就该接受我最后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要为我殉葬！你是有妻小的人，妻子不能没有丈夫，孩子不能失去父亲！你应立即向我开炮，现在还来得及！我已有‘要把共产党杀光’的恶名，再大的‘罪过’也



1956年冬的冯淑筠

背得起。你可以‘检举’我要杀人放火！要炸党委！要炸天安门城楼！我决不怨恨你！”

冯淑筠提着裤子，站在我面前，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你的一切要求我都尽量办到，惟这要求我绝对做不到！依年龄我可作你的兄长，我已是孩子的父亲，我懂得怎样做人。我了解你的身世、为人，知道事情的全过程。要我向你的心脏再楔进一把刀子，这种出卖良心的事，我宁肯死，不会干！”我跪在他面前，抱住他的双腿，苦苦哀求他。他竟然“铁石心肠”，断然回绝我。

“谁忠谁奸，谁善谁恶，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相信这一天总会来的，你一定要熬过这一劫。”

我的话一字听不进，倒反而来安慰、鼓励我，我真“恨”透他了。

冯君淑筠，河北省南宫农村人，中等个，年龄大我四、五岁，此时已是孩子的父亲，说一口河北方言。大家平时相处都不错，冯对我更亲切，如我是他的亲弟一样。

56年冬天，学校组织同学赴兰炼参观。那儿正在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兰州将成为全国化学化工中心。等待埋入地下的管道直径有两米粗，人能昂首从中穿行。那天，地上积着厚雪，天上飘着雪花，我的棉鞋湿透，晚上放在宿舍的火炉上烤。天亮才发现一只棉鞋烧掉了半拉。冯君硬把他的让我穿，自己穿单鞋。饭厅门前与宿舍间有块冰场，面积不过20平米。每见北方同学滑冰，那么痛快尽兴，好生羡慕，决心学它。我性急，恨不得立马学会，连晚饭都顾不上吃，直练到天墨黑，前后两、三小时。冯君一直相伴相守。我不知多少次人仰马翻，后脑勺、屁股、手掌摔得生痛，全跌肿了，直到基本学会。我意犹未尽，星期天要去黄河边找大场子滑练，把瘾过足。又是冯君陪我，如我的保护神一般。河边冰薄，还不曾试脚，一只脚踏进冰窟中。幸亏冯君赶来相救，帮我把腿拔出来。棉裤腿精湿。他又帮我烤，忙大半天。上大课占座位，领讲义，事事他都想着我。

我俩觉得丢掉学了多年的英语太可惜，要把它重新捡起来。星期日我俩在省图书馆度过。那儿环境安静，还备有免费的茶水。

……我一生一世忘不了他！

熬，终究是要熬的，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死！熬过精神的荼毒，还有物质生活的折磨等我去承受。

两荤一素一汤的日子勉强过了一年，新学年伊始，各人按各自情况到膳食科买主食和副食票。最要命的是，“右派”学生的助学金被宣布一律取消（我记不清具体时间，大约在1957年10月吧），我的生活一下子掉进冰窟中。这自然合情理的：人民的血汗钱岂能用来喂养“反人民”的“狼崽”！

其时，我姐、姐夫、我哥都在北京工作，若向他（她）们求救，或许能得到支助。我不愿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父亲和亲人，怕增加他们的痛苦，更担心受我的影响和株连。由于血缘关系，要使亲人们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设法尽量减少它。倘若亲人或多或少给我以支助，我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纵有千张嘴，也说不清楚，我的“罪”只能自己消受。

饭厅两层，二楼是教师饭厅，底层是学生饭厅。开饭时分，学生排队打饭，拥挤不堪。为方便教师用餐，底层除正门外，后边还有个后门，那儿有个楼梯间可直达二楼。楼梯间与学生饭厅连通，约10平方米大小。人既然分“派”，饭厅自然分“等”，这小楼梯间，即成“右派”学生的专用餐厅。开饭时，数十“右派”不约而同端着盆碗蹲踞在此，一个挨一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碗里都是酱油浇米饭，或者馒头夹辣酱。这些“右派”同学与我一样，只吃主食，无钱买菜。所幸的是，当时学生饭厅备有公用的调味品：辣子酱、酱油和醋，各储在带木盖的小瓮中，不要钱，可随意取用。吃米饭，往米饭上泼一勺酱油再加点辣酱，味道倒也不错；若吃馒头，将馒头掰开，内中夹着辣酱，也算可口。

大饭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那儿有饭桌，有椅凳，那儿个个吃得油头油嘴，大声喧哗，发出矜持的笑声，脸露骄横得意之色。大饭厅与楼梯间近在咫尺，气氛迥异，有如两个世界。小小楼梯间拥挤着数十“右派”用餐，无论认识的或不认识的，都不打招呼，个个冰冰的，木木的，陌如路人，形同哑巴。右派分化很厉害。出于生存本

能需要,有的特别关注其他右派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向左派和反右委员打小报告,以求立功自赎。几乎人人有教训,心照不宣。不过,时间一长,我在此还是认识了许多原先不知姓名的右派同学,其中有赫赫有名的赴京代表团副团长肖藩、成员之一屈健英,以及谢成、李克家等外系的;化三的胡学忠、史凌霄;还有同级不同小班的吕绥生、邓德银、翟所迪等等。“右派”饭厅还有个唯一女性,是物理系的,大约与我同届,个儿不高,戴付深度近视眼镜,在这儿与男右派一块儿用餐几个月,没有与人说过一句话,影只形单,象个植物人。我想:她内心的凄苦和承受的精神压力,一定更甚于我。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家,一米九几的大块头,物理系二年级,原是校篮球队主力中锋,球场上左冲右突,骁勇非常,全校都认得他。他的饭量何其了得!每顿吃八个馒头(每个二两,合100克),正好是我的一倍。馒头中夹的辣酱很多,从里面流出来。他动作极快,一个馒头只四五口就“消灭”了,嘴巴、腮帮都沾上红红的辣酱,头上沁出热汗。那种狼吞虎咽的“香”吃,即使再无食欲的人见了也会生出吃的激情来。

将近一学期的时光,我没有沾过荤腥,连五分钱一份的土豆丝也没买过。严重的营养缺乏,巨大的精神压力,极度的睡眠不足,身体早不堪重负,终日头晕、眼花、耳鸣,象轰炸机在耳畔轰鸣,视力混沌模糊。尽管如此,我仍坚持上课,竭尽生命之力。“右派”同学此时上课,都坐在后面座位,我顾不得这些,偏要抢占前排座位。不如此,我看不见黑板上写的字,听不见老师的声音。课毕,拖着沉重的步履蹒跚回宿舍。一路上,我得十分留神,以防被碰倒甚至被风刮倒,身子如同风筝,随时有断线扑地可能。

我终于奇迹般地熬过了1957年这个旷世不经的寒冬!

四、世上没有救世主

寒假,最迫切的问题莫过填饱肚子。我几乎断顿,连买主食票的钱也没有,每顿只吃一个馒头。批斗已榨不出油水,幸好再无人

纠缠。学校对面“一只船街”,是兰州33中所在地(又名兰大附中),我去那儿挨家挨户出售自己,终于找到两家顾主,一男一女两个初三学生,给他俩补数、理、化,每周各三个下午,条件不高,只要管饭就成。主人对我很满意,夸我细心、耐心,讲得透彻明白,我不但混饱了肚子,还得到额外金钱回报。我把其余时间用来复习功课,以补偿耽误的学业。说来奇怪,半年的批斗熬煎,并未使我思维紊乱麻木,相反,自学能力感觉大有长进,学会逆向思维,考虑问题成熟许多。在学生家中受到两家人的礼遇,由兽的世界又回到人类社会,有了人的尊严。皮包骨的身体也得到一定的康复,整个寒假我过得充实、惬意。

新学期开始,反右已是强弩之末。校园里虽时有咆哮之声,也是稀稀拉拉,不过胜利者打扫战场所逞的余威,早没有昔日壮怀激烈的情愫。大多数“右派”的“罪行”已尘埃落定,等候发落。反右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指向中右分子、中间分子,要他们“向党交心”,检查检讨在“鸣放、反右”中的态度、立场,交待与“右派”的关系,以及批判“白专”道路等等。如我所料,M君成“双反”重点,受到严重冲击,尽管批判比批斗温和得多,日子也不好过。她是个纯真、坦诚的人,我的心隐隐作痛,有几分歉疚。我也感到欣慰,因为采取断然决绝态度,不致使她蒙受更多屈辱。

有天下午,化二右派都在接受惩罚性劳动:给化学楼打扫厕所。小六班有个J右派,生着酒糟鼻,红红的,不论春夏秋冬,鼻翼上都冒汗。史美唐走近我跟前悄声说:“他是一条狗!”此前我一直迷惑,右派同学一起劳动,谁个积极、消极;谁个发牢骚抱屈,都遭批斗。这“包打听”是谁干的?

我学乖了,颇能吸取教训,恨不得象孙自筠那样,割掉舌头变哑吧,免被“狗”咬。J虽善于伪装打扮,大家很快心知肚明,人见人躲。“狗”没过多久也就成了狗屎。

由于取消助学金,生活陷于困境的“右派”同学大有人在。个别入无奈之下动起歪点子,有偷别人饭票的;有偷自行车卖的,此后都相继被“侦破”遭到严厉惩处(他们由“右派”变成“罪犯”,被逮捕

判刑,少的两、三年刑期,长的判五年以上。)。这条路我是不会走的。化三的胡学忠、冯淑筠和我不谋而合,决定星期天到建筑工地打短工,走自救之路。

与家属院隔条马路的和平饭店,正施工兴建。工地头头见我仁是年轻小伙,满口答应。

工长分配的任务是,给泥瓦匠师傅挑运砂浆,每人供应两位师傅需用。三人中惟我年龄轻,体质弱,受摧残最重。虽说寒假得到喘息,犹如大病刚过,远未痊愈。和平饭店已盖到三层,挑两铁桶砂浆走到竹排搭的梯子上,颤颤悠悠,晃晃荡荡,十分吃力。甭看两小铁桶砂浆不起眼,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砂浆距施工楼不足百米,挑着它爬楼实非易事,我每趟都得拿出浑身力气和最大意志力。起初两趟,鼓足劲一口气挑上去,累得满身大汗,眼冒金星,腿肚子发软打颤,很担心虚脱从梯子上滚下去。我只得中途小歇一下,然后再挑上去。砂浆很快告罄,师傅叫喊要料。在这种时候,胡学忠不请自来,不要扁担,一手拎一桶急急追上来,帮我“救火”。

我与胡学忠此前素无来往,从此对他有认识。无论年龄、学识、做人,他都堪为我的学兄、楷模。他祖籍四川,当时借母亲住武汉市。中等个头,肩宽体壮,圆脸、浓眉、大嘴,上唇一绺整齐短髭,隐约络腮胡,性格豪爽,是兰大不多几个拳击运动员之一,生就一副铁骨钢筋。他豁达、乐观,几乎看不到反右运动给他精神、肉体留下的任何伤痕。他挑两小桶砂浆如同游戏一般,嘴里常哼着四川小调,每隔一段时间就帮我两桶。上午下午各有三、四次。冯君原本单薄瘦弱,“泥菩萨过河”勉强应付任务,已是浑身解数用尽。

胡兄这样帮我,完全是主动、无私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应该”,“右派”中不乏这种热心肠的人。冯淑筠也是这种人,他若有能力,不待我开口也会这样做。这反而增加我的愧疚,就我的本性来说,总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不愿当弱者接受帮助。我尽力缩短中途停歇的时间,后来改为挑两个大半桶不停歇试图提高效率,效果差不多。科学证明有多少体能做多少功,增加体能需要锻炼、积累,不依主观意志决定。唯一能做到的是早上和中午提前上班,在

师傅未开工前把泥斗挑满,尽量减少给胡兄太多的负担。后来体力有所提高,但楼层也在加高,劳动强度越来越大。在长达一月多的星期天打工中,我始终没能做到“自食其力”,直到最后还需要胡兄帮我一、两趟。和平饭店主体工程竣工后,我们仁又承包整幢楼清垃圾的任务。各楼层、房间的垃圾并不多,无非断砖、木屑、砂浆渣之类。这活计比预期的要困难,主要是水泥砂浆渣粘连在墙上、水泥地板上难以剥离。胡兄建议分工,由冯兄先将易清除之物用铁铲从窗户扔出去;那些粘连的砂浆块由他来对付;我负责最后清扫,既可避免相互影响少吸灰尘,又可提高功效。胡兄不知从何处借来一把钢钎,一头尖一头弯曲扁平,既当钢钎用又当撬杠用。粘连甚牢的水泥块,无论大小,一碰即脱,事半功倍,极大地提高了工效。

这一天,我们仁都只穿条裤衩,戴个大口罩,从早干到天摸黑,中午啃几个冷馍,足足干了十三小时,把整幢楼闹了个天翻地覆,到处尘土飞扬,到处“劈哩啪嚓”,汗水干了再湿,湿了再干,都成了非洲黑人。当我们请来工长检查验收时,他大吃一惊:“想不到你们动作这么快!这样的工作量,通常三个工人干三天才能完成。”

洗了澡,我们直奔悦宾楼(当时是兰州最好的一家餐馆),要了好几道菜,美餐一顿,解了一年的老馋。天道酬勤,我们终有所获。

在这段相处的时光里,我们不曾说过一句与政治相关的话,不曾提一字鸣放与划右的事,个人铭记教训,心中有数。回校路上,胡兄突然说:“我大约在校时间不长了。对我们的处理,依我估计很快会下达。但愿你们能留校继续完成学业,我祝你俩好运。”

表面看来胡兄无忧无虑,谁知他内心的凄苦呢。

我能遇到胡学忠君,幸甚,对“患难之中见真情”有了更深体味。

五、万壑千山有穷时

张我权先生原为化学系秘书,是系主任左宗杞先生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得力助手。他划右后,1958年3月(时间记不准了)以“现

行反革命”罪遭逮捕，是兰大第一个被抓法办的右派。

抓捕他的时候，我正在化学楼边门侧旁的实验室作化学实验。忽然门外开来一辆中型军用吉普，车上跳下四、五个军人，急匆匆朝楼上奔去。只过一会儿，这几个人夹着一个用白布单蒙住全身的人，将他塞进车里，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心里嘀咕：不知抓的何人，因何事？直到作完实验出来，发现满校园张贴着标语：

“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

“拥护人民政府逮捕现行反革命张我权！”

“提高警惕，严厉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的红色江山万岁！”

校园里充满肃杀气氛，似乎刚沉寂没几天的日子又要翻江倒海。根据自己的经历，人说鸡蛋里挑骨头，现在何须“挑”，可以明白无误地指斥鸡蛋原本是骨头，我也得有精神准备，横祸随时可以从天而降。不过，类似的抓捕并没连续发生。直到四、五月份逮捕中文系学生肖藩，才揭开大规模处理右派的序幕。

肖藩自57年冬始，因无钱买书，成了新华书店的无钱买主。与他有类似行为的还有中文系的李xx，肖与李先后遭公安局逮捕。此时我与肖藩颇熟，他在捕前已得知情况，写了家书托我寄给他的亲人，我照办了。他被抓走后，学校在饭厅二楼举办“肖藩罪行展览”。他从新华书店拿的书果然不少，有好几十本，多是中外文学名著。虽然我羞于此举，但毕竟情有可原，何况是书。古有“偷书不算偷”之说，如今不敢有此奢望，惟愿政府手下留情，对他从轻发落。

没过几天，李xx也抓了，同样办了个“展览”。偷饭票的、偷自行车卖的“右派”也都逮捕了。

但凡“右派”，只要牵扯一点儿“刑事”，通通逮捕法办。听说肖藩判了10年有期徒刑，政府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新帐、老账一起算。

五月间，终于把右派处理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党的政策是：

右派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凡事走群众路线是党的一贯宗旨，据说，这样可以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意愿，保持政策的正确性。

对我的处理在班上首先讨论。除了本班同学外，小六班的沈xx应邀出席。沈是调干生，中共党员，党支部成员，是代表党的一级组织与会的。

反右委员L首先宣读关于我的右派问题最后结论，然后征询我的意见，要我在结论上签字。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允许我开口说话的这一天！多么不容易啊。不管如何处理，必须澄清事实，对自己负责，这是早盘算好了的。我感到好奇怪，结论中只字未提泉水沟三次反党会的事，没提反党小集团的事；只字未提“要杀共产党、把共产党杀光”的事；更没“法西斯匪徒、希特勒走卒”和那封信的内容。因为这些，我身心俱废，到头来全属虚妄！因为这些，我受到“法西斯匪徒、希特勒走卒”的折磨，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痛不欲生，如今不了了之，天下哪有这道理！

“我不能签字！”我回答。

“为什么？这些结论都是你以前交待、承认了的，为何不签字？”

“这很简单。是你们逼的，不是我思想原有的东西。你们中任何人，在相同的高压下都会和我一样，叫你交待、承认什么，都会乖乖地交待、承认的。”

“教授治校难道不是你同意的观点？”

“教授治校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没这水平。我同意教授治校并没有反对或不要党的领导这一前提。鸣放中，请问你们哪一个站出来表示过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观点？没有，一个没有。我何错之有？”

我的话很不策略，打击面太广。我顾不得这些，不得不吐。这使所有左派都有了右派之嫌。反右委员面面相觑，一些人忙不迭洗刷自己，痛斥我“顽固不化”，“戴花岗岩脑袋”。会场一下炸了锅。

“你把班上同学分成小组拟制访问计划，你是鸣委，写了篇访问录，是不是事实？”

“当鸣委是你们选的，为什么要选我？问你们自己。党委再三再四号召鸣放，向党提意见，提意见的人何错之有？意见不正确，你不接受拉倒，谁也无权强迫党非接受不可。搜集、整理意见没加油添醋，错在何处？”

“你赞赏大右派流沙河的《草木篇》，在同学中大肆宣扬、兜售，该当何罪？”

“这更不是政治问题，是我个人文学欣赏能力、水平问题。我看不出、嗅不到那里面的白杨——长剑是指向党的。只怪我嗅觉不灵、文学修养差。难道这是错误、罪行？如果有错、有罪，罪在《诗刊》主编、审稿者身上，你们先去追究他们才合理。待到把审稿的、出版发行的全抓判了，再来追究我不迟。”

一句话：不是我的问题，一概挡回去！

L对我虎视眈眈，从眼镜片后露出狰狞的凶光，咄咄逼人道：“这么说来，在整个鸣放中，你的全部言行都是正确的，你洁白无瑕，完美无缺！反右运动把你冤枉了，我们全搞错了？”他嘲讽地质问我。

没想到他还有脸说话！

“是的，大体说来如此。我不敢说自己洁白无瑕，更不敢承受完美无缺。我是个浑身瑕疵，毛病多多的人，却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我没有丝毫这种意念。”

会已经无法继续下去。L宣布：

“现在请同学们发表处理意见。”

发言者有的说我继续“放毒”，攻击“反右”运动，全盘否定党的“反右”政策；有的说我是“毒蛇”，是“十恶不赦”的、穷凶极恶的、最顽固、最猖狂的“阶级敌人”……总之，仅我的冥顽态度，足够处我“极刑”——极右份子，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沈xx此前一言不发，只默默地审视着我。直到大家要求给我最重一级处分后，才代表党支部作了总结性表态。如其说是表态，不如说是对我最为严厉的警告和威胁。在事过近半个世纪的今天，犹萦绕在耳旁。他说：

“你是个死硬份子。我们知道此时你在想什么，你抵触、不满、怨恨，对每个批斗过你的人，对党、对政府，你怀恨在心。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人民的江山，是铁浇铜铸的，如果你胆敢碰它，将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他的话象针扎在我心上。当他要我在处理意见一栏签字时，我毫不理睬，昂首挺胸跨出了教室。

当“开除学籍”的群众意见通过的时候，虽有思想准备，仍叫我痛彻心扉，心有不甘。听说最后处理决定由学校裁定，思谋再三，第二天一早我跑到校长办公室，请求见林迪生校长。

校长办公室一位女干部接待我，询问我的一些情况后，有意劝阻我。在我的执意坚持下，她还是去请示了林校长，并得到允许。

林校长坐在沙发上，手支着头，似乎正沉思于某个问题。见我进来，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我坐在那儿。我有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气色很差，面容憔悴。耳闻比他级别低得多的刘海声正纠集一伙人向他发难，批判他思想右倾、反右不力。在这种时候我来找他，会授人以柄，确乎使他为难的。没办法，逼到悬崖上，我不得不求助我信得过的老校长。林校长问了我的姓名、系、级，作了记录后，便不再吭声，一直默默地倾听我的陈诉。我诉说了我的身世、家史；坦陈了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行表现以及被打成右派的由来，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这中间因为情绪激动难免有过激之辞和“放肆”的时候，林校长一直微闭双眼认真的听着，不曾插话打断我，没有推脱、敷衍我的意思。

直到我一古脑儿把我要说的话和盘托出，林校长才说：“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任何时候要始终如一地相信党。”回到宿舍，心里嘀咕：“这是句冠冕堂皇的话。这种样子，叫我如何正确对待、又如何相信？”（直到20年后的1978年，林校长还与吕绥生谈到这件事，一直没忘。只是他把吕当成我了。）

不几日，对右派分子的群众处理意见在文科楼阶梯教室的外边公布了，化学系二年级只我和史美唐是“极右”，受“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最严酷处分。受这一处分还有肖藩（此前已逮捕），屈健英

等人。对右派的处分分四个等级，除“开除学籍、劳动教养”（教工则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外，次一等为“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以观后效”；再其次是“留校察看”；最轻一级只戴帽子，免于处分。受最重和最轻处分的右派人数都少，中间两级处分的占多数。

走群众路线是党的宗旨，“群众意见”“开除”，更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和史美唐不再去上课。史是上海人，在小六班。

六、离校前的日子

我已坚持到最后一刻，再去上课，给人“死乞白赖”感觉，非我所愿。冯淑筠、吕绥生、邓德银、翟所迪等受“留校察看”或“免于处分”的处理，前来安慰我。我对他们坦言，今后将谢绝看望，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愿他们努力功课，学有所成，在今后做人中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惟史美唐与我“同病相怜”，待同学们都去上课了，他就到我宿舍来。说实话，开初我对上海籍同学颇怀偏见，认为他（她）们身上多少有“骄娇”二气，史大约也不例外。经过两次交谈，才知史美唐的底细。

史出身于上海一家纺织资本家家庭。上海解放前夕，父母动员他和妹妹一道移居香港，许诺他读英、美任何一所他想上的名牌大学。他不稀罕世界一流大学，心怀祖国和民族，执意投身革命，为新政权效力。最后闹翻，与父母亲决裂，上海一解放就报名参军了。在解放军这所大熔炉中，他经受了考验，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有一次在河南某地抗洪抢险中，奋不顾身跳进滔滔洪水中，以身躯堵堤决口，荣立三等功。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实不在我之下，而在我之上，令我十分感动。将心比心，与父母亲决裂，我不一定能做到。

1955年复员转业，经过一年补习，与我同时考入兰大化学系，



1957年的翟所迪

足见功底甚好。

史美唐的事震撼了我，他比我更不容易、更冤枉也更不幸。他为了献身革命，主动放弃优裕生活条件和灿烂的前程，不惜割断与父母的亲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我是“自来红”，饥寒交迫的家庭困境和沉重的阶级压迫使我理所当然成为“革命人”；他出生入死、立过战功，我只是第一任少先队队长，无功可表；他获罪“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不可能去香港或国外，以后根落何处？他是真正众叛亲离、孤苦伶仃了。我劳教后至少可以回家与老父亲团聚，并能得到父亲的理解，而且，我坚信我的姐姐在骨子里是理解他们的弟弟的。

听了史的经历，竟然忘了自己的痛苦和悲哀，比之于史美唐兄，我是个很“幸福”的人。我拥有的这一切他都没有，我应当“满足”。

我为史美唐的处境忧心忡忡，为他感到真正的悲哀。

史君，圆脸，肤色极佳，白里透红，人长得俊秀，一表人才。表面看，他的年龄并不比我大。他在系鸣放会上的发言，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当之处，谁料竟划他“极右”，受到最高级别的处罚。

我告诉史君，群众讨论后，第二天我找林校长了，并把谈话内容大致向他做了介绍。他说：“你做的对，也找准了人。”史对林校长的评价与我不谋而合，认为林是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位有良心、说话算数的人，只是能力有限。他深信我的这次谈话会起作用。

“那么，你不认为也应该去找林校长谈谈吗？”我试探地向他提出建议。

史君对我苦涩地一笑。“我比你大三、四岁，甭看这三、四岁，有时很重要，我经历的、体会的，你没经历过，体会不到。我和你不一样，你出身好、根子正，这一点非常关键。我出身不好，再申述也无人相信，即使林校长相信，也不敢在桌面上替我公开辩护。我的出身犹如胎记，不可能洗刷掉，将终生陪伴我。尽管与父母登报声明脱离关系，仍然脱不了‘阶级仇恨’，我把心剝出来也无济于事。”

呜呼，原来如此！我无话可说。

1958年六月中、下旬,中共兰大党委公布了对右派的最后处分决定,果如史君所料,在200余教师和学生右派中,几乎都按群众讨论意见未作改动,惟我有“罪降一等”的宽大。

教师、学生总数不到两千的兰州大学,划右200余,超过中央下达的5%的指标百分之一百多,胜利完成反右任务,刘海声功莫大焉。区区如我之学生辈,政治需要用作“牺牲”,并不足惜。可惜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教授。一级教授、副校长陈时伟被开除公职,遣送夹边沟“劳教”去了。

六月的某天,受“劳教”处分的右派走了,走得悄无声息,不知是捆绑的还是押走的,戴手铐刑具没有。直到一年后我才获悉,史美唐的劳教地点就在兰州市内,四面高墙,墙上有电网,大门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把守。这分明是监狱!“劳教”并未量刑、判罪,也没剥夺公民权,何以竟如此对待?

我保住了学籍,不幸中之幸。毕竟“以观后效”给我留有重返学校完成学业的希望,好友大都为我高兴。谈话中,大家帮我总结“教训”,批评我秉性太刚直、太爱憎分明、太嫉恶如仇、太不“灵活”等等,叮嘱我今后不管遇到何事、何种情况,都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管住自己的嘴巴。

由几个好友凑钱,冯淑筠出面张罗,为我缝制了两套“蚂蚁布”劳动服,还为我准备了一个缝补的针线包。翟所迪君又塞给我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把我自己不曾想到的都替我想到、准备了。

离校前的晚上,冯淑筠、吕绥生、翟所迪前来与我相伴,买了两只烧鸡,每人半只。我们在一只船、铁路新村的小巷里,边吃边聊,直到深夜才返校。他们异口同声道,人多眼杂,明天不便前往车站送行,这算是提前为我饯行。

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前思后想,一夜无眠。大学勉强读了两年,一年在血雨腥风中熬过。从鸣放到反右,由翻手为云到覆手为雨,不谙世事的我由人变成非人。大学生咋看起来个个天真纯洁,到关键时刻,各种点子都有,千脸百面显出。有嫉妒别人女友漂亮能干的,有“挖墙脚”使绊将人推下陷阱的。中文系某班有七个女

生,她们的男友全成“右派”,反右后都跑到反右英雄怀里。有的为达到入党目的,需要“垫背”的;有为毕业后能留校或分配到好的单位,不惜将竞争对手打翻在地……,反右是天赐良机,有些人自然不会放过。

同学间友爱、和谐的氛围没有了,代之以冷漠、猜疑和互相戒备;坦诚活泼的交流和辩论没有了,代之以沉默寡言和见风使舵、模棱两可;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学风没有了,代之以政治红是唯一香饽饽。右派学生政治课规定一律不及格,其它功课即使学得再好也只能及格。教师若评“良”等级,就有“同情、偏袒”右派之嫌,要承担政治风险。有的人学得再差,教师也得送其过关;不敢给他‘不及格’。学生明分三派,壁垒森严:左、中、右(或红、白、黑)。在红类中又有大红(党员)、红(团干和入党积极分子)和淡红(一般团员);在白类中有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反右消极和右派有牵连的;在“右”中,处分分四个等级即是四个级差。三等十级,大班小班同学俨如梁山好汉在忠义堂排座次,每人心里都明白自己的“斤两”,焉敢“僭越”,惟看人脸色行事而已。校园人际关系已达空前虚伪程度。

人类史之前,曾有过“冰河时期”。由于地壳和气候巨变,造成大量物种消失,恐龙的绝迹仅是其中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经历过巨变时刻,它使许多人消失,使这个民族的许多精神荡然无存。

这是1958年七月上旬我离校前的校园情景。我即使已变麻木,还是切身感觉到的。你为兰大的未来,为祖国的命运、党的事业而忧心吗?确实有一些。可是,你已经是兰大、是党的弃子了哇!不错。可我还是炎黄子孙,无人能开除我中华民族的族籍。你这人终不改赤子之心、傻子之愚,真的不可救药了!可是……可是,谁又怜悯你的生死未卜的命运,谁为你喋血的青春而哭呢?你连自己都顾不了,还操这些闲心作什么?……。

反右终于偃旗息鼓告一段落。它令左派、右派和所有运动中的人心力交瘁(此后才知,我离校后兰大又补划了一批右派,他们被

遭送到武威黄羊镇去了)。反右运动把人们过了一遍筛子,只是,我不知道筛出来的我等,是真正的渣滓呢,还是别的什么。

无论如何,鸣放、反右完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变。我的感情变得深沉一些,不再口无遮拦、“言论自由”;我的思想深沉一些,不再迷迷糊糊,睡眼惺松,看人看事看社会看人生,似乎明晰许多。

1957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57年发生的事是民主与封建的大碰撞、大搏斗(无论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还是从政治形态层面上分析,都是如此。),是五四运动的延续和发展,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1957年发生的事,是建国八年来各种矛盾积累的一次爆发,是民主党派和广大知识分子争取基本人权、要求参政议政权利的民主运动。这次民主运动遭到有甚于数十年前五四运动残酷万倍的镇压,也就必然导致此后二十多年封建主义毒瘤在中华大地的恶生疯长、空前泛滥,导致社会大倒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无与伦比。没有反右,就不会有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不会有三年大饥馑饿死几千万人;不会有十年“文革”浩劫。这一切,是反右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它的必然结果。终极的原因在制度、体制上。这次运动唯一获利的只有一个人:毛泽东。他为所欲为,将一切权力操于己手,从此建立有甚于皇权的个人专制独裁。它证明:任何人和任何政党不管它的初衷如何,如果以封建主义来进行反封建革命,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更沉重的封建主义,给人民带来更深的愚昧、更大的灾难。

我是运动的受害者,当时并没有争民主的意识,年龄太小,什么都不懂,没这水平。我不过是“东邻失火,殃及池鱼”,是鱼池里一条最小的鱼。反右过后,才认识到这场运动的严重性,它的反封建民主运动实质。

友人看了以上文字,认为把兰大鸣放、反右写得太简略,远未反映兰大情况的全貌。确实如此。鸣放之初迷于功课,对运动漠不关心,直到大字报铺天盖地才偶有一瞥。大字报看的少,内容知道的不多。在反右过程中,因为态度“顽固”表现极坏,受到左派的打

击尤重,完全失去自由空间,对其它班级反右情况无法闻问,几乎一无所知。我没有能力了解兰大鸣放、反右的更多情况,只能由别人去补详了。

建国以来,有过众多的政治运动: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改、抗美援朝、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在党内和意识形态方面,又有批判《武训传》、反“高饶反党集团”、批判俞平伯的《红学》、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大规模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所有运动,我只知其名,不知其实,未曾介入分毫。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是我卷入的(而不是参加)第一个政治运动。谁能想到,竟使我受尽磨难,九死一生!

第三章 疯狂岁月

一、乍到联丰社

受“保留公职、劳动考察”和“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兰大右派师生共40人(我记的不准?),在学校党政干部的“护送”下乘上东去的列车。大家坐一节车厢,个个神情呆木,不说一句话。列车发出沉重而单调的轰鸣。

这群“异类”中有唯一女性:中文系二年级的谭蝉雪。她身段面貌娇好,气质不凡。有位讲师——化学系的胡晓愚先生,似乎还有助教、教授一、二,我不认得。还有三位研究生,他们是化学系一级教授朱子清的研究生胡依理;物理系苏联专家研究生徐诚和物理系教授徐躬藕先生的研究生顾雁。这之中还有我唯一颇熟的师兄、化三胡学忠君,有我认识的断舌右派孙自筠君。

甚感意外的是,和我同届的二年级学生占了半数,都只不满二十或二十一、二岁的年龄。

胡先生胖墩墩的,是化学系主力讲师,一直教高年级的有机课。听说他是江西九江人,21岁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同年考上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于1955年调兰大任教,27岁已是高教八级。在化学

系他受学生广泛称道，一是课讲得好，二是外语根底深。据说他看英语书的速度比中文速度还快。他和张我权先生在反右中被左派称为左主任的“哼哈”二将（数学系则有所谓“四大太保”），全校无人不知。

胡依理是武汉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考来兰大当研究生。徐诚和顾雁都是上海人，同时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又一同考来兰大当研究生。这时的兰大，虽是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大学之一，研究生却总共没几个，这三位又是研究生中的佼佼者，偏偏都成“右派”，令人扼腕痛惜！

火车走六、七个小时，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大家已是唇干舌燥，饥肠辘辘，直到天水北道埠才招呼下车，已是下午三点多光景。大家都背着行李，手提装脸盆、洗漱工具的网兜，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象一群落魄的逃难者。囫囵用餐毕，忙不迭乘车到天水地委大院。有人逐一点名，将我们一分两半，一半留天水市，一半去武山县。老师、三位研究生和女生谭蝉雪，以及胡学忠、孙自筠都分在天水市，我在另一半里。

又乘车向西，马不停蹄到武山县委。县委又将这一半一分为二，一半去洛门，另一半留城关，我分到城关。到了城关又一分为二，我和苗庆久、张开锡、郑连生分到联丰高级社，另一半有五个同学，他们是谢成、柴志德、马启凯、孙和和许金田，分到贺家店高级社。联丰社地处武山县城与贺家店镇（又名山丹镇）之间，离县城约七、八华里，距贺家店只三华里许，陇海铁路从村庄中间穿过。这个社由于工作出色，曾多次获得国务院和省上的嘉奖，社办公室挂着许多锦旗。此前，中共甘肃省委为安置我们这批右派，曾向有关地区部门下达指示：地点要选交通方便的；环境要选群众觉悟高、各方面工作都先进的，以利于对我们的监督改造。联丰社完全符合这些要求。

我们四个被安排在李书记（兼社长）家里。这是个西北典型的农家院落，南边上房住李书记一家人。我们住在靠院门的耳房。这间耳房呈长方形，约莫有五米乘三米大小，靠西墙是个大炕，可并

排睡四个人。炕前是条一米许的廊道，一个小门和一方小窗。院子有七、八十平米，大部分用土埂围成菜畦。菜畦里种的葱、香菜、萝卜，绿茵茵的。菜畦边还有三棵果树。从院门进来，有条窄窄的小道从我们门口经过，才到上房。上房门前有台阶，阶高半米，有三级。李书记家的上房比之我们住的耳房来，又高又大，耳房倒更象个厩棚。李书记家上房，我们从未去过，屋里的布置摆设，不得而知。

行李刚放到炕上，立即被人带到位于村东头的社办公室，是去接受训话。李书记的话开门见山、干脆脆：“你们是犯了错误的大学生，乍到农村来，生活肯定不习惯。你们要放下架子，不习惯会慢慢习惯起来。要听从社员的监督，要接受社队领导的安排指挥，不要说不该说的话，这样会减少你们的麻烦，也减少我们的麻烦。有事需要进城，要向我们请假。要努力劳动，舍得流汗。你们的劳动表现将决定你们的前途。你们过去干了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主要通过劳动去赎回。一句话：你们要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这些是肺腑之言，我们心领神会。我感到李书记的话有股巨大的威慑力，话里带着煞气。一段时间以来，心象幽魂般在漫无边际的苍穹漂泊，如今总算落到坚实的地上。虽然它忐忑、恍惚、惊惧、疑虑，不知后面的吉凶好坏，毕竟踏实多了。

回到住地，天已断黑，李书记的母亲送过来一盏马灯。铺好床，各人囫囵几口路过县城买的冷馍，又准备第二天劳动穿的衣袜，大家不说一句话，歇了。对我的三个新伙伴，一定是个难眠之夜，我听见他们翻来覆去。我头晚上没睡，早困得不行，很快会周公去了。

刚睡个囫囵觉，村里响起“咣……咣……”的钟声，紧接着是“上工咯”的喊声。天色尚未大亮，我们一骨碌爬起来，行动都很快。我穿劳动服，他们仨也都穿较旧的衣裳。只张开锡戴眼镜，没法更趋近社员打扮。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出门。在往工地的路上，学社员的样子，蹲在渠边用手兜些水，往脸上一浇，双手在脸上往下一捋，算是洗脸。每天如此，只在睡前漱一次口，入乡随俗。

我们四个分配和基干民兵连在一起干活，第一天和随后几天

的劳动内容是割大麻和沤大麻，每人发一把弯月形带柄的砍刀。大麻长得一人多高，秆粗如棍。民兵连是些棒小伙，内中几个穿旧军服，估计是返乡退伍兵。他们割起大麻来，如同切菜般容易，眨眼工夫扫倒一大片，一刀下去可撂倒好几棵。我只砍几下就大汗淋漓，每棵要砍两、三下才能砍断，不知是刀不锋利还是力气相差太多。

七月下旬，太阳正以它最充沛的精力向大地散发热量，地里干活的人对它的淫威都有几分畏惧。除我们几个，其他都戴草帽。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些人到树荫下歇凉，也有人不理睬毒太阳，坐在大麻捆上，吸着五分钱一包的“猫牌”香烟或老旱烟，吞云吐雾，开着粗俗轻松的玩笑。话题多是大姑娘、小媳妇之类，很少离开两性这一中心，甚至脏言秽语，不堪入耳。有时玩笑开过了头，双方撕闹，摔起跤来，却没见真红脸。

天气太热，下午开工很迟，到工地已是三点半了。意外地，一位壮汉（以后才知他是民兵连的排长，我们这伙人的“头头”）拿来四顶旧草帽，给我们每人一顶。说：“戴上，莫嫌，总能抵挡些晒。把你们的白皮细肉晒糊了，李书记跟前不好交差。”我心中油然腾起一股感激之情。

大家渐渐熟悉起来，民兵连这些青年人，知道我们是大学生，问这问那。天上为什么会出现七色彩虹，扫帚星拖个长尾巴是怎么回事？也有拿我们开玩笑说些“不上串”的话，我们装作听不懂，不搭腔、只摇头。

过不几天才知悉，与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两个“右派”，他们是天水步兵学校的尹茂春和王佐。尹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个头稍矮，满脸短须，脸红扑扑的，身体很结实，原为步校中尉战术教官。王是陕西人，高个，一脸书生气，年约二十六、七岁，原是步校中尉文化教员。部队也搞“大鸣大放”、也“划右、反右”此前闻所未闻。如今他俩都穿旧军装，和民兵连的人在一起，真打成一片了，如果不开口说话，谁也分辨不出来。

每天收工回来，虽觉疲惫不堪，心情都不坏，那原因多半在一顶草帽上。这天回来吃罢晚饭，大家不约而同整理自己所带书籍，

学习已提到我们的生活日程。从此，除白天劳动，我们都坚持学到十二点。条件差，四人共用一盏马灯，围坐在矮矮的马扎上看书，很费劲吃力。但我们都很勤奋，注意力专注集中。我带来一本《俄华词典》，开始啃格琳卡的《普通化学》俄文原版。一切尘埃落定，神定气爽，杂念全无。我感觉学习效果不错，甚至感到几分兴奋。在校学习时不知学习机会难得；失去这机会，才觉得它的珍贵，才会百倍去珍惜它。

割完大麻，接着是运和沤麻。联丰社的北边，渭河缓缓流淌，绝大部分土地就在河边，少部分在铁道南边山上和山根处。渭河边有一块天然凹地，便是沤大麻的“池子”，离大麻地三、五百米，可引来渭河水浸泡大麻。我们把运来的大麻一捆捆摆放齐整，然后清沟放水。在等待放满水的过程中（往往需个把时辰），小伙们熬不住这段悠闲时光，又要嘴、打斗或摔起跤来。

水放满了，大麻捆子都漂起来。民兵们都在脱衣服，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只好一样也脱得剩条短裤衩。大家朝渭河里走去，有些人“扎猛子”，沉到河底去捞大石头，然后将石头肩扛背驮运到池边。

大伙脱得精光（这儿远离村庄，妇女、小孩不会来此），跳进池里，用身体和石头将大麻捆压沉至池底。月余经浸泡发酵，绿叶青皮腐烂褪尽，池水成褐色，再捞出大麻晾晒干。冬天农闲，分到各家各户，让老人、妇女、小孩剥麻，剥好的麻即是商品，由国家统一收购，少量的留作麻绳、麻线自用。

我们四个虽然一起吃住，一块学习劳动，二十四小时生活在一起，经过反右洗礼，相互戒备，都有作“垫背”教训，不敢交谈。苗、郑和我都是二年级学生，张开锡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此前只知道苗庆久的大名，惟苗是调干生，身体魁梧，年龄最大（年长我六岁），阅历较丰。他是北京人，籍贯东北沈阳，出身地主家庭，以后搬住北京。他的情况与史美唐君相似，北京一解放他便参军，在中央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工作。1955年复员，复员前是中尉参谋，在部队曾荣立两次三等功。为人老成稳重，曾是物理系赴京代表。张开锡

是武汉人，个头与我差不多，长得干瘦，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是物理系响当当的高才生，四年功课成绩全优。他带的书最多，不少是外语精装大部头，平时沉默少语，典型的书生。郑连生不知何处人氏（我忘了），身体也单薄，面相比实际年龄显老，嘴里镶颗金牙，平时话多，常露出金牙，给人以“龇牙咧嘴”感，我不太喜欢他。劳动时他常主动与社员唠嗑，无非笼络感情套近乎意思。其实适得其反，不久有社员就说他讨好卖乖，虚伪、轻薄。尽管个性不同，在相处的日子里，我们四个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大家学会了忍让与宽容。世界上人与人不能一样，谁也没法要求别人同自己一样。

也有心烦的时候。工地上偶而有个别调皮的社员，向我们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比如说，你们放着好好的书不读，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说了些啥，能不能向我们讲讲……。这些问题令我们尴尬，只能用听不懂去搪塞。有时纠缠得过分了，他们的排长不得不过来制止。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重新分到“穆桂英青年女子突击队”，去谷子、糜子地锄草。

二、最轻的劳动也能累断腰

谷子和糜子地在铁路南边的山坡一带。突击队长是位三十好几的半老徐娘，泼辣、热情。到工地，她先教我们如何识别糜谷与野草，教得认真细致，手把手教与我们看，然后发给我们每人一把长柄锄头。

在所有的农活中，也许锄草是最简单最少花气力的农活。然而对我却成难题。糜子、谷子在四、五公分高时，与野草几乎无异，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其叶片有茸毛，野草则没有。我原本视力很好，双眼都是一点五，经过一年多“反右”、“疲劳战”的煎熬，长期严重的营养缺乏，身体一直没能恢复，两目视物常在混沌模糊中。对微细的茸毛，不俯身贴近，即使再瞪大眼睛也看不清楚。我很紧张，心里嘀咕：如果误锄了庄稼留了野草，人家扣个“故意破坏”的罪名，浑

身长嘴也说不清。我小心翼翼，将身子折成直角，握着锄柄下方的三分之一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工兵排雷探索着往前锄，不多会儿腰僵硬，疼痛难忍，速度慢得像蜗牛。身旁的同学，情况也不比我好多少。原先我们和其他突击队员排成一横排同时往前锄，一会儿工夫，被撂下一大截。年轻妇女锄草时，手握锄柄上方，身子只略微下倾，锄头来回舞动，轻松自如，嘴上不停地说话、打诨，嘻嘻哈哈，丝毫不影响劳作。

尽管小心到了家，队长在检查质量时，仍发现我有少量误锄的情况。她看出我的紧张心态，非但没扣“帽子”，反而说了些宽慰的话。我们四个眼看落得远了，其他人自动返回来接我们一阵。这些年轻妇女没有文化，心眼比学校里“文化人”一个天、一个地，不能比拟。

队长发现我视力差，下午给我一把小铲，叫我蹲着用的小铲锄。距离一近，自然看得真切。小铲解除了腰部的重负，我很感激队长对我的照顾。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比起基干民兵连的小伙子，年轻妇女在一起，更“疯”。无论劳动或休息，嘁嘁喳喳，嘴没闲的时候。他们说着远近发生的农家新闻：谁家的男人如何如何；媳妇如何如何；婆媳间如何如何；公公与儿媳如何如何；嫂子与小叔子又如何如何。一句话，尽是一些男女秘事，说到要害处，发出毫无顾忌的浪笑。他们相互开着玩笑，追打，甚至按倒在地浑身抓痒痒。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解手的时候，只走到不远的地头便褪下裤子，露出大屁股来，吓得我们不敢侧目。休息时，个别大胆妇女跑到我们跟前问这问那，说些带有挑逗、刺激的话（比如有关避孕方面的问题），拿我们开心、逗笑。

她们是纯朴的，善意的，热情开朗的，在这里没有敌视与歧视。一扫笼罩我们心头的阴霾。

基干民兵排长和妇女突击队长对我们的善意和帮助，来自这些人的本质善良，事后我们知道还来自他们上司的指示。这位领导便是中共武山县委委员、山丹镇的杜镇长（很遗憾，我记不得他的

名字,有人说他其时兼任武山县副县长。)

杜镇长——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无论相貌身材都无特殊之处。据他自我介绍,他只是个初中肄业生,但有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谈吐彬彬有礼。他第一次登门看望我们,是在“大麻战役”刚结束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个正围着小马灯静静看书,十分专注。突然门口李书记喊道(他的声音我们早已熟悉):“同学们!杜镇长看望你们来了。”我们都站起来,望着立在门口夜色中的两个黑影,没人答腔。这场面令人难堪,并非我们不懂礼貌,因为都感到为难,故而发愣。小屋里一米多宽的过廊塞着四条汉子,一张小矮桌,四只小马扎,地面已是“水泄不通”。没有椅子,也容不下椅子。总不能让客人站在门外吧,可往哪里让“座”呢?还是苗庆久老练,他道:“请镇长、书记进屋上炕坐到被子上,既软和又能展开腿脚。”

似乎有什么约定,李书记过去有事只站在门外说,从不进小屋,杜镇长也一样。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一屁股坐到门槛上,李书记则坐在廊檐外石阶上。

“大家都请坐,不必客气多礼。”我们四个一字儿排开坐在炕沿上。

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我们集体宿舍。被子折叠得还算齐整,被子与后墙间放着箱子。我们都有只小箱,张与苗是皮箱,郑是棕箱,我的则是个扁平的藤箱。箱上都码着几摞书。张开锡的书最多,床头放不下,不得不“侵占”些我和苗的“地盘”。廊道的另一端是我们的“灶房”,那儿放着一只煤油炉,一只硬纸盒上放着块小案板。“灶房”实在太小,事实上做饭都在门口的屋檐下。四顶旧草帽挂在墙上。小屋再无闲杂物,它已经快撑“破”了。

矮桌上马灯的光从低处照过来,在后墙上投下我们的巨大身影,使小屋昏暗且有点扑朔迷离的味道。

杜镇长用平和、清晰的语气说道:“我在县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本来要早来看望大家的。农村条件差,生活比较困难。看得出,你们没被困难吓住,白天劳动,晚上坚持读书,很不容易。你们的行动证明,你们已经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社员们对你们10多

天来的劳动表现也是满意的。我和李书记今天来看望大家,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有什么要求。”

要求?笑话!我们是戴罪来接受改造的“右派”,自己明白斤两,还敢提什么要求。我几乎怀疑他在引诱我们第二次“鸣放”。立刻警觉、戒备起来。大家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记不得是谁象是耳语低声道:“衣扣脱了,手磨破了,能不能到县城去买些针线、胶布之类的东西?”

杜镇长当即答复:“可以。到城里买东西,不必请假,只要打声招呼就行。为方便你们的生活,今后你们也过星期天,这天你们可以集体去采购东西。”

他的允诺对我们不啻是莫大的恩赐和奖赏。我们太需要去县城了,不是要去买针线与胶布,是要买“进口”货。到农村后,遇到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吃饭,喂肚子。社里配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糜面、谷面,还有少许的白面、土豆、蔬菜。吃糜谷面饼,大便解不下来,肚子发胀,这还是小事。主要数量有限,劳动强度大,缺油水,肚子常向我们提抗议,半夜饿醒再难入睡。(其时,我们手头都有多少不等的粮票和现钞,多为家中亲人的支援和好友所赠)。

杜镇长临走前向我们宣布,兰大每月给你们15元生活费(我记不太清了)每月定量28斤,钱和粮票都由县委组织部转发。第一个月的钱和粮票,他捎来了,当即发给了我们。

坐在门槛上的杜镇长,他的身躯一半在小屋灯光里,一半沐浴在月色中。我忽然感到,他是座桥梁,是位使者,把几颗破碎的心重新凝聚整合并引向信任。看来,党组织没有忘记我们,没有一棒子将我们打死的意思。

他还告诉我们,以后每星期他都来看望我们一次。他确实做到了——直到我离开联丰社。

三、一喜一忧皆惊雷

武山县,这个全国闻名的先进县、红旗县,58年8月,率先兴起

大规模、群众性的水土保持运动。联丰社又是先进里的先进，样样走到前边。我们四个随青壮年劳力开拔到县城南面的山上安营扎寨。

南山的各个山头、山腰插满红旗。来自各个高级社的青年男女歌声飞扬，红旗招展，场面气派、浩大，任务是10天内修好南山诸山的水平梯田。

开工典礼刚开罢，我和苗庆久被召到县委宣传部。一位30来岁的干事向我俩下达任务：负责办《工地快报》。不知情的社员议论道，到底人家有文化的人，又吃上拿笔杆的轻松饭。岂不知这活比拿锄头、铁锹累多了，我又面临严峻考验。

每天天不亮从县委出发，爬到山上赶在社员上工时候，带着小报，爬上爬下，分送给各工地的社员，还要读给他们听。然后收集采访先进人物、好人好事，记录他们的顺口溜、打油诗。要跑遍所有的工地，少说每天要爬三、四十里山路，尽是沟沟岭岭，爬坡、登山、跳涧、跨壑，走在无路之处。中午，社员能休歇1-2小时，我俩只能一边啃干馍，一边走山梁，马不停蹄。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在爬山越岭时，要十分谨慎小心，既要提防上面滚落的石头砸着自己，更提心吊胆怕自己踩滚石头砸伤别人。一块小石子从山顶以重力加速度冲到山下，不论击中人的何处，后果都不堪想象。我们可不愿当“杀人犯”。山上山腰，到处尘土飞扬，到处乱石翻滚，我俩整天就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穿梭蹦跳，直到下午五点才开始返回县委大院。

回到大院，边吃饭边写稿。组稿既要广泛性又要突出红旗社的典型性，尤其怕犯文字方面的“政治性”错误，必须字斟句酌。约6,000字的小报，稿子写好凑齐，往往到晚上9点后。送审待批又得花个把小时，然后刻蜡版、油印，每晚都忙到午夜2-3点才能上床。

10天的水土保持战役胜利结束。我与苗均是半人半鬼、蓬头垢面，浑身酸臭又筋疲力竭，吃的苦犹如在地狱走了一遭。我终没能抗住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超压，一回到社里发起高烧，病倒了。

八月，社里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王佐的未婚妻从西安来，专程来与他结婚的。她预先准备了各种需要的证明和手续。她约莫二十三、四岁，无论身段、面容，即使在大城市、在大学校园也堪称上乘。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清澈明亮；圆脸，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社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以及老太太都跑来看新人，赞不绝口。原先，社里有几个象样些的姑娘、媳妇，人前人后颇露娇色，如今与人家一比，方显出天高地厚，只有羡慕的份儿。

王佐、尹茂春的住处就在我们旁边，隔条窄窄的巷道，直线距离不到50公尺。办喜事的时候，王佐很识时务，只请了他的同事尹茂春和我们四个同学。我们都送了喜礼。酒席上，王佐的爱人表现不俗，令人钦敬。饭菜全是她一手张罗制作的。虽无山珍海鲜，是些家常菜，味道不错；尤其她落落大方，风度典雅，有见地，善言谈。我们不断向一对新人祝福，新人也频频向我们敬酒。席间，她说的一些话，令人刮目相看，大有语破天惊之感。

“我高中毕业。我原先的高中物理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是我最敬佩的老师，去年划成右派。我了解王佐和他的家庭，否则，我不会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嫁给他。您们在学识上都是我的老师，在年龄上有的是兄长，有的是弟弟，如今与王佐的遭遇相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大家还年轻。年轻时积累些经验教训，今后的人生道路就能少走弯路。世界上的事太复杂，一时看不清楚、弄不明白，时间一长就会水落石出、泾渭分明。何况，社会上有了解你们的人，你们要振作精神，切莫自暴自弃。只要挺住，相信都有作为、有光明的未来。”

她的话含蓄婉转，没有“出格”的地方，我们都懂她的话外之音。她是位巾帼有识之士，她的话如涓涓清泉注进我干涸的心田。王佐不知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知道他的英文根底不薄，正在阅读英文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我终于明白他的刻苦原因了。

过两天，王佐送走他的新婚妻子。她在新疆乌鲁木齐找好了工作（象是银行系统），那儿正等她上班。他俩新婚后的离情别绪，我没见着，也体会不到。不过，人走事在。在联丰社，在方圆数十里的

乡间田野,产生不小的轰动效应,当成佳话流传。

第二件事。一天晚上,天刚断黑,我们正准备夜读。一位社员在门口嚷道:“李书记叫我来通知你们,带上小马扎,现在就到社部的院里开会。”社部的院子我们已不陌生,分来社里时曾到此歇脚,后来又被招来此处聆听李书记的教诲。它比普通农家院落稍强一些,堂屋的廊檐较宽深,廊檐边的石阶高些,院里有几棵果树,独无菜畦,是一片空场。想来,原是个小地主的宅邸吧。小院塞满人也只能容三、四百光景。

进到小院里,一盏大汽灯悬在廊檐正中的上方,发出刺眼的白炽光,院里熙熙攘攘已坐满人。有人招呼我们坐到最前面的廊檐下,面前是张长桌,李书记和另三个社干坐在那儿。

“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安静!”李书记用略带嘶哑的语气大声喊道。待喧哗平静下来,他接着道:“现在我宣布:联丰高级农业社斗争地、富、反、坏大会正式开始!”紧接着,有人厉声喝道:“把地富反坏分子押上来!”小院立时卷起狂飚,淹没在一片口号声中——粉碎地富反坏的反攻倒算阴谋!打垮地富反坏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我们决不允许万恶的旧社会卷土重来!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我面前,突然冒出来六个人,象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他(她)们都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腰,分站在长桌的两边。李书记的声音在继续:“社员同志们,你们都听说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在广大农村,为了配合这个进攻,地、富、反、坏分子到处造谣煽动,挑拨社员和干部关系,中伤诽谤干部,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颠覆人民的红色江山,想要旧社会复辟!社员同志们,你们答应吗?”

群众怒吼:“坚决不答应!”

李书记又问:“我们该咋办?”

“斗垮他们!打倒他们!粉碎他们的美梦!誓死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说时迟,那时快,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伙人,我认得其中多为基干民兵连的小伙。他们扑过去,给六个阶级敌人一顿拳打脚踢;其中四个东倒西歪,两个打倒在地。群众堆里,喊打的声音仍一

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面前,距离我不到一公尺,倒地的一个撞在我腿上,几乎把我撞倒,我看得太真切了!

我的心紧缩、紧缩,我吓懵了!太突然了,太快了——比闪电还快。51年土改时,我幼小,哥、姐都参加了,我从他(她)俩的几十本土改工作笔记中大致知道些斗争地主的情况;以后读毛选晓得“……阶级斗争是疾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如今终于第一次亲睹这场面。我对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了严肃对比:对第一次群众运动(土改),毫无疑问我的同情心在受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一边,他们是弱者,斗争欺凌过自己的恶霸豪强是正义之举,我的父母、家族也曾遭过这种压迫。但对眼前发生的斗争,坦白地说,我内心很反感,很厌恶。并非我的“阶级感情”变了;更非我被强迫来“受教育”,充当了“杀鸡给猴看”的猴子角色,要是这样,就太没理性了。

我对眼前的斗争存在不少疑问。“造谣煽动”、“诽谤中伤”、“恶毒攻击”、“阴谋复辟”云云,确有其事吗?谁能保证不是我在反右中的“要把共产党杀光”的异曲同工之作呢,谁能保证不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呢。何况,根本不准人说话,不准为自己澄清、辩护,便“风卷残云”、“人仰马翻”。51年土改是非常时期,新政权刚建立,法律来不及设置、实施,靠群众运动横扫恶势力、旧势力当是情有可原。解放八、九年了,仍用老法子来达到震慑“敌人”、巩固政权之目的,不依法治国,行吗?不知要造成多少无头冤案!共产党如今牢牢地掌握国家政权,再用群众运动对付敌人就无必要、毫无道理了。“阶级敌人”毕竟极少数,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犯何种罪,只要证据确凿,依法整治即可。何以将法律武器弃之不用,非要以群众运动代之不可?

六名“阶级敌人”中,两人尚年轻,衣着举止不象流里流气的“坏分子”,我心里嘀咕:地主、富农成分是否衣钵相授,是世袭的?其余四个都五旬以上,内中有位女性。只这位老太婆最“幸运”,只受几次轻微的推搡,有几次翘起,与其他五人所受待遇大不同。

事后听社员议论,这六个有“帽”之人并未“乱说乱动”,只因有

上级指示,需要“教育”他们一下,起到“巩固江山”、威慑敌人的作用。老太婆有个孩子在县上当干部,才受到“照顾”。对这六个“阶级敌人”的处理,谁轻谁重,谁最轻、谁最重以及把谁打翻在地,事先都有周详的研究、布置,工作做得细得很哩。

这晚上我惊魂不定,一宿无眠。天快亮时,恍惚中有许多人朝我扑来,拳脚并用,棍棒交加,我来不及喊“救命”,后脑勺一闷棍……醒来方知是噩梦,浑身大汗。这是生平第一次做这种噩梦。我承认:我吓破了胆!一年的反右运动,尽管吼声如雷,尽管受到非人的“疲劳战”摧残,并非受到直接的皮肉之苦(虽说“疲劳战”之荼毒甚于皮肉苦)。反右中,我理直气壮,脑中从未出现过“怕”。反右后,我“怕”了;如今,更怕!直担心树叶儿掉下来会砸烂我的狗头。确实,“震慑敌人”的作用在我身上是充分得到体现的。

毛主席早总结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统治术,在“弛”的时候,预示“张”即将到来,万不可被表象所迷惑,要时时刻刻小心呵。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很久才知,以上经历的,名曰:整社大辩论运动。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

反右后,再无人敢“犯上”,毛主席一言九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下面的事发生在1958年8月下旬(我记得不一定准确)。

整夜里,村庄似乎处在剧烈的骚动中,不断有锣声、鼓声、号声,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夹杂着阵阵鞭炮声传来。天虽没亮,我已无睡意,干脆爬起床跑出去看个究竟。我猜想一定有什么大喜事发生了。自到农村后,我们没看过报,又没有收音机(那可是件惹是生非的东西,我们谁也没想过买它、听它),能得到的讯息比社员少多了,可说与世隔绝。只见农舍的屋前房后到处贴红绿纸标语“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田间小道,村里村外,到处走着手拿三角小红旗的男女。

人民公社化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一夜之间席卷了联丰社。吃罢

早饭,全村的以及邻村的男女老幼一齐聚集到联丰社队部的院外,人们擎着毛主席像和巨大的横幅,举着五色彩旗,联丰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开始了。接着,喇叭里响起李书记嘶哑的讲话,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就是好”。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经过昨晚通宵的酝酿讨论,现在我宣布:联丰人民公社正式成立!”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飘舞,口号声、欢呼声震得村庄地动山摇。接着是走村串户游行。小孩穿着新衣,人们也都穿戴得比平时整洁,喜气洋洋,一派节日气氛。

我们四个被叫到队部接受任务:“人民公社化是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你们应积极投入其中并接受考验。从现在起,你们四个抽出来搞宣传,在房前屋后、村头路口写大型标语,同时负责布置、美化公共食堂的工作。公社决定实行食堂化,从后天起正式开伙,家家户户的锅灶都要撤掉。时间短,任务重,要求你们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所需原料、材料找会计领。”

写字的事,自然不费难。不到一天时间,我们用石灰水涂满了全村所有大一些的墙壁。标语字一律用板刷写成“广告体”,既整齐又大方;字的大小则视墙壁大小和字数多少决定,小如碗,大如盆。

公共食堂是原先队部的库房改制的,把它打扮得象个样儿,是桩难事。从早到晚,满满干了十个多小时,累得王朝马汉一般,个个成大花脸,衣服陆离斑驳,五颜六色。墙上都贴了红绿标语,屋棚下交叉十字挂着彩旗花带,正中吊个大绣球。饭厅大门上写了副对联:“吃水不忘掘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横批“饮水思源”;饭厅里靠灶房的墙上方写着长条幅:“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虽然我们在两边墙上开了四扇窗户,墙壁也刷了一遍,饭厅的光线依然不好,黑糊糊的。李书记来检查验收时,皱了皱眉头,嫌不亮堂。我们汇报:石灰没啦,勉强刷一遍,等于拿清水洗了一下。他的结论是,先凑合,以后再加工。他说:“食堂可是一面镜子。如今四海为家,随便到哪吃饭都不要钱,不但咱们社员,还要接待外地的人来这儿吃饭。寒碜了,影响不好啊。”

李书记作风泼辣，在社员中享有蛮高的威信。他手下的干部个个作风过硬，办事雷厉风行，麻利得出奇。在我们打扮食堂的同时，妇女队长领着一帮婆娘，进进出出，又搬又抬，锅碗瓢盆，米面缸桶，油盐酱醋，……一一到位；食堂外面，几个人正在杀猪宰羊；我亲见会计往灶房里抱进去一千响的鞭炮足有十几挂。明天食堂起伙开灶，对所有社员都是个大喜日子。

整个联丰社涌动着春潮，人们象小儿盼过年般翘首以待。果然，天色微明，村庄沸腾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着过年才穿一次的衣服，笑逐颜开，喜气洋洋，有的老人眼中淌着幸福的泪花。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再加上前面奴隶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起伙，少说总有万年悠久历史。历来都是家庭主妇围着灶台转，公婆、丈夫、子女围桌而坐，等待主妇一样样端到桌上，碗筷递到手上。开饭时，主妇坐在一旁，眼观六路，看看谁碗里的饭已吃完，尤其公婆、丈夫，赶快上前接碗盛饭，再恭敬递上。直到全家吃完，她才囫圇些冷饭剩汤，然后又是收拾洗刷。这种日子至少要过二、三十年，熬到儿子长大讨来媳妇，自己成了婆婆才交差换班。

如今，这沿袭了万年之久的习俗，一夜间被革了命，世上还有比这更伟大的壮举么！

起初几天，食堂的确红红火火，尤其老年人特别舒心满意。社里选派几个最俊的姑娘、媳妇盛饭送菜，菜、肉都焖得软烂，没牙的老人吃到嘴里，甜在心里，乐得合不拢嘴。当然，感到开心的还有那些摆脱桎梏的家庭主妇以及即将成为主妇的青年妇女，她们喜上眉梢，庆幸自己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即使派到食堂做饭，她们知道与在家里不同。食堂做饭，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得到社会承认，是社会劳动的一种，能赚工分的。

李书记只粗识字的文化，除嘶哑的嗓门外，两只眼睛红肿，无风泪长流，风吹泪不断（砂眼），长得粗俗，却十分精明。在公社化过程中，他始终亲自抓食堂，以食堂为中心来展开他的各项工作。“民以食为天”，他抓住了中心，抓住了关键。社员齐把眼睛盯在食堂上，拿食堂办得好坏（确切地，是吃的好坏）来衡量公社化的优越

性。在这儿，人民公社的确得到社员的交口称颂，李书记的威信也如日中天。

公共食堂开伙的第二天晚上，小队长上门通知我，有件任务要我单独去完成，对我说：“石灰没了，四处买不到，社里决定用白土代替。这种白土产在南山的沟里，碰巧，有位家住南山沟来队走亲戚的妇女明天回去，请她给你带路。给你选匹最老实的马，你带把十字镐、一把铁锨，挖两背斗白土回来。”

为避免早上手忙脚乱，我当即跑到马厩找到饲养员落实牲口和工具等，又去面见我的向导——一位刚三十出头的妇女，约定出发的时间、地点，再到食堂要了一天的干粮。队上交待的任务一点不敢马虎。

出了村庄，翻过铁路，便到南山。南山山高坡陡，只有些羊肠小道蜿蜒而上。牵着大牲口，跟在年轻媳妇后面，爬着陡坡，身体尚虚弱，有些气喘吁吁。牲口只驮着一把镐、一把锨、两只空筐，虽无重负，却不大肯走，我得时时用力拉它。爬上山梁才看见山那边是条大川，竟比渭河川要宽阔得多，清楚看见川中间一条颇正规的公路，有汽车行驶。公路两边有高高的白杨和柳树。下到山底，穿过公路，不很远便到年轻妇女的家。稍事休息后，我便请她领我到白土所在地，心想早完成任务了事。白土所在地就在她家后面的山沟里，离她家不过里把路。我谢绝了她的帮助，将牲口拴在一块巨石上，把背筐中它的草料倒在它跟前，自己也啃起干粮来。白土很硬，用镐挖颇费劲，约莫个多小时终于挖下一大堆白土，装满两大筐。看看太阳，似乎不到正晌午，庆幸已完成大半任务，牵着牲口依原路踏上归途。才到公路上，公路漫了水，汪洋一片，有几百米长。看看四周，无路可以绕过去。我毫不犹豫脱鞋挽裤，水不深，打算淌过去。谁知不测的事发生了——牲口见汪洋一片水，不肯前行。我用力拽，它用前蹄顶着，不挪步；我死命拽，它拼命后退；我愤怒，它更凶狠，朝我瞪起红眼珠，与我较劲斗狠。我思忖着，该换个位置，便移身到它的后面，推它，用锨把敲打，它依然不肯下水。我急了，使劲敲它屁股。这家伙突然兽性大发，连蹦带跳尥蹶子，将背斗、十字

镐全掀下来，撒野要挣脱缰绳。我死死抓住缰绳不松手，它居然把我拖着跑，直把我拖倒地上。只得松手，眼看它飞奔而去。我大声呼喊，请前边的行人帮忙截住，没能奏效。浑身透湿，糊成了泥人。个人凄苦不足道，担心的是社里一头大牲口丢了，回去咋交待？我真个要“吃不了兜着走”大祸临头了。我叫苦不迭，心里好害怕，又无处跑、无处藏，怎么办？惟听天由命罢了。扛着锨镐，背两只空筐，拖着沉重步履，一路忐忑不安，直到天黑才硬着头皮回社里。当我满怀沮丧之情向饲养员交回工具，正打算向他说明情况时，突然发现那匹老马正在马厩里安闲地嚼着草料！老马识途，果然不假。这个该死的畜生，害得我好苦哇。人在倒霉处，连牲口也作弄、欺侮你！心里愤愤然。

没完成任务，立马到队长家去检讨。他听完我的叙述没呵斥批评我，反而捧腹大笑。“牲口也认人认生，再老实的牲口也有犟脾性，和人一样，只不会说话。只有摸到它脾性又会治它，它才会对你服服贴贴。”我羞愧无言。

是呵，人也与牲口一样，我如今不是被治得服服贴贴了吗。

和社员一样，我们四个也过一段放开肚皮吃的好日子。无论大人、小孩，每个人都放开肚皮拼命吃，唯恐自己吃的少了，吃亏，一天要吃以前两三天的粮。

只是，不知这好日子能坚持多久？

五、在“大跃进”日子里

公社一成立，迎来“大跃进”狂潮。一天等于20年；超英压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大跃进”战鼓擂得震天响，一颗颗红卫星直上九霄，捷报象雪片满天飞，全国、各省、市、地、县每天都有奇迹涌现，伴随每颗卫星的升天，人们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华夏每寸土地都激情满怀，天天如同过年过节，充满盈盈喜气，似乎到了天堂之境。（没经历过“大跃进”的后生者，要研究那时的历史，不妨翻阅当时的报纸，那里的新鲜应有尽

有，令你拍案叫绝！那是真正的不容篡改的历史。其实，真正的历史远比你能找到的资料多得多，因为地、县两级的小报多半难寻觅了。）

武山县是红旗县，卫星放了不少，却没放出国家级的大卫星，如今只记得两颗：一颗是玉米亩产万斤卫星，另一颗是白杨树上结苹果卫星。前者发生在武山何处、何人所为，已了无记忆；后者发生在洛门公社的百泉，是位团支书所为。

玉米卫星见报，喜坏了县上头头，组成验收团并开现场会，对卫星地科学估产，核实验收。能够放卫星的人都是权势人物，绝无平头百姓。他们早得到通知，做好各种准备，动员一批忠实可靠的劳力，挑灯夜战，把事先选好的十几块地的玉米连根挖出，栽到待验收的地里，然后放水浸泡，用脚逐一抹平，不露痕迹。卫星地玉米秆密不透风，一株挨一株，象热恋中互相搂抱的情侣。农技员挽起裤腿跳进地里取一个平米，数棵、数棒，结果算出来了：远超过万斤。领导喜形于色，验收团成员欢呼鼓掌，互相称赞道贺。然后到食堂（早备好酒菜）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面红耳赤，恭维吹捧，皆大欢喜。

不过两日，玉米叶儿蔫了，秆儿黄了，正在灌浆的玉米，死了。死了就死了，再无人管了。反正卫星放了，估产验收了，即使颗粒无收仍是亩产万斤，已是铁案。

洛门有龙泉、百泉两地，都在渭河边上，是武山富庶宝地。我有九个同学在此接受“劳考”，其中刘良寰和陈德根是学生物的。那儿有位团支部书记想快些染红头上的顶子，创造出“白杨树上结苹果”的卫星，接连通过几次验收，直到轰动全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足见卫星之硕巨，它把生物学理论全推翻了。朝鲜、越南等国的科学家要派团来考察取经，终于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年轻的团支书政治上稍嫩，沉不住气，吓得逃之夭夭。听说跑到陕西躲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所有“卫星”都是精心策划、严密组织实施的。上下沆瀣一气，自然“功德圆满”。经过反右运动，谁还敢“反党、反领导”？再也没有

把不痛的手指塞进磨眼里的傻瓜,人变聪明了。

九、十月份,甘谷县、漳县和武山县三县合并为武山县,县的建制扩大,公社建制扩大,基本核算单位一下相应扩大了几倍。并县合社突出一个“大”字,公社吃饭不要钱突出一个“公”字。“一大二公”是毛主席倡导,自然“越大越公”越好。人们沉浸在“共产主义马上到来”的美妙憧憬中,做着香甜的梦。

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极大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节奏和精神面貌。联丰社以班、排、连、营的建制,在公社统一指挥下,开拔到另一社队深翻土地,已有好几天了。

深翻土地是将下面的土与地表土倒腾换位,标准是一公尺。劳动量很大,没有大兵团的人海战,干这活儿根本无法想象。公社的优势正好在此得以最佳发挥。我一边翻土一边思忖:表土是熟土,具有团粒结构和微生物的分解活动,把它翻到底下去,把生土翻上来,来年能长出庄稼吗?适当深翻些,比如半公尺,或许增加土壤毛细作用利于保墒。我猜不出深翻一公尺深度的科学根据。

验收人员拿着皮尺,逐人逐块丈量深度,一公尺,半点不含糊。社员有的是力气,至于效果无须想的:党的话就是真理,按领导的指示办,就一定无往不胜,党和领导是不会错的。

正在如是遐思,工地另端冒出两个干部朝我走来,把张开锡、苗庆久和我召集一起,急匆匆地道:“刚接到上级指示,你仨另有任务,现在就随我俩回队去。”

心里一路打鼓,不知是福是祸。回到住处,杜镇长站在门口,严肃简明地告诉我们:“接到中共武山县委电话指示,点名调你们三个和柴志德,立即到县委报到。你们的任何东西都不必拿,由我负责派马车随后送去。你们现在就动身。”我们四个,两个物理系的,两个化学系的;两个四年级的,两个二年级的。听了杜镇长如此紧急的命令,丝毫不敢怠慢,急急上路。

县委门口站着几个人,等我们走到跟前,其中一位径直来到面前,主动自我介绍道:“我是张十存,这位是县委第二书记张克仁同志。同学们辛苦了。”我们被引领到县委小会议室就座。沙发两侧

茶几上摆放着“牡丹”、“前门”甲级香烟,通信员端上龙井茶。第一书记张十存给我们一一递烟,我们其时都不吸烟,谢绝了。

张十存,似乎四十出头又似还不到四十,很精神,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原为小学教员,我们对他早有耳闻。他是个毫无特色的普通人,又是个有城府的人。工作据说以泼辣有魄力著称,善“审时度势”,资历不深,连蹦带跳,职、级很快超越他原来的上司。他一跺脚,全武山就地震。他在武山县的权威性恰如毛泽东在全中国的权威性。天水地区,他是数得着的叮当响的有名人物,在省上亦小有名气。想不到今天他“礼贤下士”,对我们几个“右派”如此地客气,我有些“受宠若惊”。且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心里想。

张书记讲话丝毫不拖泥带水。他说:“毛主席在一个月前,向全党全国发出‘15年超英压美’的伟大战略部署,又提出今年要把我国钢铁产量提高到赶上并超过目前英国的水平(1070万吨),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以钢为纲’的号召。这是一项政治任务,省委分配给我县的任务是‘百天百吨’。现在,100天即将过去一半,我们还没炼出一两钢铁。这个任务倘若完不成,我们将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还可能受到法律制裁。坦白地说,这些天来,县委的同志食不甘味,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经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特把你们调来攻关。你们是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你们的知识是人民用血汗培养出来的,是党给的。相信你们不会忘记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会把你们的知识和才华贡献出来,帮助县委度过难关,圆满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政治任务。县委对你们寄予厚望,充分相信你们的知识和能力。”

原来如此。

第二书记张克仁,只在这时才发现他是个“独眼龙”,也是小学教员出身,年纪比第一书记稍大。他的话极简短:“你们就住县委工业局,和县委主要领导一起用膳。我们尽可能为大家提供最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具体由工业局长朱光汉同志负责安排。”他指了指坐在他不远处的一位身材颇魁梧的汉子。

第一书记又用婉转的语气问道：“看看同学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听懂他的话外之音，他在等待我们表态。

我们四个，相互看了看，谁都没吭声。我端起茶水，一边吸饮着，一边心里掂量：“这任务非同小可。他第一书记都怕撤职、法办，落到我们头上还了得！我们不是钢铁学院学炼钢的，尽管懂得些终非本行，谁心里能有底，万一搞不成功，责任归谁？”

张书记等了几分钟，见我们象泥塑木雕的一般，没说话的意思，有些尴尬扫兴。只好道：“时间太宝贵，希望你们立即开展工作，期望明天就能看到你们的计划和方案。”

绵里藏针，他的话明显地在行使他的权力。不管你表态不表态，接受不接受，“干墙上钉钉子”，任务非要砸到我们身上不可。我忽然感到我不如牲口，那匹老马对我瞪眼珠子，尥蹶子，摔筐子，事后屁事没有。比起它的自主和自由度，我不及万一。

离开会议室，几位大员陪同我们参观县委工业局化验室。朱局长告诉我们，此前有位中学老师在这主持工作，只是一连几天没能化验出铁来，不知什么原因。实验装置和试剂全是现成的，柴志德兄给我递眼色，那意思叫我试一试。幸得分析化学学过不久，还记得，便动手操作起来。我用两种定性方法确证了铁元素的存在。待实验毕，柴志德向他们解释了实验现象和得到的结论。他们的情绪一下高涨起来，张十存一时竟忘记地点、场合，兴奋地大声道：“我早说过人与人不同，大学生与大学生也不一样，要调动一切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嘛，事实证明县委的决策是正确的！”他的话引来一片“有远见”的恭维声。一个年轻人跑到朱局长身后低声向他报告：“他们的行李全部到了。”张书记耳朵特尖，未等局长开口，大声指示道：“你们去代劳一下，替他们整理好，铺好床，他们的时间比金子还贵重。现在就领他们到县委澡堂洗澡，朱局长去安排伙食。我要与大家共进晚餐，替同学们接风洗尘。”

晚餐很丰盛，很难相信，在这样的西北小县能吃到如此多、味道又如此可口的菜肴。这样的菜肴，自“反右”后我们没见过、没想过。席间，除原先的三位，又来了一位陪客。大家频频举杯敬酒、劝

菜，我们四个，惟苗庆久能喝点酒，其余滴酒不沾，无论怎么“敬”“劝”，也枉然。

回到工业局住所，床铺果然安排妥帖，书也摆放得齐齐整整。我们知道：“好吃难消化”，任务难完成。炼钢需要平炉或转炉，炼铁需用高炉。就县上的设备、条件，莫说炼钢，即使建座高炉炼铁，也难似上天。面前是个火坑，硬逼我们往里跳，确实够残酷的。但我们都不想被活活烧死，仔细讨论着，推敲着，最后达成共识：第一步广泛收集资料；第二部分分析资料；尔后再制定方案。向朱局长汇报了我们的意见，请他设法尽快找来近一月的《人报》、各省省报，一句话，凡登有炼铁方面的报刊都要。大跃进的年代，人们的行动风驰电掣，个把小时几大摞报刊杂志便送到跟前。有中央一级的，省级的，地级和县级的，“以钢为纲”，各种刊物自觉的围绕这个中心转。资料介绍的，有小高炉、小土炉、小平炉、自然吸风炉……种类多得很。难能可贵的是，“发明者”们能将自己的发明专利坦然公之于众，不据为己有。这些炼铁炉有构造尺寸图，还伴有文字说明，可谓详尽，让人一目了然。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炉子直到天亮我们才读完，如同读了一夜的“天书”。就我们已有的知识，其中99%我们不相信它是科学、是“发明创造”。这些“方法和图纸”，大约包含了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到来之前探索炼铁方法的全过程，惟独没有铁器时代以后炼铁术的发展演变历史。不用焦炭，不用鼓风机，没有添加熔剂——造渣材料石灰石，无法达到千度高温，铁矿石熔化不了，如何炼得出铁来？我们一眼能窥出“方法”的荒谬来。只是，对群众的“伟大创造力”谁敢怀疑，心中有数而已。

科学复古，大张旗鼓。我们却不愿“复古”得太远，更不愿复古到史前社会去。任何人都可以“发明”，我们不敢。我们没有政治本钱；我们的科学良心并未泯灭。我们的处境很难。

从上百种炼铁方法中，最后只筛选出两种小高炉，认为有些道理，颇有参考价值。最终一致意见是以书本上的高炉结构和方法为主导，结合筛选出的小高炉加以简化，先集中一切力量建造一座试验高炉。

方案得到张十存书记的认可。我们四个,分工合作,又各有侧重。建试验炉主要由物理系二位负责,柴和我负责找矿、化验。

全县的能工巧匠很快调集到一起,农机厂、木器厂、砖瓦厂、电厂全力以赴,试验炉建在县城西关原县农机厂厂址上。建炉工地拉起长长的红布条幅,上书斗大金字:“苦战五昼夜,誓死拿下试验炉!”工地人山人海,千军万马。挖坑的,竖杆的,架线的,装变压器安马达的,和泥的,拉砖的,砌炉的,更多的人在运矿石,在破碎矿石和石灰石。紧张忙碌的人们,用小跑步走路。

我们四个更紧张,只韵味不同。办公与设计都在现场。依据化学反应方程式,要计算出原料的配比;炉体的总容量;炉膛的容量;炉膛的燃烧面积;焦炭的燃烧热;电动机的功率和鼓风机的转速;进风量……等等,最头疼的,乃是炉温能达到的高度,它是最关键的。(炉温与焦炭质量——燃烧热与单位时间投入量有关;与炉膛燃烧面积和风量马达功率、鼓风机转速有关;与炉体结构——保温状况等多种变量有关。炉温是多个变量的函数。)最关键的却是我们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的,然而我们却成这儿的权威(多么荒唐!)。没有人可以求教,没有相关的理论可找来一读。我们才是真正的“热锅上的蚂蚁”,还有谁比我们更提心吊胆的呢。我们只能期望炉子点火后不断测温调控。张开锡与苗庆久在泥瓦匠跟前来回奔波,不停的拿皮尺、钢卷尺丈量。

我们太幼稚了。我们原本不是什么“权威”,张十存才是真正的权威。在修建试验炉的日日夜夜里,他以身作则亲临一线挂帅,熬得眼球充血,实在困得不行,与我们一道在炉旁的麦草堆中和衣而卧,不容易。即使在“囫囵觉”的时候,还有人来请示搅他。“焦炭只一点点,再弄不到,怎么办?”“用煤代。”“砌炉膛的耐火砖没有,怎么办?”“用普通砖代,难道活人还叫尿憋死不成!”“保温隔热的石棉没有,咋办?”“那就免了吧。”……

第一书记口若悬河。尽管在我们的方案中所用材料写得清清楚楚,他答应了的,如今全变了。我们就在他身边,他丝毫没有征求我们意见的意思,独断独行,刚愎自用,发出的指示斩钉截铁。我们

不过是他手中的棋子,是他事先备好的“替罪羊”。想起后果来,不寒而栗,浑身起鸡皮疙瘩。

人的行为常常是矛盾的,张十存对我们的态度表现得尤为突出。生活上我们的确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县委特地请来一位上海厨师,烹饪技术高妙,顿顿美味佳肴,绝大多数由他陪着就餐。其时,我们疲惫到连走路都打瞌睡,精神极度紧张,食而不知其味,思想上的压力,精神上的惊恐,吃饭时每每冒出死囚行刑前吃“诀饭”的感觉。

小高炉站起来了,点火了,马达、鼓风机昼夜轰鸣着。不论成功与失败,算是告一段落。

拿着地质锤,背着帆布包,柴志德和我每天(后来是隔天)到矿上去采一次矿样。铁矿距县城不远,过渭河桥从县医院西侧的杜家垆进沟(这沟叫令家沟?记不清了),一直沿缓坡上,不到十华里路。路上全是弯腰弓背的背矿石人流,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年长的约莫六十多,小的只有十来岁。人们的情绪高昂,粗犷的山歌四处飞扬,十里盘岩路成了拥挤不堪的人河。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地里的庄稼早已焦黄,金灿灿的麦粒全掉在地上。“龙口夺食”之时“喧宾夺主”,队里剩下挪不动窝的老人和幼小孩提,一年血汗眼睁睁撒到地上。心里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如此作践,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处理完矿样,老柴和我正进行着化验操作,朱局长陪着第一书记闯进门来。张书记兴高采烈地说道:“呵!你们这里的瓶瓶罐罐真不少呀!”弄得老柴和我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连试管、试剂瓶等等的名称都不知道;只好对他打个“哈哈”。

几天来,晚饭后照例是背煤。这是张书记的命令,全县干部都得执行。我们四个,晓得自己的“斤两”,干部都要背,我们岂敢偷懒,何况张书记亲自在西关过磅验收哩。煤在武山车站(陈家门),距县城约四华里。煤是由外地用火车拉来的,卸在路基边斜坡上,块煤极少,多是细末状。糊里糊涂刨上一背斗背上就走,在午夜十二点前一般能背三趟,每次六、七十斤。这背煤的活,于我也够呛。

背得太少，怕人说“投机耍奸”；背得重了，身体单薄，胳膊勒得发麻，中途又无歇脚处，要歇只得卸下背斗。再要背起却非易事，必须双膝跪地才爬得起来，每每要挣扎再三，拿出吃奶的气力。比较而言，我还是愿干这种最简单的力气活，多流些汗，无精神负担。脑力劳动虽“清闲”，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时时有“祸从天降”之虞。

陈家门到县城之间有条沟，两边全是麦地，直达渭河岸边。籽粒撒地，麦秆竖着，正好是一片“黄纱帐”。在“钢铁元帅”大发威时节，我亲见有少数干部仍乘着夜色躲到里面去抽烟、聊天，然后睡上一觉，直到午夜才背上一背斗煤悠哉游哉去点卯。（十二点前不敢回机关，那样会露“马脚”。）任何时候都有“贼”得很的人，也有老实过头之人。

【注】“贼”，武山方言，奸猾的意思。

六、大炼钢铁续篇

试验炉成功与否不得而知。工业局化验室没有定量分析的设备条件，何况送走的“样品”我们四人都曾经手、没有看到。依我判断，或多或少有些低品位的烧结铁炼出来，就该谢天谢地了。

不两日，化验结果回来了，天呐！“样品”居然是红绸布包裹着的一块长条形烧结铁，锃亮，熠熠发光。它是试验炉出来的？我目瞪口呆，不敢想。中共武山县委在西关召开隆重的“祝捷”大会，我们四个未邀出席。不与会更好，使我们心中少些愧疚，少担些干系，心头的重石终于落了地。

祝捷会后我们即被告知，武山全县大炼钢铁全线铺开，分三个战区，一战区在西关原地址，留两位同学；二战区在甘谷，去一个同学；我分到三战区漳县，明天即令启程。

我忐忑不安。如果用试验炉炼铁，这建试验炉的任务落在我一人身上，担心自己不堪重任。

天刚亮，正在收拾行装时，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跟前，自我介绍道：“我叫董明儒，原在县农科所工作。奉县委指示，来当你的助手，

请多指教。”向我伸出一双肥厚的大手。我点头微笑，对他表示欢迎。他随手从挎包里掏出一件东西给我看，是面红旗。上书：武山县钢铁指挥部第三战区化验队。他告诉我，这是他昨天接到通知，请人连夜赶制的。有了它，会给我们工作带来许多方便。看得出，他是个有社会阅历、有心计的人。

由武山到陇西东铺，火车用了一个小时许。到漳县还有七十华里，我发愁当天难赶到漳县去报到。董似乎胸有成竹，不慌不忙找来一根长竹竿，将红布旗挂上，高高举起。拉我一道走到大路口。公路上过往车辆不少，董见一辆拦一辆，大声问道：“你的车去哪？”气壮如牛。果然有一辆卡车要往三岔镇、岷县去。他摇着手上的旗，用老师提问学生的口吻对司机道：“你知道钢铁元帅吗？”“知道。”“我们是钢铁指挥部的，有紧急任务，请把我俩捎到漳县。”司机嗫嚅着只好同意。驾驶室还能坐一人，董一把将我推进驾驶室，自己飞快地跳到车斗里。

已经11月光景，早上下了霜，天气很冷，我很感谢他的照顾，按理，他比我年长该坐驾驶室。我毫不迟疑将短大衣脱下撂给他。

汽车在无路的河床里颠簸，七上八下，我的头几次磕碰到驾驶室的顶盖。70华里汽车跑了三、四个小时，直到下午三时才到指挥部报了到。我俩被安置在原漳县县委招待所，董第一件事是在房门边贴出〈钢铁指挥部化验队〉的牌子。

县城只一条主街，长不到200米，不及南方的区镇。一端是县医院，医院后是陡峭的大山；东端是原漳县中学，此时改称武山县第三中学。主街连着唯一一条公路——到三岔镇。三岔是交通枢纽，那儿有汽车可达珉县、陇西等地。漳县估计因漳河得名，漳河离县城只里把路，中间隔些田亩农舍。董充当我的向导，不停地指指点点，向我介绍漳县的一些情况。我索然无味，无游兴。不到一刻钟工夫，县城走遍。除原县委、县政府、医院、中学，街上看不到楼房，到处是破旧、简陋、黑乎乎的矮屋，街上行人稀少，给我以落后、荒凉之感。

最后溜达到中学对面的河滩跟前。这儿涌动着人流和激情，与

街面所见截然不同。走近一看,原来是电厂工人忙着挖坑架线,还有许多人忙着木工活。据电工说,今晚10点这河滩必须灯火通明,是钢铁指挥部下达的命令。一句话提醒了董明儒,对我说:“我们赶快回招待所,肯定有会,有任务布置下来。”匆忙回到招待所,果如董所料,会议已进行了一段时间,正在讲话的头头(副书记?)见我俩进来,冲着董板脸孔道:“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不是游山玩景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坚守岗位。免得找不到人,误事!你们现在去中学借化验所需仪器,明天一早去李家沟采矿样化验,将化验结果尽快报指挥部,别的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原以为将东关试验炉推而广之,如今只采矿样化验,如释重负,真是谢天谢地了。这位头头硬邦邦继续道:“农机厂、木器厂、工艺厂、电厂,除电厂留人值班外,其余全到河滩钢铁基地上班,不能缺席,也不能请假!”

从中学借得必需的仪器和试剂,又打点准备好第二天上山的工具,直到夜深才上床休息。我俩已受到警告,再不敢有半点懈怠。

漳河冬季流量很小,大致似老家的东门小港。令我惊奇的是,河水清澈如镜,一望到底,与家乡的修河一样,使我顿生亲切感。河上架着最原始的桥,几组木棍叉支着,上面铺垫一些树枝。河对岸是片颇开阔的川地,树木、农舍错落在田垌中。越西行,河川逐渐变窄,有个颇大的村庄,小路由当中穿过,路两旁有饭馆和卖日杂的小铺店。由此向前不远拐进北面山沟,此即李家沟。沿沟而上,不多远便是矿点。矿点四周已挤满喧闹的人群,全是青壮年劳力,正在用铁锤、钢钎、镐铲挖矿石。

矿点不大,分上、中、下三层,从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位取样,共12个矿样。我指哪,董的小铁锤落到哪,他很尽职尽责。只一个时辰样子,便完成取样任务踏上归途。这时,满山沟,满河川已是浩浩荡荡的运矿石大军,绝大多数都用背斗背,间或有一、二用毛驴驮的。

回到住所马不停蹄处理样品,安装仪器,直忙到晚上10点多才写好实验报告。老董忙不迭拿了就往指挥部跑。我正打算躺下稍

事休息,见他气咻咻转回头,对我说:“还是一起去吧,若头头问话,我不懂,难回话。”到指挥部递上报告单,这位“第三战区钢铁总指挥”只瞟了一眼,朝着我漫不经心问道:“那儿的石头里含铁,是吧?”随手把报告单塞进抽屉里。

我的心象被针扎了一下,他们并不需要化验。在此之前,矿已经在挖,矿石源源不断在运。他们唯一需要的,充其量是进一步验证铁元素的存在,如此而已。

艰辛劳动换来不屑一顾的冷眼,心里不是滋味,信步踱到河滩工地。仅一天时间,这里的变化令我膛目。这里比大城市的庙会还要热闹,灯火亮如白昼,数不清的三角小彩旗系在绳索上,飘在工地中央和四周,十几只如同鸡厩的炼铁土炉一字儿排开。每只炉子连着一个鼓风机,鼓风机通过三角皮带用大木轮带动。每个木轮由数个年轻社员摇着。女社员围在如小山般的矿石堆前,一边砸矿石,一边与摇木轮的男社员“漫花儿”(这儿男女老幼皆会)。人堆中有电工、木工、钳工来回穿梭,以及用手推车运输矿石的人流。鼓风机的“呜呜”声,砸矿石的“噼啪”声,此起彼伏的歌声汇成威武雄壮的“大跃进”交响乐,响彻漳河岸,响彻夜空。

我立在离人群较远的黑暗中,似乎并未受到这“热情似火”的太多感染。相反,我的心情复杂而沉重,感觉好冷、好冷。天气已是正冷季节,寒冷向我袭来,由不得浑身打了一个寒颤,便折身往回走。

路过中学门前,里面的强光吸引了我。近前一看,一间大屋里蹲着许多中、老年妇女,她们正用煤灰和着铁矿粉,捏成如拳的团团,尔后把它们装进土罐里。我忽然想起报上介绍的“罐式炼铁法”,不期如此神速地在此传播、开花!(我断定它结不出果实。)

躺在床上,被窝温馨,我睡不着。

偌大中国,科学家有数十万众,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大喝一声:这种蠢事干不得!偏偏能在眨眼功夫,亿万群众,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去为它赴汤蹈火!而这“壮举”却是梦呓、虚幻。古今中外,能创此“奇迹”者,绝无仅有,始信“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屋外朔风呼啸,山歌阵阵传来,不绝于耳。自奉召“大炼钢铁”以来,我和我的几个同学深感责任重大,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寝食难安。原以为他们崇尚科学,现在才“觉而不迷”,不过要“名牌大学生”的名儿做挡箭牌,堵大家的嘴。谁还敢怀疑武山炼铁的科学性呢?小学教员出身的“二张”,解放后才参加工作、入党,短短几年功夫,连蹦带跳爬上“父母官”高位,倘无“真功夫”,是很难想象的。他们深谙为官之道,精明过人,如今手中又多了‘四只猴子’,平添了“耍猴”赚钱的工具。这“猴”早戴上“紧箍咒”,他想怎么耍就怎么耍,我不过一懦夫,小命攥在人家手里,干着“助纣为虐”的勾当,此时此刻跳出来说实话,谁个相信?能扭转乾坤?实在太可笑,只能白白送掉小命。离校时,好友们的诤言犹在耳旁。

罢,罢,罢。

七、“命令”原是恶作剧

辗转反侧,一夜不寐。刚入梦境,董明儒跑来敲门,对我说:“看来,需要我们办的事不多。我家在贵清,离城40里,我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想回去看看。多则三日,少则两天,请你给个方便。”我当即答应了他,由我一人在此应付。

董是小学教员出身,调农科所工作后,曾去某农校接受过短期培训。他不再象找我报到时那样兴高采烈,看出“化验队”原是“聋子耳朵”可有可无。

除了隔日一次上矿取样做铁元素定性化验而外,在这一日千里的日子里,我竟是掉到空隙里无事可做、无人问津的大闲人。我不愿浪费时光,乐得读随身带的书。

一大早到漳河边离炼铁基地约500公尺上游处,做早操,呼吸新鲜空气(空气清新得很咯!),然后朗读外语。当我完成功课正打算返回住所时,不意发现在我不远处,有个人佝偻着身子,勾头在地上寻寻觅觅。直到走近前去才发现是位头发花白、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光着头,两眉和上髭被呼出的热气染成白霜,鼻头和脸颊冻

得彤红,上身穿件露絮的破袄,袄上披一条破麻袋,腰上系根草绳,下身只穿条破单裤,脚上穿的生牛皮窝窝(它算不上鞋,我不知该叫什么,只好用“窝窝”以代。),“窝窝”里垫的麦草,有的麦草秆直伸到他的裤脚处。老人瑟瑟发抖,不停地搓手顿足,脊背上的空背斗摇来晃去。显然,他的手、脚乃至全身都快冻僵了。我弯身勾头贴到他面前,问:“老大爷,你在找什么呢?我能帮您吗?”他这才发现我,略略直起身子,颤颤地道:“这天气真冷呵!衣服太单,肚里又空,不瞒你说,真有些熬不住了,想在这土豆地里能寻到一点填肚皮的东西。”我突然发现这位额上、脸上全是沟壑的老者,有双特慈祥、清纯的眼睛,就象漳河的水!他的年龄比我的父亲还要年长,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一股热流在胸中涌动!没想到老人眼下竟如此“唏嘘”。没有半点犹豫,对老人道:“老大爷,请您在此等我,不要走远了,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路小跑从住处拿来一套绿色绒衣裤,一双毛袜和从灶上打来的两个热馒头,塞到他怀里。一句话没说,扭头回来。我不忍心再看老人的模样,更不忍听他说感激的话。

那套绒衣是姐姐从北京寄我的,尚未沾身。御寒的衣物在离校前冯君等为我张罗的绰绰有余。调来参加会战时,头头曾提出给我们每人缝制一件大衣,被我们婉拒了。现在想来还是该接受的,将它披在老人身上该多好!我感到很抱歉,没能给老人一双鞋,原有一双布鞋、一双球鞋,早穿破扔了,现只有两双半新皮鞋轮换着穿。

并非事后诸葛亮,在食堂化开始的那天,我心里就嘀咕:好是好,只怕长不了。穷吃滥喝,都怕自己吃少了,吃亏,吃饭成了竞赛一般,一天至少吃掉平时两三天的粮。原以为能支撑一年半载,谁知只三个月,便走到末路穷途上。

老董在家只待了两天,捎来一大挎包果子,郑重其事对我说:“都是给你的。”这果子原来是小梨,个小,黄澄澄的,味道不错。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初与他相处时,我特别小心谨慎,多一句话不说,戒备提防。经过57年的教训,我一直疑心他是上边派来监督改造我的,与他保持着距离。日子一长,才知他性格沉稳,话少,眼里有活,手勤脚勤,凡较笨重的体力活,他都抢着干,不让我插手,对我

甚关怀体贴。只是他干细活，虽也认真，有些毛手毛脚。有次滴定化验时，把滴定管碰成两截。他紧张得了不得，我没有责怪反而安慰他。从此视我为知己，与我交谈多起来。他颇有头脑，也不乏正义感。有一次，他试探着问我：“这种搞法真的能炼出铁来吗？”我没有正面答复他。他自言自语：“即使矿石里含有再多的铁，矿石如果不熔化，铁如何出来？如今只把矿石烤烤，离熔化远着哩。”他的话切中要害。我向他浅显地解释了由铁矿石变铁的主要机理和化学反应，他顶认真地听着。好像听懂一些，颇为激动道：“这里没有焦炭，用的是沫子煤、草炭，有好多地方用的柴草和砍伐的树木烧，莫说1,000多度，恐怕两、三百度也不到。用手摸摸土炉的外壳分明凉凉的，1,000多度连砖也会熔化，所以要用耐火砖砌炉子。眼睁睁瞎胡闹，怎么就没人出来说句话呢？”我平静地问：“谁敢向群众运动头上泼冷水？谁敢反对毛主席的‘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的指示？现在还有这样的傻瓜？”

我们不仅是“大炼钢铁”的见证人，而且是具体参加者。老董比我耳朵灵，比我知道的情况多得多，向我敞开心扉谈了许许多多此前我闻所未闻的情况，令我茅塞顿开。

食堂化以后，农家的铁锅、锅铲暂派不上用场，为完成炼铁指标，干部挨家挨户强行将农民的铁锅摔成碎片，将农家箱柜上的锁头、锁扣以及门上的门扣拔拆，有多少老妇哭哭啼啼的哀求！有多少农民拉拉扯扯的抗争！一切全不中用。

为解决炼铁燃料缺乏，无数树木遭砍伐。山坡、河川、道路两旁，树桩比比皆是，广袤大地犹如长满疮痍，满目疮痍！（大炼钢铁对森林资源、植被的破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也是后来发生自然灾害的直接原因之一。现在有森林和草原保护法，无端砍伐林木要判刑，不知这笔历史账如何清算，罪归何人？）

更为耸人听闻的，有的地方竟以山坳为炉，将无数砍倒的树木铺垫其下，上置矿石，燃至盈月，矿石最后只留得一些烟熏火燎痕迹。

我无话可说。

在第三战区钢铁任务即将“告捷”的时候（不知这任务是用何法度量计算的），指挥部来人通知我：县委一把手来电话，要你亲自去接。我十分惊恐，在这样特定时空下，对于一个特定的“人”，随时可能大祸临头。我战战兢兢急忙跑过去，电话里传来颇熟悉的声音，是个很简短的命令：“你今晚赶回县委，具体任务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军令如山，焉敢半点怠慢！立即到厨房打了四个馒头，将几件衣服几本书塞进挎包，急匆匆上路。老董一直送我爬上医院背后的大山顶才回。背上已是汗水涔涔，气喘吁吁，随后是下坡、上坡，高高低低，在河沟与山梁上行进，全是羊肠小道，沟沟坎坎。我穿的皮鞋，很难走。约莫走了两小时，来到三岔口，不知该走哪条道，只得拐到临近村庄问路。村庄里全是老翁、老妪或稚童，皆答以摇头。所有醒事的人全去练铁了，真急煞人！无法可想，只能猜着走，错了折回重走，直到翻过一道山梁，有个“绿林饭店”的歇处，这儿已是陇西地界，一打听才知只走了30里。此时，残阳坠落，暮色降临，吃了两个馒头喝了水，立即赶路。

“绿林饭店”到东铺没有岔路，只山岭上一条羊肠小道，两旁是深沟。山上多是半人高的枯草、棘蓬，有些灌木丛，间有乔木一、二。听饭店老板说，这荒山有狼，近来有伤人悲剧发生。我加快步伐，一路小跑。天完全黑下来，四周一片模糊，有淡淡的月色，照出眼前一条白道道，一阵暗，一阵黑，无法分辨哪里是坑、是坎，几次绊倒地上，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又跑。最不争气的是鞋，皮鞋后跟错位，钉子扎进脚后跟，剧疼。用手一摸，粘糊糊的，只得狠狠地将鞋后跟拔掉。山风阵阵吹来，风吹草动，似有饿狼扑出，浑身不住冒冷汗……，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周身伤痕，大约半夜时分，终于看见东铺的闪烁灯光。由山嘴下得山来，是条东铺到陇西县城的汽车路，离东铺火车站约有四、五华里光景。谁料一到公路上，原先象只充足气的皮球，此时气全跑了，蔫了，瘫了！全身疼痛一齐发作，身体竟成无筋无骨的一团烂肉，一头栽到公路上。我又饥又渴，公路上

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一道道白光照到身上，扬起的沙土溅到脸上。躺了一阵，试探着站起来，一阵剧痛使我扑倒在地。掏出一个馒头就着果子吃了，方觉好些。“今天”就要过去，如来佛已在念“紧箍咒”，头颅在发紧发麻。我的两条腿似铅坨般沉，脚痛得不能沾地。我必须拿出全部意志力，数着路边的电线杆，不走完（分明是爬！）两个杆坚决不停歇！五华里的平坦大道，我走完它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终于乘上凌晨三点多东去的列车。在列车上，好不容易才脱掉皮鞋、褪了袜子，这才发现两脚全是血泡，右脚被钉子戳了个大洞，血仍在殷殷地流，两脚都已发炎，肿得象两只棒槌，身上的衣裤多处被扯破撕烂。

我记不得是爬还是走进县委大门的，那已是第二天破晓时分。第一把手见了，我，惊讶道：“这是怎么回事！咋弄成这等模样了？”我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向他汇报了经过。他听完汇报，用严肃的口吻道：“唉，很好嘛，你经受住了一次考验。看来，你执行党委的指示是认真、坚决的。叫你回来是商讨筹建县科学院的事，你先看病上药，洗澡、理发，好好休息两天，我们再开会讨论。”

好一个“考验”，说得多轻巧！他一句话叫我脱了一层皮，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实在太幼稚，易上当受骗又胆小如鼠，“整社大辩论”吓破胆，已是无“胆”之人，活该受这份洋罪。

想活下去，“胆”丢不得，务必捡回来。

八、‘地质矿产普查队’

筹建县科院，这是真的吗？我们几个想都不敢想，但却是真真切切的。在讨论实施方案时，我们被应邀列席。与会者在发言中个个雄心壮志，豪气冲天，尤其“二张”趾高气昂，忘乎所以。惟我们不吭声，有了一些阅历，大致能揣摩出他们的心态，无非想别人所不敢想，又要“发明新点子”，要一鸣惊人了。他们时刻想着如何才能把头上的顶戴染得更红，官阶不断晋升。他们每红一次，老百姓的脸上就晦暗一次；他们每上一个台阶，老百姓的日子就下一个台

阶。

柴学兄和我被分配指定给县科院中心化验室造计划、估算经费。这任务不算困难，搬出大学教科书，开列出仪器、试剂的名称、数量、规格，只用两天时间，一份长达数十页的计划便交了卷。

出乎我意外的是，交卷后没两日，又接到新的指令：要我尽快回漳县对该地区的地质矿产资源进行普查，助手兼向导仍是董明儒。

天呐！在他们心目中，我居然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的“万能博士”。我勉强读完大二（有两三门功课未及考试就被赶下农村），学识贫乏、可怜到不能再可怜的程度。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地质矿产一无所知。哭也无泪，能说什么？一个带罪的“劳考右派”，敢拒不接受党委的命令？

跑完武山一中图书馆，用了整天一天时间，一无所获。第二天上午在县新华书店竟得到《地质学》与《矿产普查》两本书，如获至宝，欣喜不已。

大炼钢铁结束了，我们也换了旗帜：武山县地质矿产资源普查队。我和董明儒先到离城三、四里的盐井。据说这里熬的盐特香，远近闻名。我们仔细观看了熬盐的全过程，取了样品。又到三义镇，听说离镇不远有座山出冰晶石矿（六氟铝酸钠或钡盐），需取样化验。

从山上下来，一到住处，我忙不迭就翻书，对照样品观察。老董劝我歇着。我对他苦笑：“从百分之百的外行变内行，有几万里路要走，我恨不能成杨戬用三只眼读书，我们指靠这两本书活命了。”

59年2月春寒料峭，北风凛冽，乡间行人绝迹，正是农民休养生息的日子。我和老董坐着老牛破车去贵清、石川。路，甭说多难走，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一摇三晃，老牛颈上的铃铛不停的响，有时把我从牛车上几乎摇下来。太颠了，我时时下来步行，直到天将黑时分才到贵清镇。

贵清镇位于石川、草滩、漳县的交通路口，有百十户人家，三岔路口即是贵清镇的十字街心，正中有棵硕大的老树，枝繁叶茂，像把擎天巨伞。此时正值黄昏，鸟儿归巢，树上及四周有无数鸟雀、乌

鸦在盘旋、咕噪，将头上的天空遮蔽。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壮观的鸦阵，脑中跳出马致远的《秋思》来：“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词妙不可言，好象专为我写：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真的惹出我这沦落天涯的断肠人无限思乡情结。我该给父亲写信致一声问候；还有××姑娘，也该给她一些讯息。

贵清管理区在离街不远的公路边，有个大院，公路对面是个麦场，周围有土墙围着。接待我俩的，是位大我四、五岁的年轻媳妇，颇有姿色。她看了介绍信，满面春风道：“我是妇女主任，欢迎你们的光临。我们书记和主任都到县上开“四干”会去了，管理区暂由我负责。你们有何要求尽管提出，一定尽力效劳。”老董把她叫到一边，从他的表情猜出，他在介绍我的情况、吹嘘我。董的家就在小镇附近，晚上他要回家去住。

董一走，在女主任面前我的形象似乎高大起来。她派人为我烧洗澡水、烧炕，安排伙房为我备饭，俨然敬神一般，（乃真“瘟神”也。）安排我住在办公室的里间。电话、办公桌、文件柜在外间。又从别处抱来干净、鲜艳的被褥枕头（估计从新婚家庭借来）。忙得七七八八，叫我很过意不去。晚饭是白面片外加一碗红烧羊肉。她告诉我她已用过饭，却并不离开桌面，在一旁看着我吃，帮我调酱油、醋和辣子。见我斯文，又给我夹菜。伙房师傅事先若不知情况，定会拿我当成她的亲弟弟哩。她对我说，象你这样的稀客，过去我们是摆席招待的。如今不瞒你说，我们管理区家底空了，很困难。细米白面和肉类都快告罄，只剩得一点点，留着专门接待上边来的领导。不是舍不得，委实拿不出。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一碗羊肉，她和厨师没沾牙，已经尽心尽力了，而我原本是“受之有愧”的。（她要知道我是右派，还如是对我？）断黑以后，天气异常阴沉，风吹到院里卷进片片落叶，不甚冷。洗过澡，无事可干，早早躺下看书。一床大红缎被，两只耍欢的大凤凰，非常绚丽；枕头是绣花的，做工很精细；蓝格单人床单也是新的。只火炕烧得太热，我有些承受不了。

九点光景，正在读《地质学》，电话铃响了。女主任急急跑来，我能隐隐听到外间电话中的对话。

套间门没有锁头，灯亮着。女主人估计我没睡，径直进来坐在炕沿上，对我说：“事不凑巧，今晚上很可能要打搅你休息。刚才书记来的电话，县上‘四干’会议结束，干部要连夜赶回来，大约凌晨两点路过我们管理区。与会干部要看看我们区广大社员的劳动干劲和革命热情。为此，书记要求在各山头、路口布置社员挑灯夜战，还要山歌处处唱和。要我紧急动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完成。凡行动迟缓者以‘白旗’对待，决不姑息。”其实电话内容我已知八九不离十，不知她为何要如此详细地告知我，只得诺诺应付。

她在外间不停地摇电话，银铃般嗓音又尖又脆（当时我想，她若能接受正规教育，说不定能成为出色的女高音歌唱家呢。），对下属用命令的口气，有时竟是吼叫，逐一给各生产大队通话，又要各大队立即通知生产队的主要领导，于十一时准时到管理区大院开会，凡不按时到会者，后果自负。威严得很，不容置辩。

看了一阵书。火炕虽烫，仍昏昏而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地被一声喊叫惊醒。院子里有‘噗噗嗵嗵’的响声。我知道那是在做什么，好奇心驱使我披衣下床，想看个究竟。刚打开门，风裹雪花掀门而入，我连忙退回里间，系好衣扣又加条围巾，才踱出门外。

从饭厅牵出两个大灯泡，明晃晃朝院子照着。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在一群人的头顶漫舞飞扬，风在四处怒吼。这群人有二、三十个，围成不规则的圆圈，每人头上都冒着热气。圈中站着两个人，看不清面孔，耷拉着头。女主任正发雷霆之怒：“为什么姗姗迟来？电话里通知十一点准时开会，你俩偏十一点半才到，是不是对党委不满，故意消极对抗？说！”其他人一齐喝道：“说！老实交待！”那两个嗫嗫嚅嚅，其中一个道：“我路远，要翻两座山头。”女主任尖声道：“嘿，你倒有理啦。路远不晓得笨鸟先飞一步，不晓得路上跑快点！行动军事化你不懂？你是有意捣乱，有心给我们管理区脸上抹黑！大家看怎么办？”群起呐喊：“斗他！拔他白旗！”四周的人动起手来，将“白旗”猛力推向东，未待他站稳，东边的人又将他推向西，

东南西北，前仰后合，摇晃翘起，推搡中还夹些暗算拳脚，不几个回合，像装满粮食的口袋，“咚”的一声沉重倒地。另一位还算幸运没吃拳脚，只被人“呸！呸！”吐了一脸痰唾。

“白旗”拔掉，红旗竖起。女主任命令：“现在大家立即回去布置，午夜一点各山头、路口必须灯火通明！各队社员一齐出动，齐唱山歌，各队竞赛，比干劲，比歌声亮，要评比。名次在前的受表扬奖励；最后的，要拔队长的白旗！散会。”

若不是亲见，我不会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我对女主任的第一印象是热情、大方、好客；如今又有第二印象：凶狠、泼辣。人皆有两副面孔：对上边（她肯定误以为我是上边派来的人），阿谀奉承，讨好卖乖；对下边，专横霸道，凌辱欺压。这个小媳妇竟有如此之权威，何其了得！我知道她的能力不足以使她拥有这权威，而是有一种更巨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她。我怔怔地发呆胡想。

会散人走雪未停，下得更大了。透过灯光，满院重重雾气，渗人心头的却是层层邪气。远望苍穹，天地一色，黑洞洞混沌一片。雪花打着旋儿，飘落在热辣辣的脸上，感觉清凉舒服；也飘进我心里，使我翻滚激荡的心潮逐渐得以冷却、平静。

我已了无睡意，继续读我的书。

不久便有歌声送进耳鼓，我看表，尚不到一点。争先恐后，刚才拔白旗的会起到了作用。山歌声由少而多、由弱缓而逐渐嘹亮起来，处处和应着。我踱出大院，站在大门口的公路上，远近四处有火光闪烁，虽看不到社员的“干劲”（我猜不透他们在干何种劳动。），却能从此起彼伏的歌声中，“悟到”这干劲了。歌声高亢、雄浑，并不悦耳动听，在空旷的沉沉夜空回荡，一遍遍，重复而单调。

我看书，一直等到凌晨三点。一则我想看看这“钦差”队伍，一定是浩荡气派无疑，不然何以脚步震得贵清地动山摇呢。二则，这队伍倘来，可能会到这办公室来，免不了与我碰面还得寒暄几句，若在睡大觉，似有不恭。谁知直等到四点，没见到他们的影子，很觉扫兴。社员唱了几小时，嗓子哑了，气力没了，声音没有开初模样，有哀鸣的味儿。是的，在浩渺无垠的苍穹中，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微

不足道，如小草的泣诉。

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老董早来了，在外间等着，没叫醒我。院里一层颇厚的积雪，伙房只大师傅在恭候着我，不见女主任的人影。她忙了整个通宵，委实不容易，该歇歇了。

听伙房师傅说，因大雪封路，开会的干部压根没挪窝，白等了。一出几千人大戏，无一个观众，自唱个通宵达旦，可惜。

出得管理区大门，白雪皑皑，一片银色世界。大路上的积雪比院里厚多了。举步不远，忽一幅画映入眼帘：路边生产队的麦场里，满地堆撒着包谷棒和金黄的包谷粒，还有斜七竖八的小凳、马扎、簸箕、脸盆，全浸泡在雪中，一片狼籍。我能想象：一听说“钦差”不来，浑身冻僵麻木的社员，一窝蜂似的奔逃回家，寒冷迫使他们无心顾及家什。这是多么紧迫的情景呵。

我和老董并排走在松软的雪路上，皮鞋踏进雪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身后各留下一串长长的鞋印。路上不见一个行人，天上无一只飞鸟，正是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情景。我俩无有交谈，默默地走着，走着。心，从不曾如此沉重过。

中学读杜甫《石壕吏》还能背诵：“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过去的吏，现在看来都是些蠢货，愚不可及。捉一个人当兵，要夜里亲自跑到农家去动手动脚，太难为他了。如今，数九寒天，天寒地冻，深更半夜，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无数男女从热被窝中“动员”起来，不费吹灰力气，比过去精明能干多了。不光是人作弄人，偏又下雪，老天爷助纣为虐，也作弄人。不知一夜寒冻有多少老人妇孺卧病不起……。

上午十点多，贵清镇家家关门闭户。折腾了一夜，人们都在酣睡中，我感觉此时此刻，我的可悲的民族都沉在睡乡里。走在去石川的路上，直到太阳出来，阳光照在雪上，反射出万道金光，才使我摆脱昏昏然的梦境。

石川离贵清镇不过20华里，一条可行汽车的大路，很快到了。石川是个风景秀丽的“南国之乡”，给我的感觉如同回到了故

乡武宁,我象醉了一般。这儿的山是南国的山,山山葳葳葱葱,云蒸霞蔚,遮天蔽日;这儿的水是南国的水,山间流出的清泉,潺潺叮咚,悦耳如琴,散发出醇酒的芬芳,你会身不由己去捧饮。山上山下,安详静谧,连林间小鸟也不畏人,啁啾之声听来犹如“欢迎、欢迎”,我倍感亲切,心旷神怡。不曾梦到大西北竟有如此仙境宝地,一改我对大西北“穷山恶水”的印象。我象个顽童,攀上山峰,披氤氲霓裳,受清风沐浴,看松鼠跳跃,听小鸟啼啭;我跑到山底,观游鱼嬉戏,小溪潺潺地在向我倾诉……。

贵清和石川,山好水好,农民勤劳,理当过舒心日子,然而,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挠心。

九、住病房的日子

三月底,我突患眼疾,不得不终止任务。我的眼疾还是在大炼钢铁搞试验炉时种的祸根。由于没有防护镜,在窥视炉内状况时被炉渣灼伤角膜。当时不觉很严重,没有吭声。如今发作起来,肿如核桃,不得不治。先后到县医院、洛门矿泉疗养院诊疗,病情不见好转,四月初返回兰大,住进学校病号室。

病号室设在文科楼前的一排平房里,原是建筑工人的临时住所,极其简陋。好在每个病号单住一间,倒也清静方便。离校近一年,大家不通讯息,现在好友相见,分外欣喜,彼此将别后的经历娓娓诉说。我讲了自己的经见和故事,大家听了如同听《天方夜谭》一般,既觉新鲜又不可思议。

只在这时我才知道,在校师生遵张仲良之命,理科各系悉数到陇南天水武柴乡太碌(位于葡萄园站与建河站之间)去参加大炼钢铁会战,文科各系去引洮工地,连年过五旬的左宗杞先生也莫能例外。这位全国分析化学权威,远没有我幸运,与所有师生一样,只能风餐露宿在天寒地冻的荒野,干着爬山涉水背矿石的重体力劳动。冯淑筠君告诉我,矿石在山上,原本无路,左先生高度近视,戴副眼镜,身薄力单,莫说背矿,上山下山空手也难以应付。山下是条河,

他看不过意,担着风险背左先生涉水过河。吕佩璜年轻,不堪忍受这苦,宁不要学籍,跑了(吕缓生送他)。小伙子尚且不堪其苦,左先生难奈程度可想而知。

左先生是我最崇敬的学者之一。兰大新化学楼是她按照当时世界一流水准亲自主持设计和亲自监督施工的。有一次,她凿开已浇筑水泥的地板发现钢筋使用规格不符合设计要求,执意要施工方返工。大楼竣工验收又因质量未达设计标准她断然拒绝签字。为此激怒某些权势者。左先生的品性、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一斑见全豹。

反右期间,她受尽羞辱折磨。记得化学楼系办公室外墙走廊上贴着一张针对左先生的大字报,是一位“医生”给左先生“治病”开的“处方”。其中写道:心脏在胸右侧 先天性畸形 病因 思想反动、反党夺权 处方 换心换骨。医师xxx。这位“医师”我认得的,是化学系助教,年约30,人长得很一般,嘴唇厚,特爱打扮,终日抹着口红(当时抹口红极少见,故而印象至深)。当人们再编造不出谎言时,有人还要言之无物把别人作践一番,这是人性的一大悲哀。

“大炼钢铁”之时,陈时伟教授早遭夹边沟劳教,夫妻天各一方;女儿高考居全省之冠,却被大学拒于门外,左先生孑然一身。心中的愁苦与悲哀非普通人能想象和体会。她能坚持挺住,该是何等不易!倘若炼出真铁真钢来,先生即使再苦再累,或许也会感到欣慰,偏是骗人的假货,劳民伤财。先生欲言不能,眼睁睁看着胡作非为,科学良知在心灵上产生的痛楚,谁能知其味?

(正写到此,刚从兰大胡晓愚教授处获知,先生已在数年前溘然长逝!愿我的这段文字化作一瓣心花,遥寄先生灵前。先生的高风亮节与日月同辉,不殒不灭;先生永远是良师、楷模,丰碑镌刻在学生的心上!)

校内同学早已泾渭分明,左、中、右隔着鸿沟壁垒,尽管同室而眠,同灶而餐,竟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留校的右派同学处境并不比我强,甚至更坏、更糟。大家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兰州炼油厂1958年冬开挖土方,敷设地下管道工程,挖沟深至六、七米,沟

深坡陡，须将底下的土用筐抬至地面。抬筐时，左派总是选几个身强力壮的来对付一个右派，经常是双筐、三筐迭在一起，将筐推向右派的一端，要你承受百分之七、八十的重量。直挪到你脚跟，使你无法举步走路，脚后跟与土筐磕碰，碰得鲜血直流！左派每抬两、三趟，便替换去干装筐的轻活，右派必须一连抬筐四班，一抬到底。

我听了感慨万千，照以前又会出口骂人，如今心里愤怒难耐，只不说。想起在联丰社割大麻、锄草时受到社员的照顾，很为自己庆幸。读书人比大老粗毕竟有心计，再恶毒的法子想得到、做得出。

兰大生活今非昔比，早就定量供应，主食杂粮多、细粮少。70%的杂粮多为玉米面，蒸的馒头黄惨惨的，有时蒸成发糕，有甜味，都还可口。只是定量标准，包括女生在内，都已不能饱腹，尤其副食很糟，菜肴少见油花，肉食有时一周难得一见。偶有荤腥供应，膳食科事先“号外”公布，师生顾不得上课，蜂涌而至。倏忽间，弯弯曲曲排出长蛇阵，总有两、三百米长。排在前面是幸运的，排在后面的虽站了两、三小时，站得腰酸腿胀脚发麻，到得跟前已是锅空盆罄，只得暗吞津唾怏怏而归，无人敢发一句牢骚。

有一天，校园锣鼓震天，招来众多师生围观。原来兰大伙房的炊事员放了一个大“卫星”：用一斤包谷面居然制作出七斤发糕！炊事员抬着大红喜报和一幅醒目的招贴画——两个头戴白高帽、身着白大褂、红光满面的炊事员，抬着一簸箕盆大的发糕，去向中共甘肃省委报喜。所幸面露菜色的师生和者甚寡。我心里想，一斤包谷面所含蛋白质、淀粉、脂肪、各种维生素都是定值，产生多少热量也是定值，即使制出一万斤发糕来，它们不能增加一丝一毫。“瞎子点灯白费蜡”，劳民伤财，偏偏这事发生在最讲科学的大学校园，大学眼看要成“愚人堂”了。大家吃饭的家什，由小碗变大碗，由大碗成大盆，饥饿感有增无减（最严重的1960年春，学生每餐是一盆两面的菜糊糊，其中的菜有时是野菜甚至是树叶）。

操场上已不见龙腾虎跃的矫健身影，连那些咋咋乎乎、颐指气使的“优秀族”，也少了过去骄横的底气，发蔫了。

光靠学生食堂已难以为继。我们几个又“囊中羞涩”，只翟所迪

家中景况较好，偶尔他作东，邀我们到街上饭馆一顾。市面百货匮乏，尤进“口”货奇缺且贵，到处有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主食是二两一个的“金裹银”（外表是白面，里面是玉米面）。饭堂里拥挤乞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向你伸出脏黑、干瘪的双手，眼里露出苦涩无奈、求助的神色，使人不忍吞咽！没等到顾客离座，便拿走碗和盘碟，用舌头将残羹剩汤舔个干干净净。

没有57年的“反右”，“一言堂”不会来得这么快，不会有吹牛皮大比拚；甚至不会发生眼下以及随后的全国大饥馑。我和我的几位同学对此都有深切的认识体会，只是我们从议论这些。

疗治一月，角膜伤口基本愈合，左眼的视力由一点五下降为零点二，医生说，以后多少还能恢复些，斑痕块不大，无碍外貌。

“大炼钢铁”运动终于过去，凡参加者无不留下烙印，有的在肉体上，有的在心灵上。我，两方面俱有所获，值得“庆幸”。

第四章 求索之路

一、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五月的武山正值青黄不接时候，多数农民的腹中火烧火燎一般。满街上处处有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他们无钱乘车，只得且逃且行向西，目标是去新疆。尽管已是一片肃杀之气，大跃进鼓点非但不停歇，竟越擂越响。此时又花样翻新，提的口号是：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任务早布置下来，柴志德我们四人搞社办工厂，并且，就在我回校治病一月时间，柴、张、苗在杜家垅已办起一个“化工厂”。为便于我养病，他仨要我在这个“厂”看家坐镇，他们则去县城东边十里许的上街子筹建一个新厂。

我很感激诸学长对我的照顾。但是，当我到杜家垅厂里一看，

心凉得发颤！天呐，这是个什么玩意哟，“胡日鬼”竟此！这是谁的馊主意？

杜家垅是个好地方。它位于渭河北岸，与武山县城隔河相望，相距不过一华里，河上有正规的大桥相通。一条大马路过桥直达县医院，杜家垅就在医院西侧，四周林木掩映，景色宜人。厂址在一个四合院里，四面有一人多高的土围墙围着，墙外是密密一片杏林，此时郁郁葱葱，花团锦簇。老令介绍说，这儿的杏又大又甜，远近有名。

令队长领我把四合院看个遍。房屋还算齐整，北边正房有高高廊阶，房高屋空，屋里只砌有一个大灶，尚未点火；一排东厢房全空着；西房是个贯通的大间，一排土炕，炕上有衣被等物，住着八、九个人。南面下房西头一间是办公室兼卧室，有个双人土炕，一张桌、一把椅。它的隔壁是间大房，置放 10 几只大瓦缸，缸上一律覆盖着厚草垫，弥漫出浓浓的尿臊气。院里只一眼石磨。

老令虽刚五十，满脸皱折，细眯眯的双眼总象在笑，下巴尖削，中共党员，一个老实巴交的典型农民。他带着 10 个妇女在此操持，其中有两个十七、八的姑娘，其余是年轻媳妇和半老徐娘。

办公室的墙上赫然贴着两张大纸，上面写着一串化学反应方程式，我认得是老柴的手笔。柴是我学长，一向受我敬重。他万不该出这个馊主意，胆子太大，我怕这“西洋镜”被人戳穿。那些方程式不过纸老虎，其用心是唬人的。柴兄用人尿在一定温度下使尿素发酵转变为碳酸铵，然后利用化学平衡移动原理，使粉末石膏微量溶解后于溶液中交换离子，最终转化得到硫酸铵化肥。这在理论上或许成立，实践上却无意义、不可行的。人尿中尿素含量微不足道，发酵转化成硫酸铵慢且难；即使完全得以发酵并交换，数量极有限，一月两月得半斤、一斤硫酸铵，花几百个劳力，得不偿失。没想到的是，我们曾切齿痛恨的瞎胡闹，如今自己也胡闹起来。

可是，生米已煮成熟饭，我又能说什么呢。

老令每早到城里担尿，带劳力到山上寻挖石膏，兢兢业业，忙得马不停蹄。他从不谈任何人，只用行动带动大家自觉干活。小院

里两个年龄大些的妇女砸石膏，然后将小粒放到磨盘磨成粉末。大家干这些劳动不紧不慢，井井有条。没有什么事需要我来“指导”，砸石膏，磨粉，倒入大缸尿中浸泡，盖上草垫，等待发酵与交换，大家轻车熟路，再笨的人一看便会。我落得成天看书，躲在办公室不出门。只是隔天进城一趟，看看书店有无我需要的新书，到县文化馆翻翻两日的《人民日报》，是我必修的功课。县文化馆的白胡子馆长是贺家店人，搞不清过去干过什么，知道属于“统战对象”，他对我已是很熟悉了。

然而，不多几天工夫，数、理、化和外语的专业书便读不下去，大脑如同一团乱麻，心绪糟糕透了。每趟进城都看见一些烦心事，遇到令我揪心的人。那些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逃难人流，有的来自甘谷（此时属武山管辖）北山的礼辛公社；有的来自邻县通渭。他们告诉我，公共食堂早已断炊关门，已经饿死不少人！象他们这些能够走动跑到外头乞讨要饭的，都是命大的；还有许许多多走不动的，正在家里等死。天呐，人民的政府咋能见死不救呢？这些淳朴农民都是党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所依靠的基本群众呵。这究竟咋回事？

每进一次城，不多的粮票和钱都倾囊而尽；每进一次城，回来便坐立不安、悲愤不已。心在颤抖，在流血。我要写！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这儿发生的情况，为民说言，即使头颅搬家也不惜！当我奋笔直书时，脑中又出现相反的驳词：党中央、毛主席难道不相信他的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而竟去相信你这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多么幼稚可笑！各级领导明明说是“形势一片大好”，你说逃荒讨饭、饿死人，这不是恶毒造谣、污蔑攻击又是什么？只怕你的上书上面不见踪影，你的小命早粉身碎骨了！

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每次进城回来，我都经过这样剧烈的冲动、剧烈的斗争，心潮起伏澎湃，难以自禁。我想起同窗好友对我的叮嘱：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管住自己的嘴巴，即使天塌地陷也要沉住气，努力劳动，争取尽早归来。可是，可是，我如何能控制

得住呢？我是一个堂堂正正有灵有肉的人呵，没有人的感情行吗？……我多么希望自己眼瞎、耳聋，变成无知无觉的一截木头，那该多自在幸福！罢，罢，罢，写也无用，白白找死，何苦哩。

在这种心境下，理科的书再也看不下去，思想变得深沉又固执：这搞法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呢？我开始一反过去，白天黑夜地狂读起马列的著作，希望从经典中找出疑问的答案。我借得《资本论》，和马恩的其他著作，认真读起来，尽量少进城，以减少视觉、听觉带来的刺激。

有一次进城，刚走到渭河桥头，路边地里竖着一块大木牌，由不得近前一观。牌子上写的是毛主席给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叫社员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听上面党委、公社的瞎指挥。

我看了这信，信中指示诚然是很对的，仔细一想又有“滑天下之大稽”之感。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想种什么就种什么”，还“计划”什么，计划经济不落空？公社化，土地公社所有，所有土地由公社、管理区、大队统一管着，社员手中无地可供支配，如何“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到哪里去种？生产队的地种什么与不种什么，岂容“社员同志们”七嘴八舌作主。要是这样，把党的领导和基层政权又置于何地？敢不要党的领导、想反党？不要听上面党委的，听谁的？岂不是叫“社员同志们”去反党，该不是又在“引蛇出洞”吧。公社化后，农民不只失去对土地的支配权、使用权，连起码的人身自由、自由劳动权也荡然无存。生产队叫你六点上工、晚上九点收工，你敢迟到、早退？队长今天叫你割麦、明天叫你锄草，你敢不服从调配？你不服从也可以，食堂的勺把子掌握在书记、队长手里，明天起停你的伙食！看你老实不！不只种什么不由“社员同志们”，收获多少，留多少口粮、种籽、饲料，交多少公粮，卖多少购粮，全由领导决定，无须“社员同志们”操心的。

“亡羊补牢”没补到地方，仅补在毛主席的嘴上，等于什么没说。信是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写的，可是，“右倾、小脚女人”

是谁在天天喊？党委不听你的，行吗？敢吗？“社员同志们”不听党委的，行吗？敢吗？你才是“共产风”、“浮夸风”真正源头，还煞有其事把一切责任推给下级党委头上！

除了一拨拨逃荒讨饭的饥民，每到县城或走在乡间小道，还时常看到一队队“劳教队”。受管制的劳教分子个个黄皮寡瘦，无精打采，队列的后边跟着荷枪的基干民兵。我知道那人群里不乏贫下中农，不乏有识之士，不乏敢说真话敢揭假、敢顶撞瞎指挥的人。心里不停地警告自己：要以他们为鉴呵。

有一天，几个在洛门公社龙泉、百泉“劳考”的同学老远跑来找我，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听说你条件不错，来打“游击”来了！”（打游击：即解馋、搓一顿之意。）

这些同学有褚松村，陈德根，杨贤勇（后一位我记得不确切。）褚是地理系二年级，陈是生物系二年级，杨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当时他们都在农村背粪背斗，生活与社员无异，已是穷困潦倒，饥肠辘辘，个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比起他们我确实条件不错，既无体力劳动，还得到胞姐的接济。二话没说，买来几斤大米，两斤白糖，一只鸡，全掺一起焖了一大锅，（这种烹饪法大约无人有过。）大家饱餐一顿。是晚留住我处，炕小又只一条被子，四个靠墙半躺着，被子横盖在腿上，所幸夏夜不冷，大家要我“坦白交代”恋爱故事，说到大天亮。

不久，工人中增加了一位新丁，是位五十有几、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她家住在离杜家塄六、七里的魏家庄。原来的工人无一五十之龄，且来自本地的同一生产队。她年纪这么大，一双脚比“三寸金莲”大不了多少，每天跑这么远来上班，收工又跑几里地回家，多麻烦。我心里颇感奇怪，生出一些莫名的同情与怜悯来。她一来，不待分配，便主动去推石碾，干这唯一的重活。老妪从不吭声，木呆呆地哑巴一般，象围磨盘转的老牛。砸石膏的女社员原本都是同一生产小队，相互很熟，边干活边扯家常，说些体己话，就像老妪不存在似的。

一天，有位女干部来看望老妪，是她女儿，年约三十，端庄沉

稳。在与我交谈中,才知老姬系地主成份,老伴年过六旬,队里仍派去参加“引洮”工程,因累和饿,在工地上吊自杀了,才又将老姬打发到这儿来监督劳动。女干部高中毕业,刚解放参加革命,时任县妇联主任。她言辞谨慎,惟亲情难割舍,我能窥到她内心难言的隐痛。

没过多久,我调东顺化工厂又与柴、张、苗会合,这儿的摊子由马启凯支应。(马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90年代后期听谭蝉雪说,他在大学中文系教授职上退休。)

东顺化工厂直属城关公社党委领导,与杜家垆不同,有工厂味儿,也生产出几种货真价实的产品投放市场,办成了几桩事。先建成一个小型水电站,水轮机、发电机安装调试,配电盘、内外线均由我们独立完成,除供厂动力用电还供管理区照明;生产“东风牌”肥皂(用太古油——又名土耳其红油代油脂);生产农药石硫合剂;塔式硫酸车间(挖的地槽)花两月时间建成投产,生产出的硫酸虽品位不高,却货真价实。当时市场上肥皂脱销,硫酸奇缺,产品供不应求。

东顺化工厂距武山县城十华里,离武山火车站五华里,位于东顺管理区上街子村的渭河南岸,河对岸是洛门公社管辖的百泉。除我们原有的四个同学外,因人手不够,又调来另一位同学孙和(历史系二年级,上海人氏。)。公社给厂里配备一位姓邓的厂长,一位会计,有20名从农村招来的男女青年工人。工人拿工资,每月20元。建厂与生产的一些过程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因工作关系,我和我的同学得以认识杜映华。

杜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当时是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他个头偏矮,皮肤黝黑,五官无甚特色。每次去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的答复既简短又明确:做任何事要想着农民和农业生产,要有利于农民和农业,从实际出发,不搞瞎、哄、骗。他直率坦诚,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与当时流行的作派截然不同。以后我逐渐得以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还知道他有一颗滚烫的心!不忘农民疾苦,极富同情心、正义感,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解放

前入党的地下党员。解放前就读于陇西师范,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参加和领导学运,积极要求进步,冒着生死威胁投入到党的怀抱。解放初他是漳县县委副书记,资历比解放后入党的张十存、张克仁老得多。由于他为人忠厚,对上不会溜拍,对下不会欺压,更不会吹,仕途上非但无长进反走的下坡路。他对时下盛行的吹牛风极有看法,对农民的生活状况忧心如焚。

此时(1959年8月),灾情在迅速扩大,饥饿在蔓延。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垆、百泉、龙泉、下街子与上街子村,原是武山的富庶之乡,也已风声鹤唳情急似火。正在灌浆的包谷地,生产队须派社员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即使如此,饥饿无奈的社员总要想方设法解决肚皮问题。河这岸的于夜里涉过河去偷掰对岸的,对岸的也一样;这队偷掰那队的,他们既是守卫者又是偷盗者。“贼”喊“捉贼”,夜夜盈野。因“偷盗”引发斗殴甚至致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位于邓家堡地方的一社员因偷挖土豆将看守者用铁锨砍死即是一例。

“偷”非偷,“贼”非贼。这些东西原是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本该属他们所有。如今不得不偷自己的东西,主人竟成贼!

二、创办盐井公社综合化肥厂

八月,工作又有变动,和苗庆久一道调盐井公社办厂。

魏宏模原是城关公社第二书记,与县委一把手很“铁”,同属“少壮派”人。数月前晋升为县委常委、盐井公社第一书记。盐井公社的地盘即原漳县几乎全县范围,大得“蝎虎”,自然要派一个得力可靠的干部坐镇。魏向县委点名要我俩。

意外的是,在办转迁粮油关系时,我俩不但干部待遇,还特批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定量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一般干部每月供应标准: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且百分之六十为杂粮。)。对这种破格优待,我并不“受宠若惊”,心里很反感:我俩算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严格说来恐怕一般知识分子都不够格。我意欲拒之,苗一把拉住我,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心虚害怕,怕

“好吃难消化”，怕人家以后反咬一口说我们自己吹的牛。魏的用心我俩心中很清楚：无非要我们拼命效力，替他争光创牌子。

公社社址不在盐井，在原漳县县城。公社党委和公社分占着原漳县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第一书记魏宏模极少与我俩照面打交道，他要掌握全盘。直接给我俩布置任务的，是公社工业部长贾政兴，一个年过40身材魁梧、四平八稳又没有坏心眼的忠厚人。根据魏的旨意，要我俩筹建一个综合化肥厂，厂址选在县城东北离原炼钢基地不过200米的地方，原是一座砖瓦厂的旧址。四面有围墙，有十亩地大小。围墙里东南两面两排简易平房，西端并排两座旧砖窑。院里种满卷心菜，此时都长得老大一棵。砖瓦厂因何倒闭不得而知，工人都解散回家，惟留下两位元老。一位是工人师傅贾义；一个是原砖厂的会计。（姓王？忘记名字了。）

贾老已六旬有余，身材高大，身板硬朗，脸色红润，两目炯炯有神。他是烧窑、炆窑的老把式，在漳县、陇西、珉县闻名遐迩，常有人来请他去“看火”。他的老伴也六十已过，小脚，眉慈目善，福福泰泰的模样。老两口带着小外孙女一起生活，住在围墙外渠畔的两间小土屋里。

姓王的留守会计三十好几，长得尖嘴猴腮，门牙向外翻，舌头大，说话含混不清，偏又多嘴长舌，是个什么都不会的人。他是会计，却不会做账，不会成本核算，还要我来教他。

根据公社的安排指示，从各管理区、生产队选拔招得20名工人，有男有女，个个聪明伶俐，最大的二十挂零，最小的才十六、七，文化程度由高中到小学，参差不齐。年轻工人（社员）给厂里带来勃勃生机，带来欢歌笑语，带来劳动干劲和速度。进度比预期要快，厂子一天一个样。这20名工人全是拿工资的（每月20元？我记不准了。），我和苗此时也特批每月拿30元技术津贴。还有贾老（他工资最高，每月是六十多元）和会计的工资，要养活自己和大家，担子全压在我俩身上，没有能赚钱的产品不行。当时硫酸市场销路看好，这儿又有黄铁矿，我们先建塔式硫酸车间。贾老负责砌炉，又从甘谷姚家庄购来陶管和储酸罐，只一月功夫，硫酸车间便投产了。这

期间只遇到一点小麻烦：因买不到电动机，弄来一匹小柴油机，苗和我此前都未摆弄过机器，倒腾两、三个小时才把它发动起来。

只20名工人的小厂，公社没派厂长和别的干部，工人们把我俩称作“技术员”，其实我们什么都管。贾部长隔日来看看，从不干预，不指手划脚。这种宽松的环境反而激发出更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我俩稳打稳扎，项目一个个上，弄成一个再搞第二个。靠围墙南边的一排平房有三间，第二个项目拟建菌肥车间，生产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三种菌肥。菌肥过去虽没搞过，手头有一套完整的资料，一看便会，关键是菌种要可靠，消毒要严密。

老苗和我与贾老一家一块儿吃饭，每月的粮、油、津贴如数交贾老掌管，大娘做什么我们吃什么，既不过问又不挑剔。常吃卷心菜下面片，偶尔买得鸡蛋（吃食奇缺、贵得惊人，鸡蛋两元三个；二两不到的饼子一元一个。），和着卷心菜做馅，包顿饺子或吃顿烙饼算是改善生活。我俩很满足，比起厂里年轻工人和农民，这已是天堂生活了。尤其是老两口待苗和我亲同父母视如己出，事事关怀操心，八、九岁的女孩“叔叔、叔叔”不停的喊，甜甜地，使我俩感到如家的温暖与亲情。

厂里年轻工人的生活只初来一个月还算将就，随后便江河日下难以为继。他们虽拿工资并非城镇户口，不享受国家粮油供应，必须每月回生产队带粮。起初听说是每月二十四斤，对年轻人已是半饥半饱，只得到处寻拣包谷棒瓢子用木槌捣碎，再挖厂房的卷心菜煮糊糊帮补。会计发现工人挖卷心菜（连茎根），每每要指桑骂槐一顿，仿佛这菜是他的私有。

一个多月来忙得“车轱辘”转，没挪窝出过厂门。我俩不只技术指导，也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实干家。和泥、挖地基、砌墙……什么活都干，深得工人的敬重和喜欢。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始终牢记，能与他们平起平坐劳动与相处，已是受“抬举”，自然对他们不摆臭架子。这伙农村青年直率坦诚很好相处，他们有话也乐意对我们说，发生在农村的许多严重情况得以听闻。不过，听了这些，我和老苗从不开口表态。

九月底,我出差北京购买菌种。尽管思想上已有太多的迷惑、对现实有太多的“看不惯”,有愤怒甚至痛恨,却总是告诫自己:生活在偏僻的一隅之地,全国这么大,难免不发生一些怪事情,千万莫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的错误呵。尤其对划我右派不服,更要警惕自己带着个人情绪把社会看得一团漆黑,妄下结论。这次机会难得,一定要多看多听才是。

我看到的情况很糟。尤其陇西、武山、甘谷直到宝鸡的甘肃地段。站台四处成群结队的饥民,伸着脏黑的手向车上旅客乞食,哀声凄楚。列车上也有乞讨者,在甘谷站附近有位40左右的妇女牵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来到我的座位旁,言她母子已两天没进食。我当时正买了几个饼子放在茶几上,全给了她。她拉着儿子“扑通”跪在我面前,声声“救命恩人”地唤,我的心针戳一般。

我在太原下车。是假道看望我哥的,我们有整5年没见过面。其时我哥由北京化工部调山西化工设计院工作,临时又在南堰省化工学校兼教制图课。手足情深,相见时的亲热激动自不必叙。哥哥邀请我听他的课。课讲得一般,主要是语言不生动,重点难点又强调不够。一般学生听他的课我担心犯困。我哥又把我介绍给设计院的总工,并邀请我去列席一个拟建中的电石厂设计研讨会。总工知道我是兰大化学系的,临末要我谈点意见。我比较富于联想,基础知识还算可以,加之年轻气盛,乃不知天高地厚说了一通,竟受到总工和与会者的谬赞。

哥哥比我长得高大白净,相貌堂堂,此时二十九岁,已有女友,叫张xx,山西师大物理系本科毕业,也是该校老师。我又应邀听了她的课。她的课讲得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事后才知她是该校最



1959年10月“劳考”期间

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张长得不算太漂亮,却善良热情能干,对我如亲弟一样。

在太原呆了四天,正值国庆放假期间,住在哥哥女友张家,是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张的爷爷、父亲和几个叔叔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北京、天津工作,有的在大学任教。她现今与母亲和弟妹一起生活,弟妹都念高中。这个家平时少有声音,即使说话也都轻言细语文质彬彬,叫人感到满院书香之气。说来奇怪,张母与我极投缘份,特喜欢我,亲手给我缝了件“青滚身”,非常合身贴体,一穿上身便再舍不得脱。(这件衣服是我最爱,直到62年春节在武山看守所我送给好友冯淑筠御寒。)我陪伴老人看了一场晋剧《下边亭》,在来去的路上搀扶着她,看戏时依偎在老人的怀里,母爱又回到我身上。

只发生一次不太愉快的事。当我把农村见闻向哥哥讲述后,他深感不安。哥哥知我自幼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担心我走极端会出事。他要千方百计说服我,纠正我的看法。

我哥指着太原新盖的一排排高楼大厦质问我:“难道这些不是伟大成就,你为何视而不见?”

我平静地回答:“我眼不瞎耳不聋,自然不会否定这些成就。但是,我相信我见到的比您更全面、更真实、更深刻,我只是没叫成绩蒙住双眼、遮没我的良心。”

哥哥很生气:“这些事你管得了吗,你不去想它不行吗?”

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哥哥这样要求我未免太自私、不公平。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问题,是应该管不应该管的问题,是该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不过,请哥哥放心,我已不是小孩子,能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不会因为个人的委屈而产生偏见,去干非理性的蠢事。”

我们的辩论只能不了了之,再进行下去,我会拔腿而去。我的倔强脾性他是熟知的。哥哥转弯道:“我们兄弟相见太难得,好了,不谈这些令人烦恼的事了。我的任务是叫你吃好、玩好、休息好。”

他哪里知道我此时的心情：我脑中常幻出“鬼门关”前排队的人群，怎能“玩好、休息好”呢。

到北京后，吸取与胞兄发生龃龉不快的教训，只字不提下面情况。我与胞姐分别在53年，那时我还是孩提，如今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了。彼此相见欣喜若狂，姐姐搂着我亲了又亲。

这是我首次来京。姐姐带我四处游览一番。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目不暇接。此时的北京刚庆祝罢10年大庆，尚沉浸在浓浓的余庆之中。果然，人民大会堂等10大建筑，座座气势恢宏，堂皇富丽，巍峨壮观。只是，人的心境不同，观感也就迥异。看在眼里，想在心里：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该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供人享用的，理应人先物后，物为人用。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来更重要、更值得优先吗？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即使在天安门广场，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虽是不断收容、遣送与驱赶，还是能发现饥寒交迫的身影。

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北京的公安保卫确实搞得结实如磐。我刚从中科院红旗菌种厂买到菌种回姐姐家，派出所的人随脚跟来“拜访”，仔细到把小木盒里的菌种也探查一番。

归程中，我在天津、正定、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西安都有意稍事停留。车站是观察认识社会的窗口，虽是走马观花，却无罔无欺：到处是逃荒的饥民，到处是投亲靠友的落难亡命人。总的印象是，以甘肃、河南的情况最严重，河北、陕西次之，似乎山西问题不大。原猜测瞎胡闹的仅甘肃一家，张仲良弄了个“黄袍加身”（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晋升为末位中央候补委员。），谁知全国皆然。

但凡哪个省牛皮吹得越大、声音越响，官们的顶儿便越红；老百姓的日子也就越难熬、越遭殃。

回到厂里将所见所闻对老苗一叙，彼此感叹唏嘘，惟此而已。

老苗告诉我，魏又有新任务下达：从漳县城到三岔镇要搞无轨电车，我听了几乎惊骇得闭了气。

苗以前工作过，颇有社会阅历，善周旋应付。他沉得住气，对我说：“你全力以赴尽快把菌肥搞出来，无轨电车的事我来想办法对付。”

有了可靠菌种，只要把牢消毒、接种这一关，菌肥生产我是成竹在胸的。只在配置菌种培养基时遇到大麻烦。此时工人的生活极恶劣，有的从生产队一月打不来粮，饿得迈不动步。培养基用土豆熬汁（还有琼脂），工人见到土豆如同见到救命的神丹，熬汁的土豆尚未入锅，在洗与切的过程中，一半以上早进了他们的口腹。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一片片、一块块生土豆丢进口中，无法指责他们，我开不了口。

菌肥是在十一月上旬生产成功的。无论菌种的扩大繁殖还是二级菌种的培养全与书本所叙的形态一致。

三、万户萧疏鬼唱歌

时令进入11月，天气冷了，此时的政治气候更冷：寒彻骨髓。

庐山会议已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老总成了罪魁祸首，一撸到底，中国进入绝对“一言堂”时代。毛泽东就是党，党即是毛泽东；只要与毛意见相左，不管是谁，就是“反党”。中央如此，上行下效，各级各层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成“小一言堂”。谁都看“一把手”脸色行事，都变“聪明”了。狠抓阶级斗争（以反右倾为形式）和“一言堂”是双刃剑，使农民原本危艰的日子更为凶险了。

这时，盐井公社调集脱产干部开展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高产再高产”，可公购粮任务没能完成，农民反而大喊肚子饿，诚属咄咄怪事！粮食跑到哪里去了？社员偷了，藏了，这还了得！床上的枕头撕开；火炕刨开；堂前、屋后、鸡厩、猪圈，挖地三尺！枕头里不知何年何月、哪辈人装进的谷糠麦衣撒得满炕满屋，一片狼藉，粮食没寻到一颗。没有哭喊，没有抗争，个个木呆呆地，面无表情。这就是盐井地区的农民啊。

“凡官比民刁”。其实,对农家的情况官们是再清楚不过的,然而还要煞有介事演戏,把农民糟践一通。

正值其时,中共武山县委第一书记在新寺公社召开粮食现场会,与会的是各公社书记、主任。新寺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除留足社员口粮、种子、饲料而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新寺公社的头头好不风光!事后传出真相:除表面上的几麻袋粮食外,如山的麻袋里全装的麦草!!!参加会议者个个心中亮堂,无一人敢戳西洋镜。

亲爱的读者,你见过如此胆大的吹牛家吗?见过如此草菅人命的昏官吗?中华民族素有“吹牛皮不犯死罪”一说,可吹牛皮是能吹死千万条人命的呀!

有个晚上县城放映露天电影,我有整两年没看电影了。心旌摇动,也去观看。放电影的地点在漳县中学(此时称武山三中)校门对过的街口。小小银幕挂在矮屋檐下,朔风吹得幕布晃晃闪闪,天寒人饥来看电影的人稀稀拉拉只数十个。片名:《猪,浑身是宝》,系甘肃电影厂摄制(当时每个省都有一个制片厂)。

在老苗和我来盐井公社前,魏宏模刚调升这儿的“一把手”不多时,就已一鸣惊人了。他把各管理区、生产队的猪全集中一块,谎报实现“一亩地一头猪,以地养猪,以猪养地”的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大发展。魏受到县、地、省的褒扬,红起来了。省上派来制片厂编导实地摄制这一短片。片子拍完,猪也死光,当地人知道底细。表面上这是部“科教片”,骨子里是为魏树碑立传。令始作俑者尴尬的是,片名出来刚露几个镜头,观众全走光了,放映者只好早早收场。

.....

到处在饿死人!1959年11月,有的村子饿死的人已无人埋,没有人挖得动墓穴,抬得动尸体,只好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死人可得四两粮(合125克)补贴。(中学生人数少得可怜,多为干部子女,也饿得够呛,故而乐此不疲。)最先饿死的被认为是“有福”之人,可埋到村外坟地,能得到薄板棺木;后死的用一床破席卷起扔

到村里刨的浅坑里;再后来,无人问津,尸体停在炕上任其腐烂,屋门洞开。通渭、甘谷等地有的村子十室九空,狼群大白天在村里大摇大摆啖撕死尸和将死的人!

“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当时农村的真实写照。

面对浩劫,无依无靠的农民想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安排家庭成员谁应保谁,安排谁先死谁后死的次序,而后从容以待。为了传宗接代续“香火”,女保男,长保幼,先死奶奶后死爷,继之死母死父,要千方百计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这些是几千年封建传统使然。

这就是中国农民。何等善良!何等理性!何等软弱、可怜与可悲!旧社会,发生于民国28年至31年(1939至1942年)前后河南南部的大饥荒我经历的,因记事颇早,依稀忆。——

老天作孽,连年干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死亡笼罩着这片大地。北向店镇白天依旧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各种商品和吃食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镇上有许许多多饥民、乞丐,他们用棉絮裹头,遇到手拿吃食的人,不论大人、小孩,冷不防一把夺来,边跑边回头望,迅速塞进嘴里。遇到凶汉赶来,劈头盖脸毒打一顿;心善的,自认晦气。一到夜晚,家家早早关门闭户,街上到处是哀鸣乞讨之声,求爷爷告奶奶呼爹叫娘,通夜不绝。第二天早上开得门来,街上总有一、二倒毙的饿殍。

.....

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将我偷偷写成的《给党中央的上书》愤怒地撕成粉末(连苗庆久也不知)。

四、《星火》

十月,传来孙自筠在水天被捕的消息,我立刻陷入绝望中。我对毛的最后幻想终于破灭。

孙自筠与我们一块儿下去,分在水天接受“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以观后效”处分。自然,我们所经见的他同样经见。不知在59年何月,他给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红旗》写了封匿名信。据说信的内容是抨击人民公社体制,揭露社会种种弊端,尤其正在出现的农村大面积饥馑情况。这些恰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针锋相对,为以毛为首的当权派所不容。信寄出后,当局费了许多力气才查出作者。孙以‘现行反革命罪’遭逮捕并判重刑(有期十年?)。

孙自筠是个热血男儿,他想我之先,行我之前,我好敬佩他的胆和识。但我不能走他的路,重蹈他的覆辙。

人若只为自己苟活,无异猪狗。面对这无尽的倒行逆施,这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景,这黑白颠倒的人间地狱,我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死得,我为何死不得?我虽只二十一岁,已经看够了,活够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选择爆发!当谭蝉雪来看望老苗时,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普洛米修斯取火之路。如果说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惟有死亡,才能解除心在时刻滴血的痛苦。

谭在五九年十月末专程来看望老苗,住在招待所,此前他俩早有联系。在一年半的朝夕相处中,我和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彼此很信赖,已到无话不谈的程度,他对我如同对弟一般呵护,我待他如兄长一样敬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苗带我去招待所一同晤谭。苗与谭年龄相仿,都是调干生。我在校时已知谭的大名,对她印象不错,很乐意去拜访这位“兰大林希翎”,我称呼她“谭大姐”(直到今天我依然这样称她)。谈话不很多,很快推心置腹。我们有着共同点: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

天气很冷,我上身穿着太原张妈妈为我缝制的“青滚身”,围条咖啡色薄围巾,呢裤,皮鞋。他俩都说我酷似电影《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不但穿着打扮象,连个头,神情竟无二致。

送走老谭,苗与我动手刻印刊物。碰巧原砖瓦厂遗留个小油印

机,正派用场。刊物名为《星火》,老苗在刊名旁画一手擎着一支火炬。有几篇文章:顾雁(平反后,任兰大、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撰写的《发刊辞》,题名:《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好象还有一篇《论粮食问题》也出自张手——我记不准了);胡晓愚先生撰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林昭(北大新闻系毕业)写的叙事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文章都写得很精彩,尤以林昭的诗叫我感动不已。只是篇幅嫌少,不够出一期的。我还以为缺少一篇核心文字,否则,不足以说明大局的情况,无以解人之心急、心忧、心痛。遂与苗商议,由我写篇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文中抨击时弊,挾伐凶顽,痛斥丑行,揭挖根源,矛头直指党内主流派和一切蜕化变质者,直指“一言堂”堂主。(我还写了《自白》。——这篇文字苗参与了意见。原判说我在《星火》上撰文三篇,我不记得还有一篇是什么。)

按说,这篇份量极重的文字,无论从年龄、学识、资历和阅历,不该由我来写,而应由更高素质的人捉笔。由于时间紧迫和情况的紧急,只得我来滥竽充数。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已做好为真理献身的准备了。

五、我和杜映华

一九六〇年元月,我回到城关公社东顺化工厂。我与杜映华接触日多,时常去他家中。杜映华是陇西土店子人,土店子与陇西火车站相隔不远,与鸳鸯镇、贺家店临近。杜的家眷在武山车站陈家门,我由厂到县城往返必经过他家。这是栋破旧简陋的平房,有两间卧室,一间灶房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无沙发也无象样的桌椅,只一张旧方桌和几条木板凳,与普通农家无别。两个男孩。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他的妻子善良贤惠,却不很能干,两个孩子鼻涕拉撒又衣帽不整,屋里也窝窝囊囊不甚整洁,一点不像书记家的作

派。我劳动考察一年半了，曾到过生产队长至公社一级干部的家。他们家里炕上有铺的盖的，床边柜上还码着花花绿绿的被褥；炕桌都是油漆镂花的，擦得锃亮反光，个个家中熨熨贴贴。而且，职务越高，家里摆设越阔，与普通农民家庭泾渭分明，家里一看，一目了然。虽然公社化了，一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被废除，农村的贫富差别并未得到改善。干部凭借手中的特权，多吃多占多分是极普遍的现象，生活资料的拥有程度相差很悬殊。我到过最穷的农民（社员）家，床上只有破席和一床烂被，穷得“叮当响”。象老杜这种干部之家寒碜得不如一个生产小队长，是我万万没料到的。“吃看脸上，穿看身上，贪不贪看床上”。俚语说的有理，杜映华是个清官。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每次都是“洋芋拌汤”外加一小碟咸菜。仅有一次，嫂夫人烙了两张饼，老杜和我都推诿，让给了两个孩子。



1959年的杜映华

我问他年前在新寺公社召开全县粮食现场会的情况（我估计他是与会者之一），这个从不发火的人，竟把我吓一大跳。他怒不可遏，拍桌而起：“全是假的，无耻的欺骗！真想不到世道变成这样！”

“那么，为什么没人当场戳穿呢？”

“谁敢？连彭老总都成了‘反党’，再说有何用，白白牺牲。这股风是上头直接刮下来的，谁能顶得住？”

杜知道许多地县的情况：珉县、漳县、陇西、通渭、定西、徽县、成县、康县、两当、临夏、永登、天祝……，全一样严重。

一天下午，我到公社汇报工作，天已很晚，在公社用罢晚餐，杜留我与他住一起。城关公社在县城后街拐角处。公社街对过有间平

房，是专为杜准备的。有时开会太晚不及回家便住此处。房里有个双人床，一桌一椅一个暖壶，还有脸盆洗漱等物。是晚，我们竟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衷肠，聊了个大通宵。

他问到我的家庭、身世以及“犯错误”的情况。我对他坦言相告，毫无保留。他说：“古来兵不厌诈，对待敌人，为了战而胜之，是可以搞一切‘阴谋诡计’的。可是解放后，共产党夺得政权成唯一的执政党，一切当依宪法办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皆属人民范畴，是人民的一部份。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施以阴谋诡计，设置陷阱，这个前提就是错的。再说，也无此必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一切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还需要用阴谋吗。这样做，失去了道义和信用，冤枉了好人，把自己人硬推到敌人的营垒中去，是很大的失误。现在看来，后果比事情本身还要严重可怕。如今到处坑蒙拐骗，谎言满天飞，无人敢说真话，就是57年反右、59年反右倾的必然后果。这一切是我近来思考反省才有的认识。”

他的话无疑很正确的。他是个有见地、善独立思考的人，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在难能可贵，令我感佩。

我同他谈到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那时我入校不久，朱子清教授从德国回来偶尔向学生们谈及的。他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国际贝母植物碱学术会议（东方他是唯一与会学者），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正好在匈首都布达佩斯，住中国驻匈使馆。为了他的安全，使馆人员劝他不要外出。他还是到大街上转悠了。正象报上所说，街上到处是火是血，个别匈共产党员和干部被“暴徒”捆绑在电线杆上，遭焚烧杀戮，惨不忍睹。可是当“暴徒”知道他是科学家时，自发将他团团围住，保护起来，以防他受到意外伤害。“暴徒”对科学家、医师、教师、律师非常尊重，非常友善。

我当时百思不解。经过57、58、59年的变故，尤其眼下这些触目惊心的事，终于能理解匈牙利事件的原委了。

老杜更是无限感慨。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发生过许多感人的事：有的老乡为了营救八路军战士，宁肯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女；有

些百姓为掩护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解放初期,人民同党的感情何其真挚深厚啊。那是因为我们党路线方针正确,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不谋个人私利,吃苦在前,为人表率。万想不到只有短短几年功夫,我们党变得这么快。现在已是事过境迁、真情不再,老百姓过去那种对党的感情已无处寻觅。在有的地方,老百姓对有的党员和干部,已经切齿痛恨,甚至恨不得啖其肉、寝其皮。匈牙利事件不难想象就是在中国眼前类似的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谈到国际共运的现状;从苏联谈到中国,从斯大林谈到毛泽东;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现在。坦诚相见,披肝沥胆,我俩对问题的看法竟是惊人的一致。

血淋淋的现实使两个血肉之躯悲愤难忍,心潮澎湃;我们直抒胸臆,把生死置之度外,谈话的重心是抨击“个人崇拜”和毛泽东自55年反胡风以来的祸国殃民,倒行逆施。

解放后尤其57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又同时是造“神”运动,每次运动的结果都把毛神化一次,使毛的权力扩大一次,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被削弱一次。1955年反胡风运动是对文艺界民主权利实行剥夺;1957年反右运动是对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民主权利的剥夺;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数亿农民民主权利的剥夺(耕种自主权、劳动自由权、收获分配权等等等剥夺殆尽。);1959年7至8月庐山反右倾运动则是对党内民主的劫掠与剥夺。“民主”步步收缩,收毛泽东一人的股掌中,成为他一己之私。这时,造神运动大功告成,一座泥塑神像金光闪闪,所有人伏在他的脚下顶礼膜拜、山呼万岁。

毛是封建主义之人,他搞的一套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更彻底的封建主义。毛一手遮国,自然有张仲良一手遮省,张十存一手遮县,魏宏模一手遮盐井公社。毛不懂经济偏要大权独揽瞎指挥,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吹牛风,共产风桩桩件件他是源头。大量饿死人的发生,毛是始作俑者。

老杜和我同时相信,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只是被邪气所压,无有实权。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伸张正义,为农民的悲惨处境呼号呐喊。

我把《星火》文章中的观点几乎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只那两句“打倒”的口号没有说出来。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觉天已大亮。我俩谈兴正浓,意犹未尽,既肝胆相照又都肝胆俱裂。

分手后我一路在想,在血与火的年代,面对邪恶,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也许算不得什么,一朝生存条件改变,权力到手,前呼后拥,能保持头脑清醒而不利令智昏,对广大劳苦大众不改初衷,很难。有的为妻儿私情所累;有的难以割舍既得利益;有的怕丢头上“乌纱”,(至于那些原本动机不纯,入党为做官捞好处的姑且不论),昏昏然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这类党员为数不少,他们让私心吞了良心。不只普通党员,庐山会议对彭老总形成“万箭齐发”的局面证明:党内相当多的高层领导干部同样无党性原则可言,泯灭了起码的人的良知。这一切说明,党的肌体的相当一部分已蜕化变质,共产党自身需要一场革命性自我改造与更新。革人家的命容易革自己命难!彭德怀杜映华是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勇于解剖自己并向自己身上毒瘤动刀的人。他们不愧为真正的革命者,真猛士,真英雄。

杜映华坦诚、朴实无华,对任何人没有架子。我在他那呆了一晚上,在我与他没有交心的时候,他主动为我打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是他去打洗漱水、买早点,跑进跑出几趟。我要去做这些,他坚决不让。我这人很古怪,一生中不可能对任何人有架子,也害怕、憎恶一切摆官架的人。凡对我表现出官架的人,我在内心都拒绝接受,不与交往。我的信念是:除了工作中领导与被领导在履行职务职责时而外,在生活中以及一切相处交往中,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即使再大的官诚如国家主席、总统也应该如此。

杜映华就具有这种意识和观念,获得了我对他的敬重,并且一生不忘。

六、我和张春元

五月，张春元兄路过武山顺道看我。他说我在《星火》上的文字有见地，击中要害，同时向我介绍了除东北而外各省的情况。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都很糟糕，四川、河南、安徽则更甚，与甘肃一样，死人如麻。南方惟江西稍安，尚无死人情况发生，即使有也是外省进来的人口，因为有邵式平坐镇，不吹牛说大话，甘冒“右倾”风险，给江西人带来福祉。张兄又告诉我，不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的分分秒秒，都有人偷渡越境，象潮水般往外涌。为了活命，不怕坐牢，不惜冒流血、牺牲危险，不少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往外逃的人，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已是疯狂程度。

我向他通报了杜映华的大致情况。张说，庐山会议证明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即使眼瞎耳聋，也能嗅出全国的狼烟尸臭，只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屈服于一个人的淫威罢了。这种局面断不能长久，我们要和党内的健康力量、和一切良心不泯的人共同奋斗。张执意要见杜，我勉强同意了。他俩从未晤过面，不便多谈，只寒暄几句便告辞出来。时值中午，张兄和我平展展地躺在铁路的南坡上。这儿离车站不远，荫凉僻静。他对我说：“下期《星火》要印它数千份，争取寄到每位县级干部手中，要加快写稿组稿，争取第二期尽快刊发。”我甚赞同他的构想。他沉吟良久，又道：“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遍地哀鸿，尸骨成山！现在很可能只是开始，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头，我们处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时刻。这场旷古浩劫源于个人崇拜，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和独裁专制制度。为人民幸福，为民主制度的实现，千千万万先烈付出了生命，现在轮到咱辈的时候了。我们要与党内、与一切仁人志士共同奋斗。不奋斗，不唤醒民众，农民的悲惨命运无由解救，国家无望，民族无望。”

当我还是黄口小儿的时候，张春元兄已经浴血在朝鲜战场（坦克兵），是个血性青年，他也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我很尊重他。

送走张兄，我立即动手写《食母记》。我想把它写成一篇报告文学，因为是真人真事。动笔之后却为难。只知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大致地点、情节，无法去当地作进一步访查，显然不符合报告文学的要求。不得已，保存主人公姓名和地点，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正值年轻激情、鲜血汹涌在胸，犹如蘸着血和泪，写着一字一句，仅用三个昼夜便脱稿。

七、进地狱的时刻

六月，突然传来老谭在边境被捕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春元君曾告诉我，五·一节老谭住广州某旅社，突遭大搜查，将谭押进收容所，收扣了她随身带的现金八百元（这是春元君写电影剧本《中朝儿女》所得的稿费。在当时，这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大学毕业生一年半的工薪），当局要谭回兰大出具证明后才退还她。她证明没开，钱也不要了，一走了之。无疑给当局留下把柄。这次又出事，我判断：不出数日就会追查到兰大、天水和武山来。为验证我的估计，给洛门同学发一短信，尔后亲到洛门收取，果然发现信被侦查过。

此时，我身上有三篇文章：林昭的诗作《海鸥之歌》，何之明的政论《再论人民公社》和我的拙作《食母记》。我把这三篇文字又认真捧读一遍，竟爱不释手，不忍心焚毁。尤其林昭的诗，写得太好了！与她的《普洛米士斯受难的一日》可谓“姐妹篇”，撼人心魄。我的拙文是从我的血泪中流淌出来的，如今要亲手掐死它，犹如父杀子，难以下手。理性告诉我，在一个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制度下，这些文字足可构成死罪，为了不株连友朋，必须狠心付之一炬。

1960年9月29日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一早，来了位“干部”，手持令函。说是公社派我去贺家店，任务是将一盘水磨改造为一个轧花车间。紧接着来了辆马车拉我的行李和书籍，甚觉蹊跷可疑，只能受命前往。到贺家店镇已是下午四时许，有人安排我住在一间办公室里。屋里有张床，一桌一椅，靠里墙有个长条形大面柜。我把

书全码在上面。桌前有扇窗，无玻璃，用纱布遮着。纱布黑黄。这屋是长期没人住过。桌上放着一盏有玻璃罩的煤油灯。

稍稍整理一下床铺，吃了点食品，便动身去水磨转转。水磨在东边的沟口离住地不到两百米。两旁皆山，有条小溪从南山流下来。水磨靠沟的西侧。沿沟直上是去新寺公社的捷径。沟上方很狭窄，只到沟口才变开阔。沟里有高大的白杨树和其它乔木。夕阳西下，有几分阴森。索然无味，便折回住处。

回到住处刚坐定，立即有两位自称管理区的人来“拜访”。说了些“王顾左右而言它”的话，便离去。此时，我非常清楚他们的身份和目的：他们是来“验明正身”的公安便衣。早在瓮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多此一举！随手点亮煤油灯，从面柜上选了一本要读的书。刚捧读，忽的一阵风吹来，灯灭了；重新点亮，刚沉入书海，又一阵风吹熄了灯；凡三次。我不信鬼神，心却烦躁起来，对着窗外大声吼道：“既然是鬼，请鬼快快进门，莫扰我读书！”

十二点过，我刚躺下，尚未入睡。只听得‘啵啵’一声，有人破门而入，同时一声厉吼：“不准动！”几支手电照得小屋如同白昼，其中两只直照射我的眼部。床前站着四条大汉，黑洞洞的枪管直抵到我的鼻梁上。“起床！穿上衣服！”我无意反抗，顺从照做。接着在逮捕证上签字，被五花大绑。继之是搜查。我没想到，对区区一介文弱书生，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书很多，除马列经典而外，便是数理化、外语的大学教科书。四条大汉检查极认真细致，一页页的翻书，从午夜一时直翻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才翻完，一无所获。“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早成公、检、法人员座右铭，绳捆之结实、之狠非常人能想象。先是浑身冒汗，先冒热汗继之冒冷汗，两胳膊立时麻木并很快全身麻木。绳索嵌入肉里、骨里，神经阻断。除大脑而外，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我心里道：林祥谦是人，能忍刀刚刀割之荼毒，我何以不能！我要呻吟一声就是孬种！（绳痕直到两三年后才退。）

搜毕，由绳捆改戴手铐。他们将我的行李捆成背包令我背上，这才押我出屋。

天色灰蒙蒙、阴沉沉。他们把我押到镇中一座大空屋里。这儿原是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所在，我的五名“劳考”同学应该在此用过膳的，如今它成不见炊烟的空屋。屋里坐满社员，黑压压一片。有的坐小凳，大多席地而坐，男女老幼都有。公安人员拿着事先拟好的文稿，朗声读道：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单位的紧密配合下，在中共武山县委的正确领导和统一指挥下，我公安干警英勇机智，协同作战，一举破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将涉案罪犯一网打尽，……这充分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充分证明……”云云。此时，我心静如同止水，无惊无惧，无悲无感，逐一扫视面对我的广大农民群众。他们无一不面露菜色，对我无痛恨之意。每与我目光相遇，便立刻避移。原设想会遇到雷霆怒吼，会受到拳打脚踢，这一切都准备默然承受，没想到都未发生。无一口号，无一群众声讨发言。文稿念毕，大会在寂静中散场。

在县看守所所长办公室，所长履行职责详尽搜身，收缴了裤带、鞋带、现钞、手表后，我一手抱着被褥，一手提着裤子，迈进了地狱之门。所长办公室墙上的挂钟指着1960年9月30日下午四时四十分。

……

悼文篇

④^注悼念胡学忠君

胡学忠君，原籍四川，后定居武汉，家中唯有老母。他是高我一届化学系的学生，我的学长。他蓄着两撇小胡子，宽宽的上额，始终微笑着的嘴巴，中等个头，肩宽背圆，体格健壮，是拳击运动员和兰大校体操队员。他性格活泼、开朗、热情豪放，风流倜傥，是个不知哀愁、把一切视为无所谓的人。

【注】：前三篇悼文因与本案关系不大，故不录。

我熟悉胡兄也是在那个“右派专用食堂”。在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小间里,经常有全校数十名“右派”蹲地而食,久而久之,不同年级、不同系的右派都相熟了。胡兄最先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他有两大大特色:长相特殊,那两撇小胡,当时全校惟他一人;很帅,为人极随和。一看见他的模样,就让你产生可亲可信的好感。他饭量奇大,在数十就餐的“右派”中,只有他和李克家(物理系,兰大篮球校队中锋)每顿要吃八个二两干面的大馒头(因“右派”无钱买副食,主食量都猛增——我一餐也需要4个)。

记得是胡兄先提出星期天打工自救主张的,并带着我和冯淑筠君去具体落实办理。“打工”中,我是个“累赘”,胡兄没有嫌弃我,给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处处把我当成自己的弟弟。那是一种从不言照顾的照顾,不言帮助的帮助,似乎一切帮助都是他“理所当然”的、份内的事,是一种不要任何回报、不准“感谢”的帮助。每当我供应不上师傅所需的“沙浆”时,胡兄总是光膀提两桶小跑冲上竹排梯,不用扁担,有时竟提四桶。我看着胡兄浑身大汗如注,心中又感动又难过。胡兄对我微微笑:又可以对付一个小时,有我在,你放心,一定能保证供应。

58年6月,胡兄和我领到同一等级“待遇”——保留学籍、劳动考察。我们知道“落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辍学已成事实。无论我们怎样热恋时光和学业,必须离开校园。您和屈健英(四川泸州人,历史系“右派”,现为西北民院政治系系主任)领着我,晚上三人象游魂在大街小巷转悠,偶尔钻进小酒肆,要半斤白酒、二两猪脑,边斟边叹,借酒消愁。每当此时,我作为“小弟”,既不会喝酒,又不敢吃猪脑,只在一旁怔怔地看着。我们在心里嘀咕同一个念头:明天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

后来您分到天水北道,我去了武山。只在59年下半年见过一面。

那是“社办工业遍地开花”时节,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奉命办化工厂、化肥厂。我是到天水北道硫酸厂考察,顺便去看望您的。您住在铁路北面,距离胡晓愚先生创办的硫酸厂不远,是一小间农舍。

我找到您的时候,您正在翻阅《有机化学教程》,是那般专注,竟没发现我进屋。当我站在面前的时候,您惊喜若狂,热烈拥抱我。那时,粮食十分紧张,不到二两重的烧饼要卖一元钱,一个鸡蛋卖半块钱。不由分说,您一把拉着我,说是要好好请我吃一顿。那时,要好好吃一顿不是件容易事,少说也得百元,有钱哪里又能买到呢。我心想,只要有土豆、包谷棒子啃饱一顿就不错了。您不吱声,拖着我去北道镇去。路上告诉我,您发现的一个秘密:北道有个铁路职工食堂,什么都有,只供应铁路内部职工。但售票并不查验证件,只要你衣著体面,(他们把农民模样衣衫褴褛的乞讨者坚拒门外,毫不客气)什么都可买到,还有市面绝迹的红烧肉,价格也很便宜。我俩大摇大摆进去,一切果如其言,真解了馋。

这次是我俩最后见的一面,成永诀!仍然把我当成小弟,还是那样坦诚、热情、豪放。

79年11月回兰大,才知道您的遗骸早抛高台荒丘!人世何其不公!

我是60年国庆节前夕被抓进囚笼的,谁料您也入了圈套。幸而‘案情’很轻,只判三年。刑满后婚配成家,生一女。不久,因胃癌病故。您的身体是何等结实哦!如果不是饥饿和劳改营环境的极端恶劣(在那里,死了许许多多犯人),不可能患病;即使患病也可及时发现和治疗,凭您的体质,是不会英年早逝的。您是带着冤屈和遗憾离开这个丑恶人世的。

1979年岁末,您的岳父(西北师大化学系杨教授)带着您的骨肉——一个如花似玉的青春少女来到兰大招待所(2010)房间,看望您昔日的朋友和“同案”。可惜,我恰因事外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

我曾多次打算去师大看望您的岳父母和您女儿,终因百事缠身不能如愿。追梦往事,我常想:见到您的岳父母和您女儿,我又能向他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是一粒尘沙,太渺小了,过着困窘生活,如何帮助别人?

我惟在心中默诵着: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

体同山阿。

我敬爱的胡学长，您安息吧。

2001.9.9

⑤痛悼张春元君

张春元君，河南上蔡人，出身贫苦农民家，曾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任坦克兵，驰骋沙场，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回国后给武汉部队司令员王首道开小车，技术娴熟，反映灵捷，开的车像长了翅膀，快的要飞起来，首长都有些不敢坐。曾荣获全军手枪速射冠军，能击中随手抛向空中的鸡蛋，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1954年转业，经自学，56年考入兰大历史系。1957年被错划右派，1958年与我接受同一级“处分”，下放至天水马跑泉劳动考察；1960年因“右派反革命集团”罪被捕入狱，判无期徒刑。在“文革”的1970年因“坚持反动立场”，于“一打三反”中判死刑。据兰州亲见的人说，与他一道被处决的还有曾任中共漳县县委副书记、武山县委书记处书记的杜映华。执行死刑前，被五花大绑在汽车上游街，见者百万众。

79年张春元兄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纠正；80年3月“右派反革命集团案”除春元兄和我而外，全案平反。直到1981年四月我俩才判无罪，张兄的沉冤才得以昭雪。

张兄个头偏矮，身体结实，为人耿介，义肝侠胆。他出身社会最底层，是农民的儿子，时刻关注着农民的生存状况。在所谓“三年灾害”的悲惨岁月里，凭着良知和一腔热血，奋起为千万奄奄待毙的善良农民生存权而抗争，他是民主斗士，一个真正的人民英雄。

59年上半年我因事出差路过天水，顺便到马跑泉拖拉机站去看望他。他在拖拉机站干得得心应手，既是拖拉机手，又是修理工、技术师傅，整日跑进跑去，很忙累，却很开心，觉得一技之长有了用武之地。那天晚上，他给我看了他已脱稿的电影文学剧本《中朝儿女》。

这是一部根据他在朝鲜战场的生活体验创作的作品，故事情

节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很感人。张兄在这篇作品中热情讴歌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和生命编织的情谊。这个剧本大约59年9月发表在《电影文学》上，笔名司马章，得稿费700元(?)。随即应邀出席长春电影制片厂新片摄制计划会，他的剧本被列入尽快完成的计划中。然而就在此时，因发表时隐瞒了自己的“右派”身份，中共天水马跑泉公社党委致函长影厂，一切泡汤。(顺便提一下：我以后在银幕上看见过几乎情节雷同的影片，总疑心是对张兄作品的剽窃。)

1960年5月，春元兄到武山来专程看我。我俩躺在铁路路基斜坡上，他问道：为什么黑白、善恶颠倒？为什么无人肯讲真话？为什么饿死这么多人无人抗争？中华民族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农村每分每秒都有大量人口在死亡，这种情况在民族史、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过。为民族、人民，无数先烈慷慨赴死，现在轮到咱们献身的时候。春元兄对我在《星火》中的文字作了肯定，对我说：只要人性没有泯灭，都会承认事实，赞同我们的观点，相信这些观点能经受历史的考验。在中共党内，有识之士大有人在，我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春元兄建议积极组稿，《星火》第二期要设法送到每位县级领导手里。我们心急如焚又情急似火，全部心思扑在无助的农民身上。

陪我看望李大娘后，春元兄连夜要赶火车。我们摸着沉沉黑夜，脱光衣服举过头顶，从龙泉淌过渭河。水是那般冷，心是何等热！

我最后见春元兄一面在甘肃省第三监狱(天水监狱)，1963年春节的第二天上午，是一次偶然的彼此“发现”。此前，我关押在一监院，只知何之明在二监院，苗庆久在三监院，杨贤勇在四监院，不知他的下落。我们四个于62年7月1日在洛门群众大会上，被宣判长刑后，由武山看守所转押至天水三监，正等待中院对我们上诉的裁决。我是在严密监控下，由典狱长(姓张，甘谷人)和管教科长带着去参观评比春节壁报，才得以到二监院的。当时春元兄关在二监院靠院门的小监号里，由于过节，监门并未上锁，半开的门让我一眼看出，我恨不能一步跨进门去拥抱您！您当时穿着我送给您的

大衣,还是以往的镇定、坦然。

这匆匆的一瞥,便是我们的永诀!

一切搞独裁的人,最痛恨有识有志之士。这些人勇于追求真理,勇于为悲苦的人民和民族呐喊,勇于自我牺牲,构成对独裁者的威胁,必然最先遭杀戮。他们是社会最优秀者,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春元兄是真猛士,一个胸怀坦荡、忧国忧民、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思想者,比起中国历史上任何英雄毫不逊色。诗人何其芳写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张兄算来已殉难三十年了,仍然活在我心中,活在一切熟悉他的人心中,他的事迹和英名必将记入史册。

我的挚友和兄长张春元永垂不朽!

2001.9.11

⑥悼念杜映华

杜映华,甘肃陇西县土店子人,解放前就学于陇西师范,在校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师范的学生运动,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曾在漳县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后任中共漳县县委副书记。1958年“大跃进”时期,武山县、甘谷县、漳县三县合并为武山县,他任中共武山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合并扩大的武山县,中共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我颇熟悉,都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小学教员,资历和文化程度都不及杜,之所以爬上高位,在于胆子大,敢吹牛;见风使舵,投上级所好。杜映华是纯朴诚实人,不会这一套,不升反降。

我认识并开始与杜映华交往是在1959年上半年。“大炼钢铁”以后,我和另三位同学被指派到城关公社搞“社办工业”,与杜有了接触。

办厂要选厂址、厂房,要人、要物、要钱。那时,头上有“紧箍”,

小心翼翼,事事请示报告,与上面接触也就频繁。我很快发现,杜映华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谦虚谨慎、实事求是、颇有科学精神的人,一个当官无官架、与群众打成一片、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我们拟建一个小化工厂,生产硫酸、肥皂、农药等。建在县城,排出的废气对人们健康不利;建在过于偏僻的地方,交通运输困难。化工厂需动力,除县城有照明电外,别处无电,亦无其它动力替代。我们设想将厂建在离县城不很远、交通较方便的地方,利用渭河水建一小水电站,既为化工厂提供动力,又为当地群众解决生活照明问题。杜听完我们的设想汇报,作了指示。他的话令我感动,令我吃惊。“如今我们有些人办事、想问题不是为人民着想,为农业、农民着想,为生产发展着想,而是为了‘装门面’,做样子给上级看,这种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欺骗能得逞于一时,不能得逞于永远,要遭报应的。‘社办工业’是党中央提倡的,我们当然要搞,但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好高骛远,吹牛弄假,要脚踏实地,量力而行,切切实实办点有益事。你们虽戴有帽子,是有知识的大学生,相信你们有科学精神,能办实事、真事。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国家很穷,拿不出太多钱办工业,但只要对人民有益,我们就要尽力倾心。今后只有决策一类大事你们应请示汇报,具体事你们自己作主。我不是内行,不能不懂装懂,横加干涉。只要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你们做事就不会出格,不会犯错误,你们的知识就一定能派用场。”

此后,我们在城关东顺,搞成了10千瓦小水电站,解决了动力问题,还为管理区装上了电灯;生产“东风牌”肥皂(那时市场肥皂脱销);生产出石灰硫磺合剂(治小麦黄锈病的农药),又生产出硫酸。

1959年9月,中共武山县委组织部来人考核我们的表现,杜建议给我们四个“右派”同学评“一类之一类”。

以后我与杜接触日多,发现他是个心热似火的人,一个富有同情心、正义感的人。庐山会议反彭德怀之后,他直率地向我谈到他

“对党的忧虑”。我对他的“戒备之心”消失,竟产生“相见恨晚”的感觉,我和杜很快成为朋友。

杜映华和我一样,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至死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身为“书记”,始终一身农民打扮,穿着不整不洁,一双老布鞋,浑身农民的“俗气”样,显出普通和平凡。

最平凡的,往往是最伟大、最值得人们敬重和纪念的;渺小的身躯里往往寄寓着一颗圣洁的思想和灵魂。一切堪称“伟大”者,必是平凡者;一切自以为“伟大”者,必为卑屑小人。那些道貌岸然、依靠种种手段将自己乔装打扮成“伟大”的人,其实才是真正没有人性的畜类。

1960年元月的某天,时值隆冬,寒气逼人。那天我到公社向杜汇报工作,直到天黑,要赶回厂去,杜执意留我一用饭,又安排在他的卧寝歇息。当时城关公社在县城西关后街拐角处,他的卧寝在公社大门对面隔街的地方,是间简陋的民房,房间里只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一个脸盆和一个木制脸盆架,一个暖水瓶。他亲到对面公社给我打洗脚水,第二天早上又打洗脸水,为我准备早餐。

那一夜,我俩通宵达旦畅谈,各抒心意。我向他诉说了我凄苦的身世、辛酸的童年;叙说了大学“鸣放”和反右的情况以及我被划右派的经过;谈了我下放以来的诸般见闻和感想;谈到“大跃进”各种欺世骗术;谈到“大炼钢铁”小土炉根本不能炼出铁来的科学道理;谈到无数树木被砍伐付之一炬,对大自然的破坏;最后,又谈到“彭德怀的反革命”和大量饿死人的眼前现实。

老杜对我的诉说一点不感到惊讶,比我了解的情况更多,早在脑中有反思。他说,粮食没生产那么多,都是胡吹出来的,怎么能按吹的数字摊派公购粮呢?上面逼缴,非完成不可,农民就只得喝西北风。粮食没生产出来,到农民家中刨地三尺能挖出来?前不久,县里在新寺公社开粮食现场会,该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全年公购粮任务,留足了饲料种子,余粮还多得很!余粮装在麻袋里,码堆得小山一般,叫大家参观。我们个个心中像镜子一样明白,充其量表面几袋是粮食,其余装的全是麦草!这“西洋镜”无一人敢揭,“前车之

鉴,后事之师”,彭老总去揭,被打成“反党”。这是什么世道?

老杜长吁短叹,我理解他的痛苦和无奈。沉默了好久,我以为他已睡着了,不料他突然象是对我又象是对自己说道,“过去国民党祸国殃民,贪官污吏,民不聊生,我们打倒它,我们是革命者、是正义的,为此我们付出了流血牺牲。推翻蒋家王朝,主要是农民的力量,多少农民家庭送子送夫,为革命捐躯。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历来封建统治者对反抗它的人都施以无情的镇压,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

当时,我的心在受煎熬,灵魂在受屠戮,我带着无穷的困惑正夜以继日地研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向老杜坦陈了我思考初步得到的结论:任何政党、任何政权必须建立在以普选权为前提的民主制基础之上,保证它始终体现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否则,即使宗旨再好,必走到反面去。言论自由,各种不同观点可以互相批评、辩论,让社会、让人民去评判、选择。一言堂,独断独行,是条绝路。任何人都不是神,智慧有限而不能万能,只有经过民主渠道集思广益,才能治理好国家,办好全社会的事。

我俩谈得很投机,都掏出自己的心肺。

以后我们还有多次来往,我几次去过他在陈家门那个简陋的家,他也来找过我。

1960年国庆节头晚,我进了铁笼,两年后我被判18年重刑,才知悉他也被抓判了5年,终未有见面的机会。直到79年回兰大落实政策,才获悉他已和张春元兄一道殉难!

杜映华,一个躲过了国民党军、警、宪、特绞杀的中共地下党员,却躲不过来自本营垒的罪恶子弹!五年短刑,眨眼可过,然而他执著追求真理,拒不向邪恶屈服,向腐朽让步,以致步步升级,走完自己短暂而光辉的生命之旅。

一个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痛苦的人,永远是个高尚的人,值得人民纪念的人。

杜映华,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者,一个不变色的革命者,在“右派反革命集团”全案平反后,他也得到昭雪。据悉,他的两个孩子被安置了工作,一个在武山县城商业部门当营业员,一个在陇西 257 厂当工人。

杜映华的血不会白流,他追求真理、追求民主的精神不死!

2001.9.17

⑦沉痛悼念林昭

林昭殉难已三十多年了,如今报刊杂志时时有纪念她的文章,这表明她没有历史遗忘,她已经活在人们的心中。

中华民族曾涌现过许多巾帼英雄,如秋瑾、江竹筠等。她们的共同点是反封建暴政、反独裁专制、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宁愿慷慨赴死,决不向邪恶、腐朽妥协半步!林昭正是这样一位勇士。她是女性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的英雄行为必将载入史册。

我不曾与林昭来往,但读过她的大作。《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是我亲手于 1959 年冬刻印在《星火》发刊号的。普洛米修士为人类偷来火种,送来光明与温暖,被宙斯用铁链捆绑在巨石的铁桩上,鸢鹰啄食他的血肉之躯,无悔无怨,不退不缩,直到生命殒灭。这首叙事诗强烈震撼我的灵魂,使我青春热血沸腾!我从未读过这般感人的诗篇,即使草木之人,也要动情落泪。毫不夸张地说,林昭仅凭这篇诗章,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1960 年初秋,从上海又捎来林昭的另一诗作:《海欧之歌》(还有何之明兄的政论《再论人民公社》和我的一篇《食母记》)。我正在为《星火》第二期组稿。后因情势紧迫,担心被当局查获作为“罪证”,被我残忍地焚烧。《海欧之歌》与高尔基的《海燕之歌》相比,异曲同工,毫不逊色;是《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的姐妹篇。

我是在 1979 年在服满 18 年长刑后回兰大落实政策时,才听说一些有关林昭情况的,当时不敢相信。直到 1981 年的 4-5 月份,胡晓愚先生给我寄来《民主与法治》(81 年 3 月?),登有《林昭之死》一文,文头赫然是林昭半身侧面像,才知实情!中国倒下了一位民主斗士,少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北大算是做得不错,新闻系系主任亲自主持开林昭追悼会,令活着的人多少得点欣慰。(相比之下,在兰大,史美唐、冯淑筠、邓得银、张春元、胡学忠……他们虽都得到平反,竟无一人开过追悼会)。

我常常想,人与人多么不同!林昭、张春元、杜映华原判都并非“极刑”,只因执著地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死不悔改”才走到遭杀戮的地步。大多数人(如我)为了苟且活命,只能在强权下屈服(即使是表面上)。还有个别昔日追求真理的勇士,在囹圄中不惜投身卖靠权势,陷害难友,以换得信任、照顾。此三类人,谁良谁莠?所以我说,先死者乃最优者。在非民主体制下,社会必然实行逆选择,这是中华民族落后、愚昧的深层次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林昭被处决后,当局向其亲属索取了五分钱子弹费!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拍案叫“绝”,真不能想象:有人做事做到如此“绝”的程度!我真的理解鲁迅的“呜呼,我无话可说”的感情了。

如今,我面对林昭的半身侧面头像:那飘逸的头发,那倔犟的脖颈,那微翘向上的、不屈的头颅,还有那傲视苍穹的双眸,俨然一副自由女神雕塑。自从读了她的两篇诗文,我心中涌出对她钦敬的感情!

林昭就是无畏的普洛米修士!就是迎着血雨腥风、惊涛恶浪,搏击苍穹的海鸥!

林昭,我心中永远的骄傲!

“光明已经照到古罗马的城头”。一个民主与科学、自由与博爱的中华民族必将出现在世界东方,这是人类的普遍理性使然,是社会规律使然,任何邪恶势力无法阻挡得了。未来的炎黄子孙呵,在

你们享受着民主与科学的甜果,在和谐与温馨中生活的时候,请莫忘万千个曾为这一崇高理想英勇献身的人们!

林昭英名与日月同辉,她的浩然正气永驻人间。

2001.9.19

关于所谓“右派反革命集团” 发生的历史背景和若干问题

1、历史背景和由来:

1958年6月底或7月上旬,兰大受第二类处分(保留公职或学籍、劳动考察)的“右派”师生一行约四十人,由中共甘肃省委统一发配至天水地区,后又由天水地委“一分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去武山县。在天水市的师生分别在北道埠公社、马跑泉公社、麦积山公社等处生产队;在武山的分在城关公社和洛门公社。

到农村约一月余,开始“公社化”运动,紧接着“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不仅耳闻目睹而且亲历无数的荒诞,生活在最底层又背着沉重“十字架”,惟“规规矩矩”劳动而已。

1959年春节前后,“大饥馑”笼罩着甘肃、大西北、整个中国,广大农村,公共食堂相继断炊,农民离乡背井纷纷出逃乞讨,以榆树皮为食,“观音土”充饥,四川、安徽、河南、甘肃……,有的全村、全家饿死殆尽;有的家庭死尸挺在炕上无人埋,惨不忍睹。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发生的大饥馑,是毛泽东的左倾路线一手造成的,任何人想掩盖真象终是徒劳,历史将证明这一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为10.19%;1960年,人口减少1,100万,净增率为-45.7%;1961年继续减少348万,净增率为-3.78%(《庐山会议实录》第374页)——笔者对此统计数字尚存质疑,因为,众所周知:在毛时期,中国乃无

《统计学》科学可言,究竟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成悬案。不过,较为诚实的刘少奇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右派反革命集团”正是发生在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在只要稍有人性就不能无动于衷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空前浩劫,一群知识热血青年挺身而出,怀着救民于水火、救民族于危亡的圣洁理想,置自己安危而不顾。他们有高度理性,为“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所系。

所谓“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明眼人一眼看出乃是“莫须有”罪名的强加,任何组织不会用此名称给自己冠名。无名称、无纲领、无组织、无职务、无分工,世界上有这样的“组织”吗?唯一有的只是彼此间正常思想的沟通、观点的交流。民主制国家,这一切属公民权利,不违法而受法律保护。毛时代中国视为“大逆”,“涉案人”三人先后被杀,众多人等牢狱酷刑,受尽折磨,九死一生。

这一“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是如何发生的、它的起始由来,我不知情。这里只谈个人的思想演进脉络。我猜想其他人与我大抵相同,只时间和程度稍有不同而已。

我的思想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困惑;悲愤;求索。

困惑阶段:“劳考”后从1958年7月至59年春。这期间我亲历“公社化”的一哄而起;“吃饭不要钱”的共产风;“整社大辩论”的群众野蛮武斗。亲历“大跃进”的浮夸风;深翻土地;“挑灯夜战”和“行动军事化”。亲历反科学的“大炼钢铁”和“反右倾、拔白旗”,一切“牛皮卫星”都是上面催逼出来的。这一切愚蠢至极的作法不仅劳民伤财,还摧毁科学精神和社会诚实、纯朴的道德。尽管思想上产生无数困惑和悲哀,因有“教训在心”和“十字架在背”,惟“规矩改造”而已。

悲愤阶段:始于1959年春至1959年10月。大饥馑发生,哀鸿遍地,饿殍随处可见,惨情悲景,无以笔叙!在此期间我曾无数次提笔给党中央写上书拟诉民情,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终因“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揪出”,以及与我一道下去“劳考”同学孙自筠给《红旗》写信反映实情而遭逮捕,使我痛彻骨髓,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彻底

失去信心。

求索阶段：自1959年5月一直到被捕，我一直在读“马列”的书。“反右”后决心终生不问政治，“马列”不沾；此时却日夜苦读、废寝忘食，目的在求对现实疑问的答案。我的初步结论是：毛泽东的作法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封建主义。

但是，我还担心自己犯“以点带面、以偏盖全”错误。适逢因公出差，我在太原、石家庄、北京、正定、邯郸、郑州、西安停留，方知全国皆然，非甘肃特例。

面对无数人民生灵涂炭，我是有灵有肉热血之躯，岂能熟视无睹、见死不管；如此，禽兽不如！遂义无反顾走上“决裂、叛逆”之路。

应说明的是，当时持否定态度的并非针对整个中国共产党，仅仅是蜕化变质的部分，是倒行逆施的极左路线。我认为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以及杜映华一类共产党人才是正确路线的体现者和代表者，必须谋求党的自我革新和社会道路的“改弦易辙”，解民众于倒悬。

2、关于《星火》

1959年6-7月间，我和苗庆久调盐井公社办公社综合化肥厂。其时，武山、甘谷、漳县三县合一统称武山县，盐井公社乃漳县老地盘，面积为原大半个漳县。

我与苗庆久在校时互不认识。“劳考”期间却始终在一起，没分开过。我俩同榻而卧，同锅而饭，关系融洽，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心急如焚，悲愤欲绝，除政治观点外，无话不谈，“政治观点”早心知肚明，不过隔层纸没点破而已。1959年10月底或11月初，谭蝉雪专程到盐井（漳县）来看望他，苗邀我与之相见。谭是中文系学生，也是调干生，反右中兰大“左派”称其为“兰大林希翎”，受我敬重。这次相见，各自坦露心怀，对时局的看法惊人地一致。

苗拿来几篇文稿，说要出个刊物。文稿有：刊名：《星火》；发刊辞：《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作者：顾雁（林昭北大同学——不同系；当时是兰大物理系研究生）；《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作者：林昭；《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作者：胡晓愚（兰大化学系讲

师）。《论人民公社》（或：论粮食问题——我记不清），作者：张春元（兰大历史系学生）

此四篇文稿，除《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是长诗，篇幅较长外，其余为政论，篇幅短，出一期篇幅太少，遂由我赶写了两篇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自白》。

《星火》一期刻印是由苗庆久和我在极端秘密的深夜完成的；刊物上头手拿火炬的画是苗刻画的；苗的蜡版字比我好，我俩字体迥异。

用来油印的油印机是原砖瓦厂留下来的，并非我们“捐钱”所购，其它说法是不正确的。

《星火》二期，已得稿件三篇：《海鸥之歌》，作者：林昭；《再论人民公社》，作者：何之明（现定居美国）；我的短篇小说《食母记》。1960年7月，由于情势紧迫，胎死腹中，未能见世。

3、关于“南共纲领”：

1959年国庆节后，我出差北京，到中国科学院所属《红旗菌种厂》购买菌种，偶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一书，带回传阅。

其时，我们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都有耳闻，知道斯大林的路走不得，中国毛泽东的路更走不得。究竟怎样才能拯救中国于危亡、人民于水火？大家心里茫然。惟知“科学与民主”乃救国救民之道，具体不甚了了，因此对《南共纲领》倾以极大兴趣。

4、涉案人员的一些情况

(1)林昭 女 北大新闻系学生，苏州人（住上海），错划“右派”，逮捕时间不详；原判刑期不详；1968年被处决，1980年平反。

(2)张春元 男 河南人，兰大历史系学生，调干生，错划“右派”。曾参加“抗美援朝”，坦克兵，归国后在武汉军区为某“首长”开小车，复员转业后考入兰大学习。1959年写有《中朝儿女》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电影文学》（长影制片厂主办）1959年×月号，笔名：司马章。被捕时间不详；原判“无期”；1970年在兰州被处决，1980年平反。

(3)杜映华 男 甘肃陇西土店子人,毕业于陇西师范,系解放前地下入党的中共老党员。解放后,曾任中共漳县县委副书记,1960年“三县合一”时任中共武山县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城关公社第一书记等职。被捕时间不详;原判五年(或七年),曾在武山洛门云雾山农场服刑,1970年与张春元在兰州同时被处决。1980年平反。

(4)罗守志 男 甘肃武山洛门罗坪人,捕前为中共武山县委副书记,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被捕时间不详,判刑三年(或五年)。1980年平反后,任武山四门中学校长,后任武山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等职。

(5)顾雁 男 上海人,北大物理系毕业后为兰大物理系研究生,错划“右派”,逮捕时间不详,原判十五年(?),在青海西宁服刑,1980年平反后留兰大任教,1985年正教授,后调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

(6)胡晓愚 男 江西九江人(?),北大化学系研究生毕业,1955年调兰大化学系当讲师,错划“右派”,逮捕时间不详,刑期十年(?),1980年平反后留兰大任教,正教授。2001年病逝北京,享年73岁。

(7)谭蝉雪 女 广东人,兰大中文系学生,调干生,错划“右派”,逮捕时间约在1960年6月,刑期十年(?)。1980年平反后分配酒泉师范任教,后调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有著述问世,现居上海。

(8)苗庆久 男 北京人(祖籍沈阳),解放初参军,任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中尉参谋并荣立三等功。1955年复员后考入兰大物理系,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遭逮捕,刑期二十年。1980年平反后分配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先后任校长、厂教办主任等职,现住兰州市。

(9)胡学忠 男 武汉人(原籍四川?),1955年考入兰大化学系,错划“右派”。逮捕时间不详,刑期不详(三年或五年?),原在甘肃武大坪劳改农场服刑。刑满就业后,殁于胃癌。

(10)向承鉴 男 江西武宁人(祖籍河南光山),1956年考入兰

大化学系,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遭逮捕,判刑十八年。1981年平反后,分配到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先后任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现住兰州市。(该案中,除死去的以外,他是服刑最长、最后一个离开监狱的人。)

(11)何之明 男 长沙人,1956年考入兰大物理系,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被捕,判刑十五年,1980年平反后分配到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1982年定居美国。

(12)杨贤勇 男 四川人,1955年考入兰大中文系,调干生,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被捕,判刑十年。1980年平反后分配在兰州34中任教,中学高级教师职称。2005年病逝于兰医二院。

(13)孙和 男 上海人,上海解放即参军,1955年复员后于1956年考入兰大历史系,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遭逮捕,判刑七年(?)。1980年平反后分配到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曾任中学教导主任,现住上海市。(孙为离休干部)

(14)陈德根 男 四川达县人,师范毕业后任教数年又于1956年考入兰大生物系,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被捕,判刑七年,1980年平反后分配到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1989年退休,中教一级职称。(2009年5月病逝,谭附)

(15)谢成 男 陕西人,1954年考入兰大中文系,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被捕,判刑三年(五年?),服刑届满后又卷进另一“现反”案,又遭逮捕。1980年先后两次冤案皆平反。平反后分配天水市第四中学任教,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先后任该校副校长、校长职,后加入民进,任秦城区主委、民进天水常委,甘肃省政协委员。现住天水市秦城区,有美学论著出版。

(16)田昌文 男 武汉市人,1955年考入兰大数学系,错划“右派”,1960年9月30日被捕,判刑三年,1980年平反后回武昌中学任教,现不详。

另有涉案农民,他们是:

①王凤歧,情况不详,死在武山看守所里。

②刘武雄,情况不详,听说判刑十二年。

③雷振华 男 武山白泉人,判刑五年。已平反。

④雷岩家 男 武山白泉人,判刑两年(三年?)。已平反。

还有为数众多的同学受到株连,仅我株连的有三人,后果都至为严重。

①冯淑筠 男 河北南宫人,1956年考入兰大化学系,错划“右派”。因与我友谊颇深,我被捕后,也将其逮捕入狱,关押近一年后无罪释放。返校竟拒收,使其四处流浪。后在学长胡依理(武汉人,武大化学系毕业考上兰大朱子清研究生,错划“右派”,一并遣天水劳考。此时胡在新疆天山化工厂任总工程师)帮助下得以在化工厂实验室工作。‘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被揪,遣煤矿挖煤,死于矿难。

②邓得银 男 四川人,1956年考入兰大化学系,错划“右派”。1961年毕业后分配通渭中学任教。“文革”中被活活打死。

③吕绥生 男 山西临汾人,1956年考入兰大化学系,错划“右派”。1961年毕业后分配兰州西固六中,打杂劳役,半人半鬼;“文革”关牛棚、遭毒打,致双眼玻璃体混浊,遍体伤痕;妻小赶到农村,备受歧视磨难近二十年!(现为正教授。)

在“阶级斗争”猖獗之时,受株连的何止这些!凡涉案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子女,无不牵于其中。我的外甥,1953年生,1959年他六岁时我只见过一面。“文革”期间在通讯连服兵役,各方面表现俱佳,拟“提干”,后经调查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现反舅舅”,非但没“提干”,从通讯连赶出来担粪,适逢下雨,田间路滑跌倒,粪尿糊了一身。他当时只十七岁。毛时代的“株连”比封建社会“诛九族”更广、更野蛮,甚至“八杆子不沾边儿”,也会祸从天降,毁人一生。

发生于1960年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时为全国最大要案之一,“第四号大案”。民主制国家属于公民正常民主权利,这里颠倒黑白,视为大逆,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剧。然而却是一曲响彻云霄的

青春交响乐!一部真正的中国二十世纪中期《青春之歌》。

为民族复兴、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为民主与科学真理,需要有人去喋血,去献身,去赴汤蹈火、挺身而出!

青春无怨无悔。因为它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惟愿和谐社会早日实现,民主阳光普照大地,悲剧不再重演。

林昭、张春元、杜映华,……死了的,才是最优秀的。

他们的精神不死!他们的名字将镌刻在历史上、刻在活着的人心上。

向承鉴

写于2007、2、13早五点

书 名 求 索

——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
案纪实

编 著 谭 蝉 雪

出版发行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

电话：二六七〇六六三三

传真：二六七〇一三八二

印 数 一千五百

版 次 第一版

定 价 人民币二十元

出版日期 二〇一〇年二月

ISBN 978-962-450-626-6/D.53009